

## 第一章 卢德维克

啊，到了，数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故乡。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激动；我只是感觉，这块平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之上的市政厅尖顶，好像是一个古代戴着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侵略者的堡垒，昔日的战争在它的表面上刻下了一道道不可磨灭的丑陋的伤痕。

多年来再没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了；我对自己说，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看起来似乎十分自然：从我离开这儿开始，已经过了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大多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我一直都在欺骗着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实际上却是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里既有我愉快的经历，也有我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带我来这里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地实现，而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感到不可抑制地想到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这样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怀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最后我讥讽地看了一眼外观不雅的广场，转过身去背对着它，动身去找那个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是一团糟糕：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边是一个破旧的小脸盆儿。我把皮包放在桌子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邻边楼房光秃肮脏的后背。我关上窗户，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个水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个水龙头里流出来。我看了一下桌子，还不算太差；还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挪到床边，试着坐下去。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另外床在承担我的体重时陷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使我顿时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使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用拳头撑着床，然后躺下去。并且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了毯子。床陷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是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东西能和我一起共享此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盯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时候，从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论。我能听出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子离家出走了，他的婶娘卡拉娜是个傻瓜，把这孩子惯坏了。接着一把钥匙在隔壁房间的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她的叹气声甚至也能听见！），那个男人决定给卡拉娜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我已经打定主意；我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了，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只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成功的话，除了能得到一个本地熟人的周密帮助外，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的头脑里掠过了青年时代所有的熟悉面孔，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因为只要由于所提供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地我就不愿意做。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刚到这儿来的人，这个人我曾经帮他找过工作，如果我真的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地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古怪的人物，既小心谨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据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跟她和她的儿子在一块儿生活。我有点紧

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我尽快地朝他所在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之间，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帮我拨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卡斯塔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旁边的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瞅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的到处闲逛的人们。接着我看见了他：他思索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任何吸引力。是的，正是卡斯塔，没错。我站起身来，笔直地迎向前去，好像故意要跟他相撞；开始，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手臂。我觉着他的欣喜超过了他的惊讶，他那毫不做作的欢迎方式很令人鼓舞。

我跟他解释说我刚来这儿不到一个小时，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要在这儿呆个两三天；他立即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如何惊讶和感激。突然，我觉得自己别有用心地，出于算计而不是从真正的兴趣出发而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么样？又结婚了吧？”）是很不对劲儿的。他告诉我（这使我感到放心）他仍是单身一人。我说我们之间有许多话要谈论。他表示同意，但他抱歉地说他只能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因为他得回医院值班，夜里他还得离开城里。“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住在这儿？”我失望地问道。他让我放心，他说他住在这里，在一个新村他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他加了一句，“单身生活是没有好处的。”原来卡斯塔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英里外的另一个城镇里，她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到一块儿住？”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像我曾帮他找过的那样有意思，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困难。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夫妇安排在一起住。“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其实这样也不太坏。来回旅行虽然花点时间和费用，但是我却保持了我的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怎么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住的地方去，直到我离开，如何？”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离开医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原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巴巴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到了卡斯塔的牌子。当我们从门道里走进主人房间时，我愉快地看见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一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一架唱机和一部收音机。

我称赞了这种设置，并问起了浴室。“一点也不奢华。”卡斯塔说，他对我的兴趣觉得很高兴。他领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巧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一样都不缺。“看到你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说，“明天下午和晚上你干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晚。”他带着歉意回答道，“我要到七点左右才能回来。你晚上有时间吗？”“或许有，”我答道，“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用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觉得惊诧，但他立即（好像害怕我会认为他不高兴）回答说，“你能享用它让我感到很高兴。”接着，他谨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心，加了一句，“要是今晚你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不妨留在这里好了。我要到早晨才会回来。不，甚至那时我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用，没有必要。我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麻烦是，旅馆房间不是很舒服，而明天下午我

需要一个舒服的场所。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卡斯塔说，低下眼睛。“我也这样想。”我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

这以后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卡斯塔倒了咖啡），闲聊了一会儿（我试了试床，满意地发现它很结实，既不凹陷，也不嘎吱作响）很快，卡斯塔说他应该回医院了，他快速地教给我主要的家务事项：浴缸的龙头必须格外拧紧，与经常采用的手续相反，热水只能从标着 C 字母符号的水龙头得到，收音机的插座藏在床下，食橱里有一瓶刚打开的伏特加。他把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递给我，告诉我开楼房大门的是哪一把，开他寓所门的是哪一把。在我屡屡换床的人生经验中，我已形成一种对钥匙的个人迷信，于是我窃喜地把卡斯塔的钥匙揣进我的口袋。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卡斯塔表示希望他的寓所真的会有助于“一些真正美好的事”。“是的。”我说，“它会帮助我做一桩美好的毁灭工作。”“那么你认为毁灭是美好的。”卡斯塔说。我心中暗笑，他的反应（不动声色地表示异议），使我认出了那个十五余年前初次见到的卡斯塔。虽然我喜欢他，但是我也发现他确实有点可笑，于是我回答说：“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建筑工地上，你是一个温和的工作者，不喜欢听到任何有关破坏工作的事，但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上帝的泥瓦匠。喏，如果上帝的泥瓦匠修筑了真正的墙，我怀疑我们能否毁坏它们。但我被看到的却不是墙，而是幕布，是布景。而布景是一定能被毁坏的。”

这些话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九年前）我们分手的地方。然而，这一次，我们的争论却带有一种明显的抽象性质，我们对它的具体的基本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觉得用不着再重申它们。我们只需注意到我们改变得是多么少，而我们彼此保留的不同又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么相似就行了（尽管我必须说，正是我们的不同使我喜欢他，喜欢我们的争论；我把它作为一个检验我是谁，我在想什么的试金石）。但是为了明确阐明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就算你说得对，但是告诉我，像一个你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怎么就这么肯定，你知道怎么区分一个布景和一堵墙？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你所嘲笑的幻觉是真正的幻觉吗？万一你错了怎么办？你如此起劲要毁坏的是真正的价值又怎么办？”他接着又说：“一个被贬低的价值和一个没有标记的幻觉有着相同的可怜的外衣。它们是同一的。把其中一个当作另一个是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我陪着卡斯塔穿过城镇回医院去的路上，在口袋里玩弄着钥匙，想到同一个随时随地，甚至此时此刻正在穿过一个新村凹凸不平的路面时，愿意跟我开诚相待的老朋友一起回去是多么愉快。由于卡斯塔知道我们明天晚上还可以呆在一起，所以他把奥妙的哲理探讨转到更为现实的事情上：他想弄明白我到底会不会一直等到他明天七点回来（他没有别的钥匙），并问我是否真的没有别的忙需要他帮助。他用手摸着脸说：“只是要去一次理发店。”因为感到胡子拉碴的不爽快，“把这事交给我。”卡斯塔说：“我要让你享受到第一流的修面。”

我接受了卡斯塔的好意，让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小理发店，里面有三把大转椅耸立在三面镜子前。其中两把椅子上占着人，头向后仰着，脸上擦满了肥皂；两个穿着白罩衣的女人俯身在他们上面修面。卡斯塔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附耳低声说了几句，那女人在一块布上擦擦剃刀，朝店后面叫了几声，又出来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新来的姑娘接过那个被丢开手的男人，那个与卡斯塔说话的女人向我点点头，示意我坐到那张空着的椅子上。卡斯塔跟我握握手，走了。他一走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把头向后靠在头枕上。由于多年的经验教会我不要瞧自己的脸，所以我避开直对着我的镜子，抬起眼睛，让视线游离在污浊斑驳的白色天花板

上。

我凝视着天花板，感到那女人的手指把白布单塞到我的衬衫领子里。然后她走了回去，我仅听见剃刀在皮革上上下下滑动的声音。我陶醉在一种舒适的懒洋洋中。感觉到她那柔滑的手指在我的脸上涂抹着肥皂，我在想象着这样被一个毫不相识的女人轻柔地抚摸着，而对我却毫无意义，而我也对她毫无意义，这又是多么奇怪和可笑。接着（由于内心甚至在安静时也从不停止恶作剧），我把自己想像成是一个毫无防备的完全任凭那女人用剃刀摆布的受害者。由于我的身躯已在空间溶解，我能感到的只是她的手指在我脸上的触摸，我想像那双温柔的手捧着（转动，抚摸）我的头，仿佛它没有连结着我的身体，仿佛它独立存在，而在旁边桌上伺候着的尖利剃刀只是为了使这种独立存在臻于完美。

然后这抚摸停止了，当我听到那女人走回去，真的拿起剃刀时，我对自己说（因为我的内心还没有停止恶作剧），我必须看看她长得是什么样子，这位我头颅的保管员，我温柔的暗杀者。我把视线从天花板转移到镜子，顿时一股寒气透过我的脊梁，我的恶作剧已经突然地、可怕地变成了现实：那女人正在镜子里俯向我——我觉得我认识她。

她用一只手按住我的耳垂，轻轻地用另一只手刮掉我脸上的肥皂；当我瞧着她工作时，一分钟前使我莫名惊诧的形象开始慢慢溶解和消失。她俯在脸盆上，两只手指沿剃刀滑动抹去肥皂沫，重新直起身子，把椅子轻轻转动了一下；我们的眼光顿时又相遇了，我又一次觉得我认识她。确实，这张脸是有些不一样了，它已变成一张老女人的脸：灰暗，憔悴，微微凹陷；但我已经十五年没有看见她了！在这段时间里，岁月已在她真实的脸上增加了一个面具，但庆幸的是，这面具上面的两个孔把她真正的眼睛，真实的眼睛给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我所认识的眼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而这影像重又变得混乱了：一个刚来的顾客走进来，坐在我后面傍着轮子；他跟这个女人攀谈起来，谈起这个美好的夏天，谈起他们正在城外修建的游泳池；当她答对时（我注意她的声调胜过注意她说的话，她的话毫无意义），我认为我听不出她的声音；它听起来干巴巴的，魂不守舍，漠不关心，几乎是粗声粗气；这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在她给我洗脸，用双手使劲抚摸我的脸时（虽然她的声音很陌生），我开始再次认为我认识她，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在这里，重又抚摸我，久久地温柔地抚摸我（我已经完全忘记她是在给我洗脸，而不是在抚摸我）。她跟那位多嘴的顾客唠唠叨叨发出陌生的声音，可是我拒不相信它；我宁愿相信她的手，希望从她的手认出她；我希望能从她触摸的温柔程度来判断我是不是认识她，她是不是认出了我。

她拿过一条毛巾，把我的脸擦干。那位多嘴的顾客正在为自己的一句玩笑话而大声发笑，我注意到这个女人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她大概没能听见他说的话。这令我感到高兴，我感觉这是她认出了我，而且受到震动的证明。我决定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跟她说些话。她从我脖子上拿掉布罩。我站起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克朗的钞票。我等待着我们的目光相遇，以便我能叫出她的名字（那位顾客还在絮叨着什么），但是她把头转开去，迅速地，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接过钱，以至于我忽然感到我是一个被幻觉折磨了的疯子，找不到勇气对她说点什么。

我万分沮丧，离开了理发店。我仅仅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认出一张曾是亲切可爱的脸，这是一个非常冷漠的影像。

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旅馆（在路上我看见一个老朋友，阿罗斯拉夫，我们民间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是我躲开了他的目光，就像在逃脱他那响亮、急促的音乐一样），给卡斯塔打电话。他



还在医院里。

“那个你让她给我修面的女人，她的名字是不是叫露茜·塞贝塔？”

“她现在用的是另外一名字，但是这正是她。你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卡斯塔问。

“哦，许多年了。”我回答，竟然也没有想到去吃饭，我又离开了旅馆（天渐渐暗下来），开始在全城闲逛。

## 第二章 海伦娜

今天晚上我想早点睡，或许睡不着，但是我还是想早点睡，巴威尔今天下午去了波拉迪斯亚，明天一早我要飞往布尔诺，剩下的路乘公共汽车。小兹德娜将有两天一个人独自度过，她不会在意的，不论怎样她不会在乎我们的陪伴，至少是不在意我的陪伴，她对巴威尔特别崇拜，因为他是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他知道怎样控制她，他知道怎样控制所有女人。过去知道怎样控制我，现在仍是如此，这星期他又像往常一样，抚摸着我的脸，答应我从波拉迪斯亚回来途中，在摩拉维亚停留一下，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下了。他大概是认识到我们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我希望他是想恢复原状，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现在，既然我已经与卢德维克相遇？噢，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痛苦，但是不，我绝对不会向悲哀屈服，但愿悲哀永远不会玷污我的名字，就像伏契克所说的，他的话是我的座右铭，甚至当他们折磨他，甚至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伏契克也从不丧失信心，我才不在乎他现在合不合潮流，也许我只是一个傻瓜，但是他们就是有时髦的怀疑态度也是傻瓜，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愚蠢同他们的愚蠢交换，我不想让我的生活一分为二，我愿意它始终如一，这就是我对卢德维克如此坦率的原因，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和趣味。他非常正常，坦率、快活，对一切都很明朗，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这也正是我一直所喜欢的。

我并不对我的现状感到羞耻，我只能是我的老样子。直到十八岁时，我所知道的全部生活只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布尔乔亚家族的寓所，还有功课，功课，功课，我差不多脱离了真实的世界，当我一九四九年来到布拉格时，那就好像一个奇迹，我是那样快活，我永远不会忘记它，这就是我绝对不能把巴威尔从我心头抹

去的原因，即使我已不再爱他，即使他伤害过我。不，我不能，巴威尔就是我的青春，布拉格，大学，集体宿舍，伏契克歌舞团的大部分人，如今知道它对我们意义的人已经很少了，正是在那儿我与巴威尔相遇，他唱男高音，我唱女低音，我们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和表演，我们唱苏联歌曲，唱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歌曲，当然还有民歌，我们喜欢那些最优秀的民歌，我是那样地爱上了摩拉维亚民歌，它们成我生活的主旋律。

至于我如何爱上巴威尔，我现在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它仿佛是一篇童话故事。在解放一周年纪念的那天，在旧城广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我们团也在那里，我们一伙到处走动，几万人中的一小群，检阅台上坐着形形色色重要的政治家们，包括捷克的和外国的，传来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和欢呼声，然后陶里亚蒂本人走到麦克风前，以意大利语说了几句话，整个广场像刚才一样以欢呼，鼓掌和口号予以回应，我听见巴威尔在人声喧哗中自顾自地高嚷着什么，似乎有点与众不同，当我盯着他的嘴唇时，我意识到他是在唱歌，更确切地说，是在尖叫着一首歌，他想让我们听见他，加入他，他在唱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它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在当时十分流行：Avanti popolo, a la riscossa, bandierarossa, bandiera rosa.....

这就是十足的巴威尔，他从不满足于个人的感受，他一定要鼓动起人们的情绪。这是多么地美妙，我想，在布拉格的一个广场上，用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向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袖致敬。我非常希望陶里亚蒂像我一样被感受到，于是我竭尽所能大声地加入了巴威尔的歌声，其他人也加入了我们，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到最后整个歌舞团都唱起来。可是欢呼声太大，我们仅仅是一小部分，与至少五万人的其他人相比，我们只有五十人，这个差距太悬殊了。我们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因为我们认为，在整首歌曲的第一节我们不会获胜，我们的歌声不会被人听到。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紧接着一个奇迹发生了，渐渐地，更多的声音开始唱了起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歌声慢慢压倒了广场的人声鼎沸，像一只蝴蝶从一个发出巨大的嗡嗡作响的巨大的蛹里钻出来。最后，蝴蝶，歌声，或至少这最后几小节，飞向了检阅台，我们激动地注视着那位意大利人发白的脸，当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他挥了挥手，示意听到了这歌声时，我们高兴极了，我敢肯定，虽然我离得太远无法看清楚，但我看见了他眼里的泪水。

在极度地热情和兴奋当中，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突然抓住了巴威尔的手，他也用力握住了我的手。当这一切平息下去，另一个发言人走到麦克风前时，我担心他会把手放开，但是他没有那么做，我们直到示威结束始终都牵着手，甚至后来也没有松开。人群散去了，我们一连几小时漫步在春意盎然的布拉格街头。

七年以后，当小兹特娜五岁时，我永远无法忘记，巴威尔对我说，我们并非为了爱情而结婚，而是由于党的纪律结合的。我明白他这是在一次气头上说的话，我知道这是一句谎话，巴威尔是为了爱情才和我结婚的，他直到最近才改变，但说出这样的话依然是那么可怕，他不就是那种人吗？总是告诉每一个人爱情如今不一样了，爱不是对世界的逃避而是战斗中的支持，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甚至腾不出时间吃饭，带上两个干卷饼去共青团办公室后，我们也许整天无法见面，我常常为了巴威尔而等到半夜，这时他才从那些没完没了的、六小时、八小时的会议中回到家里。在我空闲时，我抄下他在各种会议和政治培训班的发言，他对它们极为看重，只有我知道政治表现的成功对他是多么地重要。在取消公众生活与私生活的差别问题上，他从不厌倦地反复强调新人与旧人不一样。而如今，多年以后，他却抱怨道那时同志们总是干涉他的私生活是如何落伍。

我们恋爱了将近两年，我变得有点不能忍受了。毫不奇怪，

没有一个女人会永远满足于热恋，巴威尔十分满足，他喜欢这种无需承诺的便利，每个男人都具有自私的德行，女人应该为了她自己和她作为女人的天职而站起来。不幸的是，巴威尔较之我们团的别的人，尤其是跟我亲近的几个女孩在这个问题上缺少一致。她们同别人谈过一次，结果是她们在委员会上指责了巴威尔，我不清楚她们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事，但她们肯定是对他有点不礼貌。在那些日子里，道德是相当严格的，人们的确做得有些过分。但是，在道德上做得过分可能比我们现在这样道德败坏要强许多得多。巴威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搭理我，我觉得我把一切都毁了。我很绝望，我试图自杀。但他后来又回心转意了。噢，我的膝盖抖得好厉害，他希望我原谅他，并送给了我一个上面刻有克里姆林宫的项链垂饰，这是他最珍贵的财物，我从未把它解下来过，更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巴威尔的纪念品，我幸福得流出了眼泪，两星期后我们结婚了。全团的人都来参加婚礼，又唱又跳，几乎闹了一天一夜。我告诉巴威尔，要是我们互相背叛了，那就等于背叛了婚礼上的每个人，背叛了旧城广场示威中的每个人，其中也包括陶里亚蒂，而当我回顾我们终于背叛了一切时，我不由得感到好笑……

让我想想，明天穿什么好，那件粉红色的毛线衫，那件塑料雨衣，它们最能显出我的身材，我已没有过去那么苗条了，但我还可以用某种东西来弥补这些不足。某种年轻姑娘们所没有的东西，一个绝对成熟的生命的魅力，使金德雷被吸引到我身边的正是这一点。可怜的孩子，当我跟他说他，我将乘飞机而他得独自走时，我仍能看见他脸上的失落神情，他为每分钟都能和我相伴，并炫耀他那十九岁的男子气概而感到幸福。仅仅为了让我留下印象，他会打破所有速度记录。噢，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他的技术还行，是一个出色的驾驶员，电台里的人都喜欢带他去干不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呢？知道周围有人喜欢我总是很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惬意的。这几年我在台里特别不受欢迎，人们把我看成一个持强硬路线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教条主义者，一只党的警犬，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但是他们绝不会使我因热爱党，把我的空闲时间全都献给党而感到羞耻。我还能为了什么而活着？巴威尔有别的女人，我甚至都不想再调查她们。小兹特娜崇拜他，十年来我的工作完全是例行公事。编辑，计划完成的纲要，采访模范谷仓和模范挤奶女工。在家里的处境是无望的，只有党从没有损害过我，我也从未损害过党，就是在几乎所有人都企图背弃它的日子里，在一九五六年每个人都在议论斯大林的罪行时。当时人们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开始否定一切，说我们的报纸谎话不断，国营商店毫无益处，文化衰退，农庄绝不应该集体化，苏联没有自由，最严重的是，甚至连共产党员也都到处这样议论。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巴威尔也这样讲，而且他们全都为他鼓掌。巴威尔总是在受到夸奖，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开始了。他是一个独生子，他母亲将他的照片放在她的床头，她的神童，小时了不起可大了却不怎么样。他即不抽烟，也不喝酒，但他没有赞扬就不能活，这是他的酒精和尼古丁。在这个动人心魄的新机遇中，他是何等兴奋，他如此感情激动地讲到那些可怕的司法凶手，以至于人们光是哭泣，我可以断定他们是多么喜爱他的义愤，我恨他。

幸亏党严厉谴责了这些搬弄是非者。当他们平静下来时，巴威尔也平静下来了，他并不想用大学舒服的讲师职位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冒险，然而某种东西却留了下来。一种冷漠、怀疑和使人担心的病菌，一种暗暗地、秘密地繁殖的病菌。我不知道如何反击它，同任何时候相比我只是更加紧密地依靠党。党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事物，我可以对它倾诉所有最隐秘的思想，既然我对巴威尔或其他人在此问题上已没什么好说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我。当我们必须处理那令人厌烦的事儿时，这一切全都显露了出来。我在台里的一个同事，一个已婚男人，同技术科的一个姑娘

有关系暧昧。这个姑娘还没有结婚，没什么责任感，玩世不恭。他的妻子在绝望中求助于我们党委，我们花了几个钟头调查这案子。我们见了那个妻子，那个姑娘，单位里各方面的证人，我们试图使事情适当圆满的解决，并且做到绝对公正。那个男的受到了党内处分，姑娘受到了警告，两人都向党委保证不再互相见面。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言行不一，他们答应不再来往只是为了让我们安静下来，事实上他们却暗地里继续见面。可是事实总会暴露，这事很快就被我们发现了。于是我采取强硬的态度，我提议那个男人应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故意欺骗和损害党。说到底，如果他对党不诚实，他还有什么资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恨撒谎，然而我的提议并未通过，由于另一个那个男人惩戒而未受处罚，但至少那姑娘不得不离开台里。

由于以上的一切他们把怨恨都发泄在我身上，他们使我看起来像一个怪物，一个野兽，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诽谤。他们开始探听我的私生活，而这恰恰是我惟一致命的弱点。任何女人都不能过丝毫没有感情的生活，如果她能够，那她就不会是一个女人，那么干嘛要不承认它呢？由于在家里没有爱，我就到其他地方寻求它，并不是我发觉了什么，而是在一次会议上他们公开斥责我，说我是个伪君子，试图通过婚姻破裂使他人当众受到侮辱，试图驱逐、开除、毁掉别人，而我自己只要抓住机会就对丈夫不忠，这就是他们在会上讲的。背地里他们甚至更加恶毒，造谣说我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好像他们无法明白我对其他人那么严厉的惟一理由是，我知道一个不幸的婚姻意味着什么，使得我采取那种措施的不是恨，而是爱，对爱的爱，对他们家庭的爱，对他们子女的爱。我想要挽救他们，我也有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我为他们担忧！

虽然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我真是一个满肚子坏水的老巫婆。人们应该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到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私生活中去，也许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完美，我的确是一个卑鄙的政委，爱插手别人的事。但是这是我做事的风格，我只按照我的感情去行事。现在这已经太迟了，我始终相信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把自己虚伪地装扮成公众的我和私下的我，这种事只有小布尔乔亚才能干得出来。这就是我的信条，我从来都是依此行事，绝无例外。

至于说我怀有恶意，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无法忍受那些年轻姑娘，那些小荡妇。她们对自己和青春胸有成竹，对年纪大的女人毫不同情。她们有朝一日也会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我不想听什么她爱他的话，她懂什么爱情，她会和任何男人在头一夜就睡觉，毫无顾忌，没有任何羞耻感。啊！当他们把我比作这样的女人时，我感到屈辱。因为我，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尽管有过几次风流韵事，但不同之处在于我始终在寻求爱情。如果我看错了人，若我没有找到它，我总会厌恶地掉头就走，去别处瞧瞧，尽管那样会简单得多，忘掉我纯洁的爱情之梦合并它们，并跨越这道界线步入自由的。但却畸形的领域，在那儿，羞耻、禁忌和道德都不复存在，那只有无耻、畸形的自由，在那儿一切都是允许的，男人心中野兽般的性冲动是惟一最强烈的力量。

可是我知道，一旦我越过这道界限，我将丢弃自我成为另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谁，我恐惧于这种可怕的变化。因此我一直在寻求爱情，不顾一切地寻求爱情，一个适合我接受的爱情，以往的梦想和未来的憧憬伴随着我。因为我不愿意我的生活分裂为二，我希望它能一以贯之。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们见面时，你使我惊喜万分的原因，卢德维克，亲爱的，亲爱的卢德维克……

当首次步入他的办公室时，我觉得非常有趣，他甚至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即刻开始工作，说明为了那篇报道，我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以及我怎样描述那个结果。但是，当他开



始对我说话时，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我的紧张被他意识到，他便立即换了更平常的话题。问我是否已经结婚，有没有孩子，在哪儿度假，说我看上去如此年轻、漂亮，他真好，他想使我不受怯场，我想到我遇到的所有好夸夸其谈的人，他们从不让你插话，与卢德维克无法同日而语，巴威尔总是一味谈他自己，但是这确实有趣，我和他在一起待了整整一个小时。和来时相比，对他基本原则的了解没有增加多少。一回到家我立即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可是这完全不对，或许我很高兴，这给了我一个借口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肯赏光读读我写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咖啡馆会面，我的报道只有干瘪的四页长。他读了一遍，对我殷勤地笑笑，说它写得非常之好。他其实对我作为一个女人更感兴趣，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远在他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不能肯定是感到了恭维还是侮辱。可他确实对我不错，我们互相理解。他不是所谓的书呆子类型，那些人实在让我倒胃，富于生活经历的他甚至在矿井干过，这正是我真正喜欢的那种人。我告诉了他这一点，但最使我激动的是，他是摩拉维亚人，他甚至在一个辛巴隆乐队演奏过。对于自己的耳朵我已无法相信，这就像再次听到了我生命中的主旋律，看到我的青春从失而复得，我的整个心都向着他。

他问我整天干些什么，当我告诉他时，他说（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半开玩笑半带同情），这不应是你这样的人过的日子，该改变一下了。他说我的人生应掀开崭新的一页，把更多的时间给予生活的欢乐。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欢乐一直是我的一部分信条，没有比如今的怨恨和乏味更让我憎恶的了。他说信条并不等于是一个行为，那些站在屋顶上高呼欢乐的人往往是最悲伤的人。啊，多么真实，我真想叫出来。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毫不拐弯，明天四点钟他一定会在电台前面接我，我们一块开车去乡间。可我是一个已婚女人，我反对说，和一个陌生男子跑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森林里去是我自己所不能同意的，卢德维克幽默地回答说。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者，但当他这样说时他显得是多么悲伤！看到这样，我全身激动不已，多么快活。他想要我，在我告诉他我已结婚后他越发想得到我，因为这使我更难到手，男人们对他们认为难到手的东西最有兴趣。我吮下他脸上的全部悲伤，意识到他爱上了我。

第二天我们听到佛尔塔瓦河在一边细语，看见森林在另一边陡然升起，这一切是多么浪漫，那正是我喜欢的生活，我敢说我的举动就像一个傻姑娘，和已有十二岁孩子的母亲也许不相称。可是我不能自己，我笑啊，跳啊，把他拉在我身边。当我们停下来时，我的心怦怦乱跳，我们相对而立，卢德维克微微俯下身，轻轻地吻了我一下，我挣脱开他，但接着又抓住他的手，重新开始奔跑。我的心脏时常有点不适，经过一番最轻微的尝试，它开始狂跳起来，我必须跑上一段阶梯。于是我放慢了一点，以便缓过气来。忽然我听见自己在哼着我最喜爱的歌曲的头两节，啊，我们的花园里，阳光如此明媚……当感觉到他听出来后，没有丝毫羞涩地放声唱出来。我感到岁月、忧郁、悲伤、上千个灰色阴影从我身上脱落下来。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小客店，吃了一些面包和香肠。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冒险！尽管一切都那么平常，粗鲁的服务生，脏兮兮的桌布。我对卢德维克说，你知道我要去摩拉维亚三天，搞一个“国王们的骑马”的特别节目吗？他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又一个巧合，他说那是他的家乡，这使我狂喜不已，我要挤出一些时间跟你一起去，他对我说。

我有点怕，我想到了巴威尔，想到了他在我心里燃起的希望火花，我并不是对我的婚姻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打算尽力挽救它，主要是为了小兹德娜。不，这是谎话，主要还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过去，为了回忆逝去的青春。但是我无力拒绝卢德维克，我恰恰没有力量，现在生米已成熟饭，兹德娜已经睡了。我

感到害怕，此时此刻，卢德维克正在摩拉维亚，明天当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到站时，他将在那儿接我。

## 第三章 卢德维克

是的，我信步漫游。在横跨莫拉瓦河的桥上我停了一会儿，凝视着下游。这样丑陋的河（这样褐，看上去不像水而像粘土），它的堤岸多么令人压抑：在那条街道上，有五幢傻乎乎的平房，每一幢都像一个畸形的孤儿单独伫立在那里；显然它们原是为了组成一个宏大整体的胚胎，但是它后来却杳无音信了；两幢房子装饰着陶瓷天使和水泥小浮雕；很明显，它们雕刻粗陋，破碎不堪：天使失去了翅膀，浮雕许多地方已经剥落得露出砖头，弄不清它们的含意。在孤儿似的房子那边，街道尽头是一排铁塔和高压线，接着是散布着几只鹅的草地，最后是一望无边田野，田野不知伸向何方，它掩饰了摩拉瓦河粘滞的褐土。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呈现它们自身形象的倾向，这个看法（我从童年起就知道了这点，但它当时对我无任何意义）突然使我想起俄斯特拉发。那是一个空荡荡的矿城，在那里满眼里废弃的房屋，肮脏的街道，宽大，低廉的寄宿舍。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就像一个机枪流弹的靶子立在桥上。我不忍继续瞧那条有五幢孤寂房屋的满脸苦相的街道，究其原因在于我不忍想到俄斯特拉发，于是我转往上游走去。

我沿着堤岸上一条小路走去。小路的一侧是一排粗大的白杨，右边丛生的杂草向水面倾斜，在河对岸，有一些仓库、工场和几个小工厂的院子；小路的左侧，在树的那一边，有一堆散乱的垃圾堆，再往远，旷野淹没于铁塔和高压线。走在这条小路上，仿佛走在跨越宽阔水域的小桥上。为何我把这个景致比作一片水域。原因在于，首先，它使我战栗；其次，我时常处在坍塌的小路边缘。这景致所生产出的梦魇般的幻觉不过是见到露茜后不想回忆旧事的隐喻；压抑的回忆似乎被我投射到周围所见的一

切中去了：田野、院落和仓库的孤寂，河流的阴沉，以及与风景相协调的弥漫的寒气。可我清楚那些回忆对我来说是无法逃避的，它们围绕着我。

那些给我带来最初的大灾难的事件（我与露茜的相识，就是它无情干预的一个直接后果），也许是用一种超然的、甚至轻松的语调来描述可以。这全都要归结于我对愚蠢的玩笑那种倒霉的嗜好，以及玛格塔对理解任何玩笑的那种不幸的无能。玛格塔是那种看一切都很认真的女人（这使她完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人），她与生俱来的主要才能就是容易轻信。在这里，轻信并未被我用作愚蠢的委婉语，一点也不。她比较活泼，而且很年轻（十九岁，大学一年级学生），因此她那信任一切的天真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可爱。事实上伴随着这种天真的是一种自然本性的毋庸置疑的可爱。大学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她，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认真地对她下过功夫，这并不影响我们（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文雅地、全然无害地跟她开玩笑。

但是，对于玛格塔的反应来说，那类玩笑没有讲出一点时代精神，因而开得都不是很成功。那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后的头一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一种真正崭新和不同的生活，它的种种特点——它们铭刻在我记忆里——是严肃而庄重的。那些具有严肃性的特点不是以双眉紧锁的形式，而是以一种笑的形式出现。是的，那个年代告诉世界，它们是最灿烂的岁月，任何不会欢乐的人都会突然被怀疑是在悲叹工人阶级的胜利，或者（这同样是犯罪）是在向个人主义的内心悲伤屈服。

我非但没有内心悲伤的负担，而且有幸具有相当多的玩笑感。尽管如此，欢乐的时代特征却并不能说是属于我：我的玩笑感太轻浮。不，流行的欢乐缺乏嘲讽和恶作剧。正如我说过的，它属于高度严肃的种类，所谓获胜阶级的历史乐观主义，一种庄严和禁欲的欢乐——简单说，一个大写的欢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记得那时我们以“学习小组”的形式经常在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对每一个成员做出正式评语。正如那个时代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我有许多职务（我在学生会里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而且，由于我还是一个优等生，我很有希望能得到一个积极的评语。如果对于我对祖国的忠诚，我的辛勤工作，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群众鉴定通常是如下这句话，“有个人主义的表现”，惊慌不安于我是毫无理由的，甚至一些批评意见也包含在最积极的评语中，责备某个“对革命理论缺乏兴趣”，另一个人“对人际关系缺乏热情”，第三个人“谨慎和警惕性不足”，第四个人“缺乏对妇女的尊重”。但是，这样的评语一旦不是惟一考虑的因素（当它与另一个因素联系起来，或者当我们跟一个同事产生不愉快，或者受到怀疑和攻击），作为毁灭我们的种子，那些“个人主义的表现”，那些“缺乏妇女的尊重”就可能这样被播下。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党员档案中都装着最致命的种子，是的，我们每一个人。

有时（认真少于玩笑）我针对个人主义的指责为自己辩护。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向我证明，说为什么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由于具体的证据很少，他们总是说，“因为你的举止像一个个人主义者。”“我的举止怎么啦？”“你有一种奇怪的笑。”“那又怎么样？这是我表达欢乐的方式。”“不，你的笑像是你在考虑自己。”

当同志们在我的举止和笑容上烙上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的标记时，我真的相信了他们。我不能想像（我没有大胆到竟敢想像）大家会错，革命本身、时代精神会错，而我个人会是对的。我开始监视我的笑，很快我就发现有一丝裂缝存在于我原来的人和应该成为（按照时代精神）及试图成为的人之间。

然而，哪一个是我真正的我？让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多面的人。

这些面孔日渐增多。我大约在夏日前一个月，开始接近玛格塔（她就要读完第一学年，我读完第二学年）。和所有二十岁的人一样，我试图戴上一个伪装，刻意扮成老成的样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做出一副超然和冷淡的神气。我假装有一层特别的外壳，既看不见，又穿不透。我认为（很正常地）我能凭玩笑树立起我的超然，但尽管我一直擅长它，我却总是以一种不自然的，做作的，令人生厌的举止对待玛格塔。

谁是真的我？我只能重复说，我是一个多面的人。

在会上我认真、热烈且有克制，在朋友们中间——一个挑逗的贫嘴的人；和玛格塔在一起时——玩世不恭，妙语横生；独自一人时（以及想到玛格塔时）——无法确定自己，像一个中学生那样激动。

最后哪副面孔才是真正的面孔呢？

不。它们都是真的。我并非是一个有着一副真面孔和九副假面孔的伪君子。我有多副面孔，因为我年轻，不知道自己是谁，或想要成为谁（我因一副面孔和其他面孔之间的不同而感到害怕。它们似乎都不太适合我，我笨拙地在它们中间摸索着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年轻人不得不在生活中集中全部精力，去理解具有如此复杂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的爱情，并且常常忽略他那情欲的对象。他所爱的女人（在这点上他颇像一个年轻的小提琴手，非到演奏所需要的技巧自动到来，他是不会全神贯注在一首乐曲的情绪内容上）。由于我已指出我对玛格塔中学生般的迷恋，它沉重地压迫我，对我的思想和感觉施加的影响比她本人还大。我需要说明，我所感到的激动应是缘于对自己那尴尬的自信的缺乏，而不是由于我在恋爱。

为了减轻我窘迫的负担，我夸耀我的知识，一有机会就跟她采取相反意见，取笑她的所有看法。这样做较容易，因为尽管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头脑（而且美丽，像所有的美一样，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气息），她依然是天真单纯，信任一切的。她生来只能看到事物本身，而无法揭示它背后的东西；她对植物学很有悟性，但往往无法识破一个同学开的玩笑；她让自己沉浸在时代的狂热中，但当面对一个根据结果证明方法正确的原则的政治行动时，她却总是那样迷惑不解像听到一个玩笑一样。因此，同志们决定她需要以革命运动的战略战术的具体知识增强她的热情，并在暑假送她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党员培训班。

很明显，我的计划被培训班打乱了。我本来打算同玛格塔一起在布拉格单独度过这两个星期，以便使我们的关系（到那时为止，这关系不过是包括散步，谈话和几个接吻）进入一个更加具体的地步，而且由于这是我仅有的两个星期（我将在一个学生农业队度过下四个星期，并得到允许在最后两个星期去摩拉维亚看我的母亲），因此当玛格塔非但不分担我的情绪，没有显出一点懊恼，甚至还告诉我她盼望着它时，我的反应既痛苦又妒忌。

从培训班（它在中波希米亚的一个城堡举办）她寄给我一封信，这正是十足的玛格塔，对周围的一切都满怀诚挚的热情。一切都是那样新奇：早晨的健美体操、谈话、讨论，甚至他们唱的歌。她非常喜欢那几所富有的“健康气氛”，还不厌其烦地加了几句，大意是西方的革命不久就会到来，等等。

我的确很赞同她的话，我甚至相信西欧即将发生一场革命。惟有一样事我不能接受：面对我的情欲她那幸福快活的情绪。于是我买了一张明信片（为了伤害她，使她震惊，令她慌乱），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散发着愚昧的臭气！托洛斯基万岁！卢德维克。”

玛格塔以一封简短而俗气的便笺回答了我那具有挑衅性的明信片，并对我暑假寄给她的其余信件不予理睬。我正同我的学生队一起在山里叉干草，她的沉默对我来说是很难忍受的。我几乎



每天都给她写信，信中随处可见恳切悲哀的迷恋之词。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两周，我们能不能至少看到彼此间的一些什么，我恳求她。我愿意把回家看孤苦伶仃的母亲的计划放弃。只要和玛格塔在一起，我愿意去任何地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爱她，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是视野里惟一的女人，我发现缺少姑娘的男孩的情形是难以忍受的。但是玛格塔没有给我回信。

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八月间回到布拉格，我设法在她家里把她截住。我们像往常一样，沿着伏尔塔瓦河散步，穿过帝国草坪（一个忧郁的白杨岛屿和荒芜的游乐场），玛格塔不但认为我们彼此什么也没有改变，而且行为照旧。问题是，所有僵硬、坚决的相同（相同的接吻，相同的谈话，相同的微笑）给人的压抑压倒了我的极度恐惧。当我想知道第二天是否能再见她时，她叫我打电话，定一个时间。

我真的打了电话。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告诉我，玛格塔已经不在布拉格了。

我郁郁寡欢，就像一个没有女人的二十岁人，一个很少懂得性爱短暂而笨拙的碰撞，老是一心想着它的叮当腼腆的年轻人那样。那几天是那么的难以忍受的漫长和无聊；我不能看书，无法工作，为了打发时间，从早到晚看三场电影，一场接着一场。以此来压抑住我体内深处发出的夜猫子的枭鸣。虽然由于我处心积虑的企图，玛格塔总认为我是一个沉湎女色的登徒子，但我却没有勇气同在街上走路的姑娘们说话，她们美丽的大腿使得我内心作痛。

因此，当九月份冬天到来时我真高兴，因为又要开始上课以及（开学前几天）处理学生会的工作了。在学生会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各种各样的事可以使我忙个不停。然而，在我回来的那天，一个电话打来，说是让我上区党委办公室。当时的一切我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我走出学生会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我感到在整个夏天一直折磨着我的痛苦都渐渐消散了。我怀着一种惬意的好奇赶到那里。摁了铃，校党委主席把我让进屋。他是一个既高且瘦的年轻人，有着一头金发和一双冰冷的蓝眼睛。我以当时标准的党员问候向他敬礼：“劳动光荣。”但他没有回答，而是说：“马上回去。他们在等你。”我在最后一个房间又看到了三个党委成员。他们叫我坐下来。

我被他们问及的第一个问题认不认识玛格塔。他们问我是不是一直在跟她通信。我表示肯定。他们问我是否记得我写的东西。我说不记得了。但那张带有挑衅性文字的明信片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不能回忆起什么吗？他们问。是的，我说。好吧，那么，玛格塔给你写了些什么？我耸耸肩，我不能当众议论她所写的私事，因为那是事情内容所不允许的。他们问她有没有写有关培训班的事。写了，我说。她说了些什么？她说她喜欢那里，我回答。还有呢？说谈话挺有益，我回答，还有小组的风气。她谈起过健康的气氛很盛行吗？是的，我说，我想她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她说起过她正在发现乐观主义的力量吗？是的，我回答。你对乐观主义如何认识？他们问。乐观主义？我问。呢，没什么特别的看法。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他们继续问。当然，我不安地说。为了缓和这种讯问式的语气，我说我喜欢快乐的时光和快乐的笑。一个虚无主义者也喜欢快乐的笑，其中一个人说。他嘲笑受苦的人民。快乐的笑也会出自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继续说。你认为没有乐观主义能建设社会主义吗？另一个人问。不能，我说。那么你是在不同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人说。你是什么意思？我抗议道。因为在你看来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他们说，开始发起进攻。人民的鸦片？我采取守势问。不要企图回避这个问题。这就是你所写的话。宗教被马克思看成是人民的鸦片，而你却认为我们的乐观主义是鸦片！这就是你写给玛格塔的话。我

很难想象，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突击手，如果得知激励他们去超额完成任务的乐观主义是一剂鸦片，他们会说什么。另一个人加了一句，对一个托洛斯基分子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被看做是一剂鸦片。而你就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天哪，你怎么能这样想？我抗议道。你写了还是没有写？一些玩笑话或许是我写的，可那是在两个月前，我记不得了。他们说，我们很乐意让你重新记起，于是大声给我读我的明信片：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气氛散发愚昧的臭气！托洛斯基万岁！卢德维克。这些话在若大的党委办公室听起来是那样可怕，吓得我呆若木鸡。我意识一种难以抗拒的毁灭性力量向我袭来。可是，同志们，这只是开玩笑，我说，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你们觉得好笑吗？一个同志问其他两个。他俩摇摇头。你们得了解玛格塔，我说。当然了解，他们回答。那么你们没有发现吗？玛格塔对什么事都很认真。我们常常对她开一点玩笑，试图吓唬吓唬她。挺有趣，一个同志应道。你的其他信件并未显出你对玛格塔不认真。你是说我给玛格塔写的所有信件全都被你们看过了吗？因此，你有取笑玛格塔的理由，另一个人说，是她对什么事都很认真。那告诉我们，她对什么很认真？比如说，党，乐观主义，纪律等有关的事，对吗？这些都是使你好笑的事？要知道，同志们，我说，我甚至忘了以上你们所说的那些话，那肯定是在我很匆忙的时候写下来的，这只是几个句子，一个玩笑，我都没有再想一下。如果我怀有什么恶意，我不会把它寄到一个党员培训班！你怎么写的这并不重要，你写得很快还是很慢，在你的膝盖上还是在书桌上，你所写的话只能出自你内心。没有别的。要是你把事情想一遍，你也许不会写它。事实上，你写出了你的切身体会。事实上，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了。我们知道你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对着党，一副面对着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我感到我已理屈词穷，翻来覆去陈述那些个老理由：这全是在开玩笑，这些话非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空洞，我当时的情绪应受谴责，等等。我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了。他们说我在一张公开的明信片上写了我想说的话，正是为了给那儿的每个人过目的，我的话具有一种不能以当时的情绪来解释过去的真实意义。然后他们问我已有多少托洛斯基的书被我看到。一本也没有，我说。他们问我是谁借给我这些书的。谁也没有，我说。他们问我会见过哪些托洛斯分子。一个也没有，我说。他们告诉我，我在学生会的职务已被解除，并要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们。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他们。然后他们说，自然科学部党组织将按照党员的标准处理我的问题。他们站起来，也不看我。我说了“劳动光荣”，然后离开了。

后来，我记起在学生会办公室里还留有许多东西。我的办公室抽屉里有私人文件，还有袜子，被我啃了一半的朗姆蛋糕也还留在食橱里，是从我母亲在档案材料旁边的炉子里烘出来的。虽然我刚把钥匙交给了党委，可楼下的看门人认识我，给了我房间钥匙，它和别的钥匙都挂在一块木板上。整个过程我都记得，直到最末的细节：这钥匙用结实的细绳系在一块小木板上，在上面，我的办公室号码是用白色漆着的。我开了门，在办公桌前坐下。我打开抽屉，把我的东西取出来。我慢慢吞吞，毫无心情。在这段短暂的较安静的时间里，我尽量想正视关于我所发生的事，对此我应该怎么办。

没过多长时间，三个党委办公室同志走了进来。这次他们激动且粗暴，嗓门很大而且毫无克制，尤其是其中最矮的那个负责党员干部的行政人员。我怎么到的这儿？他厉声对我说。我有什么权利在这儿？他想要让保卫人员把我拉走吗？我在办公桌抽屉里乱翻什么？我告诉他我是来拿朗姆蛋糕和袜子的。在他看来，即使这儿到处都是我的袜子，我也根本没有权利在这儿。然后他走到办公桌前，仔细检查里面的文件，笔记本。由于它们的确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最后，在他的监视下，我终于被允许把它们

放在一只手提箱里。它们把被子和肮脏、皱巴巴的袜子塞在一起，然后我用垫在食橱里接碎屑的油腻纸把朗姆蛋糕包起来，设法塞进手提箱。他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当我离开时，他的临别之言是：别让我在这儿再见到你。

刚从区党委同志们的咒语中解放出来的我，从他们不可战胜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我，感到自己是受冤枉的。我的话里绝没有如此可怕的东西，我最好去找同玛格塔很熟的，我可以相信的人谈这样的人会告诉我整件事都很可笑。我探访了一个同学，一个共产党员，当我把这桩事从头至尾告诉了他时，他说区党委素以顽固不化、一本正经而闻名，他了解玛格塔，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我去访晤的这个叫泽门尼克，自然科学部党小组主席的职务将由他来担任，对于我和玛格塔，他是非常了解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泽门尼克已被选为党小组主席，这似乎是运气。事实上，我不仅很熟悉他，而且我相信，根据我的摩拉维亚背景，他对我也会给予同情的。泽门尼克喜欢唱摩拉维亚民歌，那时唱民歌是很时髦的，当然不是像小学生那样唱，而是扯开喉咙唱，一只手臂还伸向上方，说得更精确些，身着那些平民的装束，那是一些，他们父母刚离开舞场下，他们便被生在辛巴隆琴下的那些平民的服装。

由于我在自然科学部是惟一个真正的摩拉维亚人，因此获得了某种特权：在每一个特殊的场合，开会，庆祝活动，“五·一”节，我都应邀参加一个摩拉维亚乐队，那是一个由我同学中两三个业余爱好者临时拼凑的乐队。两年来，我们三个（单簧管、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总是行进在“五·一”节游行队伍里，而泽门尼克，这个长相漂亮，喜欢引人注目的人，穿上借来的民间服装，加入到我们中间，载歌载舞，手臂在空中挥动。尽管布拉格是他生长的地方，从来没有踏进过摩拉维亚，可他却喜欢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演乡村青年，我不由得挺喜欢他。我很高兴，我生长的那个地区远古以来一直是民间艺术的乐园，它的音乐如今是那样受到欢迎，那样被人赞美。

另一个好处是泽门尼克了解玛格塔。我们三人经常参加同一个学生集会。有一回，我编了一个故事，并且从据说是研究这一题目的学术论文中引用了一些话来给予证明，这个故事大概是关于生活在捷克山区里的矮人部落的事。玛格塔因从未听说过这些部落而感到大为惊奇。这并不值得奇怪，我说。资产阶级学术故意隐瞒了这些矮人的存在，因为资本家把他们当作奴隶随意买卖。

但是，应该有人把这件事大白于天下！玛格塔叫道。为什么人们不写它？它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事实！

没有人写它的原因也许是，我忧郁地说，这桩事相当微妙。你知道，那些矮人有与众不同的性爱能力，这就是他们的畅销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共和国要输出他们以换取硬通货。尤其是把他们输往法国，在那里他们被半老徐娘的资本家太太们雇来当佣人，虽然他们本应是被用作完全不同的目的。

其余的人忍俊不禁，这不完全是由于我诙谐的虚构，更是由于玛格塔全神贯注的表情，她赞成（或反对）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的热情。他们紧闭双唇，以便不影响玛格塔学到新东西的情绪，他们中一些人（特别是泽门尼克）还加入进来，补充说明我对矮人的讲述。

我记得，当玛格塔问起那些矮人像什么模样时，泽门尼克带着一副坦率的神情告诉她。塞丘雷教授，这位玛格塔和在场的人有幸经常在讲台上看到的人，就属于矮人血统，也许他的父母双方都是矮人，但至少一方是矮人是毫无疑问的。泽门尼克宣称是从塞丘雷的助教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这位助教曾经整个夏天都和教授夫妇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他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夫妇二人

加在一起还没有十尺长。一天早晨，他以为他们醒着就进了他们的房间，他惊奇地发现他们不是肩并肩地躺着，而是头对脚地躺着：塞丘雷教授蜷在床的下半端，教授夫人蜷在床的上半端。

是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说，这太清楚不过了，塞丘雷教授和他夫人都有矮人血统。就是那个地区所有矮人头对脚睡觉的遗传习俗，古时候，他们不是把棚屋修在圆形或正方形的地址上。而是修在长方形的地址上，因为不仅丈夫和妻子，而且整个家族都成一长串地睡在一起，头靠脚地一个接一个。

想起我们当时的捏造，即使在这个阴暗的日子我看到一丝曙光。泽门尼克，这位将对我的案子有决定权的人，对玛格塔和我的幽默感是了解的，他会理解，那张明信片不过是针对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又好捉弄的姑娘的一次不明智的逗弄。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双眉紧锁，然后说他将看看能做什么。

这段日子，我的精神一直恍恍惚惚，像往常一样听课，等待着。由好几个党员组成的委员会把我召到他们根前，他们的工作便是确定我是否属于一个托洛斯基集团。我试图证明，我对托洛斯基的主张确实毫不知晓。我迎着那些讯问者的目光。我在寻找信任，有几次我发现了它，我希望这种信任的目光能长久地停驻在我心中，滋养它，耐心地设法从这种目光里燃起希望的火花。

玛格塔继续躲着我。我知道还是因为那张明信片的缘故。我过于骄傲，敏感，不愿向她询问任何事。后来有一天，她自己在大学的一条走廊里叫住我，说：“我想跟你谈一谈。”

终于，经过几个月的破裂之后，我们又一同散步。时至秋天，我俩都穿上了长长的军用胶布夹雨衣——的确，很长，抵达膝盖下面，这是那个最粗放的年代的时装。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河堤上的树木光秃而又黯淡。玛格塔将整件事的始末对我说了。还在培训班时，她就被负责的同志叫去，问她是否一直都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收到信。她说是的。谁的，他们问。她说她母亲写给他的。还有别的人吗？噢，时常也能收到另一个朋友写来的信，她说。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吗？他们问。她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扬同志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她耸了耸肩，不想引述我的明信片。你给他回过信吗？他们问。我回过，她说。你写的什么？他们问。噢，没写什么，大都是关于培训班之类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他们问她。噢，是的。我喜欢它，她回答。你在信中对他说这样说了吗？是的，我说了。她回答。那么他如何回应你的？他们继续追问。他的反应？顿了顿她问。啊，他有点古怪，你们得了解他。我们当然了解他，他们说，我们想知道他在信中都说些什么。他的明信片你是否能给我们看看吗？

“你不生我的气，是吗？”玛格塔说，“我被迫给他们看那张明信片。”

“你不必道歉。”我说，“他们之所以找你，就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

“我不是在道歉。”她抗议道，“把明信片交给他们并未令我羞愧。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你是一个党员，党有权了解你究竟是谁，你想的什么。”我写的东西使她感到震惊，她告诉我。毕竟，众所周之，托洛斯基是我们所主张所奋斗的一切的首要敌人。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要她告诉我接着发生的一切。

其后，那张明信片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想知道她对明信片有何看法。她说它是可耻的。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主动把它交给他们。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明白为什么要提高警惕。她垂下头。他们问她是否知道党有多少敌人。她说是的，她知道，不过对于扬同志她是怀疑的……他们问她对我了解多少。他们问我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我有点莫名其妙，我确实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有时我会说出一些不适合共产党员身份的话。他们要她



举个例子。她说她回忆不起任何具体的事，但对我来说，任何东西都不是神圣的话。他们说从我的明信片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她告诉他们，我们经常争论许多事情，我在会上说的和跟她讲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会上活力四射的我与她在一起时却嘲讽一切，使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他们问她，她是否认为像这样的人配得上党员的称号。她耸耸肩。他们问她，当党的成员把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经常挂在嘴边时，党是否还能鼓励社会主义建设。她说不能，像这样绝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告诉她，她可以走了，但有关这一切不要让我知道：他们想看看我还会写些什么。她对他们说，她绝不想再见到我。他们说她这样做是不对的，为更多地了解我的情况，她应该与我继续保持通信。

“我的信也被你拿给他们看了？”我问玛格塔，一想到我在信中那些热烈的倾泻，脸上不由得变得通红。

“我又如何是好？”玛格塔说，“只是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不可能再继续与你通信。我不能写信而令你落入陷阱。所以我又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就停止了。我不想见你的原因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任何事，我担心你会问我，而我将对着你信口雌黄。我不喜欢说谎话。”

我问玛格塔，那么今天是什么促使她来见我的呢。

她告诉我是泽门尼克同志。他在大学的走廊里碰到她，把她带进自然科学部党组织的办公室。他告诉她，他已听说我以前给她写过一张带有反党言论的明信片。他问她这些言论是什么。她告诉了他。他问她对这些言论有何看法。她说她反对它们。他告诉她，这样做是正确的，并问与我是否还经常见面。她感到窘迫，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告诉她，培训班给部里寄来一封高度赞扬她的报告，党组织是信赖她的。她说听到这话她很高兴。他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私事，但在他看来，根据一个人所交的朋友是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而我并不是她最理想的朋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后几周，他的话一直在她头脑中萦绕。既然几个月前我们已不再见面了，泽门尼克的劝告基本上是画蛇添足。然而，正是这个劝告促使她思考：鼓励一个人的朋友与他断交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这是否太残忍，站在道德的角度看是否允许；她这方面首先与我不再来往，这是否不公平。她去看望了管理培训班的那位同志，向他征求意见，看能不能同我谈关于明信片的事，结果得知没有理由再保密了，因此她叫住我，希望能谈一谈。

接着她把长期以来困扰着她，折磨着她的心事对我倾诉。是的，她决定不再见我的这一行为是非常糟糕的，他都是可以挽救的，无论他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回想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这部影片在党的圈子里非常流行），一位苏联医学研究者把他的首先交给了其他国家自由支配而不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行为近似于判国。电影的结尾尤其使她感到：尽管这位科学家最后受到了来自同事们的名誉法庭的谴责，但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弃他，她尽其所能振作他的勇气去补救他酿成的大错。

“那么，你已决定继续和我在一起了。”我说。

“是的。”玛格塔拉住我的手说。

“但是，请告诉我，玛格塔，你真的认为我犯了严重罪行吗？”

“是的，我是这么看的。”玛格塔说。

“那你认为我有资格继续作一名党员吗？有还是没有？”

“没有，卢德维克，我认为你没有权留在党内。”

我看出来了，如果被玛格塔当作是现实的这场游戏向我发出邀请，我就会得到几个月来朝思暮想的一切：正如蒸气赋予了气船动力一样，一举两得，既满足了我的激情，也赋予了她动力。她愿意把她的肉体 and 灵魂都献给我，是她那福音的精神得到满足惟一的条件。为此，我作为她的救助对象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

罪。可这并不符合我的本意。我渴望已久的肉体此时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但我不能为此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不能承认一桩莫须有的罪；我不能接受一个无法忍受的判决；我不能容忍听见一个本应亲近我的人认定这样的罪，这样的判决。

我没有向玛格塔妥协，于是我失去了她。不过，我真的认为我是无辜的吗？当然，我不断地使自己确信，整桩事全是荒唐可笑的，但尽管如此（说到这里，凭着事后的认识我们会感觉到我现在所产生的那种最令人困惑最清楚不过的感受），我最终还是从审问者的角度来看明信片上的那几句话。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恐惧和惊慌，某种可怕的事物确实隐藏在我幽默的形式后面。我从来和党有着一定距离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投靠到革命者一边”，仅仅是出于一个简单（！）的考虑（我们认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我该怎么讲呢——本质问题，而不是一个选择问题；一个人要么是一个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运动融为一体，要么不是，于是只能希望成为一个革命者，而这就令他不断受到负罪感的折磨，因为他不是革命者）。

回想我当初的心态，我不禁想到基督教凭借它的巨大力量使教徒相信他生而即有的原罪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像其他人一样）永远低着头站在革命及其政党面前，这种看法也就逐渐被我适应了，即我的话尽管的确是为了开个玩笑，但仍然是一种犯罪，苦闷的自我批评的波涛在我脑海里汹涌澎湃。我这样告诉自己，那些想法出现在我脑子里绝不是偶然的，同志们早就指责我有“个人主义的表现”和“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们是多么正确）。我对自己说，我一直对我所受的教育，我在大学里的地位，以及我作为知识界一员的未来而自鸣得意，我那战争中死于集中营的工人父亲，对我的玩世不恭是无法体会的。我指责自己居然让他的工人精神在我身上了无痕迹。我尽可能从各个方面来责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己，最后终于承认受到某种惩处是多么地必要。我惟一反对的一件事：把我开除出党，以及紧接着的对我的“敌人”的称呼，作为我从小到大始终拥护并坚持一切的敌人而活着，那真是难以忍受的凄苦。

这样的自我批评（以及恳求宽恕）我对自己反复背诵了一百遍，对各种委员会不下十遍，最后又在自然科学部的全体会议背诵了一遍，在全体会议上，泽门尼克致了首先发言（雄辩有力，才华横溢，记忆犹新），建议以委员会的名义将我开除出党。与会成员在我进行了自我批评后，进行了讨论，结果一致反对我。没有人为我说话，在场的所有人（约有一百个人，包括我的教师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是的，每一个人都举起手来赞成不仅把我开除出党，而且（这完全使我出乎意料）把我开除出大学。

我坐火车在当晚就赶回了摩拉维亚。在家乡我寻求不到一点安慰。好几天我都没有勇气把这消息透露给我母亲，她对我的学习一直引以为荣，我回来后的第二天，一位同我一起在辛巴隆乐队演奏过的校友亚罗拉夫，顺便造访我家，发现我在家时他兴奋不已。原来过两天就是他结婚的好日子，于是马上邀请我做他的男宾相。由于我不能拒绝一个老朋友的请求，这样我就以婚礼的形式来庆祝我的毁灭。

更不用说，亚罗斯拉夫是一个完全的摩拉维亚爱国者，本地传统的专家，忠情于民俗的他，他把婚礼变成了一个传统仪式和风俗的展览：辛巴隆乐队，“族长”及其漂亮有力的发言，引新娘跨过门槛的仪式，歌曲，化装服，以及填满这一天的许多细枝末节，这一切更多的是以人种史教材为模本而不是活的记忆设想出来的。有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亚罗斯拉夫作为一个人气很盛的乐队的新的首领，尽管循规蹈矩于一切旧的习俗，但（大概是念念不忘他的职业以及屈从于当时的无神论口号）却对教会发生关系，虽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牧师和上帝的祝福的传统婚礼会是

怎样的；他让族长作了全部仪式的讲演，但却祛除了讲演中一切圣经的主旨，尽管他们的结合应归功于圣经。伤感使我无法加入到醉醺醺的婚礼聚会中，民间仪式本是一潭清水，可加入氯以后却仿佛令人很敏感，因此当亚罗斯拉夫要我（以此唤起我和他一块在乐队里演奏的那个时光的心酸回忆）抓起单簧管，和其他人共同演奏中，我拒绝了。我蓦然看见我自己在最后两次“五·一”游行中演奏着，而那个泽门尼克，生在布拉格却穿着摩拉维亚服装的家伙就在我身旁唱呀，跳呀，挥动着手臂，我拿不起这只乐器。突然间，所有这些带有民间风味的刺耳声响都使我感到厌恶，感到恶心……

不能继续求学的我也就没有了缓服兵役的资格，这个秋天通知书肯定会送到我手里。为了消磨时光，我签约参加了两个长期劳务队：一个是在格德沃尔特夫附近修路；另一个是在夏末到来的时候在一家水果加工厂帮忙干些季节性的活计。然而，秋天还是来了，于是一个清晨（在火车上彻夜未眠后疲倦不堪）我来到了俄斯特拉一个难看、生疏的边区兵营所报到。

我和分队里其他年轻的新兵站在一个院子里，大家互不相识；在开始陌生的低沉的气氛中，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粗野和任性，我们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之间惟一的人类联结便是我们无法设想的未来，猜测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人猜测我们将佩戴黑色徽章，有些人拒绝相信，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这意味着什么。我深谙其道，对这种展望感到十分恐惧。

接着一个中士走来，领着我们来到一所营房。我们涌进过道，沿着过道进入一个大房间，巨幅标语、照片、糟糕的图画占据了房间墙壁的所有空间。一幅题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幅是用大红纸做成的，它使我们面对的那堵墙的大半部都看不到了，站在那下面一把椅子旁的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益显矮小。中士指着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坐在椅子上。那个老头把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块白布单系在小伙子的脖子上，然后在靠着椅腿的一个公事皮包里，取出一把电动推子，把它插入小伙子的头发。

这把椅子就是把我們变成流水作业的生产线：剃掉头发以后，我們被驱入隔壁房间，在那里脱得一丝不挂，用一个纸袋裹着我们的衣服，用绳子拴牢，通过一个窗口递进去；然后，我們光着身子和头皮穿过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领了长睡衣；穿着长睡衣，紧接着走到隔壁，在那里领了军靴；穿着军靴和睡衣，我們排队穿过院子来到另一所营房，在那里被发给衬衣，衬裤，绑腿，皮带和军服（上面有惩戒营的黑色徽章）；末了我們来到最后一所营房，在那里一个军士大声念我们的名字，我們被划分成几个班，然后被指定房间和床铺。

当天我們列队吃完饭后就上床睡觉了。早晨有人把我們叫醒，带出营房去矿井，到了矿井口，以班为单位分为作业组，分发了工具（钻子，铁锹和安全灯），我們中间几乎没有人懂这些工具该怎么用，然后罐笼把我們送到井下。当我们拖着腰酸腿疼的身体回到地面上时，等候着的军士叫我們集合起来，把我們押回营房；中饭后我們出去操练，然后接受政治教育，强制唱歌，清理个人卫生。那间有二十个床铺的房间是我們惟一清静的地方。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被打发了。

在开始的时候，在我看来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仿佛是一团漆黑。我們所执行的那些没人格的命令抹去了一切人的情感。当然，这种漆黑仅仅是相对而言，它不仅因为环境本身，而且还在于我們调整视觉所遇到的困难（就像从光天化日下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們的视觉适应了，即使在半阴暗中人身上的个性也能被我們发现了。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是最后才作这种必要的改变的人之

因为这样的命运对于我整个身体都是难以接受的。佩带黑色徽章的与我們命运相同的士兵们，得到的只是最简单的操练，不发

任何武器，他们的井下工作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虽然他们的劳动有报酬（在这个方面其他士兵的经济状况不如他们），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可怜的安慰物。毕竟，他们完全是由这样一些人所拼凑成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敌人，怎么会把武器交给他们掌握。这意味着他们受到的是更加粗暴的待遇，而且强制性的两年服役期的延长也是他们要随时牵挂着的。然而，最使我恐惧的是，一生不能翻身，被我的同志们永远地、最后地判为我视作死敌的那伙人。最初的那些日子，我好似一个固执己见的隐居者生活在这群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中，不愿与我的敌人交友，拒绝使自己适应他们。那时要获准请假是很难的（随便请假对无任何人都是不允许的，只是作为特殊的优惠他才能得到一次准假，这就是说只准他每隔一周外出一次——在星期六），但即使当士兵们成群结队涌出去，在酒吧间寻欢作乐时，我也宁愿孤独。我常常躺在铺上，试图读点什么或学点什么，从这种特立独行中吸取点营养。我深信我只要完成一件事：为我“不是一个敌人”的权利，为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权利而斗争。

我为了使连队的政委相信，我的到来纯属误会，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敌人我被开除出党的，而是因为我的理智主义和玩世不恭才有这样的结果，我多次拜访了他。我再次（已经无数次）重述了那桩荒唐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不再是好笑的了。事实上，由于我戴上了黑色徽章，它听起来反而越发可疑，仿佛某件更严重的事不想让人知道。我必须公正地指出，政委耐心地将我的叙述听完，并对我要求得到公正的愿望给予了意想不到的一点理解。为了了解我的案子，他确实到某个上级那里去进行调查，但他最后把我叫去时，却嗤之以鼻地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他们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你是一个有名的托洛斯基分子！”

我开始明白，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我在具有生杀予夺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权的最高法庭里留下的形象了，这个值得怀疑的形象（尽管它一点也不像我）比实际的我还要更真实。我们俩的形影关系已经颠倒，我没有权利指责它不像我，因为我对这种不相像负有罪责，它仿佛是一个十字架，压在我自己的身上。

可我还是不肯屈服。我的确不想承担我的不相像，成为他们已判定我不是的那种人。

经过大约两周的时间我才适应矿井里的艰苦劳动，习惯了风钻，即使在我睡着时也能感觉到它的震动在我身上颤抖。我不顾一切地拼命干活。我想打破所有的纪录，很快我就如愿以偿了。

然而没有人把它当作是我政治上认错的一种表示。由于我们全都按计件取酬（确实，尽管他们扣除了住宿和伙食费，但仍有盈余），别的许多人，无论政治态度如何，也都很拼命地干活，目的是能从这个无所做为的岁月里至少捞到一点划算的东西。

虽然都把我和这个政权对立起来，社会主义集体的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形式我们仍要坚持：我们这些敌人，害人虫，也要讨论时事（在政委警惕的目光下），每天听激励斗志的政治讲话，把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的照片和宣传美好前景的标语贴在布告栏上。开始，我自告奋勇干这一切，但同样任何人都不把它当作我政治上成熟的一个代表：其他人为了引起连长关注以便晚上请假时也是很自愿的。他们都不把这种政治活动看成是政治，在他们看来，那仅仅是当局要求他们走的一个形式。

不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抵抗是行不通的，只有我自己才能察觉“与众不同”，别人都视而不见。

在可以任意使唤我们的军士中间有一位身材矮小，黑不溜秋的下士，他是斯洛伐克人，与其他军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举止温和，从不谗待士兵。大家都很喜欢他，尽管有人恶意地声称没有什么比他的好心肠更傻的了。当然，军士们与我们差别很大，他们有武器，还时常去打靶。一次，那位黑不溜秋的下士在射击中



以冠军的身份载誉而归，对于来自我们几个人的祝贺（一半是出于好感，一半是出于嘲弄），他只是略微红了红脸。

几天后，我与他不期而遇便问他是怎样成为一名好射手的。他抬起头用疑惑的眼光盯我一眼，说：“这是我自己窍门。靶心楣被我设为帝国主义者，于是我便变得很疯狂，几乎是弹弹命中。”我正想让他描述他所设想的帝国主义长什么样，他用严肃、沉思的口吻补充说：“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为什么祝贺我。如果发生战争，我要射杀的就是你们。

当这个可爱的小战士（由于他不能对我们大声呵斥，不久他就被调走了）嘴里说出这番话时，我明白了，把我与党和同志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被彻底切断了。本来属于我的生活道路现在已经弃我而去了。

是的。所有纽带都不复存在了。

一切都失去了：学业，为革命工作，友谊，爱情以及对爱情的追求——整个富有意义的一生都失去了。时间是我惟一剩余的东西。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现在的时间与我过去所认识的已经面目全非：一种以工作，爱情和努力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间。一种小心地隐藏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我毫不考虑就接受了时间。现在的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是纯粹的时间，是处于最基本、最原始状态的时间，我被迫叫它的本真名字（因为我现在度着纯粹的时间——纯粹的、空白的时间），以便我无时无刻不记住它，使它不断地出现在我眼前，感觉到它的重量。

每当音乐响起，我们耳边回荡起一首旋律，便忘记了它仅仅是时间的一个面孔。每当管弦乐队在乐谱里的一个休止符中平静无声时，我们便听到了时间，纯粹的时间。噢，休止符仿佛就是生存的场所，但其长度不是由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我正活在一个无尽休止符中。我们不可能模仿其他部队，把皮尺一点一点地剪去，来证明两年的限制一天天在缩短。而对于佩带黑色徽章的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兵，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无限期的服役。二连四十岁的安布罗茨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四年了。

在那时服兵役还有一个老婆或未婚妻在家里等着，那的确是一个悲惨的命运。这意味着要从远处堤防着她那不设防的存在；这意味着要恐惧经常和你生活在一起，争取在她难得一次的探望中，指挥官取消早已许诺过的假，让她在兵营门口空守。带着像他们徽章一样黑的幽默感，士兵们常常讲一些军官埋伏伺机等待从那些沮丧的女人身上揩点油水的故事，而这些油水按理是属于那些禁闭在兵营的士兵们的。

然而，这些家中有女人等待的男人毕竟还有一条可以通过乐谱里的那个休止符。无论它是多么纤细，不管它细得多么令人痛苦，一碰即断，它总还是一条线。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线是不存在的。我已同玛格塔没有任何关系，我收到的惟一来信是母亲写来的……哎，那还能算一条线吗？

不，一条线不是那样。如果家仅属于父母，那它就不是一条线；它只是过去。父母的信是来自我们正在摒弃的一个海岸的音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只是意识到启程的港口离我们已经多远了，亲人们的真诚的爱将我们包围。是的，他们的信说，港口带着它那全部令人慰藉、质朴的美在那里。可是归途已经看不到了。

我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持续性，它已从我的手中被夺走了。我所能做的，只有放弃我一直实实在在地、无法逃避地生活于其间的外在现实，去体验它的内在现实。于是我的眼睛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失去个性的半阴暗，开始注意起我周围的人们——他们之间的相互注意相比，我是晚了些，但幸运的是，还没有迟到与他们完全隔离的地步。

首先在半阴暗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昂扎，他讲一口布尔诺街头难懂的俚语，他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打了一个警察。他自己

说，他是那位警察的老同学，因私人不和痛打了那人，但是法庭并不从他的想法出发看待这件事，半年的监狱生活之后他便直接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是个第一流的机械工，但对重操旧业或干别的什么活，都显得漠不关心。他没有任何牵挂，更不要说未来，这给了他一种无忧无虑，目空一切的自由感。

彼德利奇是我们中间惟一另一个具有内心自由感的人。如果说我们营房中最古怪的人，是谁那就是他了。在充军者九月份的规定聚集之后两个月，彼得里奇才来到我们中间。最初他就在一个步兵营，但出于宗教原因，他坚决不带武器，接着当局又截获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件，信中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旗号义正辞严地呼吁遣散所有军队。当局对他的举动困惑不解，虽然那里他是惟一不带武器的士兵，却仍然被允许参加操练。他经受了泥泞中的行军，并且非常正确地做持枪立正姿势；他也参加政治学习，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予以猛烈抨击。但是，当他我行我素写了一幅要求全面裁军的标语，并把它张贴在营房里时，军事法庭以兵变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判。法官们被他那和平主义的长篇大论搞得手忙脚乱，下命令让一组精神病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撤消了对他的指控，把他调到我们这里。彼德利奇十分高兴：他是惟一一个故意挣来黑色徽章的人，并且以佩带它为荣。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到自由的原因——虽然他不像昂扎那样死皮赖脸，而是以静修和勤劳来表示他的独立。

其余的人都因恐惧和绝望而苦不堪言。瓦尔加，一个来自南斯洛伐克的三十岁的匈牙利人，根本不关心什么民族偏见，战争中好几个部队都参加过，在前线双方的战俘营都有他的身影。红发彼特兰，他的兄弟逃出边境时射死了一个哨兵。斯塔纳，一个住在布拉格工人居住区杰士卡夫的二十岁浪荡子，他的胡闹使当地议会忍无可忍，他不仅在喝得烂醉的状态下参加“五·一”游行，而且还故意当着欢呼的市民在路边撒尿。巴威尔·佩克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时候，曾伙同自己同学一道示威反对共产党人。他很快就发现我和那些在政变后把他踢出大学的人是一个鼻孔出气，一想到我们俩竟落得同样下场，他便流露出一种恶意的满足了。

我可以讲出许多与我命运相同的其他士兵的事，但我只想讲我最感兴趣的一个人：昂扎。我还记得我俩最初的一次谈话。那是在井下巷道的一个断层，碰巧我们肩靠肩坐在一块，嘴里嚼着面包口粮。忽然我的膝盖被昂扎拍了一下，说：“嗨，喂！你是聋子还是哑巴？讲讲你落难的经过？”由于我当时的又聋又哑（想的只是为自己辩护），我只得费力地解释（我随即便感觉到我的话语在他听来准是多么勉强、做作）我是怎样来到矿上的。我为什么不应属于这里。“嗨，你这个该死的杂种！你意思是我们就属于这里？”我试图把自己要说的表达得更清楚（选择听上去更自然的话语），可是昂扎吞下最后一口面包，打断我说：“你知道，如果你的个子也和你的愚蠢一样高，你的头上会被太阳烧一个洞。”这点粗俗的却不带任何恶意的挖苦话使我很难为情，我竟然纵容自己对失去的特权忧心忡忡，不能自拔——而且自己特权和自我纵容却一直坚决反对。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昂扎和我成了忠实的朋友（由于我擅长心算，而受到了他的尊敬。在发薪日，故意少给我们的找头，由于我的迅速计算而一次又一次的避免）。一天晚上，他说我是个笨蛋，不应在营房里度过自己的休假，然后便拖着我与这帮人出去。我始终还记着这事。我们这伙人还挺多，总共有八个，包括斯塔纳、瓦尔加，再加上一个从前学应用美术的学生塞勒克（由于他在学校坚持画立体画而也被弄到这里来了。现在，他偶尔会被恩准用特大炭笔在兵营的墙上画满中世纪的武士，胡斯运动派成员最后还画上链枷和镶满钉子的棍棒）。至于在那里我们选择很少。城中心是禁止进入的，在我们可以进入的地方有很多场所

限制我们进入。可是那天晚上我们运气不错。附近一个娱乐厅在举行舞会，到那里去我们是允许的。我们只付了一点入场费便一拥而进。大厅里摆满桌椅，可人却很多：只有十个姑娘，约三十个男人，有一半是本地炮兵营的士兵。我们的出现使他们立刻警觉起来。我们感觉得到他们盯着我们的目光，点着我们的人头。我们在一张空长桌边坐下，点了一瓶伏特加，可是那位难看的女服务员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宣布，这里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在这里都是没有的，昂扎只好给每个人要了果汁。然后他从我们每个人那里把钱收集起来，不久，拎着三瓶朗姆酒回去，我们随即在桌子下面把它和果汁勾兑在一起。我们的动作必须非常小心才行，那些炮兵一定在盯着我们，一旦发现我们违章喝酒精饮料，他们便会立即告发我们。据说，那些武装部队的人对我们特别敌视：一方面，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可疑分子（罪犯、凶手、恶棍，和那些宣传性间谍小说所描写的一样），他们可怜无辜的家庭成员的喉咙随时可能被割断；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相差五倍的薪水使他们更妒忌我们。

我们的状况因此而变得异乎寻常：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沉闷和疲劳。剃光头是每隔一周都要做的事，以便去掉头脑中一切自尊的思想。我们被剥夺了尘世的权利，对生活已毫无指望。但是我们有钱。噢，钱不太多，可对于一个每月只有两晚上自由的士兵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笔财富。在那几个小时中（在那几个不被禁止的场所里），在漫漫无期的日子里的长久的失意可以通过他百万富翁般的表现而获得补偿。

台上，一个很差的乐队在为舞池里几对舞伴交替伴奏着波尔卡和华尔兹，我们一边冷淡地盯着姑娘们，一边呷着饮料，我们被饮料中的酒精搞得轻飘飘。我们的情绪很好。我已深深沉醉于某种欢乐之中。一种自从我最后一次与亚罗斯拉夫和辛巴隆乐队的小伙子们一起演奏后就再没找到过的友谊感。这时，昂扎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了一个把尽可能多的姑娘从那些炮兵手中带走的主意。这个主意简单得令人叫绝，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塞勒克，这位性格外向的丑角，在这方面最有劲头，令我们满意地充分扮演了他的角色：与一位浓妆艳抹的黑发姑娘跳过舞后，她被带到我们的桌前，倒了两杯我们的混合饮料，然后说：“好极了，让我们干杯吧。”姑娘同意后。这时，一位穿着佩有两道杠的炮兵服的矮子走到姑娘身边，用最无礼的语气问塞勒克：“她空吗？”“嗨，当然，乖小子，”塞勒克说，“她完全是你的。”当空洞的波尔卡伴着翩翩起舞的姑娘和那位害相思病的下士时，昂扎离身去打电话要出租汽车。塞勒克看见出租车一来，就走过去站在出口处；姑娘跳完舞后以上洗衣间的借口摆脱了下士，几秒钟后我们便听见了出租汽车开走的声音。

B连的安布罗茨是第二个得手的人（他带走的姑娘年龄肯定要大一些，而且谈不上有魅力，但她周围依然有四个炮兵整晚围着不离开）。十分钟后，安布罗兹，那个姑娘以及瓦尔加（考虑到没有姑娘愿意跟他走）爬进了出租汽车。加速开到镇上另一个酒吧间去与等在那里塞勒克会面。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姑娘被我们其中的两个拐走了，于是只剩下了斯塔纳、昂扎和我。现在那些炮兵用一种不祥的眼光注视着我们：他们察觉到了我们和姑娘人数减少的内在联系。我们极力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但很明显，一场战斗在所难免。“再来一辆出租汽车和一次光荣的撤退，怎么样？”我说，一位金发姑娘始终在我的视线里徘徊，这天晚上我曾设法同她跳过一次舞，但没有勇气劝她与我一道离开。后来我一直希望另找一个机会，可我再也没有靠近她，因为来自炮兵的热忱保卫实在是无法逾越。“我们只是这样干。”昂扎说，起身去打电话。可是，当他穿过舞场时，炮兵们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地过去围住了他。这场殴斗似乎一触即发，斯塔纳和我除了起身向我们的同伴增援，别无选择。有一

阵子，这群炮兵只是站在那里，保持着不祥的沉默。突然，酩酊大醉的炮兵（他可能也在桌子下面兑了酒）开始发表激烈的长篇大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父亲长期失业的经过，站在一旁瞧着这些佩带黑色徽章的资产阶级臭小子们使他感到恶心，如果没有他的同志们的阻止，他也许就会在那个杂种（指昂扎）下颔上狠狠来一拳。炮兵的话一停，昂扎就彬彬有礼地询问，炮兵同志们想要他做什么。立刻离开这里，他们说。昂扎回答说，我们要做的正是叫一辆出租车然后离开。到这光景，那个炮兵眼看就要暴跳如雷了。这些混蛋，他尖声尖气地嚷道，这些该死的混蛋！我们不分昼夜地在这里干活，一个子儿都没有，而这些资本家，这些外国代理人，这些卑鄙的杂种却乘着出租汽车兜风！哼，这次就算了，我告诉你们，否则我真想就用这双手把他们扼死！

所有人包括老百姓和士兵很快都加入了进来，而舞厅的工作人员则竭力想避免一场事件。突然，金发女郎在我眼前出现。她一直独自坐在她的座位上（远离这场混乱），现在正朝厕所走去。我尽可能掩人耳目和她先后进了前厅，衣帽间和厕所都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游泳新手被投进了深水区。管它害臊不害臊，我都得运动起来。我在口袋里四处翻寻，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一百克朗的钞票，对她说：“和我一起走？你会玩得更快活的。”她眼光朝下看着钱，耸了耸肩膀。我告诉她我在外面等候。她点点头，消失在女厕所里，不一会儿穿着外套的她走了出来。她冲我嫣然一笑，说她一眼就看出来我与众不同。这话使我感到很受用，于是我挽起她的胳膊，走到街对面的拐弯处等着昂扎和斯塔纳从大厅门口出来。金发姑娘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学生，当我回答是学生时，她告诉我，前两天在工厂衣帽间里，有人把她的钱偷走了，由于这些钱是属于工厂的，她很害怕他们会为此将她送上法庭，我能不能借给她一百克朗？我把手伸进口袋，两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皱巴巴的钞票给她。

过了一会儿，昂扎和斯塔纳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出来了。可是，我刚对他们吹了口哨，三个炮兵（没戴帽子，没穿外套）紧随其后从大厅里冲出来。我只能听见他们询问的语调，不听内容我也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追寻的正是我的金发姑娘。接着，一个炮兵朝昂扎扑去，这场殴斗开始了。斯塔纳只对付一个，两个要昂扎应付。他们正要把昂扎击倒在地，这时我冲过去爆揍其中的一个。炮兵们刚才还以为他们有人数上的优势，可一旦双方人数相等，他们马上就不堪一击。当其中一个人在斯塔纳的拳头下毫无还手之力时，我们便趁乱，匆匆地撤退了。

金发姑娘在拐角处等着我们并没有离开。昂扎和斯塔纳一看见她，就兴奋不已。他们说我是最了不起的人，并试图紧紧拥抱我，我记得这还是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幸福的滋味。昂扎从外套里掏出一瓶朗姆酒（在打斗中他使这瓶酒毫发无损的原因我实在搞不清楚），在头上挥舞着。一切都很完美，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去哪？我们从一个地方被赶出来，其余的地方又禁止进入。我们的出租车来源已被愤怒的对手切断，一场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新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发生。于是我们迅速沿一条小胡同奔去。走了没多远，房子没有了，剩下的两边只是一堵墙和一道栅栏。一辆干草运货车停靠在栅栏旁，还有一个像拖拉机似的机械，上面有一个马口铁座位。“你的宝座。”我说，接着昂扎让金发姑娘坐在座位上，座位高出地面几英尺。那瓶酒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我们四个都对着瓶子喝酒。金发姑娘话很快就喝多起来，对昂扎说：“嘿，我敢说借给我一百克朗是不可能的。”于是昂扎塞给她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接着她解开外套，拉起裙子，脱下内裤。她抓住我的手，把我向她身边拉过去。可是我非常害怕，所以摆脱了她，把斯若纳推上前去补缺。斯塔纳丝毫没有任何顾虑，径自移到她的大腿之间。他们在一起持续了不到二十秒钟。我本来打



算下一个该轮到昂扎（一半是因为我想以主人自居，一半是因为我还在害怕）。但这次姑娘更加坚定了，将我拉得更紧，她的抚摸激起了我的情欲，当我做好满足她的准备时，她在我耳边柔声低语：“我只是为了你才来的，傻瓜。”然后开始叹息起来，突然间我由衷地感到她是一个爱上我，也值得我爱的了一个好姑娘。她不断地在叹息，于是我忘乎所以地和她干起来。突然从昂扎嘴里蹦出的几句猥亵的话使我再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爱她。于是我没有达到高潮就从她身上脱出来了，她用一种近似于惊恐的眼神打量着我，说：“嗨，出了什么事？”可这时昂扎已经代替了我的位置，叹息声重又开始了。

我们回到营房的时候已是早晨两点钟了，四点半钟我们就起床去上星期日的义务加班。这样做能使指挥官得到一份奖金，使我们得到每隔两周才能轮到一回星期六休假。酒后的我们醉眼迷蒙，头重脚轻，像还魂尸一样在阴暗的水平巷道里移动，对那个愉快夜晚的回味，使我们陶醉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我们两周后的休假根本没有实现。昂扎的休假因为有事被取消了，另一个排的几个不速之客的纠缠也让我无法脱身。我们立即把目光对准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东西——一个女人，她那异乎寻常的身高为她赢得了“烛台”的绰号。尽管她的长相非常困难，但我们又能怎么样？供我们享用的女人资源实在是贫乏，而且还要受到时间的压力。我们必须珍惜每一次休假（它们是那样短暂，那样得之不易），这意味着和有魅力的女人相比，男人们更要易接近的女人。通过交流经验，这些士兵逐渐集中了一伙可怜巴巴、多少容易接近的（即：没有魅力的）女人，供大家通用。

我对“烛台”是那伙女人中的一个毫不介意。斯塔纳和昂扎不停地开玩笑，说什么我根本就无法想象她到底有多高，说什么等那个时刻到来时，我们将不得不找一块砖头站在上面，但我实际上喜欢这个玩笑。我对女人的狂烈的欲望因此更强烈。任何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愈缺少个性，丧失了人格，就愈好。

可是，当灌了一肚子酒的我把眼光落在她身上时，我那炽热的欲望立刻就烟消云散了。一切都似乎令人作呕和乏味，因为像昂扎、斯塔纳等我喜欢的所有人都没去那里。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隔夜的宿醉还是那么厉害，以至于我也开始怀疑上一次休假发生的事情。

也许是某种道义上的原因使我坐立不安？废话，那仅仅是十足的反感。但是，几小时前我还因对女人的炽热欲望而变得憔悴，对那个女人的情况的不熟悉使那个欲望变得如此强烈，我的反感又来自何处呢？我所具有的敏感性可能比别人的强得多？我是不是讨厌娼妇？废话，我不过是十分沮丧罢了。

我感到沮丧是因为突然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平淡无奇。我选择干这种事不是由于闲极无聊的，任性胡闹，也不是出于想知道一切经历一切（崇高的和可鄙的）的人迷欲望，我只是把它当作生存的准则罢了。我的机运因此也就被限定，它实际上描出了我此后爱情生活的地平线。它没有向我展示自由（一年前我也许会这样看），展示的只是我的屈服，我的限制，我的判决。我感到恐惧。恐惧那个暗淡的地平线，那个命运。当我的心灵意识到它已被团团围困，已无路可走时，就不断紧缩、退却，接着开始颤抖起来。

因我们性爱的地平线的黯淡而情绪低落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彼特利奇（和平宣言的作者）为了抵抗这种沮丧，靠退到内心深处去求助于他的神秘的上帝。这种宗教式的反身内省来弥补性爱的不足，乃是一种自我的刺激的恪守仪式的养生之道。剩下的人对于他们自己玩世不恭的情场冒险则以更加过分的自欺欺人，用极度伤感的浪漫主义来补偿。许多人家里都有自己的恋人，他们把自己的回忆都打磨的剔透光亮。许多人指望无限忠诚和忠实的期待能寄托他们的信心；还有许多人暗暗地试图使

自己相信，他们在酒吧间喝得烂醉时结识的姑娘为他们使他们激情重燃。斯塔纳入伍前跟布拉格的一位姑娘谈过恋爱，她来看望过他两次，以前他从没有将这当成一回事。可现在他突然深深地爱上了她（完全符合他那冲动的本性），要与她结婚的想法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声称他对两天的婚假做周密计划，可我却能看穿他那玩世不恭的外表。指挥官准许他的假是在三月初，他去布拉格那天恰好是周末。这一切我历历在目，因为斯塔纳婚礼的那天结果也成了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天。

那天我也获得了一次准假，由于上次休假被“烛台”浪费，至今依然很懊恼，我避开了其他伙伴，独自动身了。我爬上一辆老式的窄轨电车，一辆开往俄斯特拉发远郊的慢车，让它把我带走。我随便在一个站台上下了车，又随意换乘了一辆另一条线路的电车。一望无际的郊区，工厂和田野奇妙地混杂在一起，自然之美，树林，公寓和垃圾堆，熔渣堆，农舍。这一切，既吸引着我又困扰着我。我再次下了电车，但这次却漫步了很久，以一种恋爱般感情去欣赏这块独特的景致，极力想弄清是它是在什么力量的作用下变成这样的，试图解释是什么使它繁杂多样的各个部分显得错落有致的。当我走过一幢长满常春藤的田园小屋时，我想到它之所以属于这里的原因就是，它与周围那些破烂不堪的住宅大相径庭，也与作为它背景的那些庞大的井架、烟囱、高炉的轮廓迥然不同。我从那些低矮的棚舍穿过，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幢肮脏、灰色的旧房子。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有花园铁栏和高大的垂柳，我对自己说，这准是它之所以属于这里的原因。欠缺和谐的景致把我搞得心神不宁，这不仅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反映了周围地区的共有特性，而且还因为我在这里充军的形象也是它们提供的。当然，把我个人的历史投影在一个整个城市的客观背景上也使我得到了某种解脱：我明白了我同那株垂柳，那幢覆盖着常春藤的小屋，那些通向乌有之乡的虚无的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街，那些排列着的似乎是来自各地的幢幢房屋的街道一样不属于这里；同和那些不堪人目的临时居住过一样，这个质朴怡人的地方并不属于我。我意识到别无选择，只能待在这里，待在这个不相协调、令人困窘的城市，这个不加选择包容一切的城市，我无处可去，没有依凭才是真正原因。

最后我沿着一条长街走去——已是城市的近郊，而原来它只是一个天然的村庄——停在一幢大平房前面，一个牌子立在它的一角，上面写着“电影院”。我就像偶然过路的人惯常做的那样，心里在漫不经心地思考着这招牌为什么只写了“电影院”三个字而再无其他。在房屋的外面我转来转去（它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它所号称的那样），但是没有发现别的招牌。我所发现的只有一条将电影院与邻近建筑物分开的约五英尺的巷子。我顺着这条小巷来到一个院子，看见电影院的背后还加了一个一层楼的边房，电影广告就贴在沿墙的橱窗内。我走上前去，仍然没有发现有什么名字表示。我环顾周围，看见比邻后院的铁丝栅栏后面有一个小姑娘，便向她询问电影院的名称，可是她惊异地看了我一眼，说她对此一无所知，我终于只好听任它的无名。在俄斯特拉发这个流放地，什么都没有名字，连电影院都不例外。

我信步回到（没有任何特殊原因）橱窗前，首次注意到由一张海报和两张剧照组成的对当天电影的预告，那恰好是苏联影片《名誉法庭》。影片的女主角玛格塔以前说起过，那时她主动要求在我生活中扮演仁慈的天使，影片中更为严酷的方面同志们曾经提到过，当时我正将要被学院党组织起诉。这部影片给我带来过太多的不幸，我一直希望我一直盼望永远也不要让我再听到它的名字，但那怎么可能？甚至在俄斯特拉发这个地方，它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但至少这次我可以转过脸去对它置之不理。于是，我真的朝着小巷走去，准备回到街上。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了露茜。

她正朝着我也就是院子的方向走来。我为什么当时没有直接从她身旁走过去呢？是因为我只是在漫无目的地闲荡，或者是院子里不寻常的夕辉让我不忍离去？还是她身上具有的某种东西？但是她的外貌并不惊人。确实正是她的那种普通的特性后来才让我迷恋，打动了我。我在俄斯特拉发的街上看到的寻常姑娘已经够多的了，那为什么我还首次见她，就被她吸引住，停下来了呢？她的寻常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当时站在那里望着她，望着她缓缓地走，从容地朝玻璃橱窗走去，停在《名誉法庭》剧照的面前，然后转身走向入口处，步入。对了，一定是那缓慢的步态吸引了我，她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缓慢的东西：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匆忙赶赴，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伤透脑筋。是的，我跟在她身后就是为了那种忧郁的缓慢，她走到售票处，拿出一些零钱，买了一张票，向礼堂看了看然后转身回到院子。

我的眼睛始终望着她。她背对着我站在那里，眼光越过院子朝一排带有花园的别墅望去。每一幢都围着栅栏，一直延伸上一座小山，直到一个石矿的轮廓把它们截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院子。我还记得它的每一个细部，记得把它与那个后院隔开的铁丝栅栏，在一堵矮墙侧面就是刚才那个小姑娘，她就坐在阶梯上凝望着天空。墙上有两个空花盆和一个灰洗衣盆，记得烟色的夕阳怎样徐徐斜向石矿）。

电影还有十分钟才能放映，现在是五点五十。露茜转过身来，不慌不忙穿过院子，走到街上。我跟在后面，用一幅更有都市味的景致取代了身后受到摧残的俄斯特拉发田园画。五十步开外是一个保持得极为整洁的怡人的小广场在一幢带有一个伪哥特式钟楼的用红砖砌成的建筑前面有一个小公园和几条长凳。我跟着她。她坐在了一条长凳上。她的缓慢始终伴随着她。她看上去几乎是在缓缓地坐着。她没有左顾右盼，一直使她的目光很专注。她坐着的姿势就像我们通常坐着等候作一次手术，等候某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全吸引住我们、驱使我们进入内心、远离周围一切的事情一样。一定是她内心的全神贯注使她忽略了周围的一切，我正是借此得以停足于她附近，仔细观察她。

关于一见钟情早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完全理解人们在回顾爱情时，总希望它以神话开端，本身从而成为一个传说。所以我宁愿克制自己，认为有爱情并不是这样。但是我毫不怀疑有一种洞察力当时在起作用。我瞬间就感悟并捕捉到了露茜的本质，说得更确切点，她将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露茜在我面前的出现，就像神祇呈现在他人面前一样。

由于不细心的电烫使得她的头发显得乱蓬蓬的一团；我看见较短且很破的旧褐色外套；我看见一张脸蛋，既不引人注目地迷人，又迷人地不引人注目；我看见一种天生的宁静、质朴和端庄，它们对于我是多么必要；我看到我们有多么相似。我只需走上前去，跟她交谈，她就会露出笑容，仿佛很久没有音信的兄弟突然出现在她前面。

她向钟楼望了望（即使这个微小的动作也深深印在我心里，一个没有手表，本能地面对钟楼坐着的姑娘的动作。）她起身，开始回电影院。我试图走上前去，但与其说是勇气不足，不如说是缺乏话语。我的心是溢满的，可我的头脑却是空白一片。因此我能做的只能是随后进了那个小门厅。突然，一伙人冲进来，径直奔向售票处。在他们之前，我抢先买了一张电影票，而这个电影却是我极为反感的。

此时她已经进去了。在若大的礼堂里，寥寥可数的几张电影票不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们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我走进露茜那一排，在她旁边坐下。这时，刺耳的喇叭声在大厅里吼叫起来，灯光变暗，银幕上开始播放广告。

露茜不会不察觉这个佩带黑色徽章的士兵并不是偶然地坐在她旁边。她肯定一直都知道我，感觉到我就在附近，因为她成了

我注意的焦点，至于银幕上的一切没有任何兴趣（享受一次显然是可笑的报复：当那些卫道士们经常向我提及的这部影片在我面前闪现时，我却根本不予理睬）。

电影终于结束。灯光亮了，屈指可数的观众站起身来，伸着懒腰。露茜也站了起来。她从膝上拿起那件折叠的褐色外套，把一只手臂伸进袖子里。以最快的速度，用帽子遮住了我的光头，然后默默地帮她穿上另一只袖子，她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却缄口不言，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可是我无法判断这是一个感谢的表示还是一个实属本能的动作。接着她从那排座位缓缓地向外移。我立即披上我的绿大衣（它穿在我身上太长了，可能不很适合），跟在她后面。当我们还在礼堂里时，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对话。

我肯定在两个小时的身旁长坐和牵挂中被置于她的波长上，我们的谈话就可以听起来像我非常了解她一样。只有这一次我是自然地开始谈起来，玩笑和讽刺的话不再夹杂在其中。我很惊奇，经过了所有这些藏在面具后面的经历之后，这样的谈话是那么的简单。

我问她住在哪里，是干什么的，看电影是不是常事。我告诉她我在矿上工作，那是个苦活，我很少有假期。她说她在一个工厂干活，住在集体宿舍，必须在十一点钟之间她就得回去，和跳舞相比，她宁愿看电影。我告诉她只要她有空，我什么时候都乐意和她一道去看电影。她说她更喜欢一个人去。我问她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压抑了。她说是的。我告诉她我也过得不怎么快活。

相同的忧郁可能比什么都更容易、更迅速地（尽管往往是虚假地、骗人地）使人们贴近的了。所有的恐惧与戒备都可以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气氛而都化为乌有，不论是高雅的人还是粗俗的人，学识渊博的人还是目不识丁的人都易于领会这种气氛，它是使人们贴近的最简单的方式。但它出现的次数却很少。它要求个人丢开来自文化的“心理抑制”，由修养带来的姿态和面部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以真实的自我展示给对方。对于伪装以各种假面具处处谨慎应对的我，怎么竟完成了这个伟绩，我不知道（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不知道，可是它就像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个奇迹般的解放。

我们把自己最平常的事儿都说给对方听。我们的表白简短扼要。当走到露茜的宿舍时，我们在外面一盏街灯下站了一会儿，露茜浸浴在灯光里，我发现自己与其说在抚摸她的脸颊或头发，不如说在抚摸那件破旧的令人感动的褐色外套。

那盏晃动的街灯照着，笑语喧哗地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姑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抬起头来望着露茜住的那幢房子，望着光秃秃的灰墙和毫无遮拦的窗户；我记得我瞧着露茜的脸，这张脸（与我在类似情况下见到的姑娘的脸不同）是平静的，几乎是没有表情的，很像一个站在黑板前面（毫不机灵或狡诈），谦卑地背诵她所知道的东西，既无心高气傲也不奢求表扬的女学生的脸。

我们约好，我将寄给她一张明信片，让她知道我下次的休假时间和见面时间。我们道了晚安（没有接吻也没有抚摸），然后我走开了。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她站在门口，并未推开门，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我已经不在旁边，她就可以放弃矜持的架子，任凭她的眼睛（在此之前是那样胆小）久久凝视着我。仿佛只是当一个人离开时为了挥手而挥手，而她本身并不知道该如何挥手一样——尽力地笨拙地做着手势。我停下来朝她挥手，我们站在那里互相凝望。我继续往前走然后又停下来（露茜的手还在挥动），又往前走，走走停停，直到最后我转过街角，互相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

我的心从那天晚上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又被占据了。我内心深处是干净和整洁的，有个人居住在那里。已从墙上挂钟消失了几个月的嘀答声又再次响起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



义的事件。时间，在此之前就像一条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溪流缓缓流淌着，没有任何标记可循（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无限期的休止符中），而现在又开始露出人的面孔，把自己标出来，把自己画出来。活着是为了休假，每一天都是攀往露茜那里的梯子上的的一级。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如此思念和全神贯注于一个女人（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多的时间来思念）。对女人产生这样的感激之情是绝无仅有的。

感激？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把我从众多人对可悲而狭隘的性爱地平线解放出来。是的，斯塔纳这位新郎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有一个心爱的妻子在布拉格的家里。但是斯塔纳不值得羡慕。他的命运的转动是以结婚为代价，然而一旦他登上返回俄斯特拉发的火车，他对命运的所有把握就都不复存在了。

因为认识了露茜，我也使我的命运转了起来，但是我绝不会让它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虽然我们见面次数很少，可我们的会面至少是有规律的。我知道她熬住几周的等待，然后就像我们前一天才见过面似地来迎接我。

然而，露茜不只是在我们毫无生气的性爱冒险之后把我从意气消沉中拯救了出来。尽管这时我知道我已全无斗志，对我的黑色徽章只得认命。尽管我知道与还要一起生活两个年头的人们保持距离是很不明智的，放肆吹嘘我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正确是愚蠢的（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多么具有特殊权益的生活道路）。理智上对这一变化的接受并不能根除我对“失落的命运”的痛切之感，露茜对我这种痛切之感，发挥了神奇的治疗效果。我所需要的只是感觉到她在我身边，感觉到她的生活方式的温暖，这是一种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争端以内，在警惕性和阶级斗争以内，在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要素以内所无法找到的生活——一种超出了政治的全部范围，在政治的战略战术中无法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的生活。

这些我关心的事（它们仅仅是时代的一个插曲，因此很快将只成为难以理解的术语）曾经造成了我的毁灭，可我却不能放弃它们。当我被委员会问及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入党时，我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把我吸引到这场革命运动中的，我却答不出来，你也许会把感觉到站在历史车轮边当作自己的理由。人们和事件的命运的确操纵在我们手里，特别是在大学里，在早期的那些年头，党员在教职员工中的数量很少，学生团体中的党员几乎是单独地管理大学，学院的教员编制，教学改革和课程安排都由他们拿主意。我们当年所体验到的洋洋得意如今大家都清楚那是权力陶醉，但是（持较为仁慈的态度）我愿意说得不那么直白！历史把我们给迷住了！那种跳到历史肩头，高高在上的念头令我们陶醉。如果说，其结果多半成了对权力的丑恶贪欲，可是（假使人类一切事都有多种解释）一个理想主义的幻觉仍然保留了下来（尤其可能是留在了我们年轻人心中）。这个幻觉就是：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造就者，处于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只会站在历史之中，跟在它的脚踵下畏畏缩缩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人们要做的是指引和创造历史。

在那时我坚信，远离历史车轮的地方，除了植物、厌倦、流放、西伯利亚之外是没有生活的。而突然（在“西伯利亚”待了半年后）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从未设想过的生活机运：我看见面前展现出一片久已湮没无闻的草地（湮没于历史的翱翔的翅膀下面），日常生活的草地，在这里我看到一位虽然贫穷、可怜但却完全值得我爱的姑娘——露茜。

露茜对于历史巨翅的情况了解多少？她何时听到过它们的声音？历史在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历史对她毫无吸引力，她们彼此格格不入，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她毫不知晓，她生活中的问题是平凡而永恒的。刹那间，我得到了了解

脱。我被露茜带往她的灰色天堂，这成了我宽慰和欣喜的理由，而这使我得以退出历史的这一步，在不久前似乎还是不可想象的。露茜羞怯地挽住我的胳膊，于是我让她引着我……

露茜是我的灰色向导。若用更具体的话讲呢？

她看起来要比她十九岁的实际年龄大得多，就像那些历经艰难，从童年一下子上升到成年的女人一样。她说她是希伯西米亚人，中学毕业后便当了一名学徒。她对谈论自己的家庭很反感，要不是我逼迫她，她是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的。她在家里一直不幸福。“我的父母从来不喜欢我。”她说，为了证明她的话，她告诉我她的母亲一直很讨厌我。”她说，为了证明她的话，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如何改嫁，她的继父怎样酗酒，并且她受到了残酷的待遇，他们有一次怎样冤枉她把一些钱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以及他们怎样经常殴打她。当他们对他们终于无法忍受时，她便鼓起勇气离开了。她在俄斯特拉发已经生活了整整一年。哦，她不是没有朋友，独往独来却是她更喜欢的。她的朋友们外出跳舞，把小伙子们带回宿舍，露茜对此很反感。她很严肃，她宁愿去看电影。

是的，她认为自己是“严肃”的，在她看来，严肃和电影是一致的。战争片在当时十分流行，也是她最喜欢看的，也许是一些片子令人激动的缘故，但更可能是因为她可以通过这些片子中的极度苦难使她内心充满怜悯和同情。她觉得这样的感情可以抬高和表示她如此看重的自己身上的“严肃”部分。

但是，如果说我仅仅是痴迷于露茜身上不同寻常的单纯，那是不确切的。她的单纯，她较低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妨碍她理解我，不过她的理解与经历、知识以及争论和奉劝的能力毫无关系，她在倾听我时善于接受的方式可以看出她的理解。

我记得夏日的一天，我的休假碰巧赶在露茜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坐在花园的墙上阅读我带来的一本书。我一直都在挤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间来跟上我的读书，因为很少有时间与我在布拉格的朋友们的通信。幸好我来这里时把三本小诗集装在了我的包里，这些书我反复地读，它们给了我安慰。它们是费朗基耶克·哈拉斯的诗歌。

这三本书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奇异的角色，奇异的原因在于我并不是一个酷爱诗歌的人，可它们却是我惟一真正喜欢的诗集。它们恰好是在我被开除出党之后引起我注意的，那段时期哈拉斯的名字又在群众的眼里重新出现。当时那个主要理论家认为应当对刚刚离开人世的诗人的病态、消沉、欺诈、存在主义予以谴责——也就是说，包括当时一切政治诅咒意味的东西（那位理论家在一本书中对整个捷克诗歌，尤其是哈拉斯的诗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被大量印刷发行，在捷克它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目）。

我们在遭遇不幸时，为寻求安慰往往将自己的悲伤与别人的悲伤联系起来，虽然听起来也许可笑。可我还得承认，我当时是因为我想同另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谈心，为了确认自己的心理和一个公认的叛教者是否完全一致。我想检验一下，当我处于类似的状况时，在那位权威理论家看来有害、有腐蚀作用的悲伤对我来说是否具有某种欢乐（到了这个地步，我是几乎不可能期望在欢乐中找到欢乐的）。在动身去俄斯特拉发之前，我从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学那里借来了这三本书，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才同意让它们跟着我走。就这样，这些书陪伴着我开始了充军。

当露茜发现拿着书的我坐在约定的地方时，她问我在读什么。我让她看看那翻开的两页。“诗歌！”她惊奇地说。“我读诗歌你觉得奇怪吗？”她耸了耸肩，说：“不，怎么会呢？”但是在我看来，诗歌和儿童读物是一回事，因此她当时一定感到很奇怪。我们在俄斯特拉发奇特的布满煤烟的夏天漫步。这是一个黑色的夏天，映入眼帘的不是天空中掠过的朵朵白云，而是沿着高架索道隆隆行驶的煤车。我注意到露茜的心思还在那本书上，于

是，当我们发现一片小树林并坐下来时，我翻开书，问道：“你对它有兴趣吗？”她点点头。

对于我来说，向别人朗诵诗歌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我有一个高度敏感的、内在的保险丝装置，它阻止我过分地展现自己，暴露我的情感，而朗诵诗使我觉得我仿佛在单腿站着的同时谈论着自己的感情；如果不是绝对孤独，那么每当我想到沉浸在韵律和节奏中时，那里面总有一种令我窘迫的东西。

但是，露茜却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在她之后再没有人具有这种能力），绕过我的保险丝，使我放下犹豫的负担。在她面前，我的一切都不再隐藏：真挚、激动、悲怆。于是我吟诵道：

你的身躯像一穗细长的玉米  
籽粒从上面落下来却不会生根  
你的身躯是一穗细长的玉米

你的身躯是一束丝绸  
每一卷里都写有渴望  
你的身躯是一束丝绸

你的身躯是一片燃尽的天空  
穹窿下编织着它的死亡之梦  
你的身躯是一片燃尽的天空

你的身躯是多么宁静  
我的眼睑下颤动着它的眼泪  
你的身躯是多么宁静

我用胳膊搂住露茜的肩头（她的肩膀只穿着薄薄的花衣服料子），我的手指能感觉到它们，我真愿意相信这个身躯的痛苦正是我念的这首诗所说的内容：缄默，顺从，被判了死刑。我还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朗诵了很多诗，包括那首至今还在我心中唤起她形象的诗，那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我不相信你的蠢话我相信沉默

胜过美胜过一切

那里有理解的欢乐

她哭了。那是因为她肩膀的颤动突然被我手指感受到了。

她为什么而哭？是词语的意思？是诗歌调子里流露出来的显而易见的悲哀还是我嗓音的音色？她从诗歌的奥妙的庄严中感到了欢欣，而欢欣又使她感动得流泪？或者只是诗句突破了她内心的一个秘密障碍，使积压已久的重负从此获得解脱？

我不知道。露茜孩子般的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头紧贴在我穿着绿色军装的胸部上，她哭呀，哭呀，哭呀。

最近几年，我被形形色色的女人评价（因我无力回报她们的感情），骄傲自满。这纯属谎言，我一点也不自负。但说句老实话，她们说得对，我还从没有爱上过一个女人，因为自我成年以来，还没有与一个女人真正建立起关系。一想到这点我就苦不堪言。我没有把握确定自己一定知道失败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天生的缺乏某种感情，或者是由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我无意虚构事实，但事实就是如此。在那个会议厅里，一百个人举起的手所发出的毁灭我生活的印象一次次地回荡在我心头。这一百个人不知道事情总有一天会开始变化，他们指望我一生被遗弃。与其说是出于对受苦的渴望，不如说是出于恶意的顽固，我对那个场面做过许多不同的虚构：例如，如果换成是绞死的宣判而不是作出开出我党籍的决定，那情景会是什么样呢？不论我怎样推想那个场面，我还是只能看见他们再次举起手来，如果泽门尼克当时言语巧妙地宣布我绞死，那么情景更是如此。打那以后，只要我一结识新的人，无论是有可能成为朋友的男人，还是可能成为情人的女人，我都要在心中把他们投回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然后设

想他们是否也会举手。这个考验难倒了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像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出于坚信不疑还是害怕）那样举起了手。你必须承认：和那些一心想流放心或将你置于死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跟他们变得亲密是很难的，要爱他们更是难上加难。

也许我过于残酷，将我认识的那些人置于这种无情地考验中，而他们很可能会与我和平相处，从来不会走进那种举手表决的会议厅。也许有人会说我做仅仅是为了原因：从精神优越的高处俯视他人。可是，指责我骄傲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说我对任何人的毁灭从未举手赞成，那么我也完全明白，我在这种事上的优越是有前提的，在这场游戏中我很早就被取消了举手的权利。我曾一度让自己自信，如果我换到他们的位置，是绝不会重蹈覆辙的。可是我的诚实足以嘲笑我自己。为何惟一一个不举手的，正直的人非我莫属呢？不，我表现得更出色是没有根据的。那么这件事还会一直影响着我与所有人的关系吗？意识到自己的卑劣并没有使我对别人的卑劣能泰然处之。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人在对方身上看到与自己一样的卑劣而产生的兄弟般感情更叫人厌恶了。将我也烙成兄弟关系的印记是我所不齿的。

那么我怎么又能爱露茜呢？幸运的是，后来我才产生出以上的看法，因此（一个纯粹的青年，更易于悲伤而不是思索）我当时还是能够张开的双臂满怀信任地接受露茜，把她作为一个来自天国（一个仁慈的天国，灰色的天堂）的礼物来接受。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虽然形神俱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我却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感与日俱增。真有趣：如果那些现在指责我傲慢，怀疑所有人都被我当作傻瓜的女人——要是她们知道露茜的事情，她们将会把她称作一个傻瓜，根本就不会明白我怎么会爱她。而我当时却是那样爱她，无法想像与她分离会是什么样；的确，我们从来没有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论过结婚，我将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有朝一日的相聚。如果说我确实想到过这个婚姻不相称，那么这个不相称却更令我痴狂而不是使我望而却步。

我的指挥官是我那几个月幸福生活所要感谢的人之一。那些军士挖空心思地欺侮我们，在我们的军服衣缝里搜寻污垢，为了床铺上的一点皱痕，就拆掉我们的床。可这位指挥官却是一个好人。他已开始显老，是从一个步兵团调到我们这里的——据传降了一级。换句话说，可能是他也有过不幸的遭遇，所以他才偏袒我们。倒不是说秩序，纪律，以及偶尔自愿在星期天的加班（为了向上级证明他在政治上的积极）对他不重要，而是说从不将重活压给我们，并且在批准两周一次的周六假期时也很痛快。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夏天我每月基本上能见到露茜三次。

我给她写信，当我们不在一起时，写了无数封信和明信片。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实在是忘了。但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给露茜写了许多信，可我却没收到她一封信。

我无法使她给我写信。也许我的信使她畏惧；也许她觉得可写的很少，或是怕犯拼写错误；也许她羞怯于自己拙笔的书写，我只是从她在身份证上的签名才知道她的书写的。我无法使她明白我实际喜欢她的笨拙，她的无知。我并不是抽象地看重她的简单。在我眼里，她就是纯洁的代名词，一块能使我在她身上留下更深刻、更持久印记的白板。

开始露茜只是很害羞的对我的来信表示感谢，但不久她就找到了回应我的方式：她用鲜花代替写信来送给我。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正漫步于树荫掩映的地方，露茜突然弯下身，把一朵鲜花摘下递给了我。我很感动，我并未因此不自在。但是下一次我们见面时，她却拿着一大束花站在那里等我，我开始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了。

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凡是影响我男子气或成熟感的一切，我



都非常谨慎地予以回避。我觉得手拿鲜花在街上散步很不自在，更不要说我对买花的恐惧了，至于接受它更是难以相信了。我尴尬地向露茜指出，花应是男人送给女人，颠倒过来是不对的。可是当我看见她眼泪盈眶时，我急忙补充说这些花是多么漂亮，然后接受了鲜花。

打那以后，她就始终如此了。每次我们见面，总有鲜花在迎接我，最后我屈服了，自发的送花以及这一行动对送花人的意义使我放弃了戒备。可能是她的不善言语表达，使花在她那里成为一种谈话方式——不是花通常那种严格的象征意义，而是更古老，更通俗，更本能的语言先导。也许，由于总是沉默寡言，她本能地向往那个无法言表，未有语言能力之前的进化阶级，那时人们用最简单手势来进行交流，比如，指着树，大笑，互相触摸……

我是否真的领会露茜送花的真意，我不能确定，但她送花的言行已深深打动了我，要报答她的愿望油然而生。露茜的所有衣服加起来只有三件，我们的约会就是按照她换这三件衣服的固定顺序而以四三拍子严格进行的。我喜欢这三件衣服的磨损、破旧和不太雅观；对她的那件短褐色外套我也很喜欢（袖口已经磨破），毕竟在抚摸她的脸之前我就先抚摸过它。可我还是决意要给露茜买一件漂亮一点的衣服，许许多多的好看的衣服。所以有一天我提出我们一起去百货商店。

开始，她一直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看楼梯上的人上上下下，好玩罢了。可是到了二楼，我却在一长排挂满了衣服的衣架前停了下来，露茜看见我兴致勃勃地盯着那些衣服，便靠上前去，开始发表议论。“那件衣服真好看。”她说，指着一件图案复杂的红花衣服。好看的衣服凤毛麟角，可还是有一些稍微比较中看的。我拉出一件，对售货员喊道：“这件衣服能让这位年轻女人试试吗？”要不是因为那个售货员，露茜很可能会表示反对，但在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位陌生人面前，她却不敢，她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发现自己已经在更衣室里了。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把帘子微微拉开，想看看她穿上新衣服是什么样子。尽管她试穿的那件衣服很普通，我还是大吃了一惊：这件略显现代的衣服使她完全变了样。“让我看看怎么样？”我听见那个售货员在我身后问，接着他对露茜和那件衣服赞不绝口。然后他转过身来，盯着我的徽章，问我（事先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是不是一个政治犯。我点点头。他朝我眨了眨眼睛，带着微笑说：“你愿意看几件好一点的货色吗？我可以给你拿。说完他立刻拿出一批流行的夏装和一件绚丽的夜礼服。露茜挨个儿的试，她穿每一件都很好看，每一件穿上的感觉都不同。她穿着那件夜礼服时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一个关系发展中的转折点并不总意味着戏剧性事件的结果，它们往往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展起来的。在我对露茜的爱情发展中，衣服正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去服装店的那天之前，露茜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很多东西：一个孩子，一泓劝慰和含情的泉源，一帖止痛膏，一条逃避自我的出路还没有超出过接吻阶级，而且她接吻的方式就像她身上的一切那样稚嫩（我已经爱上了那些吻——长而纯洁，紧闭着的干爽的双唇，当它们温柔地接触在一起时，互相数着对方的细纹路）。

无论如何在此之前，我虽然钟情于露茜，但对她却没有任何肉体上的贪婪。我已经逐渐习惯了缺乏情欲，以至于我甚至对此不再敏感，我与露茜的关系似乎是如入化境，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还缺少点什么。一切都搭配地如此协调：露茜和她那修道院式的灰色服装，我和我那修道院式的清白想法。然而，当她一穿上别的衣服，这个平衡就不复存在了。蓦然，现实中的露茜和我想像中的没有了任何关联，我意识到她可能远远超过了我心目中那个可怜巴巴的乡下姑娘。在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迷人的女人，身材

优美匀称，一双大腿在漂亮的裙子下显得楚楚动人。她那暗灰色的防护罩一下子就消失在艳丽别致、做工讲究的衣服里。我深深地惊诧于她展示的身体。

露茜与另外三个姑娘同住一间屋子。那幢宿舍每周只有两天允许来访，并且只有五点到八点三个小时。来访者需要把他来访的起止时间都登记上，并且还要交出他们的身份证。更糟的是，露茜的每个同室都有自己的男朋友（或几个男朋友），所有人都想利用房间来幽会，这就意味着她们彼此间的争执是常事，在背后嘀嘀咕咕，记录下任何一个人多占他人的每一分钟。这一切都这样让人感到别扭，以致我从未有过去那里看望露茜的打算。但是，我碰巧得知那一个月后三个姑娘都要去一个义务农业大队。我告诉露茜，我想趁这个机会，到她的房间同她约会。她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地告诉我，她更希望在室外与我见面。我告诉她，我渴望能在一个四周无人，完全属于我俩的地方同她呆上一会儿。我告诉她，我想看看她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她无法再拒绝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得到她的同意时是多么地激动。

那时我来俄斯特拉发已经快一年了，现在早已习惯了服役，而当初是那么的难以忍受。当然，它仍然是令人讨厌，使人筋疲力尽，可我找到了对付它的方法，结识几个朋友，甚至也会很愉快。对我来说，那个夏天是多彩多姿（树木覆盖着煤灰，但在我这个矿工的眼里看去，它们却似乎绿叶成荫）；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那个绿叶成荫的夏天却孕育着秋天的一连串不幸事件。

这一切开始于斯塔纳。他在三月份结婚后的几个月里，对他老婆在酒吧间里胡作非为渐渐地有所耳闻。他感到非常难过，给她写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她的回信使他平静了一阵，可是不久（大约在天气转变暖的时候）他的母亲来看望他；那个星期六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整天都和她待在一起，后来当他回到营房时，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起初，他羞愧得对任何人都没吐露一字，可是第二天他就对昂扎讲了，接着又说给了别人听，很快我们就都知道了。当斯塔纳发现我们全都知道了这事，他便越发说得滔滔不绝，像是中了邪。他老婆始终在外面四处鬼混，他要去她那里扭下她的脖子。他想让指挥官批准他两天的假期，但指挥官根本不愿意。他走到哪听到的都是对斯塔纳的抱怨，埋怨他心神不定，脾气暴躁。于是，斯塔纳只好请求得到二十四小时的假。指挥官动了怜悯之心，答应了他的请求。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他一到达布拉格，就抓住了他的老婆（尽管我这么称呼，但实际上她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她厚颜无耻地（也许还是迫不及待）承认了一切。当他打她时，她予以反抗。于是他掐她的脖子，把一个瓶子猛掷在她头上，她应声倒地，躺在那里全无声息。他顿时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惊恐万状地逃掉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竟在山里找到一幢空空如野的夏日别墅，于是在那儿躲了起来，惴惴不安地等着因谋杀罪而被抓起来，然后绞死。两个月后他被抓住了，审判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开小差，原来他的老婆在他跑掉以后不久就恢复了知觉，这次历险除了头上起个肿块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宣示的了。在他服刑期间，她同他离了婚，嫁给了布拉格的一个著名演员。这个演员的演出我经常去看，为的是使我想起了斯塔纳和他那悲惨的结局。刑满释放以后，他继续留在那个矿上。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丢掉了双腿，截肢造成了他的死亡。

据说那个女人在那种生活淫荡圈子里是骨干，她不仅使斯塔纳倒了霉，而且还连带上了我们大家。至少我们是这样看的。当然，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像大家所假定的那样）在斯塔纳失踪的消息与部长委员会事后不久视察我们的营房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

的联系。不管怎样，我们的指挥官被免了职，一个年轻军官取代了他（他至多二十五岁）。从他到达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像我认为的那样，他约摸二十五岁。但是事实上他年轻得就像一个小男孩，因此要使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对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他在镜子前排练讲话，把它们背诵下来，常常是我们背地里议论的话题。他是个冷冰冰的人，不喜欢喊叫，总是以非常沉着的态度，清楚地使我们明白，在他眼里我们都是罪犯。“我知道，如果亲眼目睹我被绞死，你们全都会很高兴。”这是第一次召集我们时，年轻指挥官对我们说的话，“但是，倘若这里真有人要被绞死，那就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

初次的交锋很快就来临了。也许是事情太让人兴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家塞勒克卷进去的那回。在服役的头一年，塞勒克画了大量壁画，这些画在前任指挥官统治下享受到了它们应有的权利。如前所说，塞勒克对胡斯派战士和他们的首领简·杰士卡情有独钟，他总要增添一个裸体女人像来使朋友们高兴，在指挥官面前把她说成是自由或祖国的象征。新来的指挥官很想利用塞勒克为他效劳，把他召去，要他为那间上政治教育课的教室画点什么。顺便要让塞勒克把所有的杰士卡们都抛在脑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当前，要在红军以及它与我们工人阶级的聪明上多下功夫，表现红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社会主义胜利中的作用。”“是，长官！”塞勒克说，随即开始工作。他一连几个下午都趴在地板上忙他的画，然后将许多张大纸都沿着墙钉了上去。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他的大作时（足有五英尺高，二十五英尺长），大家全站在那里惊呆了。画的中央站着一位精神抖擞，穿着暖和，肩扛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一顶粗毛皮帽子往下拉到耳朵上，周围簇拥着八九个裸体女人。身旁站着两个女人正色迷迷地抬头盯着他。他的手臂一边搂着一个，正在洋洋得意地大笑。其他女人搔首弄姿地望着他，将双臂伸向他，或是仅仅站在那里（有一个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躺着的)，卖弄她们漂亮的身材。

塞勒克占据了画前面的位置（我们在等待政治教官到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位置），把他的画讲给我们听。瞧这儿，在我们中士右边的是艾娜，我的第一个女人。当她是一位军官的妻子时，我只有十六岁，所以我相信她站在中士旁不会感到不自在。我是以她当时的模样画的。你们不用怀疑从那以后她已经人老珠黄了。可那时她还非常丰满，特别是这里（他用手指作为教鞭）大腿周围。由于她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她的臀部，我在这里又画了一个她的形象（他走到画的一个边缘，指着一个女人，她的光屁股好像快要退到房间里）。我也许把她神圣的臀部画得夸张了一些，但这难道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吗？不管怎样，那时我确实是年幼无知，搞不清她总是要我给她屁股点“爱的轻拍”的用意。一天，她感到厌倦了，便说，我的意思不是那样。来呀，把小妇人的裙子往上拉，于是我不得不把她的裙子拉下去，把她的内裤拉下来，可我仍然一如往常那样拍打她，她大发脾气了，开始叫起来，打我呀，你这流鼻涕的小家伙，你！用力地打我呀！瞧，当时我真是傻透了。不过毕竟怎样，这一位（他指着中士左边的姑娘），她叫娜佳，我认识她时已经经验丰富得很了，她有一对小乳房（他指着它们），两条长腿（他指着它们），漂亮的脸蛋（他也指了指它们），我们在同一年级，她为我们人体写生班当模特儿。我对她了如指掌。我们都很熟悉她，全班所有的人。她常常站在教室中间，而我们便根据她的身体来研究人体，但任何人都没用手碰过她。她母亲总是等候在一旁，一下课她就被赶紧带走，因此她可以展示自己而无须担心任何后果。而这一位（他指着一位在一个具有传统风格的沙发上躺着的一个慵懒的女人），这一位本来就是一个娼妇，请靠近一点（我们照办了），看一看在那肚皮上的那个小伤疤，据说那是一个与她关系暧昧的好妒忌的女人用烟头烫的。是的，先生们，她两种方式都喜欢，顺便提

一句，她有一个箱子，你想装的任何东西都能塞进去，这是一架名副其实的手风琴。啊，她把我们所有人都能装下，更不用说我们的老婆、儿女和全体家人了。

当塞勒克正讲到兴头上时，政治教员把他打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座位上，政治教员对塞勒克在老指挥官时期的壁画就已见怪不怪了，因此他对他的画甚至瞧都不瞧一眼，开始把一本旨在阐明社会主义军队与资本主义军队的区别的小册子大声地读给大家听。正当塞勒克那番讲解在我们头脑里逐渐淡化，我们开始陶醉各自的幻想中时，娃娃指挥官走了进来，我们都噌地站了起来。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政治教员的讲课的，可是他还没顾得上示意我们坐下，就被墙上画的东西惊呆了。他把政治教员的课打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冲着塞勒克大吼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塞勒克走出队伍，来到面前，开始慷慨激昂地演说：红军在我们国家进行的这场战斗中重要性在画中得以形象的表现。我们的红军在这里（他指着那中士），红军的身旁（他指着那位军官的妻子）是工人阶级和（他指着他的校友）革命的二月。瞧，这些（他依次指着其他女人）代表着自由，胜利和平等，这里（他指着那位展示臀部的军官的妻子）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正走下历史舞台。

塞勒克刚一说完，指挥官就宣布红军在这幅画里受到了侮辱，要求立刻把它抹掉。他告诉塞勒克，一切后果都要由他负责。为什么？我低声问。指挥官听见了，于是问我是不是有相反意见。我说，我喜欢这幅壁画。指挥官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在手淫者看来这幅画当然很完美。我提醒他，用裸体雕刻代表自由正是米瑟贝克的所为，阿莱斯的名画《伊泽拉河》画的也是三个裸体，用裸体比喻事物是古往今来的画家们惯用的手法。

娃娃指挥官狡猾而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再次强调那幅壁画必须取下来。也许是我们设法使他失去了警惕，因为塞勒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受到惩罚，至少这次没有。但塞勒克和我确实引起了他的反感，不久我们俩就先后受到惩戒性的看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我们用镐和铁锹在一个偏僻的营区劳动。因为是一个睡眠惺忪，戒备松懈的下士看管我们，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却倚着铁锹聊天，没有注意到娃娃指挥官正在远处监视我们。当他下命令说：“士兵扬，立即到这里来！”我们才察觉他的存在。我以精神饱满的姿态拿起铁锹走到他跟前，立正站好。“这就是你对工作的态度吗？”他问。至于我当时回答些什么我都已记不清了，可我知道我还算有礼貌，因为我无意使自己在军营里的生活过得更困窘，或者无须去冒犯一个能完全摆布我的人。可是，听到我那清白无辜，甚至声音细弱的回答后，他的目光更严厉了。他走上前，抓住我的胳膊，用地道娴熟的柔道绝技给我来了一个大背胯，然后在我身边蹲下来，把我压在地上（由于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所以我根本没打算自卫）。“还想再来一回吗？”他大声问，以便使每个人都听得见。我告诉他不想试了。他命令我站起来立正，然后对集合完闭的连队宣布：“我要关士兵扬两天禁闭。原因不在于他违抗命令，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我已用我的手处理了。不，我关他禁闭的原因是他贻工。下回这样的结果也可能落到你们其他人的头上。”说完他转过身，潇洒地大步走掉了。

当时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因使事物过于扎眼而不能给人慰藉。当时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是一个满怀报复，阴险奸诈的混蛋；现在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年轻人。年轻人情不自禁要表演：因为他们还如此稚嫩却挤进了一个成熟的世界，所以不得已扮演成熟。因此，只要对他们有吸引力，非常时髦，合他们心意的人，他们都会以此为榜样、标准——极力扮演得像他一样。

就这位娃娃军官而言，他还不够成熟，也缺乏经验，但他却突



然发现自己成了一群他无法理解的士兵的头儿。如果这个局面他能处理，那仅仅是因为他耳闻目睹的大量东西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面具，低廉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英雄，具有心如铁石的硬汉子，能够打败一帮家伙，靠机智而不是靠言语生存的男人，由于对自我拳头的信心使他从整体上相信自己是男人。孩子般的外表使他愈加不顾一切地扮演铁人的角色，他的表演也就愈是故作。

毫无疑问，就青少年的角色扮演来说我遇到的已不是第一次了。在审讯明信片事件的时候，我刚满二十岁，我的审讯者们与我年龄相仿。他们一样也是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面具，冷酷无情的、禁欲的革命者的面具，来把他们童孩面目掩盖起来。玛格塔怎么样？某部 B 级电影里的女救难者不正是她模仿的原型吗？泽门尼克不正是突然被一种感伤的道德所攫住了吗？那不也是一个面具吗？而我自己呢？我不也是在几个面具之间周旋，直到被绊倒，失去了平衡吗？

青春就像一个可怕的舞台，穿着高统靴和化装服的孩子们在上面登踩，他们把自己背熟的话在台上说出来，而这些话他们只是狂热地相信却对它的含义只是模糊地了解。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鲁，年轻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装扮起来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真实地灾难。

当这一切在我脑海里回荡时，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刻骨仇恨，同时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也掺杂于其中，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躁动不安地期待长大的一种表现。

在我回忆所有那些期待着长大的孩子时，我禁不住想起了亚历克谢。他也需要扮演一个大角色，一个他的理智和经验都担当不了的角色。同那位指挥官一样，他也显得比他的岁数年轻，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管他没有那位指挥官的魅力：他身材瘦小，厚厚镜片后面是他那向外窥探的近视眼，满脸黑头粉刺（一种可能是青春期的永恒献礼）。他曾在步兵军官预备学校服役，可是突然被调到我们这里。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公开审讯就要开始，每天，在全国各地的党支部，法庭和警察分局，属于被告的所有信心，荣誉和自由都在人们的举手同意中被剥夺。亚历克谢是一位新近被捕的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儿子。

突然有一天他就冒了出来，分到斯塔纳的空床铺。他对我们态度冷漠，一如当初我对我的新伙伴表现得那样，当得知他是一名党员时（他的党籍还保留着），其余的人当他的面说话就开始小心了。

一得知我当初是一名党员，就跟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决心经受住来自生活的最艰难的挑战，绝不背叛党。然后他把他写的诗念给我听（他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得知要调到我们团来时写的。其中几行这样写道：

同志们，随你们高兴干什么，  
把我在泥浆里拖，还朝我啐唾沫。  
可是同志们，尽管粘着泥浆和唾液，  
我还是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的行列。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和我一年前想的一样。但是随着时光推移，我已不再为此痛苦。露茜，我的向导，把我引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亚历克谢及其同类备受折磨的那个领域已不属于我。

当那位娃娃指挥官正在忙于营造他的全新统治之际，获得一次休假却是我关心的。露茜的同屋已经离开到乡下干活去了，我已在营房呆了一个月而没有被批准外出。指挥官已经详细记下了我的面孔和名字，在部队里士兵碰倒的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此。他通过任何一个机会使我明白我生活中的每一小时都得取决于他的喜好。至于我的休假，现状不是很理想。从一开始他就宣布，

休假只给那些在星期天自愿加班的人，于是我们大家都在星期天加班。但如果生活是这样就太惨了，整月都在矿上干活，时刻都呆在那里，即使谁得到了星期六的休假，清晨两点钟一步一晃地回来，第二天他又必须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去干活，很长时间看上去都像一个梦游者。

在星期天我和众人一起加班，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保证得到一次休假。很可能因为床铺没有被铺好或其他类似的违规而把星期天的加班功绩一笔勾销。但是（至少有时候），权力非但以恶意的形式而且还以仁慈的形式来显示它的霸道意志。娃娃指挥官在对我的几周恶意表现之后，他的自负准是得到了满足。他可以将他仁慈的一面展示给我，于是在最后的时刻，露茜的同屋要回来的前两天，我的休假终于被批准了。

坐在桌旁的那位老女人把我到达的时间记了下来，并告诉我上四楼，当我来到漫长的过道尽头，举手敲门时，我全身都激动不已。门开了，映入我眼帘的不是露茜，因为她躲在了门后，而是房间本身。乍一看，集体卧室与它一点都不相称。我好像步入了某座圣殿：一束鲜亮的金色大丽花摆在桌子上，窗户两侧是两棵很大的橡胶植物，这里的一切（花瓶、床、地板、甚至画片）都用绿色的小树枝结成花彩（我立刻就认出是芦笋蕨类植物），仿佛盼望着——一匹驴子驮着耶稣基督走进来。

我把露茜搂在怀里（她还在门后躲着）亲吻她。她穿我们去商店那天我送给她的黑色睡衣和高跟鞋。她身着黑衣驻足在那，在一片为节日装饰的青枝绿叶的掩映下，看起来恰似一名女祭司。

我们将背后的门关上，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房间的本来模样，看到四张铁床，四个带着缺口的床头柜，一张桌子，以及青枝绿叶下的三把椅子。但是，在露茜开门的一刹那间我所产生的喜悦是没有什么可消减的。不仅是因为在一个月里我第一次有了属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己的几小时，而且还因为在一年中我第一次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深深地陶醉于房间的舒适。

每当我与露茜一起去散步，营房和我在那里的命运总是受到来自营房的束缚。亘古永存的空气流就像一根无形锁链把我绑在营房的大门和那上面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上。我认为我可以停止“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整整一年我是第一次踏进一个私人的小房间。

而突然之间我站在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我有三个小时的绝对自由属于我。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违反所有的军纪）脱掉帽子和皮带，脱掉衬衣、裤子、靴子，脱掉一切，只要我愿意，在它们上面跳上跳下也无所谓。我可以随心所欲，无须不用担心被人监视。这房间除以上那些以外还挺舒适暖和，像酒一般滚烫的温暖和自由涌上我的脑际。我用手搂着露茜，吻她，把她带到床边。床上的小树枝（一床廉价的灰色毯子另外铺在上面）使我深为感动。它们只能被我诠释为婚姻的象征，我既惊讶又感动地想到，一种旧远而又为人尊敬的民俗被露茜以她那纯真复活了，她希望用一切应有的仪式向她的童贞告别。

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尽管露茜对我的吻及拥抱予以了回报，但她却在犹豫。虽然她的嘴唇热烈地吻着我，却又一直紧闭着。她的整个身子虽然紧紧贴我，但当我把手滑到她的裙子下面抚摸她那温暖的大腿时，她又起身避开了。我开始明白了，我那随心所欲、不顾一切的欲望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应，我记得那个时刻（我进入房间后还不到五分钟）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们相挨着坐下（可怜的小树枝在屁股底下被压坏了），开始交谈起来。几分钟后（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我又试看去拥抱她，可是她开始抵抗。我们就这样扭斗在一起，爱情的扭斗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完全是两回事，它会把我们爱的关系变成某种很不光彩的东西，露茜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猛烈的，近似

于拼命的战斗。我除了退却别无选择。

我试图用话来说服她，于是一刻不停地说起来。我记得当时我告诉她，我爱她，爱情意味着互相给予，毫无保留。当然，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我的目的也并非特别新颖）；但是，即使我的论证听起来很平庸，它也是无可辩驳的。露茜也没有打算反驳，而是静静地以沉默面对，要不就说：“请不要，不，”或者“现在不，今天不……”并且试图（无能得令人感动）改变话题。

我采取了新的战术：你该不会告诉我，你是那种为了取笑男人而引诱他的女人吧，你不会那样冷酷和狠毒吧……我又一次去搂抱她，一次短暂而又令人丧气的搏斗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搏斗的丑恶。

突然，意识到了她这样不顾一切抵抗的原因是什么了，我的上帝，我刚才干嘛没想到这点？她不过是一个对爱感到惊恐的孩子，一个害怕未知事物的受惊的处女。我决定将我的迫不及待掩盖起来——她肯定是被它吓坏了——变得更温柔一点、钟情一点，使爱的行为表现为一种我俩彼此都熟悉发展过程中的温柔的，专一的抚摸。我不再强求，并且开始爱抚。我吻她（似乎吻了一世纪），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虚伪地，狡诈地），尽可能不引她注意地使她成斜卧姿势。最终我达到了目的。我抚摸她的胸部（对此她从不反抗）。我告诉她，我将温柔体贴地对整个身子，因为她就等于她的身子，我将温柔体贴地对整个的她。我甚至设法把她的裙子往上拉了一点，然后开始吻她膝盖上方五寸，接着是八九寸的地方。我没能再进一步。当我试图把头移到她的大腿之间时，她惊恐地挣脱我，从床上跳下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痉挛的表情写在了她的脸上。

露茜，露茜，是太亮而使你感到害羞吗？你希望在黑暗中吗？她就像抓住救生衣一样抓住我的问话。是的，她因为太亮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到害臊。我走到窗户跟前，打算把窗帘拉上，可是露茜叫起来：“不，不要这样！别把它拉上！”“为什么？”我问。“因为我害怕。”她说。“你害怕光线还是黑暗？”她没有回答，反而啜泣起来。

我对她的反抗产生不了一点怜悯。在我看来，她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既过分又不公平。我感到痛苦，无法理解。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处女，很怕痛才这样反抗的。对我的每一个问题她都顺从地点头，指望她能从某个问题中爱的全部含义。“你希望自己属于我，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她渴望，她说。我再次搂她，而她再次反抗。我尽了最大努力才压住自己的怒火。“你干嘛老是反抗我？”“下一次，”她说，“我愿意，我想要，但改日吧，在另外的时间，不要在今天。”“今天怎么不行？”“不要在今天。”她回答。“可这是什么原故呢？”“请不要在今天。”她回答。“那么在什么时候呢？你应该清楚这是我们最后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明天你的同屋就要回来了。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单独在一起呢？”“你会找到一个地方的。”她说。“好吧，”我说，“我会找一个地方。但我们俩要一道去。那地方可不像房间舒适。”“没关系。”她说，“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那么好吧，可是答应我，到了那里我要你做我的妻子，答应我，你不会进行反抗。”“好吧。”她说。“答应了？”“是的。”

这个允诺是我从露茜那里得到的惟一的東西。它虽然不能令人同意，但毕竟要比一无所有强。我尽量保持平和，把剩下的时间用来谈话。我该走了，我抖掉军服上的芦笋蕨类植物，拍了拍露茜的脸，告诉她我除下次约会将什么都不想（我说的是实话）。

没过多久，在细雨霏霏的一天，我们从矿井返回营房，步履蹒跚地走过一条满是水洼的路。泥溅得我们到处都是，浑身湿透，渴望能休息一下，即使是一个星期天的休息在我们中大多数人迈一个月以来都是罕见的。可是刚一吃完饭，那位娃娃指挥官

就把我们叫出去，宣布说，下午营房检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违反规章的事。然后他把我们交给军士们，作为对我们的惩罚，让他们额外训练我们两个小时。

由于缺少武器，操练和格斗练习就特别显得毫无意义，将我们的时间的价值贬得一文不值是它们的惟一目的。记得在这位娃娃指挥官的统治时期，有一次我们用了整个下午把笨重的木板从营区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第二天下午它们又被我们拖回原处，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十来天。然而，一天的矿井做业后，我们在营区干的一切活儿都和拖木板差不多。这一次不同于拖木板的是我们反复拖来拖去的是我们的身躯。我们使身躯向后转，向右转，我们把它们摔在地上，又把它们抬起来，我们带着它们东奔西跑，拖着它们穿过泥泞。三小时后，娃娃指挥官露面了，命令军士们把我们带去进行体育锻炼。

一块田野掩藏在营房后面，可以用来踢足球、战斗演习等。军士们决定让我们展开一场接力赛。我们连由九个班组成，每班十个人，因此我们以十人为一组，组成了九队。即使把我们累得趴下，军士们也无须感到内疚。但因为他们的年龄大都介于十八至二十岁之间，所以禁不住一有机会就要炫耀，他们决定和我们进行对抗，并且组成了自己的队。

他们花了半天时间才让我们搞清他们的意图。即头十个人从田野的一边全速跑到另一边，那里将相应有十个人等着，接着这批人又全速跑回上一批人起跑处，这时候又有另外十个人等着他们，等等。然后他们不厌其烦地点出我们，把我们安排到田野的两头。

又是矿井里干活，又是操练，我们已疲惫不堪，一想到还得赛跑就气得要死。于是我有了一个简单的主意：干嘛不一招定输赢呢？我把计划告诉了一两个朋友，它立刻就传了开去。随着这计划推广，阵阵窃笑不时从累得死去活来的十兵中传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我们站到各自位置，准备赛跑，这种赛跑在我们看来自始至终都是令人发笑的：虽然我们不能脱掉军装和笨重的靴子赛跑，我们还是必须跪在起跑线上；虽然我们传递接力棒的方式很不正规（接棒的人面对赛跑者），我们还是有真正的接力棒来交接和发出起跑信号的真正的手枪。在第十队列中的那位下士（军士们的第一位赛跑者）以惊人的高速射了出去，而我们（我在第一棒）却慢慢地直起身，以缓慢的步伐起跑，跑了二十码后，要不是我们强忍着否则一定会大笑起来：下士已经跑到田野的另一头，我们却整齐地跑在后面，尽做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不久，我们听到来自田野两头的士兵的喊声：“加油！加油！加油！”半途上我们遇到了军士队的第二棒，他飞奔向起点。当我们终于到达田野的另一头，递出接力棒时，第三名军士已经接过接力棒冲了出去，正准备将我们落下一圈。

如今返回头看那场比赛，把它看做是黑色徽章的最生动的一次反抗。伙伴们各显其能，奇招百出：昂扎简直是一瘸一拐地前进，我们拼命为他加油，他以领先别人两步地优势而获得了英雄般的胜利，大家以雷鸣般的掌声对他表示祝贺；吉卜赛人马特洛斯在地上摔了八九次；塞勒克每跑一步都用膝盖碰他的下巴（这样做肯定比正常的全速跑还要累人得多）；大家都支持我们。彼得里奇，这位循规蹈矩（也很顺从的）和平宣言起草者让我们感到很满意，他不失尊严地以别人同样二倍速度小步朝前跑；讨厌的巴威尔·佩克尼也没有辜负我们；年长的安布罗兹双手背在后面，直挺挺地跑；红发皮特兰一边跑，一边发出尖利的叫声；瓦尔加，这位匈牙利人一直高喊着“乌啦”！——没有任何人破坏这个精彩的小游戏，它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我们望见娃娃指挥官从营房向这边走来。一位下士也看见了他，跑过去向他汇报。在听完汇报后，他亲自走到赛场边观看比赛。军士们（他们的最后一棒早已跑回来了）开始变得不



安起来，对我们叫道：“加油！加油！加油！”可是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我们的欢呼声盖过了。军士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下面的比赛。他们来来回回交换意见，拿眼睛望着指挥官，可是指挥官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正在盯着比赛，眼里射出冰冷的目光。

比赛终于到了最后一棒。碰巧亚历克谢也在里面，我很想看看他会怎样表现。不出所料，他想破坏我们的兴致。他全力以赴跑在前二十米就领先了五米。但接着某种奇特的事发生了：他的速度降了下来，已经逐渐和别人接近。一刹那间我意识到，无论亚历克谢怎么想破坏大家的情绪，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病得很厉害，力不从心，两天以后他们就将不得不让他从矿井里的重活调走。在我看来，在整个闹剧中正是这一点是最精彩的。瞧，他跑来了，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与落在他后面五步远，以同样速度慵懒地跑着的伙伴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军士们和指挥官一定不会怀疑亚历克谢的轻快起跑与昂扎的佯瘸，马特洛斯的摔跤，以及我们的欢呼一样，都是这场闹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亚历克谢和他身后的人的拳头一样紧紧握着，他们完全像亚历克谢一样在卖力和喘气。差别在于，亚历克谢的痛是真的，为了克服疼痛而从他脸上流下的是真正的汗水，跑到田野的一半，亚历克谢的步子更加慢了，几个假扮的赛跑者逐渐赶上了他。离终点线三十米处，他干脆停止跑了，很难地到终点，一只手使劲按在腹股沟左侧。

指挥官命令我们集合。想知道我们跑得那么慢的原因。“我们累了，首长同志。”只要觉得累的人他都要求举手。我们举起了手。我朝亚历克谢望去（他站在我前面的一排），他是惟一使手保持原状的人。指挥官忽略了他，于是说：“我明白了，你们所有人。”“不，首长同志。”“谁没有累？”“还行。”亚历克谢说。“你不累？”指挥官盯着他问，“我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吗？”“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亚历克谢回答。一阵嘀咕和讥笑从队列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出。“你是最后一个冲刺的人吗？”指挥官问。“是我。”亚历克谢说，“可是你还很好。”指挥官说：“是的。”亚历克谢回答。“既然你不累，那么你是在故意破坏这场比赛。对于阴谋破坏比赛要关你两周禁闭。其余的人因为累了，所以可以原谅。但是，由于你们在井下的工作效率过低，你们必须在假日拼命干。考虑到你们的健康。所有人下两个月的休假被取消了。”

亚里克谢在被关禁闭之下同我谈了回话，他指责我不配做一名党员，并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问，我对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回答说的是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在这里，在兵营，两者完全一致，因为这里的界线划分是另有标准的，惟一有效的界线是看你属于对自我命运丧失支配权的人还是属于随心所欲处置剥夺掉了的他人权利的人。但是，亚历克谢反对我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与反动派之间的界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我问他，娃娃指挥官使亚历克谢在禁闭室呆两周，对待所有人就像有意要使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对手，以此来捍卫社会主义而反对它的敌人，他如何看待这一点。亚历克谢承认，他也不喜欢指挥官。然而当我指出，如果我们这存在着一一条社会主义和反动派的界线，那么他就应该和指挥官是一伙时，他粗暴地回答说，他正是属于那一边。“我父亲被捕是因为间谍的罪名。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怎样能使党信任？党对我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我和昂扎在几天后也谈了一回。话题却截然不同：我对我们两个月不放一次假心怀不满（心里想着露茜）。“别发愁，卢德维克老兄，”他说，“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的凝聚力因对接力赛的破坏而骤然加强了。一个小型委员会被昂扎组织起来探讨各种不请假外出的可能性。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切便都准备停当：设立了一笔行贿基金，将我们营房里的两名军士收编了过来，我们把栅栏最关键处的几股铁丝悄悄剪

断，那地方在医务室附近，离村庄的头几幢小屋只有十五步。一位我们在矿井里认识的矿工住在最近的那幢小屋里。伙伴们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他离家时不锁上大门。士兵只需偷偷地到达营房栅栏，从下面爬过去，以最快速度过那十五步路就到了那幢小屋的大门口，一旦进入屋子，他就没有任何危险了。要想走到大街上，他只需穿过屋子即可。

虽然这个路线较稳妥，可我们还是谨慎地使用它。要是太多的人同时涌出军营，人们会立刻发现他们的外出。因此，昂扎的特别委员会不得不控制对每天不请假外出的人数进行控制，并安排了一个长期的日程表。

但是整个计划在轮到我之前就被破坏了。一夜，指挥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住处，察觉三个人不见了。他找来负责的军士（他没有报告这些人不在），胸有成竹地问他，他收了我们多少钱。这问题使下士很窘迫，他以为指挥官已经知道了内情，便打算将整个事情和盘托出。当指挥官让他与昂扎对质时，他进一步确认昂扎就是对他行贿的人。

我们被娃娃指挥官如愿以偿的处置了。首先，他让那名军士，昂扎和三名不请假外出的士兵受到了军事审判（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甚至没有道别。这一切发生在第二天早晨，而我们当时正在矿井。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们都被判有罪，昂扎被判关禁闭一年）。然后，在下一次集合时，他宣布他要休假的禁令被延长到四个月，并把我们都置于一个特殊纪律的统治下。他还要求修建了两个了望塔——建在兵营的两头——一组探照灯，两条受过专门训练的德国牧羊犬也被他调来看管兵营。

指挥官的进攻是那样猝不及防，因此我们全都确信昂扎和他计划的消息一定是被人走漏了。不是因为我们营是告密者的温床（我们对这种行为全都嗤之以鼻），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情随时都会发生。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按时获得赦免，得到表现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证明，为某种未来创造条件，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为行这有效的方法就是告密。尽管我们自己（我们绝大多数人）抵制这种最令人憎恨的行为，可我们却仍然按捺不住要怀疑别人会这样做。

这一次，怀疑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很快就变成了集体判罪（尽量可以从其他方面对指挥官的空袭进行合理的解释），并且毫无例外的落到了亚历克谢身上。事情发生时他正在关禁闭，他下井干活却依然如常，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人人都断定他有的是机会（“带着他对训练有素的耳朵”）获知昂扎计划的一些情况。

真正的磨临降临在可怜而瘦小的亚历史谢头上：领班（我们的一个人）开始将最重的活派给他。他的工具突然开始不胫而走，他只好用自己的工资去买新的工具。接连不断的侮辱和讥讽都指向了他，他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他回到营房的那天，有人用黑色的机油写四个大字在他床铺上方的木壁上：谨防密探。

押走昂扎和其他犯有过失的四个人后的几天，我偶然在傍晚时分走进营房。那里空荡荡的只有亚历克谢，他正在重新理铺。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他的床铺每天都要被同伴们折腾好几次。我告诉他，我们都深信是他告发了昂扎。他眼含热泪抗议道他对此毫不知情，也绝不会告发任何人。“你如何证明绝不会告发任何人呢？”我说，“你把自己看成是指挥官的同盟。你向他传递消息正是最顺理成章。”“我不是指挥官的同盟！”他歇斯底里说。“指挥官是一个破坏分子！”接着他把在禁闭室冥思苦想后得出的结论说给我听：黑色徽章是党为那些不能发给武器，但认为可以改造好而设制的。可是阶级敌人绝不会睡大觉，他们尽其所能阻止再教育的过程进行。由于惩戒营的士兵被他们看成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因此让这些士兵对共产主义心怀不满就与他们切身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那位娃娃指挥官如此对待这些士兵，

不断向他们挑衅——这显然是敌人的阴谋之一。敌人藏身何处是你们所无法确知的。毫无疑问指挥官就是敌人的代理人。但是亚历克谢深知自己职责所在，他已经起草了一份有关指挥官活动的详细报告。我大吃一惊。“什么？你干了什么？你把它寄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告诉我，他直接将他的控诉寄给了党。

我们来到室外。他问我是否担心被人看见我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他，傻瓜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他认为党会收到他的回信，那他就是一个更大的傻瓜。他回答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随时都要尽一个党员应尽的职责。他再次提醒我，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被开除出党），应该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要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负责。”我差点当着他的面笑起来。没有自由，何谈责任，我告诉他。他说，他的行动还是很自由的，因为他像一个党员那样行动，他必须证明而且将会证明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说这些话时他的下颏都在颤抖。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过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的亚历克谢还不足二十岁，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对于他而言，命运仅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就像一个小孩披着巨人的衣服一样。

我同亚历克谢谈话后不久，我被塞勒克质问（正如亚历克谢曾担心的那样）干什么要同那个告密者说话。我告诉他，与其说他是告密者，还不如把他当成一个傻瓜，然后我把亚历克谢对指挥官的仇恨讲给他听。塞勒克漠然处之。“他是不是傻瓜我不敢肯定”，他说，“可我绝对相信他是个告密者。在我看来，凡是能够公开宣布自己与父亲的父子关系一刀两断的人都是一个告密者。”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对我对此事的一无所知感到惊异。是政治教员擅自把那张登有亚历克谢声明的报纸给他信看的，那是几个月前的报纸，当时说：他已与他父亲脱离了关系，因此他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被他父亲背叛和玷污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天晚上，在新建的了望塔上的探照灯第一次照亮了兵营，一名卫兵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巡查着带刺铁丝网。突然之间，我感到孤独极了，我还得受整整两个月等待的煎熬才能见到露茜。我坐下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我才能看到她，我们不准出兵营，我难过极了。她上次拒绝给予我那样渴求的东西，我可以通过对那件事的回忆支撑着自己度过那段日子。

信发出去后的第二天，与往常一样。从矿井回来后，我们被迫做向后转、向前走和迅速卧倒，按照惯例，我做这些动作时，几乎不去看领队的下士，在我周围前进、卧倒的朋友们，也不去注意我们三面的营房，更不用说另一面沿带刺铁丝网栅栏延伸的那条道路。有人路过栅栏是常有的事；时而有人会停下来（多数是自己或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大人们会解释说我们是在正在训练的士兵）。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气的背景，一种着色的麻织品（它就是带刺铁丝网那边的一切），我之所以抬头望一眼，这时有人朝着那个方向轻轻地叫起来：“嘿，姑娘，你在那儿盯什么？”

于是我看见了她，是露茜。她驻立在栅栏旁边，穿着她那件褐色旧外套（当我们购置夏装时，我们完全忘了冬天就要来了），和那双时髦的我送给她的黑色高跟鞋（它们滑稽地显得很不协调），纹丝不动站在栅栏旁边，朝我们这个方向了望。对她身上的那种与众不同的顺从神态伙伴们开始大加评论，可是无奈过禁欲生活的男人的绝望渐渐从他们的话里表现出来。下士很快就发觉大家精神涣散的原因，可是他无权命令这个姑娘离开栅栏。栅栏外的领域是他控制范围之外的比较自由的领域。他的无可奈何使他十分恼火。他命令士兵们闭上他们的嘴，然后将他的音量分贝加大，加快了操练的步子。

她开始来回踱步，时而会离开我的视野，但她总是又返回原

位。即使操练已毕，我也无法走上近前，我们还要进行政治学习，直到强忍着听完一小时关于和平的军营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套话，我才能够溜出去（此刻天已快黑了）看看栅栏边上是否还有露茜的身影。她还在，于是我朝她奔过去。

她叫我不要生她的气，她爱我，要是她使我不高兴了，她很难过。我告诉她，我无法预知下次再见到她的时间。她说没关系，她会到这里来看我的（这时有几个士兵走过，冲我们喊了一句猥亵的话）。我问她，当兵的冲她这样喊叫，她是否介意。她说不，她不介意，因为她爱我。她将一束玫瑰花从栅栏那边塞给了我（集合号吹响了），我们隔着带刺铁丝网的一个缺口吻起来。

露茜几乎天天都要来到栅栏边。我在矿井里上早班，因此，下午就在兵营里度过。每天我都收到一小束鲜花（一次在检查士兵装备中，花被中士扔在地上），跟她说上几句话（每次的话都一样，因为事实上我们彼此可说的话很少。我们新闻思想都不谈。我们只希望再向对方保证一句不断重申的真话），我几乎天天给她写信。那段时期是我们恋爱最狂热的时期。了望塔上亮闪闪的探照灯，夜幕降临时吠叫的警犬，统治我们大家的那位傲气十足的小男孩——这一切很少占据我的思想，我把心思全都放在露茜的探望上。

在由杀戮成性的狗包围着的兵营里，在因风钻而震动的矿井里，我实际上感到很幸福。我感到幸福和骄傲，因为从露茜那里我得到了宝贵东西，而这些是我的同伴和我们的军官所无法拥有的。有人爱我，并且是公开而坦率地表露出对我的爱情。即使露茜算不上他们心中理想的女人，即使她示爱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比较古怪，可这仍然是一个女人的爱，并且引起了赞叹，怀旧和嫉妒的感情。

我们的人世生活和女人隔离得愈久，女人在我们谈话中占的分量就越重。每一个单项，每一个细节，都包含了深长的意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回忆胎记，描出（有钢笔在纸上，铁镐在泥土里，手指在沙里）乳房和屁股的轮廓；我们争论哪一个不在场的躯体曲线最美；我们惟妙惟肖地表演性交过程中的呢喃细语和呻吟声；然后我们再演练一遍，每一遍都更添油加醋。轮到我时，他们很自然地表现出更为浓重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每天都见到我的女友，能够想象出她的模样，把她的实际外表和我的描述联系起来。我不能让朋友们失望，我不得不向他们“交待”，我不得不详细描述我从未见过的露茜的裸体，以及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的爱情之夜。随着我的讲述，一幅表现她柔情蜜意的精致画面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我和她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样子？

在她宿舍里。她在我面前脱掉衣服，柔顺虔诚，羞怯难抑。她是一个乡下姑娘，而我也是第一个看见她裸体的男人。她的虔诚与羞怯使我发狂。当我走向她时，她退缩着，双手遮掩着下身……

她为什么总穿着那双黑色的高跟鞋？

我告诉他们，我买那双鞋是为了让她裸露时穿的。她虽然很害羞，但对我百依百顺。我直到最后一刻才脱掉衣服，而她总是穿着那双高跟鞋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多么喜欢看见我穿着衣服而她却光着身子的情景！），然后走到食橱边，取出酒来，依然光着身子替我斟满酒杯……

因此，当露茜来到栅栏前时，盯着她看的人就不只我一个了。有十来个伙伴也加入进来，他们非常清楚她做爱时的样子（她说什么话，她怎样呻吟），他们会对她穿的那双黑色高跟鞋说出种种暧昧之语，并在头脑中想像她在那间小屋里裸露着散步的情景。

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回忆一两个女人，并与其他人共享温柔，但我是惟一个可以提供一个与话语相配的肖像。惟有我的



女人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看得见的。友爱的团结感曾使我十分具体地描述了露茜的裸体和性爱动作，现在又令人痛苦地促使我对她的欲望更加强烈。每次她出现在大门口时，他们都要说些猥亵的话，但我并不为此感到不安。他们绝不可能把这些话付诸行动（带刺铁丝网和警犬使她免受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伤害）；再者，我正是因为他们才得到了她。他们使我对她的想像变得清澈透明，帮助我描绘想像的画面，增添各种令人陶醉的诱惑笔墨；我们都满怀激情地向望着她。每当我朝栅栏前站着的她靠近时，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我由于欲火中烧而半晌无语，我不明白发现她身上的女人气质竟花费了自己半年的时间，只要能与她单独过一夜，我愿意牺牲一切。

我对她的态度并不是已变得凶狠、粗暴，或者更少柔情。我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生平中仅有的一回一次体验到对一个女人的全部欲望。我的全部生命都被包括其中：肉体与灵魂，欲望与感受，悲伤与纵欲的活力，对慰藉和粗俗的渴望，对永久占有和片刻欢悦的渴望。我已全身心的投入，聚精会神，今天那段日子被我看作是一个失乐园（一个奇异的乐园——由一群狗守卫着，并回响着一个下土的口令）。

我决心放弃一切顾虑安排一次与露茜的约会。我有的承诺，她“不会进行反抗”，并愿意在任何我选择的场所与我相见，在我们通过栅栏进行的匆匆交谈中，她还多次重申了她的诺言，我需要做的只是采取果断行动。

不久我就想出了一个计划。指挥官一直都没有发现昂扎。栅栏仍然有一处不易发现的缺口，与住在营房对面那位矿工的协定只需要恢复就行了。当然，兵营看守得很严，要想白天溜出去是万万办不到的。而在夜里，虽说要对付探照灯和警犬，但这些安排与其说是怀疑我们要偷跑，不如说是为了走走形式，使指挥官得到满足，因为企图偷跑意味着有可能受到军事审判，这样做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险太大了。因此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机会。

我需要做的只是给露茜和我自己在离兵营不太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合适的藏身处。这一带住的大多数男人都和我们在同一个矿井里干活，因此很快就找到一个人（一个五十岁的鳏夫），同意按我定的价钱（仅仅三百克朗）把他住处借给我。他住的那所房子从兵营就可以望见。我通过栅栏把那所房子指给露茜看，并将我的计划讲给她听。她毫不激动，只是恳求我不要为她去冒任何风险。如果她最终接受了它，那只是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拒绝我。

约好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开始就不寻常。我们刚收工回来，那位娃娃指挥官和平时一样把我们集合起来听他训话。通常他总是讲战争一触即发，以及一切反动派（这里他主要是指我们）就要面临的倒霉日子，试图以此恐吓我们。可是，这一次他把一些新观点加了进来：阶级敌人已经打入到共产党内部，但我们要特别奉劝所有的叛徒和特务，与那些公共暴露他们思想的敌人相比，那些藏在面具后面的敌人将受到还要严厉一百倍的惩罚，因为藏在面具后面的敌人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癞皮狗。“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个这样的癞皮狗。”他命令亚历克谢走出队列，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把它伸到亚历克谢的脸上。“这封信你见过吗？”“我见过。”亚历克谢说。“你是一个癞皮狗，一个告密者，一个间谍。但是，当一条狗尖叫时，声音却没有传出去。”然后他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我还有一封你的信。”他接着说，把一个拆开的信封递给亚历克谢。“把它大声念出来。”亚历克谢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扫了一眼，但一句话都没说。“把它大声念出来！”指挥官重复他的命令。亚历克谢还是保持沉默。“你打算念还是不念？”指挥官问，看到亚历克谢仍然缄口不言，他怒冲冲地喊道：“卧倒！”亚历克谢扑倒在泥泞的地里。娃娃指挥官严厉监督了他一会儿，我

们都确信他立刻就要喊出一连串的“起立！卧倒！起立！卧倒”！那么亚历克谢就将必须站起来，扑倒，又站起来，又扑倒。但是指挥官并未这样做，他让亚历克谢留在那里，自己转过身来，开始从队列前面慢慢走过，边走边仔细检查大家的装备。当他来到队列的末尾时（这用了他几分钟时间），他又转身慢慢地往回走，来到亚历克谢仍旧趴着的地方。“现在念吧。”他说，于是亚历克谢从地上把沾满污泥的下巴抬起来，伸出右手（那封信还紧紧地握在他手里），就趴在那里，大声念起来：“特此通知你，你已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被开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籍。代表区委会签字人……”然后指挥官命令亚历克谢重新回到队列中，把我们交给一名下士去操练。

操练和政治教育结束后，在六点半左右（此时天已黑了），露茜已站在栅栏边。我朝她走去时，她轻轻地点了点头示意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便离开了。接着是吃饭，唱歌和打扫卫生，最后是熄灯。我在床上一直等到下士进入梦乡，然后迅速穿上靴子，蹑手蹑脚溜了出去，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裤和长睡衣。我穿过过道来到院子，穿着这身夜间服装实在觉得有点冷。栅栏的那个缺口正好在医务室后面。这真是个绝佳的位置。如果有人拦住我，我可以说我感到身体不适，正准备去叫醒军医，可是没有人拦我。我沿着医务室的边缘走，在房子的阴暗处蹲下。探照灯慵懒地照在一点（显然，了望塔上的哨兵对他的工作已很马虎了），我继续要走的那段路处在黑暗中。现在我惟一要做的是要避开那条整夜巡逻的狗。一片寂静（不安的寂静：我彻底丧失了方位感），我大约在那里站了十分钟，终于听见一声狗叫，吠声是来自后面，来自兵营的另一头。我跃身站起，冲向栅栏（这段距离不到五码），冲向铁丝没有和地面完全联接那个地方（多亏了昂扎的手工活）。我趴下身，从下面钻过去，跑过最后五步路，来到那位矿工房子的木栅栏。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大门开着，小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头一扇窗户的窗帘背后亮着一盏灯。我轻轻敲了几下窗子，一个高大的男人几秒钟后将门打开，大声请我进去（我被这样的音量吓坏了。我没有忘记这里离兵营只有五码远）。

门直接通向房间。我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被眼前的景象搞糊涂了。另外五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有一瓶打开的酒。他们一看见我的装束就大笑起来，他们说他们打赌，我穿着这身长睡衣肯定冻坏了，然后倒了一杯酒给我。我尝了尝，是威士忌，很浓。他们叫我干了；我照办了，接着一阵咳嗽。他们又大笑起来，给我拉来一把椅子。他们问我是如何“越过边境”的，又拿我滑稽的装束开了一阵玩笑，称我是“飞跑的内衣裤”。他们都是三十出头的矿工，在这里聚会可能是常事。虽然他们在不停地喝酒，但还没有醉，他们愉快的兴致很快就使我从最初的惊异（不，应该说是震惊）中平静下来。我让他们又给我倒了一杯这种特别浓烈和刺激的饮料。这时，房子的主人到隔壁房间，把一套黑色服装取了出来。“你看它合身吗？”他问。他几乎比我高一个头，臀部比我宽得多，可是我说：“我凑合。”我把裤子套在长内裤上，但为了不使它滑下来我必须抓住裤腰才行。“谁有皮带？”我的捐助人问。没人有。“一根绳子呢？”我说。他们果真找来一根绳子，它多少派上了用场。当我穿上夹克衫时，这些人保证（我不太肯定为什么）我再配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手杖，就会像查里·卓别林了。为了使他们高兴，我把脚后跟并拢，足尖向外。裤腿在我的鞋背上微微拂动，对这个样子他们很满意，并安慰我别担心。我的愿望将成为任何女人的命令。接着他们给我倒了第三杯酒为我送行，主人承诺，我可以在当晚任何时候敲他的窗子，重新换回衣服。

我走上灯光昏暗的街道，用了十多分钟才赶到露茜正在等候的那所房子。我别无他途只得从整个兵营绕过，径直从那些灯火通明的大门前走过。结果我的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这身老百姓

的打扮确实发挥了作用，卫兵都没正眼瞧我一眼，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目的地。我打开外面的门（一盏孤灯照着它），凭记忆往前走（住在这儿的那个矿工告诉过我方向）：向左上楼，爬一节楼梯，正对着的门。我敲了敲。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去，露茜打开了门。

我把她搂在怀里（自那位矿工去上夜班后，她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她问我是不是喝了酒，我说喝了，然后把我溜出来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她始终都在发抖，她非常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此刻我才察觉到她的确在打颤。）我告诉她，我是那么的盼望见到她，可是我能感觉到她颤抖得更厉害。“怎么啦？”我问她，“没什么。”她回答。“那么你干嘛颤抖？”“我很害怕。”她说，轻轻挣脱我的怀抱。

我环顾四周。房间很小，布置得很简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被单有点脏）。一幅宗教画挂在床上，靠对面的墙有一个食橱，顶上存着几罐水果（这是此处惟一有点个人特色的东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灯，灯光刺得我的眼睛很不舒服，把我那悲惨而好笑的身影十分清晰地照出来。它使我痛苦地意识到我那肥大的夹克衫和松弛的裤子，下面朝外窥视的黑色军用靴，以及最为痛苦的是，我那光头在白炽灯下它就像苍白的月亮在发亮。

“请别介意我这副模样，露茜。”我说，然后又把我这身装束的必要性给她解释了一遍。她一再说这无所谓。酒力的发作使我无法自制，我宣称，不，我不能像这副样子站在她面前，于是脱下夹克衫和裤子；和我刚刚脱掉的那套衣服相比，我里面穿的睡衣和部队发的难看的长内裤更令人可笑。我走过去把灯关掉，但是黑暗没能来解救我，街灯光直接照在房间里。由于我以为至少光着身子都比穿这身可笑的衣服好受，于是我干脆把剩下的衣服脱光。我把她搂在怀里（我再一次感觉到她在颤抖），恳求她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掉衣服，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阻隔都消除。我用手抚摸她的全身，我再三恳求，但是露茜要我等一会儿，她不能，不要马上，不要那么快。

我拉住她的手，于是我们在床边坐下。我把头搁在她的腰股之间，过了好久，一动没动。在昏黄的街灯照射下我的裸体微微发亮。当我意识到结果一切恰与我所幻想的相反时——不是一个全身裸露的姑娘为一个衣着整齐的男人斟酒，而是一个全身裸露的男人躺在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腰股之间——我突然看清了我的裸体太不雅观。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从十字架上取下的裸身的基督，放在伤心的玛利亚怀中，我感到恐惧，因为我到露茜这里来不是为了寻求同情和慰藉，而是为了某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于是我再次采取强硬手段，吻她的脸和衣服，偷偷解开我想解开的地方。

我的目的没能得逞；露茜又一次挣脱开；我失去了推动力和急于求成的信心，也耗尽了言语和爱抚。我只是伸长四肢躺在床上，裸着身子，纹丝不动，而露茜则坐在我身旁，用粗糙的手指抚摸我的脸。痛苦和愤怒逐渐将我压倒，我在内心深处提醒露茜为了与她约会我冒的全部风险，以及我可能会遭到的全部惩罚。但令我烦恼的并不在于此（所以我可以对她讲一下——即使只是在心里）。我愤怒的真正根源深藏在我自己的痛苦中（我不好意思告诉她）。一个失败青年所感到的悲悯，没完没了的挫折所带来的痛苦，未实现的愿望所带来的永恒的耻辱。我想起了对玛格塔毫无结果的求爱，与那位金发女郎在拖拉机上令人作呕的交锋，对露茜徒劳的求爱，我真想大叫：为什么我必须始终一个成人——作为一个成人被审判，被开除，被打上一个托洛斯基分子的烙印，被送到这个矿上——而在爱情中却要因我的稚嫩而被迫忍辱负重呢？我恨露茜，知道她爱我就更加恨她，因为这使她的反抗显得更加无法理解，更加令人生气。于是闷闷不乐地沉默了半

小时后，我又展开新的进攻。

我压在她身上，使尽浑身解数想拉起她的裙子，扯掉她的乳罩，抓住她的乳房，可是露茜不顾一切地进行搏斗（和我被某种隐秘的力量缠住一样，她也着了魔一样），终于挣脱开来，跳下床，退到食橱边。

“你为什么要反抗我？”我冲她大叫。她咕哝着类似不要发火和原谅她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任何解释，也说不出任何符合逻辑的话。“你为什么要拒绝我？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吗？你一定是疯了！”“那么就让我出去好了。”她说，仍然紧紧地靠着食橱。“这正是我想做的，我正是要这样做！你一直在拿我当傻瓜！”我要给她下最后通牒，我叫喊道，或者她把自己给我，或者我们永不相见。

我再次走到她面前，把她搂在怀里。她这回没打算阻止我，可是她显得软弱无力，仿佛整个生命都不属于她。“你就那么看重你的童贞吗？你在为谁保全它？”没有回答。“说呀！”“你并不爱我。”她说。“我不爱你？”“不，你不爱，我原以为你爱我，可实际上你不爱我……”她突然哭了起来。

我蹲下来，吻她的脚，恳求她。但是她哭个不停，不断地说不爱我。

突然，我被一阵狂怒所统治。我感到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挡住我的道，不断地将我想要追求的一切从我手中夺走，我渴望得到的一切，本应属于我的一切。我感到正是同样的力量抢走了我的党，我的同志，我的大学学业——我的一切，而且总是毫无道理，没有缘由。我意识到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此刻正附在露茜身上与我对抗，我因她成了它的奴隶而痛恨她。我给了她一耳光，因为我打的不是露茜，而是那个邪恶的力量。我喊道，我恨她，只要我记着，就再也不想见到她。

我把她的褐色外套朝她扔去（它一直放在椅背上），吼叫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她出去。

她穿上外套，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心里空荡荡的。我想让她回来，因为我刚把她赶走就想念她了。因为我知道与一个穿着衣服，固执的露茜在一起，也要胜过没有露茜一千倍。因为缺少露茜的生活就意味着完全的孤寂。

尽管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可是我没有把她叫回来。

我在那张借来的床上光着身子躺了很长的时间。我不能想像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所房子，与矿工们开玩笑，回答他们亲切的猥亵的问题。

最后（很晚了）我起来穿好衣服走了出去。那盏街灯还亮着。我再次绕过整个兵营，在那所房子的窗子上（现在灯火已经不见了）敲了敲，等了三分钟左右，在那位打着呵欠的矿工面前脱掉衣服，当他问我事情办得如何时，我遮遮掩掩地咕哝了几句，然后再次穿上睡衣和长内裤，动身回营房。我此时的心态已是绝望之极，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一点也不去留意巡逻犬和探照灯可能会在那里。我从铁丝网下爬过去，神情恍惚地朝住处的方向走去。正当我来到医务室的墙边时，我听见一声喝令：“站住！”我停下来。一束手电筒的光射着我的眼睛。一条狗开始吠叫起来。

“你在那里干什么？”

“呕吐，中士同志。”我答道，用一只手扶着墙。

“哦，继续吐吧，伙计，把它吐得干净些。”中士说，然后带着狗继续他的巡逻。

我很顺利便上了床，但是我无法入睡。当听到指挥官发出“起床了”的叫声时，我感到很高兴，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了。我匆匆穿上靴子，在身上浇了些清凉的凉水。回到房间后，看见一群衣衫不整的士兵团团围在亚历克谢的床边，极力不笑出声



来。我顿时猜到有事情发生：亚历克谢（趴在毯子下面）还在酣睡。这使我想起弗朗特·彼得拉塞克，他装睡以报复指挥官，接连三个长官都无能为力，直到他们把他连人带床一起抬到院子，冲他打开消防水管，他才懒洋洋地揉了揉眼睛。然而，亚历克谢是不会反抗的；他过于虚弱是惟一可以说得通的。我正想到这里，一个下士（管理我们的下士）拎着一大桶水从走廊里进来。另一群人围在他周围，很明显他是受他们的唆使。这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典型的指挥官的心理，具有所有时代和所有政权的特征。

看到这些士兵与他们的指挥官（通常是令人憎恨的人物）之间这种可悲的和解，看到他们之间的仇恨同对亚历克谢的一致憎恨而化解，我气愤不已。他们显然觉得他们对亚历克谢的怀疑通过指挥官以那样方式对他讲的那番话得到证实，于是突然觉得很同意指挥官残忍的手段。我勃然大怒，对于所有这群人，对于他们愿意相信任何控告，对于他们渴望用暴力来抚慰被摧毁的自尊，感到一阵无所适从的狂怒，我抢在下士和那帮人的前面，挤到亚历克谢的床头，大声说：“起来，亚历克谢！起来，你这个傻瓜！”

可是有人抓住我的胳膊，用力一拧，我不得不跪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巴威尔·佩克尼。“谁让你来管闲事，你这个共产党员杂种！”他厉声骂我。我猛地挣脱他，一拳打在他脸上。要不是别的人使我们平静下来，一场殴斗将不可避免。他们担心在提着桶的下士走到亚历克谢床头之前他就被我们弄醒。接着，下士走上前，吼道：“起来晒太阳！”然后把一桶水（足有两三加仑）全部倒在亚历克谢身上。

令人惊奇的是，亚历在谢仍然没动。下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然后他大声喊道：“起立，士兵！立正！”但是这位士兵毫无声响。下士弯下身去摇他（毯子和整个麻都湿透了，地板上正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形成一摊摊的水)，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翻转过来。亚历克谢的脸下陷，苍白，一动不动。

“快，找军医！”下士叫道。但是谁都没反应：我们全都盯着穿着湿透的睡衣的亚历克谢。“军医！”下士又指着一个士兵叫。这位士兵跑了出去。

（亚历克谢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显得比以前更小更虚弱，而且更年轻。他就像一个孩子，尽管他闭着嘴唇，一个孩子绝不会这样紧闭嘴唇的。水珠不停地从他身上滴下来。“下雨了。”有人说。）

军医来了，他拿起亚历克谢的手腕，说：“我明白了。”然后将他身上的毯子拉开，从两只湿漉漉的裤腿里伸出两条同样湿漉漉的脚。亚历克谢全身（小小的身子）伸平了躺在我们面前。医生环顾四周，从他床铺旁边的桌上将两个塑料瓶拿起来，朝里面看看（它们是空的），说：“两个人都够了。”说完从旁边的床上拉来一条被单盖住亚历克谢。

这一切拖延了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把早饭吃完，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就已经出发去矿井。在矿下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依旧是操练，政治教育，吃饭，唱歌，打扫卫生，上床，整个期间我不断在想，斯塔纳离开了，我的挚友昂扎离开了（我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终于服完兵役后，越过边境去了奥地利），现在亚历克谢也离开了。他把他扮演的疯子角色勇敢地无目的的演完了，他的表演突然中断了，当他们把他在泥浆里拖，还朝他啐唾沫时，他无力继续让自己不动摇和坚守在他们的行列里，过错不在于他。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他那致命的信仰与我无法契合——可是他的命运使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谁都更密切。我觉得他的死隐藏着一个责备。他想告诉我，一旦党从它的队伍中将一个人排除出去，这个人就没有再存活下去的理由。我忽然为我从前没有喜欢过他而感到自责，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

无法挽回地死了，我从来没有为他做点什么，而我是这里惟一能为他做点什么的人。

但是，我失去的不仅是亚历克谢和拯救他的无法挽回的机会。今天回顾这件遥远的往事，我明白了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失去与我的政治犯伙伴们有过的那种团结和友谊的温暖感，从而任何恢复我对人们信任的可能性也失去了。我开始怀疑那种以环境的压力和自我保护的欲望为基础建立起来团结的价值。我开始意识到黑色徽章的集体能够欺侮一个人（使他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把他置于死地），正如那个讲堂里的集体一样，正如任何集体一样。

我觉得一片沙漠始终将我覆盖着，我感到就像是沙漠中的沙漠，我想朝着露茜叫喊。突然，我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要那么急不可耐地想得到她的身子。她没有身子。她是一块永冻土地上的——一根透明的暖柱，一根温暖的柱子，而我却让她走掉了，把她赶走了。

第二天操练时，我老是盯着栅栏望，盼望她到来。可是在栅栏边停下的只有一位老太婆，她把我们指给她那个拖鼻涕的小孙子看。当晚我给露茜写了一封伤感的长信，恳求她回来。我说我必须见她，我无意从她身上得到什么，我只想她到哪儿来让我看看，知道她和我在一起，知道她在哪儿就行了……

仿佛在嘲弄我似的，天气突然之间变得暖和起来，湛蓝的天空，阳光明媚的十月。五色斑斓的树叶，大自然（可怜的俄斯特拉发的大自然）用狂喜的典礼来欢庆秋天的离去。我感到受了嘲弄，因为我的信没有回音，停在栅栏边上的人（在傲慢的阳光下）全是些生面孔。大约两周后，我的一封信被退回来了。地址被人用难以擦掉的铅笔划掉，写上：迁走。转寄地址不详。

我惊恐万分。从与露茜最后一次见面至今，我在心里一千次地反复思忖我们彼此对对方说的一切。我一百次地咒骂自己，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百次地为自己辩护，我一百次地使自己确信她已被我永远赶走了，又一百次地使自己相信她会理解我，原谅我。但是，信封上的通知仿佛就像是定论。

这种焦虑使我忍无可忍，第二天我就着手进行另一个轻率的计划。尽管我说“轻率”，其实它的危险度与我上一次逃跑差不多。“轻率”这个形容词主要表现在计划失败后的思考中。我知道昂扎在夏天与一个保加利亚女人（她的丈夫上午出去上班）寻欢作乐时就曾多次成功地对付过去了。于是我根据他的计划来制定我自己的计划。我同大家一道来到矿坑附近，捡起我的衣服和安全灯，用把脸用煤灰涂脏，悄悄地溜走了。我跑到露茜的宿舍，向坐在桌旁的女人了解情况。我所了解到的只是，大约两周前，露茜带着装有她所有财产的皮箱离开了这里。大家对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简直发疯了：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那个女人望着我，冷漠地说：“你能指望什么呢？们没有正式工作，四处奔走，别人不会从她们嘴里知道些什么。”我去她工作过的地方，向人四处打听她的情况，但我一无所获。我在俄斯特位发四处徘徊，我赶回时恰好要收工，于是混入走出矿井的人群中。但是，在昂扎技巧中某种根本的东西准是被我忽略了，整个事情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两周后军事法庭对我进行了审判，以擅离职守罪判处我十个月的监禁。

是的，一段长久的空虚和绝望就从我失去露茜的那一刻开始了。此刻，在故乡这个泥泞的郊区滞留使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是的，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当我在监狱时我母亲去世了，我甚至无法出席她的葬礼。结束了十个月的刑期，我又戴上黑色徽章，回到俄斯特拉发，服完最后一年的兵役。然后我签署了在矿上再干三年的合同，因为据说只有这样做才不必在部队上继续待一年。因此，我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又在煤矿度过了三年。

回忆或谈论这些事，都是令人厌恶的。事实上，听到当人们

和我一样被他们发动和信赖的运动排除出来，并夸耀他们的命运时，我就感到令人作呕。的确，有一个时期我也以一个被驱逐者的命运为荣，但这种自豪是虚假的。我不得不经常为自己敲警钟，我获得黑色徽章并不是因为战场上骁勇善战，也不是因为与别人进行思想交锋。不，不是真正有意义的招致了我的不幸，我更多是我的经历的承受者而不是发动者，因此（除非把不幸、痛苦和无用视为美德是有意义的）没有什么值得我夸耀的。

至于露茜？噢，是的，有十五年没有见过她了，甚至在很久以后她的消息才传进我的耳朵。我退役后听说她在西波希米亚某个地方。我没有去找她。

## 第四章 雅罗斯拉夫

我看见一条道路在田野中曲折穿行，看见农民大车的窄窄轮子在路面上留下的辙迹，看见路两边的田埂，多草的田埂如此翠绿，我禁不住地抚摸它们平滑的斜面。

小块的田地环绕在我四周，望不见一个集体农庄。这怎么可能呢？我穿过的这些土地难道不属于这个时代吗？它们是什么样的土地？

我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田埂上的一丛野玫瑰跃入我眼帘，小小的玫瑰遍地开放。我停下来，欣喜若狂。我在树下的草花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下来，我能感觉到多草的地面与我的脊背的接触。我用脊背去触摸它。我仰卧着支撑它，希望它不要对我的重量过于担心，把它全部的重量都放在我身上。

接着哒哒的马蹄声传了过来。远处扬起一小团尘埃。随着尘埃靠近，它也就渐渐消散，一群骑手呈现出来，一群穿着白色军服的年轻人。那些服装的杂乱随着他们的行进而愈是清晰。一些人的外套由亮闪闪的纽扣扣住，一些人的外套却敞开着，还有一些人只穿着衬衫。有的人戴着帽子，有的人却光着头。不，军队不会是这样。他们是逃兵，这些人——叛徒，逃犯！我们的骑兵！我站起来，望着他们驰近。第一骑手拔刀出鞘，朝空中刺去。骑兵们不再飞奔。

手握军刀的那个人俯身在马脖子上，盯着我。

“是的，是的。”我说。

“国王！”那人惊诧地说，“现在我认出你来了。”

我点了点头，很高兴有人认出了我。像这样他们已骑了几个世纪，可是还认识我。

“你的境况如何，我的国王？”那人问。

“我害怕极了，我的朋友们。”

“他们在追你吗？”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糟的是某桩卑鄙的事正在发生。我不认识我周围的人。我走进我的房子，发现寝室和妻子都已变了样——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是搞错了，于是冲了出来，但毫无疑问那就是我的房子！外面是我的，里面是一个陌生人的。我到处都能看见它的痕迹。某桩卑鄙的事正在发生，我的朋友们，我真是怕极了。”

“我相信，怎样骑马你还会吧。”那人说。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战马旁边立着一匹装有马鞍但没有骑手的马。那人指着那匹马。我踏蹬上马。马暴跳起来，可是我在马鞍上坐得很稳当，欣喜地用膝盖紧紧夹住马的两侧。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面罩，把它递给我，说：“蒙住你的脸，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了！”我把它套在脸上，突然间就像成了瞎子。“你的马会给你引路。”那人对我说。

整个队伍小跑出发。我能感觉到骑手们在我两边缓缓行进，被此小腿间的接触是可以感觉到的，听见他们的马喷着鼻息。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停了下来。还是那个声音对我说：“我们已经到了，我的国王！”

“到了？”我问，“到了哪里？”

“大河流水的淙淙声你不会听不见吧？你们到了多瑙河畔。在这里你是安全的，我的国王。”

“是的，我感到我安全了，我想取下面罩。”

“你不能，我的国王。现在还不能。你的眼睛只会欺骗你，所以你不需要它们。”

“可是我希望看看多瑙河。它是我的河，我希望看见它！”

“无须你的眼睛，我的国王。因为你可以通过我的讲述了解一切。这样做更好。我们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牧场。到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灌木丛，一根木桩，那是一口井的轱辘。但我们却靠近水边，这里河床尽是沙子，所以草长在沙子中。现在请下马吧，我的国王。”

我们下了马，坐在地上。

“那些人正在生火。”我听见那人的声音说，“太阳就要落山，这块土地很快将有寒气侵袭。”

“我希望见到乌娜斯塔。”我忽然说。

“你会看到她的。”

“她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你可以由你的马带路。”

我跳起来，要求让我立刻到她那里去。我的肩膀被那人按住，强迫我坐在地上。“坐在这里，我的国王。你首先得休息，填饱肚子。眼下我将对你讲讲她。”

“让我知道她在哪儿。”

“距这里骑马一小时的路程有了一幢木头房子，房子盖着木瓦，围着一道木栅栏。”

“是的，是的。”我点头。我兴奋得不理解自己。“都是木头。与原来一模一样。绝对连一根钉子都没有。”

“是的。”那声音继续说，“栅栏是用粗糙劈成的木尖桩做的。木尖桩里的树枝依稀可见。”

“只要是木制的东西就如同猫或狗一样。”我说，“与别的东西相比，它们更富于生命。我喜欢木头的世界。它是我惟一的家。”

“栅栏那边种有向日葵、金盏花、大丽花。还有一棵老苹果树。此刻，门槛上站着的正是乌娜斯塔。”

“她穿着什么服装？”

“穿着亚麻布裙子，有点脏，因为她刚去过牛棚。一个木桶拎在她手里，赤着脚。可她非常漂亮，因为她很年轻。”



“她很穷。”我说，“一个穷人的女儿。”

“可仍然是一个王后。因为王后的身份，她必须藏起来。为了她不被暴露，你最好不要到她那里。如果你要去她那里，就必须戴上面罩。你的马会带路的。”

这人的话讲得真好，它使我沉醉于一阵甜蜜的倦怠之中。我躺在草地上，耳边响着她的声音，当他的声音沉默下去后，传来了淙淙的水声和劈啪的火声。太美了，我希望永远都闭着双眼，可是我别无选择。我知道时间已到，我的眼睛必须睁开。

我与上漆的木头被三张床垫隔离开来。我不喜欢上漆的木头——或者这张床的弯曲的金属腿，从床腿的角度讲。我的上方是一个有着三条白色条纹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从天花板上吊下来。这个球形的玻璃灯罩也是我不喜欢的。或者面对我的那个碗橱，其他无用的玻璃因为它的玻璃而被显示出来。房间里惟一的木制品是角落里那架黑色簧风琴。这是整个房间里我惟一钟情的东西。它曾经是我父亲的，一年前父亲就不在了。

我从床上站起来，我觉得休息还不是很充分。现在是星期五下午，还有两天才到星期天“国王们的骑马”。一切都得由我决定。在我们这个地区，只要和民俗有关那就都由我说了算。我两周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些差使、杂务和小争吵占据了一半原因。

这时乌娜斯塔走了进来。我一直觉得，她应该长胖一点。据说胖女人的性格都比较温柔。乌娜塔长得很瘦，脸上皱纹遍布。她问我有没有忘记了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到洗衣店去一趟。我忘记了。“我就知道嘛。”她说，又问我有没有在家待一次的打算，我只能给她以否定的回答，因为我在城里有个会议，是地区会议。“你答应过帮弗拉吉米尔做家庭作业。”我耸了耸肩膀。“参加会议的都有谁？”我开始报名字，但是乌娜斯塔打断我，“汉兹尼克太太？”我点点头。看得出乌娜斯塔有些烦躁不安。我知道我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倒霉了。汉兹尼克太太声誉有问题。她乱搞男女关系的事众所周知。乌娜斯塔并相信我和她不会有瓜葛，但只要提到她的名字，乌娜斯塔就气不打一处来。凡是有汉兹尼克太太参加的会议，乌娜斯塔都会不屑一顾。要与她谈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立刻溜走是更可取的。

会议议题就是专门在为“国王们的骑马”做准备。整桩事被搞得一团糟。我们的预算开始遭到区议会的消减。就在几年前，区议会还将大量的补贴投入到民间活动中。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支援区议会。要是青年团再招不到团员，干嘛不让它接管“国王们的骑马”？它们的威信会因此倍增。别的不大流行的民间活动想获得从骑马中赢利而给予的资助现在是已经不可能了。这一次，青年团可以得到这些赢利，并且为所欲为地使用它们。我们请求警察在“骑马”进行期间车辆通行受到限制。我们刚受到他们的拒绝：交通中断仅为了骑马是不可能的。可是，汽车鬼怪般地在马的四周穿梭，这算哪门子“骑马”？真叫人头疼！

我离开会议时已是八点钟了。然后在广场上我突然看见了卢德维克！他正朝相反的方向走来。我蓦地停住。他在这儿干什么？他注意到了我。他盯了我一眼，接着扭头装作没看见过。两个同窗好友。在学校的同一条凳子坐了八年！而他竟然对我熟视无睹！

在我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个缺口就是卢德维克。至今我已习惯了它。我的生活就像一所不堪一击的房子。不久前在布拉格，我去了一家小剧院，它属于那类在涌现于六十年代初，因拥有那些刚从大学毕业才华横溢的新演员而很快名声大噪的剧院。尽管他们所演剧目情节不多，不过歌曲伶俐，爵士乐挺棒。可是突然之间，乐师们把有羽毛的帽子扣在头上，正是那种我们穿民间服装所戴的那种，嘲弄地学着一个辛巴隆乐队。他们尖叫着，嚎啕着，我们的舞步和我们把手举在空中的样子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

……他们的表演虽然不过几分钟，但观众们却被逗得大笑不止。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五年以前，谁敢这样丑化我们，也没有人会发出笑声。如今我们却成了笑柄。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到这步田地？

还有弗拉吉米尔，几周以来我一直在为他烦恼。区议会把他推荐给青年团体今年的国王。儿子被选作国王对父亲来说从来都是莫大的荣誉，今年他们打算将这样的殊荣给我，以报答我为民间文化所做的一切。可是弗拉吉米尔却挖空心思推掉这个任务。他的借口花样百出。起初他说他星期天要去观看摩托车比赛。后来他又声称他害怕马。最后他说了心里话，承认如果事情是早已安排好的，他就不想当国王。他不想作木偶。

我的悲伤之情由然而生。他好像试图将能想起我生活的东西统统从他的生活中清除出去。他过去总是回避参加我和我们乐队共同发起的儿童歌舞队。甚至在那时找借口就已是他的强项。他声称他没有音乐才能。可他的吉他却弹得颇有造诣，而且美国最新的流行歌曲也是他和朋友们聚在一块所喜欢唱的。

当然，他只有十五岁。而且他爱我。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几天前进行了一次谈心。也许他理解了我。

我不会记错的，当时我坐在转椅里，弗拉吉米尔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我的手臂放在那架簧风琴的盖子上。那是我最喜欢的乐器。当我还是孩子时就听到它的声音。每天父亲都要弹奏它。主要弹的是民歌，简单的和声伴在其中，就像远处的泉水叮咚声。最好弗拉吉米尔也有如此想法。但愿他会极力去理解。

捷克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几乎已不存在。事实上它在十九世纪才获得新生，是欧洲古老国家中的一个孩子。的确，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可是它与自己的历史被两个世纪的鸿沟切断了，在这两个世纪中，捷克语言退却到乡村，是文盲独享的财产。但即使在那段时期，捷克仍然继续创造着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朴实的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化，整个欧洲对此没有给予任何重视。这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文化、民族、童话、古代风俗和仪式，谚语和格言。一座横跨两百年鸿沟的狭窄的小桥。

仅有的桥，仅有的连接。一个未折断的传统的惟一脆弱的茎。这就是在十九世纪初从事复兴捷克文学和音乐的人们把它作为他们的出发点的原因。这就是最初的捷克诗人和音乐家们投入无数时间去收集民间故事和歌曲的原因。这也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尝试范围仅限制在对民间诗歌和民间歌曲的改写的原因。

但愿你会极力去理解，弗拉吉米尔。对民俗的钟爱不仅仅是你父亲的一种嗜好。也许有嗜好的成分，但比嗜好更为深沉。他深深地洞察到使捷克文化永存的活力就在于民间艺术中。

我对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那时他们妄想使我们相信我们无权存在，我们只不过是口操捷克语的德国人。我们需要将自己存在的过去证明给自己看，而且让自己知道它至今仍然存在。我们对我们的源泉作了一次朝圣。

那时我在一个业余爵士乐队演奏低音提琴。一天，来自摩拉维亚协会的一些成员突然来访问我们。他们说，如果我们要尽自己的爱国责任，那么支持他们刚恢复的辛巴隆乐队就是一个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推辞呢？我跟他们去了，去演奏小提琴。

死一般沉睡的古老歌曲被我们唤醒了。那些十九世纪的爱国者把民歌收集在歌本里非常及时。民俗迅速被文明推到了背景。到本世纪初，我们需要民俗协会来使民歌从歌本里复活。首先在城里，接着是乡村。而且主要在我们这一地区。类似于“国王们的骑马”这样的民间仪式都是他们极力想恢复的对象，对民间歌舞团给予支持。有一段时间，几乎在进行一场无法获胜的战役。民俗学家们不可能使传统复兴像文明埋葬它一样快。

我们从战争中获得新动力。在占领期间的最后一年、我们组织了一次“国王们的骑马”。我们城里军营的，德国军官在街上冲撞本地居民。“骑兵”演变为一次示威游行。一群年轻人骑在马上，身着艳丽的服装，挥舞着马刀。一个不可征服的捷克游牧民族，捷克历史的缩影。这是所有捷克人的心声，他们的眼睛被照亮了。那时十五岁的我被他们选为国王。我头戴面罩，左右是两个侍从。我多么自豪！我的父亲多么自豪！他清楚人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是一个乡村教师，一个人人敬重的爱国者。

我相信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意义，弗拉吉米尔。我相信人的命运都是紧密相联的，由智慧的灰浆把他们凝在一起。你被选为国王被我看成是一个标志。我像二十年前一样自豪，更加自豪。因为他们希望以让你作国王的方式给予我荣誉。为什么要拒绝接受它？这个荣誉对我很重要。我要把我的王国传给你，我要你把它从我手中接过。

也许他的确理解了我。他对当国家的建议来示同意。

希望他会尽量去明白这一切是多么有趣。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有趣、更令人激动的事。

比如说吧，布拉格的音乐研究家们早就声称，欧洲的民歌起源于巴洛克时期那时在贵族的管弦乐队里演唱的乡村音乐家们把他们的音乐文化带到了人民的生活中。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因此他们认为民歌只是由艺术音乐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独门独派的艺术形式。

在波希米亚这种解释或许成立，可是我们在南摩拉维亚唱的那些歌却是用艺术音乐解释不能的。例如，瞧一瞧它们的调性。巴洛克音乐以大调和小调组成的，我们的歌曲却是用那些城堡管弦乐队做梦也无法想到的那种调式唱的！

拿吕底亚调式来说，它那升高四度的音阶，总是在我心中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古代的田园牧歌，使我想起潘神，听到他的箫声。

为了建立次序巴洛克音乐和古典音乐对大七度的力量尤为看重。它导向主音的惟一道路是严格的、易感的七。从下面的大二度爬上主音的小七度是它所恐惧的。而小七度——如爱奥利亚，多里亚或混合利底亚调式——四者都是由两个非连接四音音列组成的希腊调式。正是在我们的民歌中我最喜欢的。因为它代表了忧郁和沉思。它以此来抵制轻飘地推进到结束一切，包括歌曲和生活的主音。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古怪的歌曲存在于调式里，它们不局限于教会标准的命名法。这些歌曲简直使我着迷：

摩拉维亚歌曲所具有的宽广调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的基本原理有时让人不可理解。它们以小调开始，以大调结束，在中间转几次调。当我必须给这些歌曲配和声时，我常常觉得对它们的行进进行把握是件很棘手的事。

摩拉维亚歌曲使人困惑不解的地方还表现在节奏和调性上。尤其在它以节奏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舞蹈的伴唱而唱歌时更是这样。贝拉·巴尔托克把它们称作是说话体裁的歌，我们的乐谱系根本无法记录下来它们的节奏。换句话说，从我们乐谱的优越地位来看，所有的民间歌手唱的歌都很差，毫无节奏。

如何将这一点说得通呢？利奥斯·雅那切克坚持认为，是歌手们稍纵即逝的情绪导致我们无法公正对待节奏上的所有细微差异的复杂化。他说，时间、地点、唱歌活动的气氛都需要考虑在内，都会对民歌手造成影响。

这个解释是不是过于诗意化了呢？我在大学的第一学年时，一位讲师给我们讲过他进行的一次实验。他曾把一首节奏难定的歌曲交给几个民间艺术家分别演奏。他在高度精确的电子仪器上对这些结果进行了测量，发现他们的演奏百分之百地相合。

因此，歌手的粗心，拙劣或性情不是歌曲节奏复杂性的原

因。它遵循的是自身的神秘法则。比如，在一种摩拉维亚舞蹈歌曲中，小节的前半总比后半要历时短。那么，这怎么能记谱呢？对称是艺术音乐使用韵律体系的基础。一个全音符分为两个二分音符，一个二分音符分为两个四分音符。每个小节分成两个三个或四个相等的节拍。可是，该如何处理同一小节中长度不等的节拍呢？将一首摩拉维亚歌曲的真正节奏落实在纸上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难题。

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巴洛克音乐不是我们歌曲的起源。波希米亚歌曲也许是这样。波希米亚总是倾向于更发达的文明，城市和乡村、城堡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一些。摩拉维亚也有它的城堡，但是乡村的原始落后使它们之间的距离显得很大。摩拉维亚乡村音乐家在城堡管弦乐队里演奏是肯定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使最古老的民族得以保留下来，在悠久的、缓慢的历史各个阶段都有它们起源的痕迹。

所以，我们整个民间音乐文化摆在你面前时，就好像《一千零一夜》中的舞蹈者当着你的面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剥掉。

瞧，第一层面纱脱了下来。它的质地粗糙，零星花样装饰在上面。这些是近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的歌曲。它们是从西方，从波希米亚铜管乐队传到我们这里的。老师们把这些歌教给我们的孩子。尽管它们与我们的节奏形式有略微相通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普通的、大调的、西欧的民间音乐的风格。

第二层面纱脱下来了。它的色彩更为艳丽。匈牙利歌曲是它的发源地。它们伴随着马扎尔语的侵入一道传来。它们在整个十九世纪被吉普赛人传遍四方。为人们所熟知。恰尔达什舞曲以及带有特殊切分音节奏的征兵歌曲。

在这层面纱下还隐藏着有一层。那是十到十八世纪期间的本地斯拉夫人的歌曲。

但是，比这更美丽的是第四层面纱。它的歌曲甚至更加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远，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瓦拉几亚人从东方和东南方穿过科尔巴迁山来到斯洛伐克牧场的时候。他们唱的歌完全没有和弦与和声，就和强盗唱得一样。从观念上讲它们完全是旋律的，古代调式音阶在旋律中得到充分利用，并且演奏它们的管乐器和横笛使它们听起来效果更美。

除了这层面纱外，就没有别的面纱了。可舞蹈者不戴任何面纱还是继续跳着。这是最古老的歌曲。从前基督教时期，它们就开始出现，以四音音列体系，最古老的人所周知的音乐体系为基础。割草歌、丰收歌，与古老村落的仪式有密切关系的歌曲。

在巴尔托克看来，在最古老的这个层次，斯洛伐克，南摩拉维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歌曲都极为相像，可以说将它们区分开来几乎是办不到的。请想象一下地理区域，你看见了什么？大摩拉维亚公国，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斯拉夫人领土。在一千年前它的边界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在最古老的民间音乐方面，它们却毛发未损。

民歌或民间仪式是历史底下的一条隧道，这条隧道使许多被战争、革命和残酷的文明在地面上早已毁掉的东西在地下得以保存，对遥远的过去能有所了解。我看见了罗斯底拉夫和斯维亚托波尔克，最初的摩拉维亚公爵。我看见了古代的斯拉夫世界。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被局限在斯拉夫人的世界呢？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弄懂一首谜一般的民歌歌词费尽心思。在这首歌曲中，蛇麻草，一辆马车和一只山羊被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有人骑在山羊身上，有人坐在马车里。然后蛇麻草将少女变成新娘的力量被给予了热烈地歌颂。最先把它唱给我们听的那些人对它的含义也一无所知。古老传统的坚韧使现在毫无关联的词能结合得以保留。作为结果，古希腊的酒神节，是仅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一个萨提尔骑在公山羊身上，一个神祇手执缠着蛇麻草的神杖。



古典作品中的神话！我怎能相信。但那时我正在学习一门关于音乐思想史的课程。我们最古老民歌的结构实际上类似于古希腊音乐。同样是吕底亚的，弗里吉亚的和多里亚的那种四音序列，同样不是从低音符而是从高音符来推定音阶的倾向（低音符——占优先地位是音乐开始有和声以后的事）。所以，我们最古老的歌曲与古希腊歌曲属于同一个音乐思想的时代。古代的神话是它们为我们保留下来的。

今天吃晚饭时，我好像总是看见卢德维克的眼睛在回避我，于是我比在任何时候都感到弗拉吉米尔对我们的重要性。突然我担心他一直被忽视。我一次都没能把他真正成功地拉进我的世界。晚饭后，乌娜斯塔留在厨房里，我同弗拉吉米尔走进起居室。我试图把民歌作为我们的话题。可是，效果不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小学教师。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厌倦了我。当然，表面上看，他坐在那里是在听我讲。他一直是听话的孩子。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他头脑里想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他被滔滔不绝地折磨了很长时间，这时乌娜斯塔把头伸进房间，说到睡觉的时候了。我能怎么办呢？她是家里的灵魂和心脏、日历和钟表。

我们不要争论了。去休息吧，我的孩子。晚安！

我走出弗拉吉米尔和那架簧风琴放置的房间，他睡在有金属腿的那张床上。我睡在隔壁卧室我们的婚床上，睡在乌娜斯塔的旁边，但我现在还毫无困意。我会辗转反侧，担心可能将马娜斯塔弄醒。不，我不想睡，我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今晚很暖和，我们居住的这幢旧平房的花园充满了旧式的田园风味。那棵梨树下有一条木凳。

那个该死的卢德维克。他为什么一定在今天露面？我担心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的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就常坐在这里，就在这棵梨树下。我打开始就喜欢他，那时我们在同一所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校读书。同我们所有人相比，他都要聪明得多，但却从来不自我炫耀。他对学校和老师毫不在乎，只要是与规则不相符的事，他都喜欢干。

我们两人为什么成了挚友呢？很可能是命运使然。我们俩都是半孤儿。我母亲死于分娩，卢德维克的那个砌砖工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那时卢德维克才十三岁。他再也没见到他的父亲。

作为长子的卢德维克，也失去了弟弟，只剩下他和他母亲。他们勉强才能使收支平衡。高昂的学费，使他在一个时期不得不退学。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了一线生机。

卢德维克的父亲有一个姐姐，战前与本地一个富有的建筑商结了婚。那以后她几乎与她的砌砖工弟弟不再往来。但当弟弟被抓走后，她的爱国心占了上风，于是主动提出资助卢德维克。她自己的女儿并不很聪明，因此她很妒忌卢德维克的才能。卢德维克不仅在物质上得到了她们夫妇的帮助，而且还常被邀请到他们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当地社交界的名流。卢德维克只得做出很感谢他们的样子，因为他的学业离不开他们的资助。他受不了他们。他们姓库茨基，从那时候起，这个姓就被我们用来指那些自命不凡的人。

库茨基夫人瞧不起卢德维克的母亲。她一直认为她兄弟娶了一个让她掉价的女人。她的看法在她兄弟被捕后依然如故。她施舍的目标是指向卢德维克的，而且只对准卢德维克。他被她当作是自己的血肉，希望把他改造成她的儿子。她弟媳的存在在她看来是个不幸的错误。因此她从不让弟媳来家做客。这期间，卢德维克在一旁愤怒地看着这一切。他已经大到可以反抗了。但他的母亲总是眼含热泪恳求他不要犯糊涂。

这就是他特别喜欢到我们家来的一个原因，我们俩就像一对

双胞胎。父亲对他的爱甚至胜过我。他很高兴看到卢德维克在他书房中阅读每一本书，当我开始在爵士乐队中演奏时，卢德维克也希望能加入其中。他在自由市场买了一只便宜的单簧管，很快就在这方面出人头地。我们一起演奏爵士乐，一起参加辛巴隆乐队。

战争进入到尾声，库茨基家的女儿结婚了。卢德维克的姑妈决定要妈妈操办这件事。她决定要有五对男女宾相站在新郎新娘身后。她不但把卢德维克算在其中，而且还让本地药剂师十一岁的女儿作他的搭档。他深受刺激。在那家市俗的婚礼化装舞会上扮演丑角真是耻辱！人们以成年人的标准看待他是他的愿望，而一想到一个小女孩挽着自己的胳膊就觉得屈辱。他对库茨基家将自己作为他们的慈善典型炫耀而感到愤怒，对被迫要在仪式期间吻人的口涎弄湿的十字架而感到愤怒。那天晚上，婚礼进行当中他溜了出来，来到我们在当地酒店的密室。我们一直在那里饮酒做乐，看见他来了就开始开他的玩笑。他火冒三丈，宣称他恨透了布尔乔亚。接着他对教会仪式咒骂不已，声言他对教会嗤之以鼻，决定要抛弃它。

我们以为他的话只不过是玩笑，但是战争结束后几天，他实现了他的威胁。当然，库茨基家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他毫不介意。能够同他们不再来往，他感到太高兴了。他对共产党给予热情的支持，参加共产党人主办的讲演，购买他们出版的书籍。在这地区我们都相信天主教，我们的学校尤其如此。但卢德维克对共产党的笃信却都得了我们大家的谅解。我们给了他这种特权。

一九四七年我们毕业了。那年秋天我们考进了大学——卢德维克在布拉格，我在布尔诺。再见到他已是一年后了。

那是一九四八年，一切都倒了过来。卢德维克回家过暑假时，我们不知道怎样迎接他。我们认为，共产党的二月改变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表着一个恐怖统治。卢德维克带来了他的单簧管，但没有摸它一下。我们整夜都在争论。

那时是我们不和的起点吗？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那天晚上我几乎被他说明了。他避开政治争论，只谈我们的乐队。我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放在一个更广泛的继承发展关系中来看待。仅仅去复活一个失去的过去没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朝后看，我们就会像圣经中的罗德之妻那样完蛋。

那么，你认为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喊道。

保护民间艺术的遗产当然是必要的，他回答说。但这样做是不够的。时代已经变了。新的地平线正在升起。我们应将我们音乐文化中那些缺乏生命力的流行音调清除出去，那些都是布尔乔亚曾强使人们接受的陈词滥调。它们应被一种全新的、真正的人民艺术所取代。

真奇怪，卢德维克倡导的仅仅是最守旧的摩拉维亚爱国者那种古老的理想社会，城市文化的邪恶与堕落在他们那里也经常谈论。在查尔斯顿的乐曲中他们也听到了撒旦的歌声。但那又如何？这不过使他的话更易令人理解罢了。

无论如何，更新颖的是他的下一个观点。它涉及到爵士音乐。爵士乐是黑人民间音乐的产物，整个西方世界都为它折服。不管它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它可以被我们当作是民间音乐是有神奇力量的作证。民间音乐可以缔造整整一个时代的音乐风格。

我们怀着既羡慕又厌恶的复杂心情听他大放绝词。他的自信激怒了我们。他显出一副当时只要是共产党人就有的那种神态，在他与未来之间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因此获得了代表未来活动的权利。如今的卢德维克已与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个截然不同，这是我们对如此讨厌的另一个原因。过去他一直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男孩，一个真正的乡巴佬。瞧他现在这副样子，不顾廉耻地滥用

过分的修辞和夸张的词汇。当然，我们对他将我们乐队的命运与共产党的命运混为一谈也感到很生气。他思考的方式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梦想是一致的。刹那间我们就被他推到了历史的伟大领域。

我私下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彼德·皮帕。只要他的长笛一响，我们便成群结队地追随其后。他的论点稍见完备，我们就马上帮助他。我还记得我自己的贡献。我当时正在考察欧洲音乐在巴洛克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在印象派之后音乐自身开始出现问题。一方面它在奏鸣曲和交响乐中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另一方面在它那里也见不到动人的曲调。这就是为什么爵士乐对它产生了奇迹般影响的原因。它如饥似渴地从百年来的爵士乐基础音中汲取新的活力。爵士乐不仅占领了欧洲的夜生活，而且斯特拉文斯基，奥涅格，米约也深深地被它吸引，他们的作曲受到了爵士乐节奏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大约在这十年前，欧洲古典音乐的血管被输入了我们自己大陆民间音乐的大量的新鲜而有力的血液。而只有中欧才使民间音乐保持着生气。想一想亚那契克和巴尔托克吧！因此，通过对欧洲音乐的比较可以直接得出民间音乐和爵士音乐的比较结果。二十世纪严肃音乐的形成也有它们一份功劳。但当涉及到大众音乐时，情况就不同了。几乎看不到传统的欧洲民间音乐，爵士音乐取代了一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是的，说得对，我们说。就基础音而言，我们民间音乐与爵士音乐存在着同样的力量。爵士音乐有它自己旋律的特性，这一特性仍然带有早期黑人歌曲的基础六声音阶的痕迹。而我们的民间音乐也有它们自己的特性，概括地说，它们的旋律变化得更多。爵士音乐有它自己的节奏，它几千年来非洲鼓文化促使它在节奏方面惊人的复杂。但我们的音乐在节奏上也是最早时期的。最后，即兴创作是爵士音乐的始基，而我们那些不识音符的乡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提琴演奏者的出色的合奏也是依靠即兴创作。

我们的民间音乐和爵士音乐之间区别只有一个。爵士音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着。它的风格处在不断的变换中。它从早期新奥尔良的对位法出发，经过一段苦难的摸索，发展到摇滚乐，波普，甚至更远。今天爵士乐里会采用和声，而这在新奥尔良的音乐中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的民间音乐却恰恰相反，她是曾经的沉睡过去的睡美人。我们必须唤醒她。她不能离开今天的生活，应和它共同前进。要使自身继续存在下去，要保持它旋律和节奏上的固有特性，民间音乐必须形成它自身固有的风格发展阶段。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任务的完成才能成为可能。

社会主义能和它扯得上关系吗？我们反对道。

他向我们解释，传统的乡村以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过活。乡村的时令由公共仪式确定下来。这些仪式是民间艺术惟一了解的活力。浪漫主义者就像一位割草姑娘突然产生了灵感。唱出一首又一首的歌，就像从岩缝里涌出的一股泉水一样。但是，民歌在起源上有别于有学问的诗。诗人写诗是为了表达自己，将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表达出来。民歌却把人们引到一起。它们和钟乳石的产生过程很相似，缓慢地形成新的花纹和新的变化。它们代代相传，每个歌手都给它们赋予新的内容。每一首歌都有许多创作者，他们全都谦虚地消失在他们的创作后面。没有一首民歌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它总要起一定作用。有在婚礼上唱的歌，在收割时唱的歌，在忏悔节唱的歌，有为圣诞节，为翻草，为跳舞，为葬礼的歌。甚至情歌也被放在某些经常性的节日活动的组织中。傍晚的散步，在少女窗下的小夜曲，求婚——它们都统涉在一种集体仪式下，在这种集体仪式中，民歌具有它确定的地位。

资本主义把这种集体生活方式摧毁了。民间艺术的立足点不复存在，它找不到自我，丧失了它的作用。在人与人之间被隔绝

开，人人都为自己而活着的社会条件，企图复兴民间艺术是徒劳的。但是，由于有了社会主义，人们才从孤独的枷锁中摆脱了出来。他们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将合二为一。许多公共仪式将再次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集体风俗。前者将来自以往的，收割，狂欢节，跳舞，劳动。后者将来自现在的五·一节，集会，解放周年纪念日，各种会议。民间艺术将到处受到欢迎。它将得到发展，变化，更新。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很快，这种无法相信的事就开始实现了。共产党政府为我们民间艺术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它为新的乐队的创立拨了大量的款。无线电扬声器里每天都能听到小提琴和辛巴隆琴的声音。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民歌充斥了大学，“五·一”庆典，青年庆祝活动和各个剧院。在国家的表面上，爵士乐已不存在了。甚至它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颓废的象征。代替吉特巴舞，年轻人开始，互相抓住肩，围着圈跳舞。共产党竭尽全力地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把它的努力基于斯大林对新艺术的著名定义上：社会主义内容应采取民族形式来表达。而音乐，舞蹈，诗歌的民族形式只能来自民间艺术。

在这个政策强劲波浪的推动下，我们乐队很快就全国闻名。它增加了歌手和舞蹈家，成为一个主要的文化企业，在数以百计的舞台上表演，每年还要出国进行访问演出。我们不仅仅唱那些情人喉咙被强盗割断的传统的短叙事诗，而且还创作我们自己的新作品：颂扬斯大林的赞歌，关于个体农场的瓦解和集体农业的胜利的群众歌曲。我们的节目演过去，它充满了活力，当代历史包含了它，它伴随着历史。

共产党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政治上我们很快就不再保守。我自己在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了共产党。我在乐队里的朋友们不久也相继入了党。

那段时光卢德维克我们俩还是很友好的。最初的阴影是何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笼罩在我们上空的呢？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是在我的婚礼上。

那时我一直就读于布尔诺——在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并在大学里学音乐理论。在第三学年麻烦开始打到我头上。爸爸逐渐不行了，他中了风。病虽然治好了，但从此以后他就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我时常对他独自生活感到忧虑。即使他出了事，他甚至都不能给我发封电报。每个星期六我都担惊受怕地回到家里，每个星期一早晨我又带着忧虑返回布尔诺。最后我对这些忧虑我忍无可忍了。它们在星期一折磨我，在星期二把我折磨得更厉害，于是在星期三我把所有的衣物都塞进包里，付了房租费，告诉女房东不要等我回来了。

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从车站走回家的情形。从城里到我们的村庄得穿过一片田野。时至秋天，夕阳西下，吹着风，一些孩子正在用长线放风筝。我曾边有一个爸爸曾经为我扎的风筝。我们经常一起带着风筝来到这片田野，把它抛到空中，然后奔跑起来，直到它被风送上天。我从来就对风筝不感兴趣，可是爸爸非常喜欢。那天，这件往事触动了我，使我加快了步子。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原来爸爸把风筝送上天是为了母亲。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一直想像母亲是在天堂里。噢，多年以来我一直相信上帝、永生或类似的东西。我现在与其说在谈信仰不如说是在说幻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有幻想。没幻想我会感到像孤儿似的。乌娜斯塔说我是个梦想家。她觉得我不能把握事物的真实一面。喔，她错了。我当然看得见事物的真实的面貌，但是除了有形的东西，我还能看见无形的东西。生活中不能没有幻想的位置。幻想能使住宅成为温暖的家。

我对母亲的了解是在她去世了很久以后，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哀悼她。我一直喜欢想象天堂里的她既年轻又漂亮。别的孩子母亲都没有我的母亲年轻。



我喜欢幻想坐在长凳上的圣彼得通过小窗俯视人间。我母亲经常去那里拜访他。她提出的任何事彼得都乐意效劳。因为她很漂亮。他让她也朝外看。于是我们，父亲和我都尽收眼底。

母亲的脸上从来都看不到悲伤。恰恰相反，当她在彼得的小房间里从窗户俯视我们时，她总是在微笑。悲伤是不属于那些住在永恒里的人的。他们知道人间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团圆。但把爸爸只身一人留在家中，自己去布尔诺时，母亲的脸上开始写满悲哀和责备的神情。而我希望与她和睦相处。

所以回家的脚步越显匆忙。风筝飞得那样高，好像是从天上挂下来似的。我很高兴，我对我失去的东西一点也不惋惜。并不是我对小提琴和音乐研究毫不热爱，而是我没有真正的野心。对我来说，无论什么，即使前途最光明的事业，也比不上回家的快乐更有意义。

当父亲听说我不打算回布尔诺时，他深感不安。他不希望我为了他而自毁前程。于是我设法使他相信成绩不好被开除出来才是我回家的真正原因。这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但是我没有为此事烦恼。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是我回家的目的。我继续在我们的乐队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找到一个在本音乐学校任小提琴教师的工作。我可以干我愿意干的事。

我所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和乌娜斯塔呆在一起。乌娜斯塔住在邻近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和我自己的村子一样，今天已合并为城镇。她跟着我们的乐队跳舞。在布尔诺读书时我认识的她，既然我现在回来了，我就希望每天都能和她相见。但我爱上她是后来的事——完全出乎意料，在一次排练中，她摔倒了，跌断了腿。她被我抱在怀里走向救护车。我能感觉到她那纤细，虚弱的身子。突然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几乎身高六尺两寸，重两百多磅，我完全可以胜任当一个伐木工，而她却又轻又弱。

这是一个顿悟的时刻。我从乌娜斯塔受伤的身躯上看到了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更熟悉的身影。以前我怎么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所有民歌里的那种“穷人的女儿”就是乌娜斯塔！一个只有好名声的穷姑娘，一个人都羞辱的穷姑娘，一个穿着破烂的穷姑娘，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的小姑娘。

当然，事实上正相反。她有双亲，他们一点也不贫穷。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一度是富裕的农民——他们被新时代逼入了绝境。乌娜斯塔经常眼泪汪汪地来参加排练。当局差不多将他们家所有的财产都收光了。她的家被定为富家。他的拖拉机和农具都被征用。他还被威胁要遭到追捕。我为她感到难过，把自己看做是她的保护人。我愿意为保护这个穷人的女儿而承担起一份自己的责任。

从那以后，我就把她放入民歌的传统观点来看待，我觉得一个经历了一千多次的爱情正在我身上重演。我好像正在按照一个古乐谱演奏这个爱情。我正是这些歌曲的歌唱对象。我沉湎于时间的共鸣的溪流中，幻想着将来的婚礼。

距婚礼还有两天，卢德维克蓦地冒了出来。看见他我很高兴，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对他说，作为我的挚友，他做我的证婚人是最佳人选。他满口答应了，而且遵守了诺言。

乐队里的那些朋友们为我举行了一次地道的摩拉维亚婚礼。一大早他们就来向我们祝贺，演奏，唱歌，身穿民间服装。仪式的主持人“族长”由一位五十岁的辛巴隆琴手来担任。爸爸首先用烈性白兰地、面包和背溜肉款待他们。然后族长示意大家安静，声音洪亮地朗诵起来：

正直的贵宾们，少女们，少男们，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被我召集于此，

因为居住这里的这位年轻人不揣冒昧

邀请我们和他同赴乌娜斯塔·内特，

哈尔的父亲那里，  
这位年轻人已将彼淑女择为  
他的新娘……

族长从始至终都是仪式的核心。一直都是这样。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新郎从来都是婚礼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不是他在成亲，是别人在使他成亲。别人通过结婚去控制他，而他就像在一片巨浪上随波逐流。婚礼上族长取代了他的言行，那里已不是他讲话和行动的场所。不，甚至也不是族长。是世代相传的古老传统，用它那温柔的溪流将他带走。

我们在族长的带领下出发去邻近的村子。我们越过田野时，朋友们一路演奏。一群身着民间服装和乌娜斯塔的人在她家门前等候着我们。族长朗诵道：

我们是疲倦的旅行者  
拜求你们  
俯允我们入此篷屋，  
因为我们急需食物和饮料。

从人群中走出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汝等若相配，理当欢迎。”于是我们被邀请入内。我们默默地拥进屋。正如族长所说，我们只是疲倦的旅行者，不会首先将自己的真实打算透露出来。但接着那位老人，新娘家的代言人，向我们发起进攻说：“汝等若有心事，就请道来。”

于是族长开始讲起来。最初他绕着弯子地用譬喻讲，那位老人也以同样的方式作答。绕了许久族长才将我们此行的目的通了出来。

于是那位老人向他提出以下的问题：

请告诉我，亲爱的朋友，  
为什么这样诚实的新郎欲娶这位  
诚实的姑娘为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为了花朵还是为了果实？

族长回道：

众所周知，花儿开时美丽又雅致，

惹得人心头阵阵欣喜，

可是花儿一凋谢

果实即成熟。

因此我们娶这位新娘不是为了花儿，

而是为了果实，报偿正是从那里来。

这种问答进行到新娘的代言人结束道：“那么，让我们把新娘叫来，听听她是否同意。”然后他走进隔壁房间，把一位身穿民间服装的女人领了出来。她又高又瘦，骨骼粗大，脸上蒙着一张头巾。“此即汝新娘。”

但族长摇了摇头，我们都吵闹着以示抗议。老人企图说服我们接受她，但最终他只好把那位蒙着头巾的女人带回去。到了此时，乌娜斯塔才被他带了回来。她穿着黑色靴子，红围裙，颜色鲜艳的开口短上衣，头上戴着花环。她看上去漂亮极了。老人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

然后他转向新娘的母亲，对她用悲伤的口吻说：“啊呀，母亲！”

新娘听到这句话，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扑到倒在母亲的脚下，低着头。老人接着说：

亲爱的母亲，宽恕我对汝做的一切错事！

最亲爱的母亲，我恳求汝，宽恕我对汝做过的一切错事！

最最亲爱的母亲，凭着基督的五个创伤，我恳求汝，宽恕我对汝做过的一切错事！

其实我们是在模仿一首古老的民歌歌词。美丽的歌词令人激动，而且都很真实。接着音乐再度响起，我们动身前往城里。在

市政厅我们举行了正式的仪式，即使在那里音乐依然在演奏。然后是盛宴，宴会后是跳舞。

最后，入夜时分，乌娜斯塔头上的迷迭香环被伴娘取下，郑重地交递给我。她们将她松散的头发编成一根辫子，盘在她头上，然后快速用一顶女帽扣在上面。这是一个代表从处女走向妇人的仪式。当然，乌娜斯塔在这之前早就失去了童贞。严格说来，花环的象征意义已不适用于她。可是我并不把它看得很重。从更高更有约束力的层次来看，直到我从伴娘手中接她的花环接过来的一刹那，她才失去了童贞。

哦，天啊，我为什么要感动于对那个花环的回忆而不是我们首次相拥或她真正的处女血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事实确是如此。女人唱起了歌曲：水面漂过花环，波浪将它编织成红缎带。歌声使我想要哭泣。我陶醉了，我只看见花在漂流，小溪到小河，从小河到支流，从支流到多瑙河，从多瑙河到大海。花环在我的视野中漂走了，一去不复返。逝者不返，这就是我深切体会到的。生活中的各种基本状况一去不返。任何够格的人都必须直面逝者不返这一事实。尽量体会它。不许自欺欺人。不要装作对它熟视无睹。现代人自欺欺人。他对从生至死的长路上的所有路碑尽回避。传统人更诚实。他高唱着走进人生每一种基本状况的核心。当我放在乌斯塔娜身下的那条毛巾被她的血弄脏时，我并未考虑正在对待逝者不返这一事实。现在已来不及想了。妇女们正在唱临别之歌。等一等，等一等，我多情的情郎，请允许我和我亲爱的母亲话别。等一下，等一下，收起汝马鞭，请允许我和我亲爱的父亲话别。等一下，等一下，勒住汝马匠，因为我还有一个亲爱的妹妹，我怎舍得离开她。别了，我的女友们，因为我正在被他们从你们身边带走，我也不再被他们允许。

夜幕降临，队伍陪伴着我们回家。

我打开大门。乌娜斯塔走到门槛停了下来，再次转身面对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前的一群朋友们。蓦然，一个人唱起了最后一首歌：

她站在门槛上，  
含苞欲放的纯洁处女，  
最纯洁的一朵玫瑰。  
接着她跨过门槛，  
她所有的美都失去了，  
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她的美。

然后我们背后的门关上了，只剩下我们俩。乌娜斯塔二十岁，我大一点。可是我禁不住想到，跨过门槛的她，她的美丽从这一神奇时刻开始就要似藤上花儿一般凋谢。我从她身上看见了凋谢的未来。我看见这已经开始。我心里想，她不仅是一朵花，她的体内要结果。这一切无法抗拒的秩序，我体会到了。我接受了这一切，并与之融合在一起。我想到了弗拉吉米尔，当然那时我还不可能认识他，更不能去描绘他。可我的确想到了他，进一步还想到了他的孩子。接着我和乌娜斯塔从堆着高高的被子的床上爬过，就好像整个人类用它那无限的智慧把我们搂进了它温柔的怀抱。

卢德维克在婚礼上究竟对我怎么样？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寡言少语，十分冷淡。下午跳舞开始时，他拒绝乐队小伙子递给他的单簧管，不想演奏。隔了一会儿他干脆走掉了。幸运的是，那时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对此事怎么注意。可是，第二天我意识到他的中途离去给婚礼留了一个阴影。酒醒后的我过分夸大了这件事。乌娜斯塔把此事看得更严重，她压根就不喜欢卢德维克。

当听我说将要让卢德维克做我的证人时，她表现得很冷淡。第二天早晨，她便性急地提醒我他的行为。她说他整天走来走去，就像我们给他带来了多大麻烦。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她还是头一次见到。

当天，卢德维克来看我们。拿了一些礼物送给乌娜斯塔，并

向我们表示道歉。希望我们能原谅他昨天的行为。他把他的遭遇告诉了我们，他已经被开除出党和大学。他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

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可是卢德维克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话题很快就转了。乐队过两周要出国演出。我们真是些乡巴佬，都等不及要早点出发。卢德维克理解我们的心情，开始询问有关这事的详细情况。可我并没忘卢德维克从小就立志出国，而如今他出去的机会已很渺茫了。在那个时期以及后来的许多年，只要档案中在政治方面有问题的人都不允许出国的。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生活差距有多么大，现在该轮到我要改变话题了。假若我谈论这次出国演出我俩命运间的鸿沟就会明显暴露出来。我不想让这条鸿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我字斟句酌，生怕某个词会使它显露出一点来。然而，我没有一个词可以使它不显露出来。只要我涉及到和我们生活有关的话，似乎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人了。我们有不同的机运，不同的未来。我们正在朝不同的方向驶离。我本以为，也许可以通过谈论琐事来掩盖我们之间的疏远。可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我的逗趣显然牵强附会，结果谈话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

没过多久卢德维克说了声再见便离开了。他已自愿去某个劳务队，而我将随同乐队去长见识。再见到他是几年以后的事了。他在部队时我给他写了几封信。每次寄出一封信，我心中都会感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给我带来的不快。我无法面对卢德维克走背字这个事实。我为我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功而感到羞愧。我发现我从洋洋得意的高处向卢德维克施舍鼓励和同情的话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此我装作我们之间和从前一样。我继续告诉他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乐队的新鲜事，我们最新的辛巴隆琴手，我们最近的冒险。我试图让这些话听上去仿佛我们彼此的世界自然是一致

的。

后来有一天，我父亲收到了卢德维克母亲去世的讣闻。关于她生病的事我们无所知。卢德维克的母亲随着他从我的地平线消失而消失了。手里拿着这份讣闻，我意识到我对那些与自己不在同一生活轨迹上的人是多么冷漠。我的生活是成功的。我感到有罪，尽管我事实上谈不上有什么错误。接着一件令我惊讶的事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份讣闻是由库茨基夫妇署名的，上面根本没有提到卢德维克。

葬礼的日子到了。从大清早起，只要想到卢德维克又要与我相见我就感到惶恐不安。然而根本没见到卢德维克的影子。在棺材后面只有几个人跟着向墓穴走去。我向库茨基夫妇打听卢德维克在哪里。他们耸了耸肩，说他们不清楚。送葬队伍停在一座大墓前，墓上有一个沉重的大理石和一个白色的天使雕像。

这位富裕的建筑商家里的财产已被充公，现在他们靠微薄的收入糊口。这个庞大的家族墓穴是他们剩下的惟一财产。我搞不明白，卢德维克母亲的棺材为什么要放在他们家族的墓穴里。

后来我才听说卢德维克当时正在监狱里。在城里，只有他母亲知道此事。她去世后，败家子弟媳的尸体被库茨基夫妇接收了，宣布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终于报复了恩将仇报的侄儿，抢走了他的母亲，用一块沉重的大理石将她盖住，让一个头发卷曲，手持花枝的一白色天使看护着，我永远记着那个天使，在一位朋友被毁生活的上空飞翔，他被从手中夺走了连同他父母尸体的一切东西。那是一个毁灭的天使。

乌娜斯塔不赞成一切无节制的方式。在她看来，仅仅因为自己喜欢就夜里坐在院子中就是一种无节制。蓦然，我听见窗玻璃上一声重敲。一个身穿睡衣的女人的威严身影从窗户那边赫然出现。我生性就很顺从，我对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从不说“不”。因为我身高六尺两寸，能够比我体重更重的重量举起，我还没有



发现可以和我对抗的人哩。

于是我回到房间，躺在乌娜斯塔身边。为了打破沉默，我便提起白天曾见到卢德维克。“是这样吗？”她用冷漠的口气说。对此我一筹莫展，她受不了他。她始终无法忍受他。原因不在于她要抱怨什么。自从我们的婚礼以后，她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那时我对我们间的鸿沟再也无法掩饰了。即使对我自己也无法掩饰了。

卢德维克服过兵役，蹲过监，又在矿井干了几年。他正在布拉格作准备好恢复学业，那次是为了和警察局处理几项法律手续才回来的。一想到要见到他，我再次感到惶恐不安。可是我所发现的完全不是像没想的颓废抱怨。一点也不。但他已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卢德维克了。他身上既有一种粗鲁无礼，又有一种内在的平静。任何怜悯都是多余的。仿佛那种如此可怕的鸿沟是我们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就能跨越。为了恢复旧日的友情，我邀请他来观看我们乐队的排练。我仍然认为乐队也是他的。虽然辛巴隆琴，第二小提琴，单簧管已由另外的乐手接过去，我是老搭档中唯下留下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卢德维克在辛巴隆琴手旁边坐下，从那里观看排练。我们首先演奏了我们最喜爱的歌曲，那些我们在学校里常常演奏的歌曲。接着我们演奏了几首从偏远乡村发掘出来的新歌。最后我们演奏我们最看重的一组歌曲。它们不是真正的民歌，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具有民歌风味的歌。我们歌唱通过犁耕掉小块土地的旧界限，而使大量和私有农田转化为一片广大的集体农田，歌唱过去的穷人如今一跃成为国家的主人，歌唱拖拉机手在自己的拖拉机站总能得到尽心尽力的帮助。这些音乐与真正的民歌音乐差别极小，但歌词却比报纸还要更切合时事。有一首关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歌是我们最为钟爱的，这位共产党英雄在占领期间曾受尽了纳粹的折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卢德维克坐在那里，瞧着辛巴隆琴的木槌急速在弦上跳来跳去。他偶尔给自己斟上一小杯酒。我从我的小提琴琴码上望着他。他陷入了沉思，始终没有看我一眼。

妻子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这表示排练马上将结束。卢德维克被我邀请回家。乌娜斯塔给我们做了些吃的，然后就去睡觉，留下我们单独在一起。卢德维克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但我能察觉他是为了回避我的话题才如此健谈。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怎能对我们最大的共同领域只字不提呢？于是我打断他漫无边际的闲聊。你觉得我们的歌怎么样？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喜欢它们。但我不打算让他说一两句客气话就搪塞过去。我要盯住他。他认为我们自己创作的那些新歌怎么样？

卢德维克不愿陷入争论，可是我步步紧逼，直到不给他回旋的余地，直到他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他认为我们发现的那些传统歌曲的确很美，否则他是不会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我们在迎合时尚，这很正常。我们为各种各样的观念演出，想要使他们全都满意。所以我们将自己歌曲中特有的东西都抹去了。我们用习用的节奏代替了它们美妙绝伦的节奏。我们之所以从最近的过去中选择我们的歌曲，是因为它们更容易听懂和理解。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只是刚刚起步。我们想要民间音乐尽可能地受到欢迎。我们对大众趣味让步的原因就在于此。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创作出了我们自己的当代民乐，与我们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民歌。

他又争执起来。他感到那些新歌都很刺耳。它们是可怜的仿制品！赝品！

这句话至今回想起来还使我感到刺痛。我们难道不是被他告诫，如果老是朝后看，我们就会像圣经中的罗德之妻那样完蛋？难道不是他曾幻想时代的新风格将从民间音乐中孕育出来？难道不是他激励我们给予民间音乐必要的推动，使它跟上历史的步

伐？

那全是一个空想的境界，卢德维克说。

空想的境界？那里就有歌曲！它们是存在的！

他当面嘲笑我。你和你的乐队可以唱那些歌，可是请告诉我，还有谁在唱那些歌。请告诉我有哪一个集体农庄庄员为了快乐而唱你们的那些集体农庄歌。他面带微笑地说。这些歌是那样呆板，那样做作。这种宣传好比一个剪裁得很糟糕的衣领那样刺目。一首关于伏契克的伪摩拉维亚的伪民歌！你们竟是如此可笑！布拉格的一句共产党新闻记者！他与摩拉维亚的农民的相同点何在？

我表示反对，他是我们大家的伏契克，我们有权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歌唱他。

用你们自己的方式？你们用的不是我们唱歌的方式去唱！你们是依照宣传机关叫你们唱的方式在唱！瞧一瞧那些歌词，为什么要首先歌唱伏契克呢？难道他是唯一干地下工作的吗？他是惟一受到折磨的吗？

可他是人所共知的人物！

当然他是！宣传机构需要让一个主要的烈士在完美无缺的烈士长廊中起带头作用。

你干嘛要这样说风凉话？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象征。

对，但是谁成为象征？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很多一样英勇的人如今已不为人知。其中也有著名的人。政治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中谁都没有成为象征。在学校和办公室里你是看不到他们被挂起的照片。许多人还功勋卓著。事实上，正是那些功劳耽误了他们。功劳不能修改，不能缩小，也无法安上新的形式。耽误他们不能进入宣传机关的名人纪念堂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绞刑架下的报告》怎么讲？只有伏契克才能写出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那些沉默不语的英雄又怎么讲？那些英雄无须把他们最后的时刻变成一个壮观。一次公开的讲演。伏契克，尽管那时默默无闻，却认定要使世人知晓他在狱中的感想和经历的事情，给人类留下一些具有概括性的名言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把这些话潦草地写在碎纸片上，让那些把纸片偷带出狱，并让妥善保存它们的人去冒生命危险。想一想他是如何思考那些思想和印象的！想一想他是如何思考自己的！

现在他说得太离谱了。难道伏契克只不过是那个自以为是的说大话的人吗？

然而什么都不能阻止卢德维克。不，他回答道，促使伏契克写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主要原因是他的软弱。因为私下表现得勇敢，没有让人，没有人承认，只是面对着自己——这样做需要异乎寻常的尊严和力量。而伏契克却需要一个观众。在他被关在单人牢房时，一个虚构的观众被他创造出来。他需要让人看见！让掌声来支持他。除非那是真的，否则就是虚构。他需要把他的单人牢房变成一个舞台，见有人去表演，去描绘，才能使他的命运能够忍受，而不是仅仅经历它！

我本以为会看到一个颓废甚至痛苦的卢德维克。但我没料到这般的尖刻或恶意讽刺。伏契克烈士把他怎么啦？一个人必须忠实于他的原则。我知道卢德维克遭到了不合理的对待，但那样做问题会更严重！那样的话，改变原则后面的动因就显而易见了。一个人仅仅因为受到了侮辱就可以把一切他信奉的东西都放弃吗？

我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这些话。但接着某种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无动于衷，仿佛他那愤激的情绪突然烟消云散了。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接着以极为平静的口吻要我不要生气。很可能是他错了。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古怪、冷静，以致我一眼就能识破他说的是伪心话。我不想以这种虚假的语气来结束我们的谈

话。尽管我很恼火，可我还是继续原计划。我仍然想与卢德维克达成共识，恢复我们的旧情。尽管我们发生了正面冲突，我还是希望一旦我们的争吵平息下来，我们将试图重返我们从前一起度过的那些流金岁月的共同基础上。可是，我所有想使谈话不再终断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卢德维克为他像往常一样夸夸其谈，胡说八道而不断地向我道歉。他要求我忘掉他说过的一切。

忘掉他说过的一切？为什么不去记住一次严肃的讨论？为什么不要牢记着它？卢德维克这一要求的真实用意我是在第二天才明白的。卢德维克在我家过了一宿，并和我们共进早餐。早餐后我们又谈了半小时。他告诉我，为了获准读完大学最后两年的学业，他费了很大劲。他一生都将因开除党籍而被打上烙印，无论到哪里没人相信他。只是多亏几位二月政变前的老朋友，他才有机会重返学校。他谈起与他处境相似的几个朋友，他们被人跟踪，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他们这个环境里的人受到追问，他们的生活可能因为一条恶意的证据就多受几年波折。接着他突然把话题转到一些琐事上，在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很高兴见到我，并再次要求我把他昨天所说的抛在脑后。

很显然，这个请求是与他谈到朋友们的遭遇间有关系的。我不能摆脱这个想法。卢德维克打断跟我谈话是因为他害怕！害怕有人会知道我们的谈话！害怕我会告发他！害怕我！太可怕了。又一次完全出乎意外。我们之间的鸿沟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得多。深到足以阻止无法将我们的谈话进行完。

乌娜斯塔睡着了。时而发出一点鼾声，可怜的人儿。他们都进入了梦乡。而我躺在这里，一个高大笨重的人，在沉思着，我是如此弱小。与卢德维克的谈话使我真正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自欺欺人地相信我把握着情势。卢德维克和我都从没伤害过对方。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怀着一点善意就可以重归语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果证明，我手里掌握的东西为零。不论是我们的争吵还是我们的和解。我开始将这一点寄希望于时间，光阴似箭，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又过了九年。卢德维克获得了学位，并在他喜爱的领域找到一份极好的工作。怀着友爱之情，我遥望着他的进展。卢德维克绝不会被我看作一个敌人或陌生人。他是我的朋友，不过他倒了霉。就像神话故事中咒语使王子手中的新娘变成一条蛇或一只癞蛤蟆一样。在神话故事中，王子总是凭借忠诚和耐心化险为夷。

然而我的挚友没有被时间从咒语中唤醒。这些年来我多次听说他回过故乡。可他从不来看我。而今天我们相遇时，他却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这个该死的卢德维克。

经过上次我们的谈话，一切都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荒原在我四周滋生，苦恼在其中蔓延。更多的沉闷，更少的欢乐，更少的成功。以前乐队每年都有一次机会到国外演出，可那以后邀请开始减少了，现在几乎任何地方都不邀请我们。我们不停地工作，努力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可是我们却被沉默所包围。我正站在一个空无一人地寂静的大厅里。我觉得是卢德维克命令我孤单。因为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朋友判你孤独。

从那时起我开始到一条田间小路上去躲避。去那里的次数越来越多，去到田野边上的一丝孤单的野玫瑰那里去。在那里我遇见了最后一个忠诚的人，一个逃兵和他的同伴。一个游走各地的行吟诗人。在地平线的那边有一幢小木房。乌娜斯塔，那个穷人的女儿就住在里面。

这个逃兵称我是他的国王，并答应他随时都会根据我的需要来提供庇护。他说，我要做的，只是到玫瑰丛去，他就一定会在那里。

在幻想的世界中找到安宁是轻而易举的。可我总是试图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总想两全齐美。放弃现实世界的权利不属于我，

即使我正在失去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如果我最终能设法办成一件事，也许这就够了。这最后一件事是：

对我的生活，它将是一个清晰明了的信息交给一个能理解它、传承它的人。只有完成这件事以后，我才会加入到那位驰向多瑙河的逃兵中去。

我心中的那个人，我惟一的希望是历经这一切磨难后，就躺在墙那边酣睡。后天他将骑上他的骏马，缎带将遮住他的脸。他将被称国王。来我这里吧，我的孩子。我就要睡着了。他将叫我的名字。我即将入睡。骑在马上你将出现在我梦中。

## 第五章 卢德维克

我睡了一个又长又香的觉，醒来时已是八点多了。做什么梦已经记不清了，是好梦还是噩梦，头倒不痛，可也不想起床；于是我就躺在那里。我自己和我星期五晚间的邂逅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一道使我感到（至少是暂时）安全的防风墙。这不是露茜退出了我意识，而是她又回到了她以前的抽象状态。

抽象状态？没错。当露茜如此神秘和冷酷地离开俄斯特拉发，我对于我去寻找她，我一筹莫展。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被免除兵役），我渐渐没有了寻找她的打算。我对自己说，无论我是多么爱她，无论她是多么绝无仅有，她终究与我们相识和相爱的那个境遇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将所爱的人从初次邂逅的环境，从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彻底分离开来，挖空心思地去掉所爱之人的一切，只留下他或她本身，换句话说，把一对恋人一同经历的使他们的爱情具有形式的恋爱中故事排除掉，那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归根结底，我在一个女人身上所爱的不是她的本身，而是她给予我的东西，她对我所具有的意义。我爱她是把她作为我爱情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如果缺少了爱尔希诺的城堡，缺少了奥菲莉娅，缺少了要经历的具体情境，缺少了一系列相关的人或事，哈姆雷特会是什么样了？除了一个毫无声息、空洞的、虚幻的实体外还会有什么？同样，如果缺少了俄斯特拉发的景致，缺少了那些通过栅栏献上的玫瑰，缺少了那些褴褛的衣服，缺少了我自己那些看不到尽头的绝望日子，露茜便和我曾爱过的那个露茜完全是两个人了。

是的，这就是我对我和露茜的爱情，我就是这样使它概念化的，随着时光推移，我渐渐变得几乎害怕与她再相见：我知道我



们终究会在一个地方见面，可那时露茜已不再是露茜，我将没有能力再去重续前缘。当然，这并不等于我已不再爱她了，我已把她忘掉了，或者她的形象已经不再鲜明了。恰恰相反，以一种平静的怀旧形式，她依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渴望她如同渴望某种无法挽回地丧失了的东西。

由于她已经成为一去不返的过去的组成部分（某种生活在过去，可如今已经死亡的东西）但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在我头脑中她的物质性，肉体性已渐渐消失，以一种传说或神话的形式写在羊皮纸上，放进我生命基座上的一个金属匣子里。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真不能相信——我不能确定理发店的那个女人一定就是露茜，为什么第二天早晨（睡眠间隔也会欺骗人），我觉得这次邂逅是虚假的，它发生在传说、预言或谜语的层次上。如果说星期五晚间我为露茜的真实出现而震惊，突然间我被驱赶到一个曾由她统治的久远的岁月，那么，星期六早晨观察自己平静（休息得很好的）的内心是我惟一能做的事，并自问：我为什么会遇见她？难道露茜的故事势必还要有一个新的连载吗？我们不期而遇说明了什么？它试图让我知道些什么？

除了事件和人，爱情故事还有什么内容？尽管我是个怀疑主义者，我始终还是相信几个迷信——例如，我奇怪地深信，一切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都有一种高于它本身的意义，都意味着某种东西。生活通过它每天发生的事在向我们讲述它自己，在逐渐揭示一个秘密。生活所具有的寓意，采取必须译解的画谜的形式。我们生命中的神话就是这样由我们生活中的故事组成的，在这部神话书中有着一发现真理和秘密的线索。这完全是幻觉吗？也许是，很可能是，但我可能永远都会有去译解我生活的这种需要。

我躺在嘎吱作响的旅馆床上，心里想着露茜——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念头、一个问题装在头脑里。床开始吱吱嘎嘎地响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这吱嘎声一进入我的意识，我就想起了（迅速地，冷酷地）海伦娜。这张吱嘎作响的床好像在发出责任的口令：我长叹一声，把脚伸下床，坐起身，伸伸懒腰，迅速地按摩了一下头皮，望望窗外的天空，然后站起来，星期五与露茜的相遇，在晨下尽管显得遥不可及，然而还是使我大大降低了对海伦娜的兴趣。这个兴趣就在几天前还是如此强烈，可目下只剩下了对兴趣的意识，对一个完全没有了的兴趣的义务感，我的内心向我保证这个失去的兴趣会重新恢复它的强烈程度。

我走到脸池跟前，将睡衣裤的上半部脱去，把水龙头拧开到最大。我用手捧着水，迅速把水浇到脖子上、肩膀上和身上。我用毛巾擦蹭全身。我想让血管里的血液循环起来。突然我感到不安起来，对海伦娜的到来毫无感觉使我不安，担心难得的机会就在我的漠然中被破坏掉。我决定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用一杯伏特加把饭咽下去。

我下楼去咖啡厅，呈现在我眼前只有众多凄凉无靠的椅子，椅腿朝上，搁在光光的桌上，一个系着脏围裙的老妇人在桌椅中间毫无生气地走来走去。

我走到旅馆接待处，向埋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睡眼惺松的守门人询问，旅馆提不提供早餐。他纹丝未动，告诉我星期六咖啡厅不开门。我走出旅馆。这是一个美好的天气，云彩在空中穿梭，微风使街上的尘埃打旋。我朝广场匆匆走去，从一群站在肉店前面的年龄各异的女人身边走过：她们提着购物袋和网兜，耐心地、无精打采地在排队。有几个漫步或匆匆赶路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们像举着小火炬一样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蛋卷冰淇淋，兴高采烈地舔着。不一会儿我走进了广场。一幢零乱的平房出现在我面前，一个自助餐馆。

我走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地上铺着砖，桌腿都很高，人们就站在桌前吃三明治，喝咖啡或啤酒。

我不愿在那里进餐。从一大早起，我就决心要吃一顿味美丰盛的早餐，要有蛋、薰肉和一杯酒，从而让我失去的元气复原。我记起距这里几步之遥的另一个广场有一家旅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小公园，一个巴洛克式的鼠疫受难者纪念碑。那家饭馆也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可我所需要的就只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侍者，就一个，任何现成的饭菜送上来都可以。

我从纪念碑前走过，纪念碑基座上，从下到上依次是圣徒、云、天使，在那个天使的云上还有一个天使，最后一个天使。我长久地注视着这个圣徒、云彩和天使所组成的生动的金字塔，用石头装点成的天堂，尔后又望着真正的天堂——一片淡淡的（早晨的）蓝色无望地远离这块遍布尘埃的大地。

我穿过有着干净齐整的草坪和长凳的公园（尽管公园空得足以保持满是尘埃的空寂气氛），试着想推开饭馆的门。门上了锁。一种想法涌上心头，我那个梦想的早餐将不会实现，一个令人惊恐的念头，因为带着一种稚气的固执，我确信这一天成功与否就在于一顿丰盛早餐。我意识到这个外省城镇并不会为那些渴望坐下来吃早饭的古怪人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要很晚他们的饭馆才会开门营业。因此我放弃了找地方吃饭的计划，而是转过身往回走，穿过公园。

我再次从拿着顶上饰有红色的小蛋卷冰淇淋的人身边经过，我再次觉得它们就像火炬，但这一次我想搞清楚是否有更深的含义蕴藏在它们的形状里。因为那些火炬并不是火炬，而是火炬的拙劣模仿。他们如此认真地显示出来的那点极度的高兴，与其说是愉快，不如说是对愉，这种模仿似乎能抓住这个到处是灰尘、毫无生气的小地方里所有火炬和愉快的不可避免的模仿的实质。接着我突然想到，只要我经常遇见这些贪吃的持火炬者，我就走向一个糕点店，在那里我就能找到桌椅，也许还能弄到一些浓咖啡和一点吃的东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果我来到的不是一个糕点店而是一个冷饮店。人们排着长队在等可可或牛奶面包，在同样高的桌上吃喝，后面虽有几条正规的桌椅，但都已有人了。于是我加入了队列，缓缓移动几分钟后终于买到了一杯可可、两个面包，并找到一张桌子，尽管有五六个杯子堆在桌子上，但总算有一处没有溅上液体。

我闷气地三下五除二把早餐吞下去：不到三分钟我已回到了街上。现在是九点钟，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留给了我。海伦娜乘坐从布拉格起飞的早班客机，然后从布尔诺乘公共汽车，应在十一点钟左右到达。我看出这两小时无异于白白浪费掉了。

当然，我可以到我年幼时常去的地方走一走，带着伤感的思绪从我出生的那幢房子，我母亲生前一直居住的那幢房子前面经过。母亲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是在这里，在这个镇上，她的遗体被骗去葬在外人的大理石下面。我所有回忆似乎都因此而变得不再清洁；这些回忆会与我当时产生过的无能和痛苦的感觉混杂在一起，我不愿意勾起这些感受。

因此我无所事事，坐在广场的长凳上呆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商店橱窗前，扫了一眼书店里的图书书名，在报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回到凳子上，浏览毫无意思的大标题，把外事专栏里两三条还算有趣的报道读了读，然后再次从长凳上站起来，折起报纸，新新的就把扔掉了；接着慢步朝教堂走去，在它前面停下，抬头凝视它的两个高塔。然后登上宽大的台阶，进入走廊，怯生生地进入教堂内，这样当初来乍到的没有在胸前划十字时就不会有人感到震惊了。

随着更多的人走进教堂，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怎样低头或怎样紧握十指的闯入者，于是我走了进去，看了看钟，还剩下不少时间。我试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在海伦娜身上，打发掉多余的时间。可是思想不肯出来，不肯移动。我充其量只能追忆起她的视觉形象。说到底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象：一个男人在等一个女人时，他发现要想她很是不容易的，除了在她凝固的肖像下徘徊外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我踱起步来。在教堂对面，我注意到十辆空婴儿车摆成一排停在旧市政厅（今天是市议会的大楼）外面。我正在想那些婴儿车放在那里的原因时，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年轻小伙子又把一辆车推到那些车跟前。他后面跟着的那位妇女看上去很不安，从车里包起一个白色缎带的包（显然一个婴儿在包里），他们一起匆匆走进大厅。想到还有一个半小时无处打发。我便随他们走了进去。

宽宽的楼梯两旁站着瞧热闹的人，我上了楼，那里有更多的人，大多数都在二楼的走廊里（通向三楼的楼梯上没有人）。他们簇拥到一块要看的事显然将发生在二楼，八成就在走廊尽头那人开着的门上挤满了人的房间。我也走了进去，发现步入了一个不是很大的会堂，七八排椅子上几乎都坐满了人，他们似乎是在期待一场即将开始的演出。房间前面的台上有一张铺着红布的长桌，桌上的花瓶里有一大束花。台子后面的墙被非常艺术地折叠起来的国旗装饰着。台前用八张椅子排成半圆形（离第一排观众约十英尺）。在会堂的另一头，在后面，有一架小簧风琴，在键盘前的俯身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光头老人。

还有几把空椅子在会堂里。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很长时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那些人很有耐心，仍然倾斜着身子，带着热心的期待嘀嘀咕咕。这期间那些留在走廊上的人也慢慢挤了进来，把剩下的几个座几也站了，沿墙排成一溜儿。

活动终于开始进行：台子后面的一道门打开，现出一位身穿褐色服装、戴着眼镜的女人。她的眼光从长而挺的瘦鼻子上投进会堂，将右手抬起。周围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她转身朝向她刚走出的房间，显然是为了给那里的某个人示意，但很快她又面向我们，靠着墙，浮现出一种常规、礼仪的微笑。一切都似乎配合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很，就在她露出微笑的同时，我背后的簧琴开始呼哧呼哧地响起来。

几秒钟后，一位亚麻色头发的红脸少妇从台子面的门上走了出来，她精心制作的发式和化妆与她眼里的恐惧表情和怀中的白色襁褓形成了鲜明对照。戴眼镜的女人往墙边贴得更紧，以便抱着婴儿的女人通过，并以微笑示意她不要停下来。那女人紧紧抱着婴儿，慢慢地前进，对自己信心不足，接着，另一位妇女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她身后（排成单行）是一支女人的小分队。我盯着领头的那个女人：开始她注视着天花板，然后她的眼光落下来，与观众里某个人的目光接触。那目光激怒了她，于是她转移视线，微笑起来，可是那微笑（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她花了很大力气才做出这微笑）很快就不见了，留下的只有一个僵硬的嘴形。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内（从门口走十五或二十尺所用的时间）。可是由于她径直朝前走，到了半圆形的椅子跟前时也没有转过来，戴眼镜的女人只得离开墙（微微皱着眉头），赶紧走上前去，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提醒她该往哪儿走。这位母亲很快校正了路线，领着别的母亲绕椅子前面走了一圈。她们一共有八个人。她们终于不再走了，每个人站在一把椅子前，背对着观众。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指着地板。那些女人渐渐明白了这个意思（仍然背朝观众），抱着她们的包裹在椅子上坐下来。

消极的阴影从穿褐色衣服的女人脸上消失了。她又微笑起来，走向半开着的门，进了后面的房间。在那里站了几秒钟后，她轻快地走回来倚着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黑色西服，白色衬衣，塞满一根花领带的衣领，把他的脖子牢牢卡住。他盯着地板。走路时略微摇晃。七个年龄各异的男人跟在他后面，全都穿着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衣。他们走到那群抱着婴儿的女人坐的椅子后面，然后停下来。但接着他们中有几个人开始不安地四处张望。穿褐色衣服的女人（她的脸顿时又变阴暗

了)跑向他们,听完一个低声的请求后,点头表示默许,于是这些男人局促地交换了位置。

穿褐色衣服的女人又露出了微笑,回到门口。这次她不必点头或示意了。另一群列队进来的人对自己该做什么了如指掌。他们自然而有纪律,举止近似于专业演员一样优美:这群人全是十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交叉排列着。男孩们穿着深蓝色裤子、白衬衫,折起来的红领巾的一角搭在背上,其他两个上角围着脖子打了个结;女孩们穿着深蓝色短裙、白衬衣,一样在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在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小束玫瑰花。正如我所说的,他们信心十足地行进,没有在椅子那里一分为二,而是沿着台子散开。然后他们停下来,脸向左转,面对着母亲们和观众他们站在那儿。

又停了一会儿,最后一个单独的人出现在门口,直接朝台上盖着红布的长桌走去。他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没一根头发。他的背挺得很直,威严地向前走着。他身穿一件黑色西服,夹着一个鲜红的公事包。走到桌子中间的时候,停住面向观众微微鞠了一躬,露出一张病态的发胖的脸,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白、蓝三色的宽绶带。一个大金质勋章缀在绶带末端,悬在他的腹部附近,当他俯身向前时便上下摆动。

突然(任何宣布都没有)站在台前的一个男孩开始大声演说起来。他说春天即至,所有的父母都欢欣不已,整个大地欢欣鼓舞。他始终用这个语调讲着,直到一个女孩打断他,并以相同的方式演讲。就是说,话语有些模糊,但全是“妈妈”、“爸爸”和“春天”之类的字眼,她也采用了“玫瑰”这个词。接着另一个男孩又把她打断,那个男孩又被另一个女孩打断,尽管看出任何她们在吵架的痕迹。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的话。比如,一个男孩宣称,儿童是和平。他后面的那个女孩说,儿童是花朵。接着这些孩子共同走上前,伸出拿着花束的那只手。由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八个孩子，八个成半圆形坐着的女人，所以每个女人都得到了一束花。然后孩子们回到台前的位置，不再做声。

现在该是站在孩子上方台上的男人出场的时候了，他打开红色公事包，开始读起来。他也讲到春天，花朵，妈妈和爸爸，但他还讲到爱情，讲到爱情处境怎样结果，突然他的词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出现了像职责，责任，国家，公民之类的字眼，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母亲和父亲，接着他把国家对他们的一切恩情一一进行了列举，提醒他们，作为报答，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模范公民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指着在桌子一头放着的皮面本子，号召所有在场的父母在父母登记簿上签名，以此进一步证明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的决心。

这时，穿褐色服装的女人走到离登记簿最近的那个母亲身边，拍拍她的肩膀。那个母亲抬起头来，女人接过她的婴儿。然后母亲起身来到桌前。脖子上挂着绶带的男人翻开登记簿，把一支笔递给那位母亲。那母亲签了字。回到座位上，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那儿抱回自己的孩子。接着她的丈夫走到桌旁签了字。然后穿褐色服装的女人把一个母亲的孩子接过来，打发她去桌旁。接着她的丈夫签了字，然后是下一个母亲，下一个丈夫，就这样依次类推直到他们全都签了字。尔后簧风琴的曲调再次回荡在会堂里，四周观众都围到母亲和父亲们的周围与他们握手。我也走上前去（仿佛想与某个人握手），这时，那个脖子挂着绶带的人突然叫着我的名字，问我难道没有认出他。

当然我认不出他是谁，尽管他讲话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为了避免以否定回答他模棱两可令人不快的问题，我问他别来无恙。还可以，他说，忽然我完全认出了他，科瓦里克，我的一个老同学。他那张长满了肉的脸已使他的面貌难以辨认他，半天我才再次回忆起他原来的面貌。无论如何，科瓦里克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既不假正经，也不流气；不是特别亲近人，但也绝



不是不合群；学习成绩一般——总之，很少有人注意他。由于他原来搭在前额上的头发已经脱落，我也就可以借机找到一个没有立刻认出他的理由。

他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的亲戚是否在那些母亲中间。我回答说没有，我来这里是由于无事可坐和好奇。他满意地微笑起来，开始向我解释，市议会为了使世俗仪式变得庄严，采取了很多措施，接着他带着谦虚的骄傲补充说，作为负责民政事务的官员，他被给予了一些荣誉，甚至已受到了区一级的嘉奖。我问他，刚才我看见的是不是一个洗礼仪式。他告诉我，那不是个洗礼仪式，而是对一个新诞生的公民的欢迎仪式。显然他对有机会能阐述这个题目而兴奋不已。他说，有两个大的对立阵营：天主教会及其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仪式，我们的民政机关及其面临着取代这个上千年古老仪式的必要性的自己新的仪式。他说：如果我们的世俗仪式比不上教会仪式的庄严和美，那么人们是不会停止去教堂为孩子洗礼或结婚的。

我告诉他这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表示同意，并说他很高兴像他那样的民政官员终于从我们的艺术家们那里得到了一点支持，艺术家们现在应对自己的职责很清楚，而我们的人民提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葬礼、婚礼和洗礼仪式（说到这里，他立刻纠正为“欢迎新公民诞生的仪式”）。就拿那些少先队员刚才朗诵的诗歌来说吧，他说：它们真是美极了。我点了点头，问道，是否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使人们放弃宗教仪式，也就是说，把放弃一切仪式的选择自由给予他们。

他说，人们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婚礼和葬礼。无论如何，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强调了“我们的”这个词，好像旨在使我明白，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几年他也加入了党），如果不利用这些仪式把人民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政府拉得更近，那将是一大缺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问我的老同学，对那些不想参加这个仪式的人他将如何是好，是否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当然有这样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觉悟，愿意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们将不断接到邀请，直到他们参加为止，他们中大多数人迟早会在两周后来。我问他，出席仪式是不是强制性的。不，不是强制性的，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市议会把出席仪式作为考察人们的公民感和对政府的态度的一個检验标准，人们最后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来了。

如果是这样，我说，同教会相比，市议会对待它的信徒更要严厉。科瓦里克笑着说，正是如此。然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很遗憾，我时间不允许，因为我得去接一个乘公共汽车来的人。他问我见没见到“那帮哥们儿”（他指的是我们的同学）。我说，很遗憾，我没有见到，不过令我高兴的是我起码见到了他，因为我一旦有了孩子需要施洗，我将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他哈哈大笑，友好地在我肩上给了一拳。我们握手告别，然后我走出去又到了广场，不知道对剩下的十五分钟怎样消磨。

一刻钟并不算太长。我穿过广场，在经过理发店时，透过窗户朝里窥望（我很清楚露茜只有到晚些时候才会在那里），然后仁立在公共汽车站前面，想着海伦娜：她那厚厚脂粉掩藏下的脸孔，显然是染过的红头发，丝毫谈不上苗条的身材，尽管没有丧失使一个女人成为女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比例。她那极具刺激性的，同时让人讨厌又令人迷恋的特点在我脑海中萦绕。她的声音，高得使人不悦；她那粗笨的姿势，暴露出想继续引人注意的可悲的用心……

我一生中只与海伦娜有过三次见面的经历，因此很难使她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形成固定的模式。每当我试图追忆她的形象时，她的一两个特征就特别显著地突出来，致使她总是变成她本人的一幅漫画。但不论我的想象是多么模糊，它还是——正是靠

它变形——抓住了海伦娜的一个基本特征，某种在她外表下潜藏的东西。

我无法忘记海伦娜肌肉松弛的形象，它不仅显露出她的母性和她的年龄的特征，而且更显露出她本然的欲望特征：性爱的牺牲品。她的本质是否真是这样的，还是仅仅是我对她的态度的一种预示？谁说得上来？公共汽车就要到了，我渴望见到一个与我的假设出来的解释毫无二致的海伦娜，我闪进一幢楼房的门洞，希望观察她一会儿，看看她是如何可怜地东张西望，然后突然对她这趟旅行是否是徒劳而产生疑惑。

当大公共汽车快速驶进广场时，第一个下车的就是海伦娜。她穿着一件蓝灰色的来自意大利塑料雨衣，这种当时在外汇商店时髦雨衣使穿上它的人显得年轻、精神。这雨衣（领子上翻，腰带紧束），也使海伦娜漂亮了许多。她向广场四周望了望，朝前走了几步，检查被汽车挡住的地方，接着，不是站在那里无望地等待，而是立刻转身走向我住的那家旅馆，她要订一个房间过夜。

我再一次意识到，我的想像只是让我有了一个对她曲解的形象。好在她本人总是比我所想像的更迷人，当我从后面看着她穿着高跟鞋洋洋自得地朝旅馆走去时，我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看法。我尾随其后。

我走进门厅时，她正靠在接待台，向毫无生气的办事员办理登记。“泽门尼克”，她告诉他。“海伦娜·泽门尼克”。我站在她身后她把她自己详细情况进行介绍，办事员一登记完，她就问：“有个叫扬的同志在这住吗？”没有，没有这个人，他嘟哝说。我走到她身边，把手从后面放在她肩上。

在我和海伦娜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一个清晰的仔细考虑过的计划进行的。不能否认，海伦娜进入这种关系一定是有她自己的目的，但这些目的依然在女人的那种要保持一个罗曼史的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而和感伤诗意的虚假期望的界限，这种愿望实际上不利于女人引导事态的发展，事先对事情作出专门策划。另一方面，事情的起初我就对我将经历的这场艳遇作了精心策划，绝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热，对我们的相处，既不会只是谈话和挑逗，也不会为此去开一个房间。我就怕有任何风险，害怕把一个对我如此重要的机会给断送掉，这并非因为海伦娜出奇地年轻，可爱，或者迷人，而纯粹是因为她姓泽门尼克，她的丈夫是我恨之人骨的人。

那天在研究院，当他们通知我为电台播放我们的研究一个叫泽门尼克的女人要来采访我时，我马上联想到了我过去的那位朋友，想知道这种同姓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然而我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如果我不愿他们把她派到我这里来，那绝对是另有原因。

我对新闻记者很反感，他们大多是轻薄、巧言令色的人。海伦娜在电台而不是在报社工作只能更加激起我的反感。在我看来，报纸还有一点让人产生好感的地方：它们不制造噪音，它们叫人生厌，但它们却不吵闹。人们可以把它堆在一边，扔进废纸篓里。无线电广播叫人生厌，但却缺少使人产生好感的地方。在咖啡店，饭馆，火车上，甚至私人住宅里，它都不断干扰着我们，以至于居民们已变得如果没有不绝于耳的听觉消遣就不能生存下去了。

而且海伦娜谈话的方式也使我感到很不快。我能看出，在踏进研究院之间，她的报道已在她的脑子里成型了，她需要做的只是从我这里得到几件事实和数据，几个例子，来支持她的陈腐论点。我尽量使事情变得对她很棘手。我有意使自己谈话用的句子复杂混乱，极力扰乱她预先准备好的思路。在一个问题上，她差点儿听懂了我的话，于是我便拉起近乎，转移她的目标。我告诉她，她的红发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尽管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并问她对在电台工作的看法，她喜欢读些什么书。我一边继续把

话谈完，一边考虑，姓名的一致也有可能就是必然。在这位夸夸其谈，高谈阔论，不可一世的女人与我记忆中那位不可一世，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的男人之间近似于亲戚般的共同之处。于是我继续以那种轻浮、近乎调情的语气问起她的丈夫。这个话题恰到好处。没有几个问题，我就很有把握地验明了他。可以说，我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想到要进一步了解她，完全没有。这个发现只会使我对她在进屋时产生的反感更加强烈。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一个借口中断这次采访，让研究院的另一个成员接待她。我头脑里甚至浮现出微笑着将她扫地出门的兴奋情景，但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接着，就在我感到忍无可忍之时，海伦娜被我非常亲昵的问题和话语激得兴奋起来（没有察觉到它们纯粹是为了调查），以几个女性惯常的姿势，使我的警惕性迅速降低，我的仇恨突然呈现出一种新的模样：在她那电台记者的滑稽伪装后面，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能够尽女人职责的具体的女人。正是泽门尼克应得的那种女人，在心里略带不屑地对自己说，再合适不过的惩罚。但很快我就修正了看法：我这样快就对她产生的极度轻蔑过于主观和勉强。实际上，她曾经肯定很漂亮，是没有根据的断定巴威尔·泽门尼克已经不再喜欢把她作为一个女人使用。我继续用调侃的口吻谈话，我的真实想法丝毫没有暴露。某种东西在提醒我，要尽量找出我的采访者的女性的一面，使我们自动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如果一个女人在中间调解，情爱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就可以超越于仇恨之上——诸如好奇心，与某人接近的渴望，跨过亲密门槛的强烈渴求之类的特性。在几乎是狂喜的状态中，我想像着泽门尼克，海伦娜以及他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尽情地挥洒我的仇恨（文质彬彬的，近乎温柔的仇恨），仇恨她的外表，她的红头发，她的蓝眼睛，她短而硬的眼睫毛，她的圆脸庞，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性感而张开的鼻孔，她那两个门牙间的缺陷，以及她成熟多肉的身躯。我像男人们观察他们所爱的女人那样观察她。我带着近乎将她全部铭刻在心的意图观察她。为了不使她发现对她突然产生的兴趣背后的深仇大恨，我使我的语调显得益发轻松活泼，这使她相应地变得更加女人气。我不断想着，她的嘴、乳房、眼睛、头发，都属于泽门尼克，我在内心拨弄它们，抓住它们，掂量它们——我的拳头能否将它们捏碎，或被墙壁碰碎——然后再仔细检查它们，先用泽门尼克的眼光，然后用我自己的眼光。

或许我确实有过一个短暂而毫不实际的柏拉图式的幻想，把她从我们戏谑的真空地带驱赶到卧室的交战区域。但那仅仅是在头脑中一闪而过，毫无痕迹的一种幻想。海伦娜宣布，她对我给她提供的情况深表感谢，不愿再占用我更多的时间。我们道了再见，见她能离去我很高兴。那种古怪的得意感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反感，一想到刚才竟用如此亲密的关心和热诚对待她（尽管是伪装的），我就感到很别扭。

如果几天后海伦娜没打电话来，问她是不是可以来见我，那次会面就会毫无结果的。也许她真的认为我过目一下她写的东西很必要。但当时我就坚信那是一个借口，她的语气更看重的是我们谈话的亲密、轻松的方面而不是它的工作方面。我自己很快就采用了这种语气，并始终没有改变。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见了面，我为了挑衅对这次采访的话题而不谈，一有机会就抨击她的职业兴趣。我眼见她失去了镇静，为了占上风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邀请她同我一道去乡间。她拒绝了邀请，提醒我她已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这句话实在是给我带来太大的乐趣。我玩味着她令人愉快的拒绝，从中汲取乐趣，用它开玩笑，不断地提及它。最后她只有接受我的邀请来中断我的话题。打那时起，一切便都完全依计而行。我所制订的这个计划背后掩藏着十五年的仇恨，不知道为什么，我坚信这个计划会顺利实现。

没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我提起海伦娜放在接待台的小旅行箱，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去她的房间。这个房间与我的房间一样的令人失望，就连具有将事物描述得胜于原貌的特殊才能的海伦娜，也不得不承认这房间枯燥乏味。我告诉她别烦恼，我们会设法对付的。她投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她想梳洗一番。我说，好吧，我在门厅等你。

当她下楼时（在她没有扣上的雨衣里面穿着裙子和粉红色毛衣），我再次沉迷于她那优雅的举止。我告诉她，我们的午餐将在人民之家吃，尽管那儿的饭菜很差，但却是本地最好的。她说，既然我是本地人，她将客随主便，不作任何反抗（她好像对词语的双关义进行了仔细琢磨，表现出一种可笑而又可喜的努力）。我们取道清晨我寻求一顿像样的早餐而无功而返所走过的路线，海伦娜不断地强调，她很高兴能了解我的家乡。但尽管她事实上是首次来这里，她却从没有环顾一下周围，或者询问这幢建筑物或那幢建筑物是什么，也看不出她有任何正参观一个陌生城市所应有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缺乏兴趣是由于造成对外界好奇心减弱的那种精神萎缩，还是由于她全神贯注于我，无暇顾及外界，我倾向于后者。

我们又经过了鼠疫纪念碑：圣徒上面依然是云，天使，第二朵云，第二个天使。天空比刚才更蓝了。海伦娜脱掉雨衣，把它搭在手臂上，谈论说天气真不错，温暖增强了灰尘弥漫的空间感，矗立在广场上的纪念碑就像一片脱落的天空找不到回去的路。我心想，我们也落进了这个有着公园和饭馆，空旷寂辽得怪异的广场，无可挽回地掉下来了，我们也从某种东西上脱落了，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像尘世本身一样卑下之时，我们却徒费光阴企望通过思想和言语去攀登高峰。

是的，我深刻认识到自我的卑劣将自己深深打动。它让我深感吃惊，但更叫我吃惊的是它并没有使我觉得恐惧，我怀着一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愉快的感受接受了它。不，如果说是欢乐，轻松的感觉更合适；在我身旁走着的这位女子正在将自己卷入一个前途未卜的下午冒险，她的动机和我的一样卑下，这一确定无疑的事实增强了我的愉快感。

人民之家开门，由于才十一点三刻，饭馆里还没有客人。桌子已摆好，每张桌子面前有一个摆着一副刀叉的汤碗，调羹放在拭嘴纸上。我们坐下来，把餐具和拭嘴纸放在我们的盘子边，然后等待着。几分钟后，一位服务员出现在厨房门口，他用无精打采的眼神扫视打量了一下餐厅，然后转身想回到厨房。

“服务员！”我叫道。

他转过身，朝我们这个方向挪了几步。“你们是不是想要点什么？”他问，仍离着十五或二十尺远。“我们想要点吃的。”我说。“开饭是在12点。”他回答，又转身想回到厨房。“服务员！”我又叫道。他回过身。“请问，”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喊叫，因为他离得很远，“你们有伏特加吗？”“伏特加？没有。”“呃，那么你们有什么？”“裸麦酒，”他站在老远地叫道，“还有朗姆酒。”“就这些吗？”我喊道，“那给我们拿两杯裸麦酒。”

“喝不喝裸麦酒我还没征求你的意见呢。”我对海伦娜说。

海伦娜笑了：“我不太习惯裸麦酒。”

“没关系。”我说，“你会习惯的。你现在在摩拉维亚裸麦酒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饮料。”

“唷，那太不一般了！”海伦娜高兴地说，“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普通酒吧更让我喜欢的了，就是长途驾驶员和建筑工人去那里吃便饭和喝酒的那种酒吧。”

“那么你喜欢在啤酒里加点朗姆酒罗。”

“嗯，一般吧。”她说。

“可你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

“噢，是的。”她说，“我无法接受那些时髦的场所，你周围



围着一打服务员，给你端上一道又一道的菜……”

“不错。没有比简陋的饭馆更妙的了，那里的服务员对你熟视无睹，烟雾和恶臭使你呼吸不得。而裸麦酒——没有任何像它这样的饮料。当我还是学生时从来不喝其他饮料。从来买不起其他饮料。”

“我也喜欢简单的饭菜，像土豆油煎饼，洋葱油炸肥香肠……”

我早已成为一个彻底的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所以每当有人开始列举他的好恶，我都对他的话表示怀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只把它作为这个人自我形象的一个反映来接受。我一点也不相信海娜伦娜更合适在污浊的、通风不良的下车酒吧而不是在洁净的、通风顺畅的饮馆里呼吸，也不相信她对劣酒和便宜、油腻的食物而不是名菜佳肴情有独钟。假使她的话真存价值，那是因为这些话表现了她对一种特殊姿态的偏爱，一种废弃的，不合时宜的姿态，一种可以追溯到那革命激情年头的姿态，那时任何“普通的”、“卑贱的”、“简单的”、“粗俗的”东西都受到赞美，而任何“精美的”或“高雅的”东西，任何与温文尔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遭到贬低。我被她的姿态带回到我的青年时代；海伦娜的样子使我回忆起泽门尼克。我早晨的担忧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全神贯注起来。

服务员用盘子给我们端来两杯裸麦酒，放在我们面前，并留下一张纸（无疑是复写本的最后一张副单），上面列出当天的菜肴，字迹模糊不清，几乎无法认识。

我举起酒杯，说：“向裸麦酒致敬——纯味的、普通的裸麦酒！”

她大笑起来，跟我碰杯，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那种质朴爽朗的人。不虚伪。真挚坦率。”

我俩都饮了一大口。“这种人不多。”我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他们的确存在。”海伦娜说，“你就是一个。”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

“可你是的。”

我再一次惊叹于人所具有的不可思议地将现实转变为与理想似的东西，不过我很快就认可了海伦娜对我性格的曲解。

“谁知道？可能是吧。”我说，“真爽朴实。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要什么东西就要什么东西，毫不羞愧地去追求它。人们都受规矩的奴役。如果他们被告告诉应该作这种人或那种人，他们就极力去做到，就是到临死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使得他们成为微不足道的人。首先，一个人必须具备勇气去保持自我。所以让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你使我着迷，海伦娜，我需要你，不管你结婚与否。我不能用别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也不能把它埋在心里保持缄默。”

说出这番话是件很难堪的事，但我还这样说。征服一个女人的心要遵循其自身固有的法则，用合乎情理的理由来使她相信的一切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聪明的做法是树立她自我的基本形象（她的基本原则、理想、信念），并设法（利用花言巧语，过分的虚夸之辞，等等），在她的自我形象与她所向往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譬如，海伦娜向往“朴实”、“直爽”、“坦率”——这些理想是以从过去发展而来的清教徒主义为基础，并在她头脑中与对一个“纯洁”、“清白”、极具原则和道德感的男人的概念混在一起。但是，由于海伦娜的原则世界不是建立在仔细的思考，而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建立在一个逻辑的联想，所以采用一些粗鲁的诱惑，将“真挚坦率的男人”的概念与毫无拘谨、毫无道德及通奸的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那个所期望的行为（也即通奸）与她内心的理想发生伤害性的冲突，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女人要求任何东西，只要他尽

可能使她的行为与她内心深处的自我欺骗保持和谐，除非他希望自己显得像个畜生。

这期间，陆续有人进入饭馆，大部分单子很快就都有了主。那个服务员现在又出现了，逐个记下人们所点的菜。我把菜单递给海伦娜。她说我更了解摩拉维亚菜，于是把菜单又递还给我。

其实根本不需要了解摩拉维亚菜，因为这张菜单上的种类与所有饭馆的菜单上的种类没有什么区别，能供人选择的就那几样标准菜，全都不诱人，因此很难从中挑选出合意的菜。就在我还愁容满面地盯着那张沾满污渍的菜单时，服务生走了过来，极烦躁地问我点什么菜。

“稍等一下。”我说。

“一刻钟以前你就想点菜，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抬起头时，他已经走了。好在，他很快就转来了，我们大胆地点了牛肉卷，又要了两杯裸麦酒，这次还要了苏打饮料。

海伦娜精神十足咀嚼着，一边评论说，和我坐在一个她在歌舞团唱这个地区的歌时就向往的陌生的地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她最喜欢用的词）。她知道与我在一起不应感到这样幸福。她说，但她无能为力，她毫无意志，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她，不应对自己的感情感到羞耻。

我们出来时，鼠疫受难者纪念碑再次对着我们。它看上去很可笑。“瞧，海伦娜，”我指着纪念碑说，“瞧那些圣徒，想往天堂爬。天堂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天堂才不知道他们存在哩，这些有翅膀的乡巴佬！”

“真的，”海伦娜说。新鲜空气加大了酒劲。“他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保留它们，那些神圣的雕塑？他们干嘛不为赞美生活而建造一些东西而不是所有那些神秘主义？”她还有足够的自我控制补充说，“还是我仅仅在说空话？是不是？喂，是不是？”

“不，你没有，海伦娜。你没有任何错误。生活是美好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怎样赞美它都可以。”

“对，”海伦娜说，“不论人们说什么，生活都是美妙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是谁让我不高兴，就是那些影响人情绪的悲观主义者。我抱怨的东西有很多，可你从我这听不到一点嘀咕。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既然我能从生活那里得到像今天这样的一天。啊，这一次是多么不可思议：这座陌生的新城镇，以及与你一道在这儿……”

我让她继续混乱地往下说，每当她停顿时就插一句鼓励的话。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科斯特卡所住的那幢楼房前面。

“我们在哪儿？”海伦娜说。

“没有一个好的公共场所能在这个城里找到，”我说，“但我知道一个私人的小场所。我们上去吧。”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海伦娜跟在我后面抗议道。

“这是一个真正的摩拉维亚小旅馆，见过这样的小旅馆吗？”

“没有。”海伦娜说。

我打开科斯特卡的房间门，走了进去。

看见所谓的“小旅馆”不过是借来的一套寓所，海伦娜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要求任何解释。客观地说，在跨过门槛的那一瞬间，她就似乎决心把活动从调情的游戏转入到一个有明确意义的行动，并且相信这与其说一场游戏，不如说是生活本身。她站在科斯特卡的房子中间，半转身朝着我。我从她的眼神可以断定，她在等待我走到她身边，吻她，把她搂在怀里。此刻，她和我梦想的那个海伦娜完全一致，没有丝毫警惕，任我摆布。

我走近她，她抬起脸朝向我。可是我没有吻她，而是微笑着把手指放在她穿着蓝色雨衣的肩上。她领会了这意思，解开雨衣的钮扣。我拿着雨衣来到过道，将它挂起来。不，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我的欲望和她屈服），我不打算仓促行动，那样我就不

能看到想像中的各种不同的效果。我开始谈些无关紧要的话：我请她坐下。我把各式各样的家具摆设指给她看；我打开科斯特卡给我看过的那个放有伏特加的食橱，装出感到很惊异的样子。我拧开瓶盖，把两个小玻璃杯放在咖啡桌上，然后斟满酒。

“我会喝醉的。”她说。

“我们都会喝醉的。”我说（但我明白我不会让自己喝醉，极为小心地，因为我想要使我的记忆保持完整）。

她没有笑，她仍然很严肃。她抿一口酒，说：“你知道，卢德维克，如果你把我看成是那种感到厌倦，到外面放纵一次的已婚妇女，我会非常生气的。我也是一个深谙世故的人。我知道你有过许多女人，你从她们那里学会不要认真对待她们。但是我会很不愉快的……”

“我也会生气。”我说，“如果你只是那种感到厌倦，到外面放纵一次，以便摆脱丈夫的已婚妇女。如果你真是这样的女人，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的约会将毫无意义的。”

“真的吗？”海伦娜说。

“真的，海伦娜。你说得对，我有过许多女人，她们教会了我把一个女人换成另一个女人不当回事，可遇见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会是口是心非吧？”

“不，我说的是心里话。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立刻知道你正是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要是你没有这样感觉就不会这样说，对吗？”

“当然不会。我不会在女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感觉。那是一件我根本没从她们那儿学到的事。不，我不是在撒谎，海伦娜，不管你是多么怀疑这件事，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甚至在认识你之间我就在等待。只知道我一定会得到你。这是命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哪！”海伦娜闭上眼睛说。她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些红晕，也可能是酒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激动；她愈来愈和我梦想中的海伦娜接近：没有丝毫戒备，任我摆布。

“要是你知道该多好，卢德维克。我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时的幻想。我害怕的也正是这个。我是一个已婚女人，我知道我对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你是我的真实，我对此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也是我的真实，海伦娜。”我说。

她独自坐在长沙发上，把她那对熟视无睹的大眼睛对准我，而我则坐在椅子上如饥似渴地打量她。我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把她的裙子缓慢地向上拉直到长袜顶端，吊袜带现了出来，两条肥硕的大腿上它们显得多么可悲可怜。我对海伦娜的抚摸没有得到回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但愿你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我怎样生活。我一直是在怎样生活。”

“那么你一直是在怎样生活的呢？”

她苦笑了一下。

突然，我担心她会和所有不忠的妻子一样举出老掉牙的理由，就在她的婚姻即将被我毁掉时，通过贬低她的婚姻而使我失去它的价值。“看在上帝的面，不要对我叙述你的不幸婚姻和不理解你的丈夫。”

“我并不想说那个。”海伦娜说，我的诘难使她不安起来，“尽管……”

“尽管这正是你一直在想的。任何女人单独与一个男人相处时总是按这种思维方式想问题的。但是这也正是所有谎言的开端，你想坚持真实，海伦娜，是不是？你肯定爱过你的丈夫，你是那种为爱情才献出自己身子的女人。”

“是的。”海伦娜轻声地说。

“你的丈夫到底是谁？”

她耸了耸肩，微笑着说：“就是一个丈夫而已。”

“你们认识有多久了？”

“结婚有十三年了，在结婚前几年认识的。”

“那时你肯定是个学生。”

“是的，读大学一年级。”

她试图将裙子拉下来，可我抓住她的手阻止她。“他呢？”我继续问，“你在哪儿认识他的？”

“一个民间歌舞团。”

“一个民间歌舞团？那么你丈夫唱歌？”

“是的，我们都唱。”

“你们在一个民间歌舞团认识的……对初恋来说是一个美好的背景。”

“是的。”

“那是一段美好时光。”

“你是否对那段时光也记忆犹新？”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你丈夫是你的第一个恋人吗？”

“我不愿在此时想到我丈夫。”她说。

“我了解你，海伦娜。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对你了解得愈多，你就会愈属于我。在他之前你还有别人吗？”

“有的。”她点点头说。

想到海伦娜曾有过别的男人，一种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这似乎削弱了她对巴威尔·泽门尼克的感情。“那是不是很认真的？”我问。

她摇摇头：“无所事事地好奇。”

“那么你丈夫是第一个真正的恋人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点了点头，“可那事已过了很久了。”

“他那时像什么样子？”我平静地问。

“你干嘛想要知道？”

“我希望你的整个心灵和过去都属于我。”我抚弄着她的头发。

如果一个女人不愿当着情人的面谈论她的丈夫，那几乎不是由于圆滑或真正的礼节，而仅仅是因为担心她所说的话会伤害情人。一旦情人没有了这种担心，她会感激他，并感到一种新的自由，但更有意义的是，她有更多的谈资了。因为话题并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对妻子来说，丈夫是最令人兴奋的话题，只有谈起这个话题她们才充满自信，只有在这个话题上她们才是专家，而人们乐于抓住机会炫耀自己的特长。因此，当我使海伦娜确信谈论她的丈夫不会使我烦恼时，她马上就连锦不断地谈起巴威尔·泽门尼克，变得完全推动了自制力，轻轻松松地就把他们之间最隐秘的事讲了出来，她讲了很久，很详细，她是如何爱上他（那个直着背的金发青年）。当他成了歌舞团的政委时，她是如何敬仰他，她和所有认识的女孩是怎样爱慕他（他的谈吐风度实在令人赞叹）！他们的爱情是怎样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珠联璧合，她也讲了几句赞成那个时代精神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斯大林曾命令把忠诚的共产党员枪毙呢），哦，并不在于她想把话题转到政治，在于她感到自己牵涉在内。她如此捍卫她的青年时期，与那个时代认同（仿佛它曾经是她家，从那之后她不再拥有这个家），看上去近似于一个挑战；就仿佛她在说，占有我吧，但有一个条件：让我保持我的本色，把我的信念作为我的一部分来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肉体而不是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高谈阔论什么信念确实异乎寻常，它表明这个女人由于她的信念而在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程度地创伤。她或者担心人们怀疑她没有任何信念，或者（现在看来海伦娜更可能是这种情况）对这些信念暗暗产生怀疑，



希望把恢复她的确信押在她眼中某件确实可信的重要事上：性爱（也许怀着胆怯的、无意识的自信，认为在她的情人眼里做爱比讨论信念更重要）。但我觉得海伦娜的挑战没有什么不好，它和我激情的顶点间的距离更近了。

“你看见这个了吗？”她问，指着用一根短链系在她手表上的一个小银垂饰。我探身瞧了瞧，海伦娜解释说，这个雕刻品代表克里姆林宫。“它是巴威尔给我的礼物。”接着她给我讲了整个故事。许多年以前，一个害相思病的俄国姑娘把它送给了一个叫萨沙的俄国小伙子，他在大战中去参加战斗，战争接近尾声他来到布拉格，保卫这城市免遭毁灭，但它却给他带来了毁灭。红军在巴威尔和他父母居住的那幢大房子的顶楼设立了一个小医院，那个身负重伤的萨沙中尉在那里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巴威尔成了他的朋友，连续几天守在他的身边。在他弥留之际，萨沙把那个克里姆林宫装饰品送给了巴威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用一根细绳把它挂在脖子上。在巴威尔眼里，那是他最有价值的纪念品。有一次，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海伦娜和巴威尔吵了架，正在考虑两人分手，但后来巴威尔来了，把那个小玩意（珍贵的纪念品）作为言归于好的赠品送给她。从那以后，海伦娜始终戴着它，她把它看做是一个讯息（我问她是什么讯息，她回答说“欢乐的讯息”），一个要一直带到终点线的接力棒。

她面对我坐着（吊袜带吊在上面的那种流行的黑色松昆短裤历历在目，她的脸仍在发红“由于酒，也许还由于此刻的激动”）。但她的面目已经暂时为另一个人的形象所掩盖，海伦娜讲的这个几经周折的装饰品的故事突然（一下子）使巴威尔·泽门尼克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对那个红军战士萨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即使他存在过，他的真实生命也会由于巴威尔·泽门尼克冠冕堂皇的姿态而走样，泽门尼克靠这个姿态把萨沙变成了他的个人传奇中的一个角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崇高的人物，一个感伤的工具，一个满腹愁肠的理由，一个宗教的人工制品，而他的妻子（显然比他更坚定）将用她一生疯狂地、毫无顾虑地去崇拜这个制品。我感觉到巴威尔·泽门尼克的精神（心里只装着的风头的精神）就在这个房间里，和我们一起。一刹那间，我仿佛又回到十五年前的那个场面中：自然科学部的大礼堂。礼堂前面台上的一张长桌旁坐着泽门尼克，一侧坐着一位身着丑陋毛衣，留着辫子的圆脸胖姑娘。另一侧坐着一位代表区委会的年轻小伙子。一个大黑板挂在台后，左边是镶有镜框的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画像。我坐在桌子对面的阶梯座位上，同一个人，十五年后正以当时的眼神注视着泽门尼克，注视着他宣布现在开始讨论“扬同志的问题”，然后说，“这儿有两封共产党员的信让我念给你们听。”然后他顿了一下，拿起了一本小册子，用手指梳理一下他那波浪型长发，开始用一种迷人的，近似于柔美的语调朗读起来。

“死亡，你实在来得太迟。可我曾经希望在多年之后再实现我们的会面。继续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更多地活，更多地爱，更多地唱和更多地在这个世上漫游……”我听出这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参加了战斗。我爱你们，善良的人们。当你们回报我的爱时，我感到欣喜，当你们不理解我时，我感到痛苦……”这篇是那个时代的经典著作，它被秘密写于狱中，战后发行了上百万册，无线电大肆广播，学校把它作为必读物学习的文字，泽门尼克大声朗读了其中最著名的，人人都烂熟于胸的段落。“希望我的名字永远不被悲哀玷污。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姐妹们，是给你的，我的古斯达，是给你们，同志们。是给每一个我所爱的人……”墙上伏契克的画像是出自马克斯·萨宾斯基之手，他是新艺术派的大师，擅长画讽喻、丰满的女人，蝴蝶，以及一切可爱的东西。战后，据说同志们拜访了他，请求他照着一张照片给伏

契克画一张像，于是萨宾斯基以非常优美的线条和不同凡响的趣味画了一幅他的侧面像，以至于使他看上去就像处女一样——热情而纯洁——并且非常楚楚动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更喜欢萨宾斯基这幅杰出的画像而对他们记忆中的那张真实的面孔却不大喜欢。这期间，泽门尼克继续念着，礼堂里的人全都鸦雀无声，聚精会神。桌旁那位胖姑娘的目光始终都落在他身上。接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铿锵有力，甚至带有威胁了。他已经念到有关叛徒米瑞克的段落：“想想吧，他以前绝不是一个懦夫，在西班牙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他没有退缩，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他也没有屈服。现在他却被盖世太保的鞭答吓得脸色发白，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出卖同志。如果是挨几下打，勇气就动摇了，那么他的勇气是多么薄弱。他的信念也是同样薄弱……当他一开始考虑到自己时，他就一无所有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牺牲了同志们的生命。他胆怯，并且由于胆怯而背叛了他们……”挂在墙上的伏契克的脸如同挂在我们国家许多公共场所的那张脸一样，它的表情，那种热恋中的年轻姑娘的光彩照人的表情，是那样楚楚动人，使我不但为自己的错误，甚至，也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泽门尼克继续读道：“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达？但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善良的人们，你们能够想像，如果在经历这一切痛苦之后，我们又一次相逢，相逢在一个自由的生活里，一个由于有了自由和创造变得美好的生活里，我们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与我们曾经企盼的，当之奋斗的而今又要为之献身的一切都终于实现的时候，我们将过上怎样的生活？”读完最后这几句悲怆的句子，泽门尼克停顿了一会儿。

接着他说：“这封信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写的。现在我们要给你们再读一封。”他高声朗读我的明信片那三行即可笑又可怕的短小的句子。当他再次停顿下来时，礼堂里鸦雀无声，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沉默呀，沉默。充满灵感又强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吸引观众的泽门尼克，此时故意继续保持沉默。终于，他把陈述这件事的权力交给我自己。我知道我已无法辩护。如果迄今为止我所有的理由都没有任何效果，那么今天当泽门尼克拿我的明信片与伏契克的痛苦的绝对标准相比后，它们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呢。当然，我别无选择，只好站起来申诉。我又一次说明这封信仅仅是随便说说而已，并谴责它的极不妥的拙劣，谈了我的个人主义和理智主义，我与人民的脱离，甚至揭露了我的骄傲心态，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我能说的惟一对我的有利的的话是，即使这样，我依然对党忠贞不贰，绝不是党的敌人。接着讨论开始了。同志们指责我自相矛盾；他们问我，一个承认是玩世不恭的人如何能对党忠心？一位女同学提醒我曾说过一些淫秽的话，诘问我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应讲这样的话。其他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一些抽象的评论，然后引用我的所作所为的一个具体事件为例；他们似乎一致认为我的自我批评是肤浅的，不诚恳的。接着，坐在泽门尼克旁边那个梳辫子的姑娘说：“请问，你认为那些被盖世太保折磨致死的同志们对那些话会有何反应？”（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意识到他们对他的死全都在佯装不知。）我缄默不语。她又问了一遍，逼迫我回答。“我不知道。”我说。“再好好想一想，”她一再坚持，“你是知道这个答案的。”她的目的是要我通过牺牲的同志们那想像中的嘴唇对我自己做出严厉的判决，可是我却感到怒上心头，一种意想不到的，从不曾有过的狂怒，出于对这许多天来的自我批评的反抗，我回答说：“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的心胸并不狭窄。如果他们读了我的明信片，他们很可能会哈哈大笑。”

我本来可以从梳辫子姑娘那里至少能得到点什么的机会。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去理解同志们的批评的程度，认同它，接受它，从而从他们那里得到几分理解。但我意想不到的回答顷刻间就把我排除在他们的思维范围之外。在上百次的会议中，惩戒活

动中以及不久以后的法庭审讯中，我不想扮演那种被扮演的那种角色：即以被告的角色指控自己，并且凭着他自我指控的热情（他与原告的完全一致）来寻求宽恕。

会堂再次变得肃静。接着泽门尼克讲话了。他说，他看不出在我的反党言论有一点幽默的成分。他再次提到伏契克的话。并且说，在关键时刻左右摇摆和怀疑主义一定会转为背叛行为，党是一个堡垒，它绝不允许自己堡垒里有叛徒。他说我的回答显然证明我对一件事还很不清楚，我不仅不该留在党内，而且不应享受工人阶级花在我身上的教育资金。他提议将我由党内驱逐出去，并且开除我的学籍。礼堂里的人都举起他的手，于是泽门尼克要我交出党证，退出会场。

我起身在他面前的案上放下了自己的党证，泽门尼克没有看我一眼；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可是现在，我看见他妻子正坐在我面前，昏昏欲睡，满脸通红，裙子拉到腰际。她的大腿从她那松紧短裤的黑色开始，正是这双大腿的一张一合使泽门尼克十年的生活具有了节奏和律动。把手放在那双大腿上，那个生活好像就被控制在我手中。我盯着海伦娜的脸，盯着那双在我抚摸下半闭着的眼睛。

“脱掉你的衣服，海伦娜。”我平静地说。

当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时，裙边再次盖回到膝盖上。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一句话都没有说（或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她开始解裙子侧面的钮扣。钮扣解开了，裙子从她的大腿滑落到地板上。她左腿从裙子中迈出来，然后用右脚把裙子挑到手中，把它往上椅子一丢。她穿着毛衣和内衣在那里伫立了片刻，然后把毛衣拉过头顶，扔到裙子上面。

“不要看我。”她说。

“我想看看你。”我说。

“我脱衣服时不想要你看着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走近她，从她的两侧腋窝下按住她，通过她的身体使手逐步滑到她的臀部。通过她有点汗湿的丝绸内衣，她那具有柔软曲线的身体可以被我感到。她抑着头，嘴唇习惯地（恶习）半张开等我接吻。但是我并不想那样做。我想看着她，用最长久的时间打量她。

“把衣服脱掉，海伦娜。”我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走开去脱我的外衣。

“光线过于亮了。”她说。

“这光线正合适。”我说，把外衣挂在椅背上。

她把内衣拉过头顶，将它丢在毛衣和裙子上面。她解开长袜，从腿上将它们退下去。但长袜并未被她扔在长椅上，而是走过去，仔细地把它们搁好。然后她挺起胸脯，把手伸到背后，几秒钟后，她勒紧的双肩变得松弛了，向前下垂，胸罩也随之下垂，从乳房上滑落下来。乳房被她的手臂挤在一块，庞大，丰满，雪白，分量自然也不轻。

“把衣服脱掉，海伦娜。”我最后一次说。她一边直视着我的眼睛，一边把紧贴在她大腿的黑色松紧短裤脱了下来，把它搁在那堆衣服上。她赤身裸体。

整个情景的每个细节都看在我眼里。我不喜欢去追求和一个女人（即任何女人）的短暂放纵。我需要的是占有一个异乎寻常、隐秘的天地，并在一个下午，一次做爱的过程中完成它，在做爱时我将不仅是一个处在激荡的肉欲的痛苦中的男人，我将是一个具有较高戒备地守护着自己的逃亡猎物的男人。

迄今为止，海伦娜还只是被我的眼睛所征服。在她急欲开始热烈的爱抚，使她的身体避开我冰冷的注视而隐藏起来时，我却保持着距离。我几乎能感觉到她嘴唇的温度，她舌头的欲炎难耐。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了，我朝她走去。在房子中间站在两张堆满我们衣服的椅子之间，我们互相搂在一起。

“卢德维克，卢德维克，卢德维克……”她喁喁道。我把她带到长沙发前。“来呀，”她说，“快来呀，快来呀。”

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相结合的时候很少。当肉体（以它古老的、普通的、固定不变的动作）彼此结合时，精神实际上在做什么？想一想在那些年代里从它那里生发出的众多美妙的观点吧，这些观点必然要证明精神比永无止境、固定不变的肉体生活优越得多！想一想精神对肉体的蔑视吧，后者（与它的配对一起使精神拥有了比它自身还要丑陋一千倍的幻想素材！）或者反过来想一想精神从抨击的肉体中所获得的愉悦吧，它一方面放任肉体做推拉游戏，一方面又在广阔的思想领域纵横驰骋。一盘特别引起争论的象棋布局，一顿难忘的饭，一本新书……

两个陌生肉体的结合其实也很常见，甚至偶尔也会出现精神的结合。难得的是肉体与其精神在共同的激情中的结合。那么当我与海伦娜进行肉体接触时，我的精神在做什么？我的精神已把一个女人的肉体记住了。它对这个肉体不感兴趣。它知道这个肉体对它的意义只有通过当时不在现场局外人像这样看过、爱过肉体才会有效。这就是它试图通过那位第三者的眼睛来审视这个肉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努力变成那位第三者的媒介。裸身的躯体，弯着的膝盖，腹部和胸脯的曲线——只有当我的眼睛被那个第三者的眼睛所代替时，这一切才具有意义。这时我的精神才能与他那完全相异的注视相结合。它不仅占有那个弯着的膝盖，那个腹部和胸脯的曲线，而且还通过那个第三者的眼光来占有它们。

不但我的精神而且我的肉体都成了那个第三者的媒介，然后它站在后面，观看两个扭动的肉体，两夫妇的搏斗，直到它突然下令使我的肉体回到自身，干预这对夫妇的性交，毫不怜悯地毁掉它。

一道蓝色的静脉血管可以清晰地从海伦娜脖子上看出来，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身震动了一下。她把头扭到一边，用牙齿咬住枕头。

然后她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流露出片刻地恳求的眼神。

可是我的精神要我不能停止，把她从快乐赶到快乐，强迫她做各种姿势，要让那个隐藏起来、不在场的第三者一刻不停地观看。不许她喘一口气，不，要让她反复地重复震动，在震动时她是真真切切的，在震动时她绝不会做假，凭借这个震动，她将在不在场的第三者的记忆中打下深深地烙印，就像一张邮票，一个印记，一个密码，一个符号。窃取密码，窃取玉玺就是这样！劫掠巴威尔·泽门尼克神圣的寝室，彻底搜索它，把它洗劫一空！

我看着海伦娜，由于怪相她的脸变得红了起来，难看起来。我把手放在她脸上，我把手放在她脸上那张脸就像是一个东西而被翻过来又翻过去，被搓过来又揉过去，我觉得正是以这些条件她的脸欢迎我的手：好像一个渴望被翻过来搓过去的东西。我把她的头翻转到一边，然后翻转到另一边。我这样几次把它来回翻转，突然这动作变成了一个耳光。第二下，第三下……海伦娜开始啜泣和呻吟，但这只是因为激动，而非疼痛的原因。她的下巴使劲抬起来够我，于是我不停地打她。接着我看见她的乳房也努力地朝上挺，于是我便（弓在她上面）开始打她的胳膊，她的两肋，她的乳房……

一切都平静了，包括我那动作优美的劫掠。她斜伏在长沙发上，疲惫不堪。我可以见到她的背上褐色胎记，以及在那胎记下边的屁股上被我打红的纹斑。

我站起身，身体摇晃着过了房间，打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拧开冷水龙头，冲洗着手脸与身子。我抬起了头，看到了镜子里的我。我面带微笑，当这微笑一凸显出来，立刻就转成了大笑，一阵袭然而至的大笑。然后我用毛巾擦干身子，坐在浴盆边上。我想单独静一下，品味不经常的突然独处带来的不多有的愉悦，沉醉于快乐的心情。



是的，我感到满足，也许甚至感到十分地满足。由于沉浸在我的胜利中，我不需要后来的那些时刻。

然后我重回到房间。

海伦娜不再趴伏在长沙发上。她已侧过身来，正望着我过来。“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她说。我没有答理她的邀请，而是径直走到放着我衣服的椅子跟前，拾起上面的衬衣。

“别穿上衣服，”海伦娜带着恳求的语气，朝我伸出一只手臂，她重复说，“到我这里来。”

我此刻仅只一个期求：省去这难受的时刻，或不要这样也罢，而是使这一段完全变成消遣，无关痛痒，快活轻松，无足轻重。我不想再触及她的身躯。我害怕她会做出娇媚百生的模样。但我同样害怕她会借助于演戏，大吵大闹。因此我丢下了衬衣，坐到了她身边，太可怕了：她偎依着我，把头搁在我腿上。她不住地吻我，一会儿就弄湿了我的腿。但不是她的吻，她抬起头来时，我看见她满脸是泪。她拭掉眼泪，说：“别烦恼，亲爱的。要是我哭，请别烦恼。”她贴得更近，用手紧抱着我，突然抽泣起来。

“怎么啦？”我说。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傻瓜，没什么。”然后就火热地亲吻我的脸和全身。“我在恋爱。”她说，我没做任何表示，她继续自言自语，“你愿意，你就笑人吧，我不在乎。我在恋爱。在恋爱！”我仍然默不吭声，她加了一句，“而且幸福。”然后她指了指桌上未喝完的酒瓶，“要来点伏特加吗？”

我不想喝也不想让海伦娜喝。我害怕这样会更危险，因为消耗酒会再将这个下午的活动延长些（这些活动的成功是依它们的完成和结束而定）。

“亲爱的，请。”她仍指着桌子，“别生气。”她抱歉地补充说，“我就高兴而已。我想要高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高兴也不用。”我说。

“别生气。我只是想喝一点。”

我能做什么呢？我给她倒了一杯伏特加。“你的确不想再喝一点吗？”她问。我摇了摇头。她举杯一饮而尽，说：“把它放在那儿吧。”我在长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放下了杯子和酒瓶。

她迅速地从刚才的疲倦苏醒了过来，突然成了一个想高兴和快活，并把这种高兴和快活传染给每一个人小女孩。显然她觉得身子裸着（她反戴了手表，表链上的那个克里姆林宫在摇晃）轻松自在，没有拘束，为了舒服她换了几种坐姿。先是土耳其式，双腿交叉压在身下，然后又伸直双腿，一只肘撑着，最后翻了身趴着。把脸贴在我的腿上。她极尽所能地通过自己的方式告知我她多么地幸福，同时一直不停地吻我。我觉得，我显示出了很强的自制力，因为她的湿嘴不愿止足于我的肩膀和脸，似乎决心要达到我的嘴（我讨厌含了口水的接吻，除非欲火导致我忘乎所已）。

接着她告诉我她以前还从未知道有这样的事。我说（纯粹是没话找话说）她是在夸张。她发誓她以一切她所珍视的东西保证，在爱情上她从来不撒谎，我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她。为了证实这一点她说，她从一开始就坚信无疑了。肉体有一个永不会错的直觉。噢，当然，我的聪明和劲头（是的，劲头，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在我身上发现这一点的）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也知道（尽管直到现在她才敢说出来）我们两人的肉体在短暂的一瞬已经签订了那种人的肉体在一生中只签订一次的秘密协议。“这就是我如此幸福的原因，现在你懂了吧？”她把腿从长沙发上摆下来，俯身去拿酒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我能怎样？”她一饮而尽后微笑着说，“你不跟我一起喝，我就独自喝！”

尽管我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但我不能否认海伦娜的话使我愉快。它们使我进一步确信，我的冒险已经取得了胜利，我有理

由感到满意。极有可能由于我不太明白我该作出怎样反应，又不想过于冷淡了海伦娜。所以我指出她谈到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经历时是在夸张。不正是她自己告诉过我她一生中真正的情人是她丈夫吗？

海伦娜随即开始了沉思（她坐在长沙发上，脚放在地板上，腿稍微张开，肘支在腿上，右手拿着空杯子），然后平静地说：“的确。”

也许她认为有一个强烈的真诚限制着她刚享受过的那种同样强烈的感情经历。“的确。”她重复道，接着又补充说，为了今天的奇迹（这个词她用来描述我们的做爱）而贬低某种过去曾有的东西，这也许是在犯错误的。她又喝了一杯，突然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起来，我们不可能对生活中那些最有影响的经历作出比较。对一个女人来说，在二十岁和三十岁时发生的爱情是完全不同的。她希望我明白她的意思：在心理上和肉体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接着（不合逻辑地跳跃）她宣称，实际上我和她丈夫有某种相似！她不能很准确地指出哪点相似。我跟她长得一点也不像，但她不可能错，她有一个永不犯错的直觉，能够使她看到人们内心世界，他们的外表里面。

“我很想知道我和你丈夫哪一点相似。”我说。

她要我别生气。这个话题我先提到的，要求她给我讲他的情况我也是要求过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淡到他。但如果我想知道全部事实，她愿意告诉我，在她一生中只有两个人如此强烈，如此彻底地吸引住她——她的丈夫和我。我们两个的共同点是，她说，我俩的身上有一种活力很神秘，并且从身上都发射出一种快乐来，是一种青春永驻和青春力量的快乐。

海伦娜试图把我与威尔·泽门尼克的相似之处讲清楚，使用的词汇也许相当含糊，但无疑她看到和感觉到了这个相似，并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强地固守己见。我弄不清她使我震惊，还是叫我生气，但听她的看法如此荒诞倒使我吃惊。我走到椅子跟前，开始穿衣服。

“我说错话了吗，亲爱的？”她试探着问，觉察到我不高兴。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她开始抚弄我的脸，恳求我不要生她的气。她尽力停止我穿衣服（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的裤子和衬衣成了她的敌人）。接着她想尽办法让我相信，她真的爱我，绝不是在滥用这个词。她会用一切方法来证实这一切。当我问到她丈夫时她立刻就明白了——谈他是没有意义的。她不要别的男人，任何陌生人阻在我们中间。是的，陌生人，因为她丈夫早已对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已有三年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傻瓜。只是因为小兹德娜我们才没离婚。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我们实际上行同路人。他不过是我的过去，很远的过去而已。”

“是真的吗？”我问。

“千真万确。”她说。

“你在说谎。我不相信你。”我说。

“我不是在说谎。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不是像男人和妻子那样。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了。”

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可怜兮兮的情妇。她不停地向我保证她讲的是真话。她没有在企图欺骗我。我没有必要嫉妒她丈夫。这一切都已过去。即使今天她也没有做什么不忠的事，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她的忠诚。我没有必要烦恼：我们的做爱美好而又纯洁。

突然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她看出了这点，从容了许多，放松了一些，立刻缠着要我告诉她我相信她，要我大声告诉她。然后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并极力要我也倒一杯（我拒绝了）。她吻我，这使我皮毛紧张，但我不能转过脸去不看她。我被她那愚蠢的蓝眼睛和她的光身子（依旧生气勃勃，劲道十足）吸引住了。

可是现在我看她的裸体换了种新的眼光。这是被劫掠了的裸体，被劫掠了魅力的裸体，在此之前这个裸体还一直跟随着时代的一切过错，我觉得这其中我看见了海伦娜的婚姻、她凝聚在一起的去和现在，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她的裸体有吸引力。既然她现在赤裸着站在我面前，没有丈夫，没有夫妇之间的连结，就她独自一身，那么她被剥夺了魅力的肉体就失去了刺激我的能力。它也成了它自身——一个缺乏魅力的肉体而已。

我怎样看她，海伦娜已不再知晓。她愈来愈醉，愈来愈满足。她很高兴，我相信了她的爱情宣言，但她不太知道该如何表达她的高兴，她在收音机前突然蹲下（背朝着我），打开收音机，开始调波段。她收到爵士音乐，于是站起来，眼睛闪闪有光。她蠢笨地模仿了一下扭摆舞的起伏动作（我恐惧地盯着她的乳房左右飞舞）。“这样对吗？”她笑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从来不跳这些新舞蹈？”她又笑起来，声音大得很，并张开怀抱朝我走来。她要我同她一道跳。她非常恼怒于我拒绝了她。她说她虽然不会跳这些舞，可是她愿意学，教会她跳这些舞是我的职责。她希望我能使她变得年轻，她要我告诉她她仍然年轻（我照办了）。她觉察到我穿着衣服而她却光着身子。她大笑起来，这对于她简直妙极了。她问，住在这儿的那个人有没有穿衣镜，她想知道我们像什么样子。没有镜子，只有一个书橱的正面装有玻璃。她努力想从玻璃里辨认出我们，但是影像很模糊。她走近书橱，一看见那些书名就又大笑起来《圣经》，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书》，胡斯的著作。她取出《圣经》，做出严肃认真的样子，随意地翻开书，开始用牧师的声调读起来。她问我她是否会成为一个好牧师。我说她读《圣经》很合适，但现在她该穿上衣服了，因为科斯特卡先生随时有可能回来。“现在是几点钟？”她问。“六点半。”我说。“骗子！”她大喊一声，抓住我的左手腕，看一眼手表，“差一刻钟才到六点！，你想脱离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企盼她离开，企盼她那太物质性的肉体失去物质形态，融化，变成小溪流走，或者蒸发，飞出窗外——但是它还在那里，这个肉体不是我从任何人那里偷来的。我在这个肉体上没能报复任何人，没能毁掉任何人，这个肉体已被抛弃了，被它的搭档遗弃了，一个我原打算利用可它反而利用了我的肉体，这个肉体此刻正在恬不知耻地庆祝它的胜利，狂欢做乐。

要结束我那异乎寻常的爱折磨是我力不能及的。她开始穿衣服时都快六点半了。在戴胸罩时，她注意到我在她手臂上打的一块红痕。她拍拍它，说这是个纪念品，她将带着，直到她再见到我。她马上纠正自己：这个纪念品在她身上远未消失之前，她肯定会见到我！她就这样站在那里面对着我（腿上穿着一只长袜，另一只拿在手上），要我答应，我们在那之前将会见面。我点点头，但这还不行，我得答应我们在那之前将见很多次面。

她穿衣服用了很长时间。她差几分到七点时才离开。

我打开窗子，企求一阵微风吹走这个倒霉的下午的一切记忆、吹走气味和情感的所有痕迹。接着我迅速把瓶子拿开，把长沙发上的垫子弄直，当我觉得已经把她的一切痕迹擦抹掉时。我一屁股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急切地等待科斯特卡，期待着他那充足男子气概的嗓音（我渴望听见男人深沉的声音）。他那平坦的胸膛和修长瘦削的身材，他那平静的谈话方式，既奇怪又伶俐，期待着他能告诉我有关露茜的任何情况。与海伦娜形成对比，露茜是那样令人感到愉快、精神、抽象，远离一切冲突，紧张和戏剧性，然而又那样大地影响我的生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影响了我的生活，就像占星家觉得星球的运动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一样。当我舒适地坐在椅子上时（在仍在消除海伦娜的气味的打开的窗户下），我突然觉得我懂得了露茜为什么要在这两天一下子出现的原因：是为了使我的复仇失败，为了把我来这儿的变得虚无缥缈。因为露茜，我深深爱着而到最后从我身

边不知何故跑掉的露茜，是逃跑女神，是徒劳无用追求的女神，是虚幻不实的女神。她的手仍然捧着我的头。

## 第六章 科斯特卡

我们一直没见面已有多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生中只见过几次面。但说来也奇怪，我在想象的世界中的确经常见到卢德维克·扬，我自言自语时把他总是看做是我的主要对手。我已经十分习惯了他的无形的存在，以至于昨天一旦碰到活生生的他时我简直猝不及防。

我把卢德维克称作我的对手。这样做是我的权利吗？每次遇见他我似乎都正好处在一个濒临绝望的境遇，每次都是他帮助我摆脱了困境。然而一个内在的不和的深渊存在于我们表面的同盟下。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一样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显然他把我们表面的一致看得比我们内在的张力更重要。他对表面的敌手一直冷酷无情，而对内在的不和却很宽容。我不是这样。我恰与他相反。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卢德维克。正如我们爱我们的对手一样，我爱着他。

一九四七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在那个年代震荡着所有高等学院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上。国家的命运危机重重。这一点我们都感觉到了，包括我本人，因此在所有的讨论、辩论和投票中我都站在共产党少数派一边。

许多基督教徒——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反对我。他们把我当作是叛徒，因为我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到了一场将无神论刻在盾牌上的运动上。今天当我碰到这些人时，他们料定过去十五年已足以显示出我的道路走错了。但是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一直到现在我也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共产主义无疑是无神论，然而除了那些不愿除掉自己眼中大梁的基督教徒们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因无神论而指责共产主义。我说：“基督教徒们”。可他们究竟是谁呢？瞧瞧周围，我所见的全



是一些伪基督教徒，他们只不过像异教徒一样生活。作一名基督教徒就等于选择了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就等于走基督走过的路，模仿基督。就等于放弃个人利益、舒适和权力，面对着穷人，被蹂躏的人以及受苦受难的人。教会是在做这些事吗？我父亲是一个劳动者。虽然经常失业，但他一直忠诚于上帝，坚持对上帝的谦卑信仰。他不断将他虔诚的脸转向上帝，但教会却从没有把脸转向他。因此即使在他最亲近的人中间他仍是孤独的，在教会时依旧是孤独的，不认为他的上帝和他在一起，直到他最后生病去世。

教会不认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被蹂躏被压迫的人祈求正义的运动。教会不愿为他们工作，也不愿与他们一起在人间创造一个天国。它们与压迫者一起共事，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运动失去了上帝。现在它们却反过来指责这个运动不信上帝。这些法利赛人！是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无神论的，然而它正暗示了对每一个基督教徒的神圣审判。正是谴责了我们对于穷苦大众缺乏同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做些什么呢？我能对教会成员的减少感到震惊吗？我能对学校里教的那些反宗教宣传感到震惊吗？多么愚蠢！世俗权力的认可对于真正的宗教没有任何裨益。世俗的反对只会加强宗教信仰。

或者难道是我们使社会主义成了无神论，我就应该同它作斗争吗？那更愚蠢！我只能痛惜导致社会主义丧失上帝那个悲剧性错误。我可以试着把个别错误阐述清楚并努力校正它。

可是，为什么要震惊恐惧，基督徒兄弟们？发生的一切都是顺应上帝的意志发生的，我经常思考探寻，上帝是否在有意给人类一个明示，人是不可能不受惩罚而稳坐他的宝座的，没有他的参与，哪怕公正的世俗制度也是注定要失败和腐朽的。

我记得在那些年里，这里的人们认为他们离天堂很近。他们多么骄傲，这制度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进入天堂而无需上帝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帮助。然而突然间它就消失在他们眼前。

总之，在二月政变之前，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却一直在帮助共产党人。他们喜欢听我阐述福音的社会内容，抨击旧世界及其私有财产和普遍战争的腐朽，论证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密切关系。毕竟，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吸引最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们也努力争取宗教信仰徒的支持。然而，政变后不久，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作为在大学一名讲师，我保护了几个由于父母的政治观点而将被开除的学生。由于我的抗议，我与行政当局发生了矛盾。于是突然间人们开始提出怀疑，社会主义青年的教育是否能由这样一个基督教信念如此坚定的人来承担。看来我似乎不是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接着有一个名叫卢德维克·扬的学生在一次全体党员的会议上公开为我辩护。他宣称，如果忘记我在政变前对党做的贡献，那将是卑鄙的忘恩负义。当他们提出我的基督教信仰时，他说，它们肯定只是我正在经历的一个不成熟阶段，我还年轻，随着逐渐成熟我就会超越这一阶段而不是停留于此。

我去见他，感谢他为我辩护。然而，我不想欺骗他，我告诉他我并非像他所想的那么年轻，根本不要指望我会“超越这个阶段，放弃我的信仰”。很快我们就对上帝存在与否，有限和无限，笛卡尔对宗教的看法，斯宾诺莎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地位，以及许多其它问题进行了辩论，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最后我问卢德维克，他现在是否因为我辩护而后悔，既然他已看出我已无药可救。他回答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除了个人任何人没有理由参与个人的事。

我在大学里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结果我们的生活道路极其相似。我们谈话后三四个月，扬被开除了党籍和学籍，六个月后我也离开了大学。我是被赶出来的？被驱逐出来的？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又出现了对我和我的信念的怀疑。我的一些同事暗示我最好还是按照无神论的路线做一次公开声明。在课堂上出现一

些令我不愉快的场面，一些受寻衅的党员学生企图侮辱我的信仰。显然已经风传我要离开这一学校了。但我也得说，我在学院里有几个尊敬我的党员朋友，因为他们欣赏我在二月革命前的立场。也许我稍微做出一点要为自己辩护的暗示，他们就会来帮助我。但我不愿那样做。

“跟我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们就跟着来了，撒下了渔网、渔船、房子与家庭。“接受了我派给他的工作，却不全身心投入去做的人，不配进天国。”

如果我们听到基督的呼唤，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即使在福音里的这番话也许很亲切，但在现代听起来却像神话。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还能指望什么呢？一旦我们撒下渔网，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将跟从谁？

然而，我们留神注意倾听，今天的世界上，仍有发出那个呼唤的声音能传入我们的耳中。它不是像一封挂号信通过邮递传来。它是经过乔装打扮而来。它很少把自己打扮成某种很先锋和迷人的东西。“不是你所选择之行为，而是违背你意志，你头脑，你愿望放在你身上之行为。此乃你必践行之路，我于彼处呼唤你，至彼处你便成为主的门徒，此乃你的机会，此乃主所践行之路。”马丁·路德写道。

有许多理由使我留恋大学的职位。这个职位相对来说是舒适的，我有大量时间从事我自己的研究。而且很有可能把它作为终身职业，并最终当上教授。但同时我又因为自己对它的留恋感到不安，看到大批人才，教师和学生，都被迫离开了大学，我更加感到不安。对舒适生活的留恋使我自己感到不安，这种生活的平静和安全使我疏远了与那些命运坎坷的同胞的距离。我感觉到大学里那些反对我的声音是一个呼吁。我听见有人在对我呼唤，在警告我提防一个会锁住我的头脑，我的信仰和我的良知的舒适的职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有了一个孩子的妻子，尽力劝我为自己辩护，保住我在大学的职位。她除了我们的儿子和家庭的未来什么都不关心。因为她那已显老相的脸，对明天和来年的忧虑，对所有明年和来年的责任、无穷无尽的可叹和忧虑，我感到不安起来。

这些忧虑所潜在的责任使我感到不安。在我的内心，我听见耶稣的话：“因此不要担心明天，明天自有明天的忧愁，当天的苦恼就够受的了。”

我的敌人巴望我会因懊悔而痛苦，而实际上我却感到一种始料未及的愉快。他们认为我会觉得这发生的一切限制了我的自由，而事实上我却找到了自由的真正意义。我意识到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他的位置，凡是耶稣到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他的位置。

等最初的不安和后悔过去了，我决定迎面反击我的敌人的恶意。他们加于我身上的中伤我只把它看做一个译成电码的呼吁来接受。

共产党人以一种明显的守教态度认为，一个在党面前犯过罪的人只要同工人阶级一道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就可以获得大赦。二月政变的许多岁月里，许多知识分子都去了矿井，工厂、建筑工地和国营农场，在那里经过一段神圣又让人不解的涤罪后——有时很长，有时不那么长——他们又可以被批准回到办公室、学校以及其他公务部门。

我向大学行政部门提交了辞职书而不是关于申请职位的申请书。我的那些党员同事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按照他们的信念而不是我的信念来解释我的举动，即作为一个从未有过的自我批评的榜样。他们全都颂扬我的举动，并帮我在西波希米亚一个国营农场找到一份好工作，那里有一个正派的场长和一个优美的环境。他们写了一封不同寻常，超乎想像的赞扬我的介绍信，把我打发上路。

在新的环境里我的确很快乐。我感到获得了新生。这个国营农场地处一个僻远、人口稀少的边境村庄，战后就是从这里赶走了德国人。群山环绕着村子，大部分山都是光秃秃的牧场。广阔的山谷间点缀着一些狭长，散落的村庄的屋舍。从乡间卷过的薄雾形成一道帘幕不时从我和这块安身之地中间闪过。世界就像处在创世的第五天，那一天上帝好像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它交给人类。

这里的人也似乎更贴近那种原始状态。他们面对着大自然——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牛羊。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自由自在。不久我就提出了几个建议，更好地利用这个多山乡间的一草一木的方法，如何采用化学肥料，贮藏干草的新方法，建立草药试验田，温室。场长很感谢我的建议，我也感谢他让我能够靠有用的工作来谋生。

一九五一年，九月间天气还凉，但十月中间气候却突然变暖了起来，那个秋天的天气真是棒极了，一直拖延到十一月里。沿山坡晒干的干草堆散发的芳香飘到很远的土地。鲜活的草地上，藏红花在草丛里星星点点。就在这时候，关于那个逃亡姑娘的传言开始传播开来。

一天，邻近村子的一群男孩去到一块刚收割的地里，正在吵吵闹闹的时候，他们看见从草堆里爬出一个姑娘来，头发散乱着，满身都是干草，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姑娘。她吓坏了，四处环顾，然后猛然朝树林里冲去，等他们醒悟过来，准备追踪她时，她已经消失得没影了。

同一村子的一个农妇也有过同样类似的经历。一天下午，她正在院子里忙活，冷不丁突然钻出了一个穿着破旧外套、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眼睛低垂望着地上，问她要一片干面包，“你要到哪儿去，姑娘？”那个女人问她。姑娘回答说她还要有很远的路要走。“步行？”“我的钱丢了。”她回答。那个女人不再问了，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她面包和牛奶。

最后我们的羊倌报告说，有一次在山上，他把一块黄油面包和一罐牛奶放在一棵树桩旁边，然后去赶羊，等他回来时，面包和罐子都神秘地消失了。

孩子们立刻凭借丰富的想像力加上这些传说虚构出许多东西。只要有人丢失了东西，他们马上就把这看做是她存在的证据。他们声称，在村外的池塘里，一天晚上她在里面洗澡，尽管这已经是十一月初，此时的水是很冷的。还有一次，他们听见从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歌声。成年人说山上的一个村舍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太大，但孩子们知道这是谁。这是那个在山顶上游荡，头发披散，唱着歌儿的逃亡者。

一天傍晚，在树林附近孩子们用马铃薯叶子生起一堆火，把马铃薯扔进灼热的灰里。当他们朝树林里望去时，一个女孩大叫起来，说她看见他们背后的阴影里那个逃亡者在偷窥他们。一个男孩捡起一块土，朝女孩指的方向猛掷过去，奇怪的是，没有传出任何声音。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发生了，孩子们开始对着那个男孩吼叫，差点要揍他。

无论怎样，那块土坷垃使孩子们在心底里同情那位姑娘。就在那天，他们留下一小堆烤熟的马铃薯在灰烬旁边，为了保持热度还用灰盖了，插在上面一枝折断的冷杉树枝。他们甚至给那个姑娘起了一个名字。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他们写了几个铅笔大字：飘游的仙女，这是给你的。他们把那张纸放在马铃薯堆旁边，并压了一块土坷垃。然后他们走开，躲在周围的树丛里，等待那个胆怯的人影出现。夜幕降临，仍然没人来。最后孩子们悻悻地离开他们的躲藏处，各自回家去。但在拂晓时他们又回到他们的躲藏处。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马铃薯不见了，那张便条和树枝也一起不见了。

孩子们享受着热爱他们的仙女乐趣。他们给她留下牛奶、面

包、马铃薯和信。但他们从来不在同一地方放两次他们的礼物。他们避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陈列食物，因为那样就好像是专门给乞丐准备的。他们在同她玩一场游戏，是一个藏珍宝的游戏。从留放第一堆马铃薯的那个地方开始，他们越来越远离村子，移到田野里。他们把他们的珍宝留在树桩边，大岩石下，岔路附近，野玫瑰丛旁。他们对任何人也没有泄露藏礼物的地方。他们从未违背过微妙的游戏规则，从未埋伏着等候姑娘，也从未试图去惊扰她。他们允许她始终不露面。

然而，很快这个童话就收尾了。一天，我们农场的场长和地方议会的主席为去察看一些被废弃的村舍深入到了乡村，看看村舍是否可以用作远离村庄干活的农场工人过夜的住房，在路上他们遭遇了阵雨袭击，那雨顷刻就变为倾盆大雨。他们看到一面灰色的草棚立在附近一丛冷杉树边上：一个牲口棚。他们跑过去，打开门——门仅仅用一个木桩顶住——然后爬到里面。透进来的光线穿过打开的门和棚顶。他们看清有一堆铺平的干草，于是四肢舒展开躺在草上，倾听雨点落在棚顶的声音，呼吸着令人陶醉的气味，天南海北地侃起来。主席的手随意地抚弄着身后的草壁，突然，他在干草捆中摸到一个硬东西。这是一个小提箱。一个用硬橡皮制作的难看廉价的旧提箱。我不知道对着那件神秘的东西这两个男人沉思了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有四件姑娘的衣服，都是新的，而且很漂亮。我听说，那个很土气的箱子与这些漂亮的東西形成了奇妙的对照，因此他们立即怀疑到盗窃案。他们发现在衣服下面还有女式内衣，内衣里面有一扎用蓝色缎带捆住的信。我甚至不知道场长和主席是否看了那些信。我只知道从那些信他们获知了箱子主人的名字——露茜·塞贝特卡。

他们正在默思于这个意外的发现时，主席在干草里又发现了一样东西：一个大缺口的旧罐子。这是一个牛奶罐，正是这两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牛倌每晚都要在酒店里反复讲述的那个不翼而飞的蓝色搪瓷牛奶罐。

接下来，这件事就只是按部就班地发展了。主席藏在树林里等她回来，场长回到村里，派本地警察前往支援。黄昏时分，姑娘回到她芳香的闺房。他们让她先进去，关上了门，等了半分钟，然后跟在后面进去了。

那两个在牲口棚里埋伏诱捕露茜的人都是那种社会的脊梁。主席出身是一个贫穷的长工，现在已是六个孩子的慈父。那个警察是一位蓄着大胡子，老实粗笨，性情温顺忠厚的人。他俩连一只蚂蚁都不会踩。

可是，当我听到他们抓她的办法时，我却感到感情上有种奇怪而又近乎痛苦的感受。甚至现在当我一想到场长主席彻底搜查她的提箱，随意翻看她私生活中最个人的物件，她的隐私的微妙秘密，窥探他们无权窥探的事，我不禁心中一阵剧痛。

我一想到她那个干草搭成的窝，两个彪形大汉堵住了惟的一道门而无法逃跑的情景，同样强烈的痛苦就会在我心中产生。

后来，随着对露茜的情况知道了更多，我吃惊地意识到这两个令人痛苦的情景给我所需要的洞察力，去把握她命运的本质。这两个情景都是标志了玷污。

那晚露茜没有在牲口棚里睡，她睡在从前是店铺现在是警察办公室里的一张铁床上。第二天她的案子交给了地方议会审理。他们获悉她以前生活和工作在俄斯特拉。她因为再也不能忍受那个地方而逃离了那里。当他们还想从她嘴里进一步掏出一些更具体的情况时，他们却遇上了固执的沉默。

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到西波希米亚来？她的父母住在赫布，她说。那么她为什么不去和他们同住呢？由于半途中她就怕了起来，离赫布很远时就下了火车。她的父亲只会打她骂她，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干。



地方议会主席通知她，由于她离开俄斯特拉发却没有正当的解职书，他们将必须把她遣送回去。露茜对他们说，她将在第一站就下火车。他们对她大发雷霆教训她，但当他们看见这样做没有任何用，就问她是否应该把她送回家，送回赫布。她死命地摇头。他们再次试图对她严厉，但最后主席出于宽容厚道的性情丢弃了把她送走的主张。“那么，你想要怎么办？”她问能不能让她留在此地干活。他们耸耸肩膀说，他们要需要同国营农场商量。

场长正在为缺乏劳动力而犯愁。他当场就同意了地方议会的建议。然后他通知我，很快我就会得到一个已要求很久的温室帮我干活的助手。当天，议会主席把我介绍给了露茜。

我很清楚记得，那是十一月底，几周的明媚阳光以后，秋天已开始显出它的阴晦面。天飘着蒙蒙细雨。她身穿一件褐色外套，手里提着提箱，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神里露出茫然的神情。主席拿着那个蓝罐子站在她旁边，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原谅你曾做过的错事。我们信任你。我们本来可以把你送回俄斯特拉发，但我们却留下了你。工人阶级随处都需要诚实的男人和妇女，不要让我们失望。”

然后他去办公室把羊倌的罐子送给他，我把露茜带到温室，把她和将和她一道工作的姑娘互相介绍了一下，告诉她她需要什么活。

回首过去的日子，露茜使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尽管我仍然能依稀辨认出议会主席的身影。昨天你坐在我对面时，卢德维克，我无意使你不快。既然你又正如我熟悉的那样，像一个幽灵一样坐在我对面的空中，又若见形象，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那位希望为处在不幸中的同志创造一个天堂的从前的长工，那位崇高地谈论原谅、信任和工人阶级的诚实质朴的热心人，比你更接近我的内心和灵魂，即使他并未给我做过什么特殊的事。

你过去常说，社会主义是在欧洲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土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一种非宗教和反宗教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否则社会主义便无从理解。但是你当真能坚持认为，物质至上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信仰上帝的人就不能使工厂国有化吗？

我完全相信，立论于耶稣教诲的思想体系会更加顺其自然地导致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每每我想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那些最富激情的共产党人——譬如，把露茜交给我照料的那个地方议会主席——他们似乎更像饱含了宗教的热情信徒而不是拥护福尔特尔哲学的怀疑主义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革命时代没有任何一点相同于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个时代具有伟大的共同信仰。凡是与这个时代一道前进的人都体验了类似宗教的感情。他放弃自我，自身和私生活而去赞同更高的超个人的东西。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最初是非宗教的，但如今它们已经被赋予了类似于福音和圣训的意义。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神圣的思想体系，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不可侵犯的。

这个时代正在逝去或者已经逝去，它具有某种伟大的宗教运动的精神。它未能把宗教的自我启示进行彻底，真是一大憾事。它具备宗教的态度和感情，可内里却一直是不信神的，空洞的。当时我还相信上帝会宽容的，会让人们了解自己，最终会证实这个伟大的非宗教信仰是正当的。我白白地等候了。

仅仅是由于这个时代未能理解自己而发誓忠于理性主义，并为它的理性主义遗产而付出高昂代价，因而它最后背叛了自己，背叛了它的宗教精神。两千年来基督教一直被理性主义的怀疑论侵蚀着。基督教一直被侵蚀着却并没有被毁灭。但是在几十年里却毁灭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它自己的创造。它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卢德维克。而这点你明白。

只要人们能够逃到具有崇高、同情和诗意的童话故事领域，他们就会拥有它。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哎，他们却很可能常常谨慎、疑惑和怀疑，他们正是这样对待露茜的。当她恢复了一个

真实姑娘外形而离开孩子们的仙境——一个工友，一个同屋——她立刻就成了人们恶意和好奇心的对象，从天堂里逐出的天使和从童话时逐出的仙女才会承受这种恶意。

事实上，她即使少言寡语也无济于事。大约一个月后，农场收到了从依斯特拉发来的她的档案。档案告诉我们，她最初在赫布当学徒美容师。由于人们指控她的道德，她在一个教养院待了一年，从那里她去了俄斯特拉发。在俄斯特拉发，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优秀工人。她在宿舍的行为堪称模范。奇怪的是，在她逃离前不久的时候人们惟一一次指责她，她曾因在墓地偷花而被抓住。

由于档案上记载的情况太少，露茜的神秘不仅没有揭示出来，反而使它更加令人困惑。

我答应场长要把她照顾好。我发现她叫人好奇。她干活井井有条，全神贯注。她腼腆得很镇静自如。她一点也没有因为单独一个人在树林里过了几周而表现出那种姑娘身上的怪癖行为。她一再告诉我，她在农场过得很幸福，她不愿意离开这里。由于她性情温和，而且做事总是愿意让人，因此与她一起工作的姑娘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然而，在她的沉默里总像是有点什么，显示出她一生的悲苦和灵魂受到了伤害。我希望她会告诉我她的秘密，但我也知道她一生中经历的盘查和讯问够多了。这样就会使我采取的任何方法听上去都像是盘问，因此我没有为难她，而是与她谈起了我。我每天都跟她谈话。我将在农场打算栽培草药的计划告诉了她。我告诉她过去乡下人如何用各种草药的熬法和溶液给自己治病。我给她讲起地榆，乡下人用它来治疗霍乱和鼠疫，讲起虎耳草或称破石灵，的确可以化掉肾结石和胆结石。露茜听得聚精会神。她喜欢草药。但她单纯地如一位圣徒！她对草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要她说出一两种草药的名字，她都颇为费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冬天快到了，露茜只有几件漂亮的夏装而没有别的衣服。我帮助她计划她的工资。我劝她买了一件雨衣和一件毛线衫，以后又买了靴子、睡衣、长袜、一件新大衣……

一天，我问她信不信上帝。她的回答使我感到很独特。她既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她做着耸肩的样子说：“我不知道。”我问她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说她知道。但她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与圣诞节有联系。完全是阴差阳错，将几个随便的概念凑到了一起。直到那时，露茜对于信仰和怀疑一无所知。就像一个情人发现在他之前没有任何男人的躯体进入他所爱的人的体内时一样，感到突然的一阵晕头转向。“你想更多了解他吗？”我问，她点点头。那时节，皑皑白雪已覆盖了群山和牧场。我讲着，露茜倾听着……

她细嫩的肩上已担负了太多。她需要有人帮助她，可是没有人帮助。宗教只提供了非常简单的服务。露茜，放弃自己吗。献出自己，将压在你肩上的重担卸下，你会在给予中得到解脱。我知道你从未献给任何人你自己。你一直害怕所有的人，但是有上帝。把你自己献给他吧，你将会放松一些。

撇开你过去的生活就是放弃了自己。把它从你的灵魂里根除。忏悔吧！告诉我，露茜，你从俄斯特拉发逃走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公墓里的那些花？

有一点。

你究竟为什么要拿那些花？

她一直很抑郁，所以她总是在宿舍房间里的花瓶里插些那里的花。她也摘野地里的花，但在俄斯特拉发这个阴郁污秽的地方，留下来的几乎没有什么野生的东西——到处是垃圾堆、栅栏、空地，覆盖着煤灰的灌木丛上东一簇西一簇。美丽的花只能在公墓里找到。崇高的花，庄严的花。唐菖蒲、玫瑰、百合，还有菊花，它们有丰满的花朵和易损坏的花瓣……

他们是怎么捉住你的？

她喜欢去公墓，常去那里。不只是拿花，而且也是是为了那里的美丽和宁静。宁静可以安慰她。每一个坟墓都如同一个私人的小花园，她喜欢停留几分钟在一个个坟墓前，以便仔细观看墓碑上黯淡的碑文。避免被人打扰，她常模仿那些扫墓者，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跪在一个墓碑前。一次她喜欢上一个刚垒起的坟墓。几天前才埋在那里一个棺材。坟上的土是松的，花圈铺在上面，坟前有一个插了束非常美丽的玫瑰花的花瓶。跪在一棵友好的垂柳的苍穹下，露茜不可言喻的狂喜溢满了内心。正当这时来到坟前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和他的夫人。也许这是一个儿子或兄弟的坟墓。谁知道，他们看见跪在墓旁一个陌生姑娘，便吃惊地站在那里。她会是谁呢？她的出现肯定使他们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一个家族秘密，一个未知的亲戚，或是被死者抛弃的情人……他们怕打扰她，便远远地观望着。他们看见她站起身，拿了那束玫瑰花，那是几天前他们放在那里的，然后转身离开。于是他们追上她。你是谁？他们问。她感到一种屈辱，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几个词。最后他们才知道这位姑娘与死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叫来一个工作人员，他们要求看她的身份证。他们冲她大叫大嚷，告诉世上最可恶的就是盗窃死人。那个工作人员进一步证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公墓里的花被窃。他们叫来一位警察，又从头盘问她。她说出了一切。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说。活人应占有坟上的鲜花。露茜，你虽然不知道上帝，可是你却渴望他。你在尘世鲜花的美中窥见了非尘世的启示。你为了你自己，你心灵的寂寞需要那些花，而不是为了别的。

他们抓住你，羞辱你。但只是因此你就逃离了那个阴郁污秽的城市吗？

她片刻的沉默后，然后她摇了摇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受到了伤害。

她点点头。

告诉我这事，露茜。

那个房间很小，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没有灯罩歪歪斜斜的电灯泡。一张床靠着墙，床上方是一幅画，是一个穿蓝色长袍的、跪着的英俊男人。那是客西马尼园但露茜并不知道这点。她与一个男人走入了那个房间，她拼命抗争，大声叫喊。他企图强奸她，扯下她的衣服，可是她挣脱了他，然后跑掉了。

那是谁，露茜？

一个士兵。

你爱他吗？

不，我不爱他。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去那个只有一盏电灯泡和一张床的房间呢？

心灵的寂寞使她靠近了他。这个可怜的姑娘找到的仅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二等兵。

但我们仍搞不明白一件事，露茜，既然你与他一同去了那个房间，那个只有一张床的房间，怎么后来又跑掉了呢？

因为像别的男人一样他下流邪恶。

别的男人，露茜？你指的是谁？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还认识谁在那个士兵之前。告诉我，露茜！讲实话。

他们六个和她一个。年纪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一伙人，她本人是十六岁。他们自称是一个团伙，每当提到它就肃然起敬，仿佛那是一个异教教派。入会式是那天的主要活动。他们带来几瓶廉价酒。她盲目顺从地参加了他们的狂饮。这个场面使她发泄了对父母的单恋。他们喝酒她也喝酒，他们大笑她也大笑。然后他们命令她把衣服脱光。她还从未在他们面前脱过衣服。她

正在犹豫时，他们的头目已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她才意识到这不只是让她一个人干的命令，于是驯顺地脱了衣服。她信任他们，连他们的粗野她也信任。他们是她的保护者。她不能想像没有他们将会怎样。他们就是她的父亲，母亲。他们喝呀，笑呀，又给她下了一道命令。她伸直腿。她很害怕，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她还是照办了。接着她尖叫起来，从她身上涌出了血。男孩们大声狂叫，举起他们的酒杯向头目的背上倒上发泡的劣等酒，倒遍她的全身，倒在他俩的大腿之间，模糊地叫着洗礼式和入会式的用语，然后头目从她身上站起来，下一个团伙成员上前代替了他，就这样按照年龄顺序轮下去，这样一直到了最小的同她同岁的那一个，他和露茜一样只有十六岁，露茜再也受不了啦，她不堪忍受这疼痛，她只想休息，只想单独待一会儿，由于他最小，所以她才敢把他推开。但是，正由于他最小，他绝不愿受到羞辱。他毕竟是团伙的一个成员，一个羽毛丰裕成员！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狠狠地掴她耳光，没有任何一个团伙中的人支持她。在他们看来，他完全是合理的，他只是在要求得到他应得的东西。泪水从她脸上流下来，但是她再也没有勇气进行反抗，只好第六次伸开她的腿……

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件事，露茜？

在团伙中一个男孩的家里，他的父母上夜班去。他家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房间，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一张长沙发和一张床，一幅装框的刺绣挂在门上，绣着“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快乐的家”。床上方是一个身着蓝色睡衣，怀抱一个小孩的漂亮女人的画片。

是圣母玛利亚？

她对此一无所知。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哦，然后便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了这件事，或者是在同一个房间，或者是在别的男孩的家，有时也在野外。他们似乎已形成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种习惯。

你喜欢这样，露茜？

不，她不喜欢。从那次起，他们对她变得更坏，甚至更粗野，可是她对此毫无办法，无路可逃。

怎样结束这件事的，露茜？

一天夜里，警察闯进一间空荡荡的寓所，一个不落地把他们带走了。这个团伙偷窃了一些东西。虽然露茜对此一无所知，但人人都知道她与那个团伙混在一起，人人也都知道那伙人得到了她这个姑娘给他们的一切。她是全赫布的耻辱，在家里他们把她打得浑身鳞伤。那几个男孩被判了不同的刑，而她则被送往一个教养院。一年的时间里她待在那儿——直到她满十七岁。她不管如何都不想再回家了。所以她最后去了那个阴郁污秽的城市。

前天，当在电话里卢德维克告诉我他认识露茜时，我很吃了一惊。好在，他认识露茜的时间不太长。他显然交往过露茜同宿舍的一个姑娘，但仅仅泛泛之交而已。昨天他再次向我打听她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早就觉得需要把这重负卸下，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我可以把此事托付的人。卢德维克对我怀有某种感情，同时又离我的生活很远，更不用说露茜的生活。因此我不必担心有人知道露茜的秘密。

不，除了卢德维克，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过关于露茜向我吐露的秘密。当然，虽然农场的人从她的档案里得知她曾经去过教养院，还偷了公墓里的花。他们待她很好，可是她却由于他们而不断想起过去。场长称她是“坟墓小盗贼”，尽管他是在开玩笑，可这却继续延续了她过去的罪孽。露茜不断地自觉有罪。她最需要的是完全被赦免。是的，卢德维克，她需要赦免，她需要经受对你来说是那样陌生、那样不可理解的那种神秘的涤罪仪式。

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怎样提出赦罪，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



旦产生罪孽，他们就缺少消灭罪孽的力量。他们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把罪孽的正当性除去，驱逐它，把它从时光中抹去，换句话说，需要一个神秘的超自然的行为把事情化了。只有上帝——因为人间法律不能约束他，因为他是自由的，因为他能创造奇迹——可以洗清罪孽，把它神化了，赦免罪人，人要赦免他的同类只能以神的赦免为基础。

赦罪你不可能同意，卢德维克。你不可能宽恕，因为你不相信。那次所有人举手反对你，一致毁掉你的生活的全体会议笼罩束缚着你。那些人你从未原谅过。你不仅把他们作为个人，而且还似乎把他们当作为人类的缩影。你从未原谅人类。打那时起，你就一直对它不信任，鄙视它。哦，我能理解为什么。可是有一事实却不可改变：你对同类的普遍蔑视是可怕的，有罪的。你已把它当作你的诅咒。因为生活在不能宽恕任何人，不能进行任何赎罪的世界里，就是生活在地狱里。你就生活在地狱里，卢德维克，我同情、怜悯你。

人世间一切属于上帝的也可以属于魔鬼，甚至做爱时人们的激情。对露茜来说，那些激情向她显现出了一个败坏和罪恶的领域。她把它们与那帮青少年和那个一再要求的士兵的兽性的面孔联系在一起。那位士兵我看得如此清晰，以至于我觉得我认识他。他把最陈腐、最使人发腻的情话与一个因兵营栅栏而远离了女人的男人的野蛮行为混在一起。露茜突然发现那些温柔的话不过是一个野蛮兽性的躯体的虚假的掩盖物。在她眼里爱情的整个世界崩塌了，掉进了一个令人恶心的憎恨的陷阱。

这里就是败坏的根源。我不得不从这里开始。一个沿着海岸行走，伸出手臂狂舞提灯的人很可能是一个怪人。可是在夜里，船因海浪而进入歧途时，这个人却是一个救星。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是一个位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真空地带。行为本身无所谓。只有当它处在事物的特定位置中才有所谓的好坏。露茜，甚至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本身也不存在好坏。假若你的爱与上帝创造的秩序和谐一致，假若它是真正的爱，那么你的性爱就是好的。你会感到幸福，因为上帝规定：“一个男人要离开他的父母，要依恋他的妻子。他们两人要融为一体。”

我每天都讲些东西给露茜。我一天天使她恢复信心，她已得到了宽恕，没有理由再折磨自己，松开她心灵的束缚，已到了服从上帝安排的秩序的时候了，在上帝安排的秩序里，所有的一切，包括性爱，都会各就各位。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接着，初春那些日子来到了。苹果树在山坡上开始开花，那些树冠在微风中摇晃看上去就像是微风中铃铛在摇晃。我闭上眼睛，倾听它们柔和的音调。我睁开眼时，看见露茜穿着她那件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锄头。她正在俯瞰山谷，露着微笑。

我观察她的微笑，迫不及待地研究它。这可能吗？直到那时为止，她的灵魂一直都在不停地逃避过去和未来。她一直害怕所有的东西。过去和未来都是危险的漩涡。她拼命抓住现在，而现在不过是一个有漏洞的救生艇，顶多是一个不安全的避难所。

可是她突然微笑了。没有一眼便知的理由，犹如晴天霹雳。她的微笑告诉我，她已开始充满信心地望着未来。我觉得自己就像突然看到陆地而在海上已漂流了数月的海员。我感到幸福。靠在一棵歪扭的苹果树桩上，我再次把眼睛闭上片刻。我听见白色树冠上的微风和柔和的铃声，我听见鸟儿的鸣叫，在我闭上眼睛前，我看见鸟儿的歌声变成无数盏提灯，看不见的手把它们带向一个隆重的典礼。尽管我看不见那些手但我能听见嫩声嫩气声音，我知道他们是孩子，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蓦然我觉得我的脸颊上一只手在抚摸着。接着一个声音说：“你真好，科斯特卡先生……”我没有睁开眼睛。我没有移动那只手，我仍然看着无数盏灯，我仍然听见苹果树的铃声。接着我听见一个更微弱的

声音加上一句：“我爱你。”

也许我应该停止这件事情，应该离开，既然我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还来不及控制自己，就让一阵令人晕头转向的虚弱控制了我。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片开阔乡间叫人可怜的小苹果树丛中，我把露茜搂在怀中，我们一起在大自然的树荫里倒下。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我看见了她的微笑中她重新恢复了平静的灵魂时，我知道我已达到了目的。我本来应该离开，可是我没有，这样只能有坏的结局。我们继续在同一农场生活。露茜喜气洋洋，容光焕发。她就像我们周围逐渐转入夏日的春天一样。然而我却一点也快活不起来。我害怕我身边这个庄严和柔和的春天。既然我已唤醒了它，它就把它所有的花朵朝向我开放。但我本不应占有这些花朵，我在布拉格有妻子和儿子，我每次难得的回家探望他们都在耐心等待。

我不希望中断与露茜的关系，只怕会伤害她，可是我又不敢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种权利。尽管我渴望她，可我还是对她的爱恐惧，不知道对此该怎么办。我尽了最大努力才保持住我们从前谈话的那种自然的语调。我的疑虑已经楔入我俩之间。我感到我已经露出了对露茜精神上帮助的原形。从一见到她我就渴望她的肉体。我是一个穿着牧师长袍的诱奸者。我所有关于耶稣和上帝的谈论都只是掩盖了最世俗的欲望。我觉得在我被性欲屈服的那一瞬间，我就亵渎了最初意图的纯洁，上帝剥夺了我的一切功绩。

然而，当这个结论得出时，我就做了一个极厌恶的表情。多么虚荣！多么傲慢！希望受到尊敬！想使上帝满意！人对上帝的功绩是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露茜爱我，我的爱支持了她的健康！如果我因为拯救自己的纯洁而使她重新陷入绝望。上帝难道不会更加蔑视我？即使我的爱是有罪的又有什么关系？哪一个最重要，露茜的生命还是我的纯洁？这将是我的罪孽，不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吗？我将为承受它而陷入痛苦。

接下来有一天，介入进来了外部世界，打断了我的反省。主管当局决定强行诬告场长的政治问题。当事情变得很明显，场长将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时，他们企图声称他所用的都是可疑分子，以此来加强他们的指控。其中有一个想必就是我；据说被开除出大学是因为对国家有敌对观念，除此之外还是一名牧师。场长极力证明我不是牧师，也不是被大学开除的，但是他的抗议愈发显出我和他的友谊，愈害了他自己。我的处境危在旦夕。

非正义吗，卢德维克？是的，你会用这个词来表达你对这类的事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非正义。假若人类的事没有任何人来监督，假若只是那些行为者赋予了行为的意义，那么“非正义”这个概念就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就可以援引在我忠心耿耿工作的那个国营农场多少被丢弃的这个非正义。如果为争取我微不足道的人权我站出来反对一切非正义，并因而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斗争，这甚至也可能是符合逻辑的。

可是，那些盲目的发起事件的人所见赋予它的意义往往完全不同于事件的意义，事情常常如此。它们往往是来自上天的虚假的旨意，而那些事件的发起者不过充当一个更高意志的不知情的使者，他们甚至连更高意志的存在也没料到。

我相信情况在这儿也是如此。所以农场正在发生的事态我接受了。我甚至感觉得到了解脱。在这些事态中我看到了条指令很清楚：趁还来得及之前离开露茜。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你不应占有你努力的成果，你的去路在别处。

结果，我采取了与两年前在自然科学部同样行动。我告别了眼泪汪汪、郁郁不乐的露茜，迎向即将来临的灾难。我是自动提出离开农场的。场长确实表示了一下反对，但是我看得出他只是因为面子才这样做，而在内心却由于我走而很高兴。

所不同的是，这次我的自愿离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的

路途没有用二月革命前的党员朋友们的忠告和恭维的介绍的点缀。我离开农场时人们都抱着这种看法，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适合他。于是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一九五六年一个秋日，在布拉格至布拉迪斯拉发快车的餐厅里，我五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卢德维克。我正在去往东摩拉维亚的一个工厂建筑工地的路上。卢德维克刚结束了他的俄斯特拉发矿井的合同工作，去布拉格申请恢复他的学业。现在他正准备回故乡摩拉维亚。我们差点没有互相认出来。当我们互相认出后，我们都很惊讶于我们对方生活道路如此的结局。

我还记得，卢德维克，你听到我如何离开大学，以及那个国营农场发生的使我成为一名砌砖工人的阴谋诡计时，你眼中流露出同情。我感谢你的同情。你万分地气愤。你谈到非正义，谈到为非作歹，谈到缺乏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你也斥责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你为什么没有斗争就屈服了？我们绝不当自愿离开任何地方，你说。让我们的对头自己去干苦活！替他们减轻良心负担意义何在？

你是矿工，我是砌砖工人。如此相似的生活经历，可我们俩却又如此不同。我宽恕，你不饶恕；我谦卑，你骄傲。外在何其相似，内在相距又何其远！

我比你更深地了解在你我之间内在的分裂。当你详细给我讲述你为何开除出党时，你想当然地认为我会支持你，同样表现出对同志们偏执行为的愤慨，他们惩罚你仅仅因为你拿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开玩笑。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如此不安？你非常诚恳地问。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在日内瓦，用加尔文的话就是法律的时期，有一个男孩与你类似，一个总是喜欢开玩笑的聪明的男孩。一天，他们发现对耶稣基督和福音嘲笑讽刺的话写满了他的笔记本。他们究竟为何如此不安？那位与你相似的男孩肯定也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他没做错什么事。那只是一个玩笑。他心中一点没有仇恨。不尊重，无感情，是的，但没有仇恨。可他们还是处死了他。

我绝对不是赞成他们的残忍，请相信我。我只是想说，绝不可以嘲笑或轻视决意要改变世界的伟大运动，他不容忍这样做。嘲笑是一种锈，它腐蚀所有它接触的东西。

例如你自己，卢德维克。他们把你从党开除出去，开除出大学，让你在政治犯中间服兵役，然后让你干了两三年的矿工。而你呢？你气愤得火冒三丈，深信你遭受了天大的非正义。至今你所走的每一步都受这种非正义的摆布。我不明白你！你怎么能讲非正义呢？你被他们送到处罚共产主义敌人的惩戒营。这事理所当然。但这就是非正义吗？它不是更像一个绝对机会吗？想一想你的事业本来可以在敌人中间完成！难道还有使命比这更伟大吗？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不也是“像送羊进狼群一样”吗，“健康的人无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就像耶稣所说，“我来不是要叫义人不悔改，而是要叫罪人悔改……”而到罪人和病人中间去你却不愿意！

你会同我论争，我的比喻是站不住脚的，耶稣是带着他的祝福把他的门徒送到“狼群中”的，而你却先是被逐出教会，打入地狱，然后又被作为一个敌人送到敌人中，像送到狼群中一只狼，像送到罪人中一个罪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罪人？你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同类眼中你认为你一点也没有罪？你凭什么这样骄傲？一个献身于他的信仰的人是谦卑的，必须对最不公平的惩罚谦卑地忍受。将提升蒙受耻辱者。将洗清忏悔的罪孽。那些被冤屈的人因此而得到考验他们忠诚的机会。假若你怀恨你的同类的惟一原因是他们放在你肩上的重担太沉重，那么你的信仰就不坚定，你经不住考验。

我不能同意你抱怨党的一切，卢德维克，因为我知道只有一

群谦卑地献身于一个崇高的事业，无限忠的人才能完成世上伟大的行为。你的忠诚，卢德维克，离无限相距太远。你只有脆弱的信仰。否则，你怎么会拒绝除了你自己和你可怜的理由外的一切其他衡量标准呢？

我绝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卢德维克。我知道你为我，为许多现行政权这样或那样伤害了的人所做的事。我知道你凭借你与一些高层人士在二月革命前的关系和你现在的地位来调停，说情，干预。为此我更加喜欢你。但是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窥视你的灵魂深处！爱不是爱，却是仇恨是你那些善行的最深刻动机。恨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些在礼堂里举手反对过你的人！由于你的灵魂不为上帝所知，它也就不知道宽恕。你渴望报应。你认为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就是那些现在伤害别人的人，于是你展开你的复仇。是的，复仇！我感觉到你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含有这一点。可是，除了更大的仇恨，一连串的仇恨之外，仇恨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在地狱里生活，卢德维克，我再说一遍，在地狱里，而我可怜你。

要是我的独白被卢德维克听到，他很可能称我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明白他曾在很大程度上帮过我。一九五六年的那一次，当我们在火车上相遇时，他十分忧虑我当时过的生活，立刻开始想法替我找工作使我满意和喜欢的工作。我对他的速度和效率很吃惊。我不失时机地拜访了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希望那位朋友能够帮助我在本地中学找一份教自然科学的工作。他胆子真大，当时反宗教宣传还在猛烈进行，根本不可能让一名基督教徒作中学教师。卢德维克的朋友也是这样想，不过他还是提出另一种建议：当地医院的病毒学科。这八年来我一直工作在那里，在老鼠和兔子身上培养病毒和细菌。

事情就是这样。正是因为卢德维克，我才可能在这里生活。露茜和我才会生活在这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离开农场几年以后，她结了婚。她继续留在农场已不可能，因为她的丈夫想到城里工作，尽管他们不太清楚要定居在哪里。最后她把他说服搬到这里，搬到我生活的这个城镇。

我从未收到过比这更贵重的礼物，更大的酬劳。我的小羊羔，我的小鸽子。我曾用心灵疗治和培育过的孩子回到了我身边。她过去对我一无所求，现在依旧对我一无所求。她有一个丈夫，但她还是想和我接近。她需要我。她需要不时听到我的声音。在星期天礼拜式上看见我。在街上碰到我。我很高兴她能迁到这里来。这使我意识到我已经老了，我比我想像的要老，也许露茜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成就。

这不太少了点吗，卢德维克？一点也不少。它对我来说满足了。我很幸福，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哎，我是多么自我欺骗啊！我是多么费尽心机使自己相信我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我在不信教的人面前是多么炫耀我的信仰！

是的，我的确使露茜皈依了教会。我使她安宁平和下来，治愈了她的创伤。我消除了她厌恶性欲的情绪。然后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是的，可我为她做了什么善事呢？

对她而言婚姻并不幸福。她的丈夫是一个野兽。他公开对她不忠，据说还经常打她。露茜从未为此对我提起一个字。她知道我会为此而难过。她说她的生活非常幸福。但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城镇，在这里任何秘密都不能保守很久。

哎，我是多么自欺欺人！我把指向国营农场场长的政治阴谋解释成上帝的旨意。然而我怎么确认在所有声音中辨认出了上帝的声音呢？假若我仅仅是我自己怯懦的声音我听到了又该怎么办呢？

在布拉格我有妻子和儿子，不是吗？的确，对于她们我并不是太爱，但我也不可能与他们分手。我担心陷进一个我不能自拔的处境。我害怕露茜的爱，不知道如何面对它。我害怕卷入纠纷。



我把自己当成拯救灵魂的天使，而实际上我不过是她的另一个引诱者而已。我爱过她一次，就只有一次，然而就掉头离开了。我表现得像是我在赐予她宽恕，而实际上我才应该被她宽恕。我离开时她绝望地哭泣，几年后她来了，居住在了我的城镇。她跟我讲话，像求救一个朋友一样求教我。她已经原谅了我。我很清楚一件事：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经常发生这种事，即这位姑娘爱我。我掌握了她的生活。我可以给她幸福。然而我却离开了。没有人像我这样伤害过她。

莫非我试图把充作神的呼吁的东西实际上仅仅当作一个借口，想逃避我做人的职责吗？我害怕女人。害怕她们的脉脉温情，害怕她们的不断出现。当时我害怕与露茜一道生活，就像现在我一想到要不断地走进邻近城镇那个教师两间一套的房子就感到害怕一样。

十五年前我自愿从大学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爱我的妻子。她比我大六岁。我不能再忍受她的声音，她的面孔，以及家里那个单调的、摆来摆去，滴答滴答的钟。我无法跟她生活在一起，可是我也不能因离婚而使她遭到打击，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来没有做过对我有伤害的事。接着我突然听到了上天呼吁我的拯救声。我听见耶稣在呼召我抛弃我的渔网。

告诉我，上帝，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如此可笑而又可怜吗？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让我恢复信心！对我讲话，上帝！再大声点！我似乎在这片嘈杂声中听不见你的声音！

## 第七章 卢德维克罗斯拉夫海伦娜

那天晚上我从科斯特卡的住处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我决定天一亮就动身回布拉格：既然我已经结束了那霉气的使命，我再呆在家乡也没什么必要了。倒霉的是，我的思想一片混乱，直到半夜还在床上（吱嘎作响的床）辗转反侧，没有睡着；睡着后直到天亮才真正沉沉入睡。结果我九点钟才起床，此时早班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已经开走了。当我意识到我不得不等到去布拉格的一下班车而那时已是下午两点时，我懊恼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人遇到了船只失事。突然间我非常向往布拉格，向往我的工作，我房间的书桌和我的书可是我也只好心里恨恨地，下楼到餐厅吃早饭。

为了避免碰见海伦娜，我小心谨慎地走进去。她不在那里（就是说她已经出去到附近村子里瞎逛去了，肩上挎着一个录音机，用话筒和愚蠢的问题纠缠过路人），但餐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人声鼎沸，烟雾腾腾，人们在坐着喝啤酒、浓咖啡和法国白兰地。令我懊恼的是，我又一次发现我的家乡竟连一顿像样的早餐都不愿提供给我。

我走到街上，蔚蓝的天空，飘柔的云絮，逐渐增加温度，灰土扬起的灰尘，伸向宽敞平坦的广场的大街，塔尖（对，正是那个看上去像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的塔尖）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无聊的忧郁。远处，一支摩拉维亚挽歌醉醺醺的低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对怀乡病、大平原、古代枪骑兵的诅咒），突然，我好像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露茜，露茜和那些古代事件，多么像那首节奏拖得很长的歌，直接对着我的心讲话，无数女人跨过这颗心（像一个大平原）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像是灰尘宽阔平坦的广场上场起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落在鹅卵石之间，然后扬起，

又随着一阵大风吹走了。

我跨过那些满是灰尘的鹅卵石，我的生活充满了空虚。露茜，虚幻不实的女神，先是让我失去了她，然后昨天又使我精心策划的复仇变得毫无意义，现在甚至把我对她的回忆也变成一件十分可笑的事。变成一个荒唐的幻觉。科斯特卡讲的故事表示的很清楚，所有这些年来一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萦绕在我的头脑里，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露茜是谁。

我把露茜一直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传说和一个神话，从中得到安慰。但现在我意识到隐藏了一个毫无诗意的现实于诗意的幻想背后，我并不了解她，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面目，她的内在和外在。我所能见到的（在我年轻人的自我中心中）仅仅是直接与我有关的她的那些方面（我的孤独，我的监禁，我对温柔和爱的渴望）。她只不过对我来说与我的处境密切相关。她本身的一切一旦超出那个具体处境，我便一点也看不见了。由于她只是与一个处境密切相关，难怪当那个处境变了（当另一个处境出现，自然是自己老了，变了），随之消失的就是我的露茜。她的没有被我看见的留下了，与我无关，超出我范围的一切。因而，也难怪十五年后她没有被我认出来。在我眼里（只有与我有关的范围里，我才会留心注意她。），她早已是一个不同的人，一个陌生人。

十五年来我失败的预示一直在跟踪我。现在它终于赶上了我。对她来说那个古怪的科斯特卡（我完全不把他当回事）更重要，做了很多事给她，对她更了解，爱她爱得更好（我说更好，而不是更爱她，因为他的爱情的力量绝不会大于我）。她的一切都已告诉了他，而我却不是这样。他使她幸福，我却使她不幸。他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我却失去了机会。为了占有那个肉体我如此渴望，我需要做的只是理解她，逐渐认识她，爱她，不仅为了她对我所具有意义，而且也为了她与我无直接关系的一切，她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且只是她所拥有的一切。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她和我都受到了伤害。心头掠过一阵愤怒。我生自己的气，生我那时的年龄的气，那个荒谬、诗意的年龄，在那个年龄，对自己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因此不能破解开他自身以外的谜。在那个年龄，其他人（无论他多么爱他们）不过是活的镜子，他在其中惊奇地看见自己感觉，自己情绪，自己价值的影像。是的，十五年来露茜就一直被我看成是保存了我那个岁月的影像的一面镜子！

我回忆起那个房间的暗淡，那张床孤单单，那盏街灯透过脏玻璃照进来。我回忆起露茜反抗的疯狂。真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我以为她是个处女，而她因为不是个处女而拼命搏斗，害怕突然暴露真相。但是还有另一个解释（与科斯特卡对她的看法一致）：她最初的那样残酷的性经验，他们使她完全厌恶了性行为，使性爱丧失了其他人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使它完全变得丧失感情和爱情。半是孩子，半是妓女，她认为肉体是丑陋的而爱情是精神的。灵魂与肉体在战斗中无声地、顽强的进行着交战。

这个解释（似乎既像通俗剧，又如此有理想）使我想起许多令人可叹的肉体和灵魂之间的不和（我很熟悉这种不和，以及它的许多形式）。我想起（因为可悲总是与可笑处在不断的角逐中）一个故事曾使我捧腹大笑。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非常风骚的女人（她这一点曾被充分利用过），与一位物理学家订了婚，决心要使她成为他的第一个恋人。可是为了确切相信这是真正的爱情（不同于她经历过的无数风流的韵事），在婚礼晚上之前，她拒绝他的一切肉体亲昵。夜间在公园里散步，她顶多不过紧握住他的手，在街灯下吻他，由此不使肉体阻碍她的灵魂，能够直上云霄，享受它在那里感到的眩晕。但他们结婚后仅一周她就提出离婚，强烈地埋怨他毁掉了她一生的爱情，原来他完全是一个无能力的、阳痿的恋人。

摩拉维亚歌曲低沉的声音此刻在远处与这个故事的怪诞回味，混着广场的灰尘和冷清、我的沮丧情绪（肚子里咕咕作响的饥饿加剧了我的沮丧）。我正好在一个饮食店附近停下，可是当我想把门推开时，门一动也不动。“今天他们都在过节。”一个走路人告诉我，“国王们的骑马”？“对。有一个看台在那边。”

我咒骂了一声，但是也无可奈何。我走向歌声的方向，饥饿的痛苦指引我走向我一直希望躲闪的那个民间节日。

筋疲力尽，一大早就开始筋疲力尽。仿佛我在外面狂欢宴饮了一整夜。可我睡了一整夜，如果辗转反侧也称得上睡觉的话。吃早饭时我拼命控制住打呵欠。不一会儿，人们开始陆续到来，弗拉吉米尔的朋友们和一些喧闹旁观者。然后一个合作社的小伙子牵来马给了弗拉吉米尔。在人群中卡拉塞克竟然出现了，区议会的文化顾问。这两年来我们一直不和。他身穿一件黑色西服，显得很严肃。同他一道来的还有一位女人，举止优美，布拉格的一位电台记者。我将做他们的向导，他说。那个女人想录下有关骑马活动的采访。

不，谢谢你！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我不想扮演蠢货。那个记者继续说，她多么激动能见到我，当然卡拉塞克也插进来，我的政治责任便要与他们一道去。这个蠢货，我几乎想任性胡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儿子是今天的国王，我想在现场看他做准备。但这时乌娜斯诺在我背后给了我一下。她的任务才是为儿子做准备，她说。我干嘛不走开，去帮他们录音。

最后因此我只好照着办了。那个电台的女人将大本营设在了区议会的一个房间里。除了录音机，一个为她跑腿的年轻小伙子也跟着来了，她只有笑时才停止说话。最后她把话筒放到嘴唇边，问了卡拉塞克第一个问题。

卡拉塞克轻轻咳了一声，然后讲起来。支持民间艺术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一点区议会充分认识到了。这就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得到大力支持的原因。他希望大家成功，皆大欢喜。他对所有参加的人表示感谢，热情的组织者和热情的学生们，他衷心感谢他们。

筋疲力尽。筋疲力尽。老是那一套话。那些十五年来老一套的话，今天从卡拉塞克的嘴里说出来，而这个人根本无关于民间艺术。他只是用民间艺术这玩意儿来骗人的。他借此正好表现一下他是多么积极，紧跟指导路线，自吹自擂。他对没有为“国王的骑马”尽过任何力，还把我们的预算消减到最低程度，然而他却得到了荣誉。本地文化的老爷，一个从前的送货少年甚至连小提琴和吉他都分不清的人。

那个记者把话筒放回嘴边。我满意今年的“国王的骑马”吗？我真想当面嘲笑她。骑马连开始都没有呢！可是她反而嘲笑起我来。我对民俗有那么多了解，她说。这次活动的结果我早已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事先就知道一切。他们完全可以预知未来。未来已经发生了，现在只是在为他们重新展示一番。

我有点想对她讲一下我的真实想法。这次骑马将不如往年好。民间艺术一年年失去支持者，当局也渐渐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它已经名存实亡，这一事实也不会被电台里不断播出的民间音乐所改变。所有那些民间管弦乐器和民歌歌舞团演唱的说成是民间音乐还不如说是歌剧、小歌剧或流行曲调。民间乐器有指挥，总谱和乐谱架！交响乐式的管弦乐曲！实在是亵渎！你如此喜爱的音乐，我亲爱的女士，只是外表上有一层民间曲调的古老浪漫主义而已。民间艺术已经死亡，是的，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

这就是我想对着话筒吼出的话，可最后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国王们的骑马”辉煌壮观。民间艺术的力量。多彩多姿。我很喜欢。我对所有参加的人表示感谢，热情的组织者和热情的学生们，我衷心感谢他们。

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说了他们要我说的话。我难道是如此胆怯吗？训练得那样听话吗？那样筋疲力尽吗？

这件事终于了结了，我很高兴，于是匆匆退出。我急着想回家去，许多人在院子里，有的只是在闲荡，有的正在给马装饰蝴蝶结和飘带。我想看看弗拉吉米尔怎样在做准备。我走进去，但是在里面他们给他穿衣服的那个起居室的门门上了。我敲门，喊叫。这里不关你的事，乌娜斯塔在里面回答。正在给国王穿衣。让我进去，该死的！我说。凭什么你不许我进去？这有悖于传统，她在里面答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传统，不让父亲看国王穿衣，但是我不想反驳她。在她的声音中有一种兴趣，我察觉了出来，这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对我的世界感兴趣我很高兴，我那个世界已成为可怜的孤儿。

于是我回到院子，与正在给马装饰的人闲谈。这是一匹大驮马，耐心而又稳静。

接着从门外大街上传来了嘈杂的声音，紧接着是一些喊叫声和咚咚的鼓声。我的时刻到了，我万分激动。我打开门走进去。“国王们的骑马”被引导到房子前面，饰带和飘带装饰着马匹。年轻的骑手们穿着鲜艳的民间服装，就像二十年前一样。二十年前他们来这里接我。他们向我父亲请求要求把他的儿子给他们做国王。

两个侍从坐在大门旁边，化装成女人，但手中拿着马刀。他们在等待弗拉吉米尔，一整天他们都将伴随他，保卫他。一个年轻人骑着马从乐队中出来，正好停在我面前，他朗诵道：

汝等听着，汝等听着，大家全都听着！

慈善的父亲，我们特来向你问候致意。

请求你同意把你的儿子献出来做我们的国王！

接着他许诺他们将好好看护国王。他们将引导他安全地穿过敌人的军队。他们决不会让敌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他。他们渴望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战斗。汝等听着，汝等听着！

我往后看。在我们房子的阴影中，一匹装饰得非常漂亮的马上跨坐着一个人影。他穿着一件折袖的女人服装，色彩鲜艳的飘带遮住了他的脸。那是国王。弗拉吉米尔。蓦然间我忘掉了疲倦和沮丧，感到非常惬意。老国王正在送给人世间年轻国主。我走到他跟前，踮起脚极力要靠近他掩藏着的脸，悄声说：“祝你好运，弗拉吉米尔！”他没做出反应，没有动一下。他不可以的，乌娜斯塔带着微笑对我说。一直到晚上他才许说一句话。

我用了不到一刻钟就到达了村子（在我年轻时，还有一块田野隔在村子与城镇之间，可现在它们几乎已经连在一起了）。刚才我在城里听到了歌声（歌声在那里听上去是那样遥远，那样悲哀），此刻从挂在房子和电线杆上的喇叭里的高声播出来（我永远都是个傻瓜，听到那个想象中沉醉迷恋的怀旧声音，我的眼睛竟然情不自禁地朦胧模糊起来，它其实不过是个复制品，恭维区议会技术力量和一对沙沙作响的 78 转/分的录音带！）。就在离村中心不远处，为这个宏大壮观竖起了一个凯旋门，用红色花体字母装饰成的一个巨大的欢迎字样放在凯旋门顶端。人群密集，大多数人穿着平常的衣服，他们的民间服装只有几个怪老头穿着长统靴、白色亚麻布裤子、绣花衬衫。在这里街道扩展成一块村子草地：一大片草坪处于道路和最近的那排屋舍之间。几个摊子点缀在草坪的树木间（也是为了这个盛大场面），卖啤酒、果汁水、花生、巧克力、姜饼、芥末香肠、奶油饼干。那家饮食店也有一个小摊，正在供应牛奶、干酪、黄油、酸奶和奶酪。没有一个小摊出售烈酒，但我感觉几乎所有人都像醉了似的。在小摊周围人们不断拥来拥去，互相挡路，呆呆地看着；还有人不时突然唱起来，但总是唱个开头就没有了（并且还挥舞着手臂好像唱醉酒似的）：人群的喧闹声和喇叭播出的无敌的民族歌声立刻就淹没了一首歌曲的两三节，地上扔满了（尽管时间还早，骑马尚未开



始)硬板纸做的纸酒杯和硬板纸做的、沾满芥末的盘子。

由于不卖酒供应牛奶和酸奶的摊子，生意很差；我很轻松就买到了一杯牛奶和一个卷饼，然后走到人群稀少的地方，去静静地吃我的早餐。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骚动从草地另一端传来：“国王们的骑马”来了。

插着小公鸡羽毛的小黑帽在草地上到处都是，袖子全部卷起来的白衬衫，红毛线缀缝的蓝背心，马具上飘动的彩色纸饰带；不一会儿。新的声音又杂合人喇叭里的音乐；马嘶声和骑手们的歌声：

汝等听着，汝等听着，大家全都听着  
从溪谷到山岭，从近处到远方，  
听一听今年降灵节发生的事！  
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  
那天从他的荒地上盗贼  
抢走了足足一千头牲畜……

眼前是一片乌烟瘴气。一切都不协调，喇叭里的民歌与马背上的民歌，色彩艳丽的服装和马匹与观众们做工很差、难看的褐色和灰色的衣服，不自然地做出动作的身着骑服的骑手们，与不自然地过分管事的组织者们——他们在马匹和人群中戴着红臂章跑来跑去，企图把混乱控制住，可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是因为不守秩序的观众（很幸运，他们人数并不太多）。而是因为道路没有禁止车辆通行。虽然组织者在队伍两头打信号叫车辆慢下来，但小汽车，卡车和轰轰的摩托车仍旧在骑马行列中曲折穿行，惊吓马匹和骑手。

老实说，我并不是因为现在耳闻目睹的情景而想避开这种（或那种）民俗活动：我已料想到这样的乏味，我也料想到真正的民间艺术与媚俗的这种褻渎的结合，我也料想到愚蠢的演说者虚夸的讲演，对这一切我是有准备的。是的，对大话和虚伪我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最坏的准备的，但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切是如此拙劣低级，几乎令人悲哀和感伤。它遍及一切无处不在：可怜巴巴的小摊，稀少而不守秩序、漫不经心的人群，日常交通与早已过时的仪式之间的战斗、逡巡不前的马匹，老是机械地、固执地吼着那两首民歌的沙哑的喇叭，完全压倒了（与摩托车的轰叫混在一起）年轻骑手们的声音，这些骑手尖叫着他们的诗句，脖子上青筋暴露。

我扔掉杯子。现在骑马活动已经为草地上的观念表演结束了。开始了长达几小时的穿过村子的游行。我对这一切太熟悉了。战争的最后一年，我自己就当过一个小侍从骑在马上（穿着女人的礼服，佩带着马刀），在国王雅罗斯拉夫身旁行进。我并不想在感伤的回忆中，可是（也许是被骑马活动的低劣所震惊），我觉得用不着对它的做作转过背去。我慢慢跟在队伍后面，队伍现在已经散开，道路被覆盖了。队伍中央的三名骑手：国王，身旁的两个小侍从穿着女人服装，拿着马刀。王室护卫队或大臣们在他们周围。队伍中其余的人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骑马行进在街道两侧。这些骑手的角色也有明确限定。有掌旗手（他们炫示着旗帜，在鞋子里插着旗杆，以至于绣花旗帜在马的两侧呼啦啦飘扬），有信使（在每家房前吟诵写成诗歌形式的讯息。有人从贫穷而正直的国王的空保险箱里抢走了三千块银子。从他的荒地里抢走了一千头牲畜，最后还有募捐人（他们的任务只是为争取捐献而叫喊：“为了国王，我的善良的女人，为了国王！”并把竹篮伸出去接受捐献）。

谢谢你，卢德维克，我才认识你八天而已，可我从未像爱你那样爱过别人。我爱你，信任你，我用不着考虑，我就是信任你，因为就算是我和我的感情或灵魂被我的头脑欺骗了，但肉体不可能骗我，肉体比灵魂更诚实。我的肉体知道，像昨天那样的情景，情欲、爱慕、残忍、愉快、疼痛我从未经历过，像这样的情景我的肉体从未梦想过，我们的肉体昨天发了誓，现在我们的

头脑只得遵守，我认识你只有八天，卢德维克，我感谢你。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明媚灿烂，我容光焕发。今天早晨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去了国王和他双亲居住的房子，录下了召集仪式，可他来了。他吓我一大跳，我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从布拉迪斯拉发到了这里，我没料到他是那样残忍，想想吧，卢德维克，他还带来了她，这个无赖！

我真傻，一直到最后还认为我们的婚姻没有完全破裂，认为它还可以挽救，我真傻，竟然差点为了那个腐朽的婚姻而牺牲你，差点把我们在这里的约会取消掉！我真傻，他的甜言蜜语差点骗了我！他告诉我，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去时将中途在这里下车找我，他要和我谈很多话，就我们两个，可现在他却带来了那个孩子，那个还正在吃奶的孩子，那个二十二岁，比我小十三岁的小姑娘，因早生出来而输掉那就太丢脸了。我感到无望，真想大喊大嚷。可是我不能嚷，我得微笑，同她握手时很有礼貌。啊，我是多么感谢你，卢德维克，你给了我力量。

当我们在一起单独呆着时，他说现在我们找到了把事情谈明了的机会。就我们三人，这是最体面的方式，体面，体面，我知道他开始谈到体面时想要说些什么。两年来他一直想得到离婚，他知道与我单独在一起他不会成功，他指望这种面对面的会面震动我，他认为我会不屑于显得像个泼妇，我会垮掉，主动让步。这个男人多么可恨啊，当我正在执行一个公务时，当我需要平静和集中精力时，他却用刀镇定自如地戳进我的肋间，至少他应该给我的工作一点尊重，一点体谅吗？可是不，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我总是受欺负，受侮辱，我总是失败，噢，这一次不同了，此刻我背后有你和你的爱，此刻我仍然觉得你在我体内。在我身上，在我周围那些年轻英俊的骑手欢呼喊叫。我甚至会觉得他们在叫喊，我有你，有生活，有光明的未来，顿时骄傲充满我的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一种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的骄傲。我极力给了他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说，我不需要与你们一道去布拉格，我不想打搅你们，何况我有电台的汽车。至于你想谈妥的协议，我们可以马上解决，我正要介绍给你那个我打算和他共同生活的男人，我肯定我们会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也许这样做太轻率了，她吧，就算轻率又怎么样，为了那个极度骄傲的刹那，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值得的，他突然做出一副谄媚样子，显然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也有点惊恐，担心我说的不是真话。他要我再说一遍，这次我告诉了他你的全名，卢德维克·扬，我对他说得非常清楚。别担心，相信我，我答应不妨碍你们的离婚，别担心，我不再需要你，即使你要我我也不会要你。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他说，我淡然一笑说，我对此并不怀疑。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乐队奏单簧管时，我们经常绞尽脑汁想弄明白“国王们的骑马”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据传说，当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吃了败仗，逃离波希米亚，国王与他的马队为了躲避捷克追兵被迫在这里，在摩拉维亚乡间，靠乞讨度日，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事件才有了“国王们的骑马”，但是只要简单查一查原始资料就会清楚，远远早于匈牙利国王遭遇不幸就有骑马的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在何处起源，它的含义是什么？也许它可以追溯到非基督教时期保留下来的一种通行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承认男孩子已长大成人？那么为什么国王和他的小侍从爱穿女人的服装呢？是一支伪装的军队（不管是马蒂亚斯的还是更早时期的一支军队）引导着首领穿过敌人的领土的表示，还是一个幸存下来的古代非基督教的迷信，按照这个迷信，男扮女装是为了避免魔鬼怪的伤害？那么国王为什么在整个骑马中不许说一句话呢？为什么明明只有一个国王却要把它称作是“国王们的骑马”呢？这一切难道有什么含义？天知道。有许许多多假设——没有一个被证实。“国王们的骑马”是一个神秘的仪式；它的含

义，它的意蕴无人知道，但正如对于那些看不懂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他们仅仅把它们看成是奇异的草图）它们是最美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国王们的骑马”同样是很美的，至少部分是因为它想传达的意蕴人们早已无人知道，留下的只是更加鲜明突出的动作，色彩和话语。

我对结果大为惊异，我最初怀着疑虑跟在“国王们的骑马”散漫的启程后面，但我很快就消除了疑虑。我发现从一家到另一家缓缓前进的、色彩鲜艳的人马吸引住了我。不仅如此，几分钟前被一种刺耳的女人声音所垄断的无线电广播的喇叭现在也已经沉默了，只有那些信使的奇异的音乐声音能听到（除了偶尔传来的车辆的隆隆声，而我早已学会了不听这些声音）

我真想在适当的位置站着。闭上眼睛，倾听。在这里，在个摩拉维亚村子的中心，我感到听见了正在最原始时代的诗歌。那种从收音机或电视里，甚至舞台上绝对听到的诗歌，像有韵律和仪式的一种预示，处于讲演和歌曲之间的一种思维产物的诗歌，一种具有魔力的精神从其韵律中产生，正是那种起源于古希腊圆形剧场的精神的诗歌。这是一种庄重严肃的、复调的音乐。每一个信使朗诵他的诗都用单调，但每一个都有特别的音调，因此所有声音杂乱地形成了和声。而且，这些小伙子并不是同时朗诵，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房前开始朗诵。所以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不同时刻的声音，结果使人联想到一个丰富多样的轮唱。一个声音刚停下来，另一个又接着唱下去，而第三个正在等待以自己的声调加入进来。

“国王们的骑马”顺着大街移动（不断被车辆阻断），直到最后到达一个预定的岔路口才分开，右翼朝前继续走，左翼拐进一条小街。第一幢房子是一幢黄色的小屋，花园有栅栏和艳丽的鲜花。信使们富有灵感地即兴演唱。这幢农舍有一台漂亮的水泵，女主人有一个很健壮的儿子。确实有一个绿色的水泵在农舍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那个矮矮胖胖、四十岁的女主人听到对她儿子的形容后高兴得笑起来，给了那位正在叫着“为了国王，我善良的女人，为了国王”的骑手（募捐人）捐献物。这位募捐人刚丢进系在马鞍上的篮子里捐献物，另一个信使又对那女人叫道，她多么娟秀的身材，可他更喜欢她的美酒，然后他用一只手做成杯状，头朝后仰，假装痛饮了一杯。所有观看的人都大笑起来，那位女人既窘迫又愉快，跑进屋子，很快就转回来（她准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个瓶子和杯子拿在手里，给每一个骑手饮了一杯。

国王的侍从在喝酒和开玩笑时，国王本人的两名小侍从却庄重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几步开外，也许在喧闹的军队面前保持尊严和孤傲正是国王的职责所在。立在国王马旁的两名小侍从的马，近得连他们的靴子都相触在一起（马的胸部戴着用许多小镜子和各种颜色的糖装饰的华丽的心状物，它们的前额上披着纸玫瑰，鬃毛上编着彩色绉纸带）。这三位骑手都穿着宽裙子，浆硬的皱褶衣袖沉默不语。小侍人头上戴着装饰华丽的女帽，国王头上戴着亮晶晶闪闪发光的银色冠冕，上面挂着三条长而宽的飘带，两边是蓝色，中间是红色，完全遮住了他的脸，看上去他既神秘，又富神启。

我迷醉于这个恪守礼仪的三位一体。二十年前我也曾像他们一样跨坐在装饰漂亮的马上，但因为我当时是在队伍面里看“骑马”，所以什么也没看见。只有现在我才能真正看见了它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那样笔直地坐着的国王，就像一个受到保卫的塑像。也许，我猛然想到，也许他根本不是一个国王，也许他是一个女的，也许这就是露茜的真正面目。她后来显示给我，因为她的真正面目实际上就是她隐藏的面目。

与此同时，我想到科斯特卡是个怪人，他奇异地将冥思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可以确信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是真实的，但仍然有些值得怀疑。当然，他的确了解露茜，她许多事甚至他都知道，

可他了解一件重要的事实：那位在借来的矿工房间里试图对她施暴的士兵——露茜的的确确爱他。我怎么可能相信露茜是出于某种模糊的宗教渴望而摘花的，我记得她是为我而摘的。如果对科斯特卡她隐瞒了这一事实，隐瞒了摘花的真相和我们整整半年甜蜜的爱情，那么她只是为了要保持这个秘密，甚至不让他知道。她不全是为他而迁到此地的，也许只是巧合，但也许也是因为我。她毕竟知道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感觉到，第一次强奸的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我现在对某些细节怀疑。一个受到罪孽念头刺激的男人夸张的心理渲染与故事的一些部分，另一些部分则被只可能出自于一个醉心于仰望天堂的男人的忧郁所渲染了。很清楚，科斯特卡的故事既有真实又有虚构，在旧的故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传说（也许更接近真实，更美丽，更深刻）。

看着戴面罩的国王，我看见露茜骑着马（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庄严的（并且带有某种嘲弄地）通过我的生活。接着（对某种外部刺激的反应）我的目光微微移向一边，碰上了一个男人的目光，显然这个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看我，并且微笑着。“喂。”他说，倒霉的是他居然朝我走来。“喂，”我说。他伸出手，我握了握。然后他转身招呼一位姑娘，直到现在我才留心到她。“你在等什么”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姑娘（个子太高了一点，但还算漂亮，黑头发，黑眼睛）走上前，自我介绍说她叫布罗日小姐。她把手伸给我，我做了自我介绍，加上一句：“见到你很高兴。”“有好多年了，伙计。”那男人高兴地说，正是泽门尼克。

筋疲力尽，筋疲力尽。我似乎不能从疲倦中恢复。骑马队伍与国王一道出发去村庄草地，我跟在他们后面很吃力，做着深呼吸以抑制我的疲劳。我数次停马与走出家门观望的邻居们攀谈。我突然觉得我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旅行和冒险的日子已不复存在了，我绝望地被束缚在我居住的这两三条街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骑马队伍在我到达草地时已经开始沿着长长的大街出发。我正在准备再次缓缓地跟在队伍后面进行，这时我看见了卢德维克。在道路旁边的草坪上他独自站着，沉思地望着骑手们。该死的卢德维克！最好他滚蛋，从我的生活中滚远点！他一直在回避我。好吧，今天我可要回避他。我转过身，决定休息一下，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长凳上，听听信使们的声音。

于是我便坐在那里，倾听和观望。骑马队伍渐渐走远了。它靠着道路两边可怜兮兮地行进，好让川流不息的小汽车、摩托车通过。跟在后面一群慢吞吞的人。可怜兮兮的一小群人。来看“骑马”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尽管今年卢德维克来了。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你滚蛋吧，卢德维克！现在已经太迟了。对一切都太迟了。你是一个凶兆，一个不祥的征兆。特别是现在，当我的弗拉吉米尔做国王时。

我朝别处望去，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人在草坪上：在小摊旁，在餐馆门口。他们大多数都已喝醉。醉鬼最忠诚地支持民间节日，惟一留下来的支持者。他们可以借民间活动这个高尚的借口来喝酒。

接着皮切塞克老人走来，坐在了我身旁。它不像从前了，他说。我表示同意。确实不像从前了。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骑马活动该是多么壮观！尽管花哨上远不如今天的骑马活动。今天的骑马活动半是媚俗，半是化装舞会。马的胸部佩着华丽的心状装饰物！在百货商店买的一卷卷纸饰带！色彩鲜艳的服装，但从前的服装却很朴素，马只有鲜红色的彩带带在脖子和胸脯上，国王也只戴一个朴素的面罩，而不是戴花哨的饰带面具。尽管有一朵玫瑰在他牙齿之间，为了不让他说话。

你说得对，老伙计，从前要好得多。年轻人不必人们去追看，恳求他们参加。人们也不必坐在那里开会没完没了，争论谁来负责组织，谁来接受收入。“国王们的骑马”就像一道源泉从



村庄生活的中心汨汨涌出。它收集施舍而从一个村庄疾驰到另一个村庄。有时它会遇上另一支骑马队伍，于是就会有一场战斗。双方都顽强死命地保卫他们的国王，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如果一个国王被另一支骑马队伍的成员俘虏了，国王父亲就会付钱让他们喝得不省人事。

你说得对，老伙计，太对了。甚至当我是国王时，在占领期间，也与今天的“国王们的骑马”不一样。是的，甚至战后它还多少有点价值。那时我们觉得一个崭新的世界将由我们建起，人们将恢复民间习俗。从他们生活的深处会再次汨汨涌出“国王们的骑马”。我们要把这一切实现，我们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节日。但是我们却不可能组织一个源泉。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瞧瞧我们的歌，我们的“国王们的骑马”，我们的一切是怎样被我们不得不挤出的。它们是最后的几滴水，正是最后的几滴水。

啊，已经看不见骑马队伍了。它可能已拐进了某条小街。但信使的声音我们仍能听到，他们极其动人地祈求着。我闭上眼睛，想像自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纪，很久以前。然后我睁开眼睛，对自己说，弗拉吉米尔成为国王是多么好啊！一个即将毁灭的王国的国王，但这是一个最壮丽的王国，忠诚不渝的王国。

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人向我打招呼，是库茨基。我没见到他有好久时间了。他拄了一根拐杖，走路很困难。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但今天我却因为他的衰老感到难过。“你到哪儿去？”我问。他说他每到星期天都要出来活动一下。“你觉得‘骑马’怎么样？”我问他。“瞧都没瞧一眼。”他挥挥手说。“为什么不瞧瞧？”我问。他又挥挥手不予答复，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不去观看骑马了：卢德维克在观众中，与我相比库茨基更不想再碰见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并没有意思要责备你。”我说，“我的儿子参加了，但即使这样我也不想慢吞吞地跟在后面。”“你的儿子？你是说弗拉吉米尔？”“是的。”我说，“他是国王。”“真有趣。”库茨基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我问。“非常有趣。”他说，他的眼睛发亮了。“那是为什么？”我又问。“因为弗拉吉米尔跟米沃什一起。”

库茨基说，“我还不知道谁是米沃什！”他告诉我，米沃什是他的外孙，他女儿的儿子。“但这完全不可能的。”我说，“我刚才还看见他的，看见他骑着马走了！”“噢，我也看见了他。”库茨基说，“他坐在米沃什的摩托车被带到我家去了。”“荒唐。”我说，可我还是不禁要问：“他们要到哪儿去？”“要是你不知道，”他说，“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说完他就走掉了。

会遇到泽门尼克我绝对没有料想到（海伦娜曾告诉我也要到下午才会来找她），整桩事都使人感到不愉快。可是我能怎么办？他就在这里，站在我面前，与从前一模一样：头发淡黄地像过去一样，尽管不是像从前那样朝后梳着长卷发，而是剪短了，时髦地搭在前额上。他仍然站得笔直，脖子朝后仰着。他仍然快活，踌躇满志，完美无缺，仍然享受着天使们的青睐，此刻显然正享受着一个妙龄女郎的青睐，顿时她的美使我痛苦地想起了与我在一起的昨天下午的那个不完美的躯体。

由于希望早点结束我们的相遇，我极力用陈腐的答复回应他连珠炮般的陈腐问题。他反复地说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又说在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居然在“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小地方”相遇真叫人吃惊。我告诉他，我就在这里出生的，于是他向我道歉，说既是这样，他敢肯定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个地方，布罗日小姐笑起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反而说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这里遇见他，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他一直喜欢民间仪式。布罗日小姐又笑起来，说他们来并不是为了“国王们的骑马”。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国王们的骑马”，她说她对它并不感兴趣，

我问她为什么，她耸耸肩，于是泽门尼克说：“得啦，卢德维克，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时，骑马队伍走到了另一家前面，两名骑手正在竭力控制变得躁动不安的马。一名骑手和另一位在吵嚷，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马控制住而指责他。“笨蛋”和“蠢货”的叫骂声与喜庆的仪式十分滑稽地混杂在一起。“如果马脱缰了那才妙啦！”布罗日小姐说。泽门尼克听到这个想法后纵声大笑起来，可是没多久马被骑手设法安静下来了，“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声音又重新响起来，队伍能过村庄时平静而庄严。

当我们一道在那些响亮的声音后面跟着，沿着两旁都是鲜花盛开的花园的一条小街走去时，我一直在为了与泽门尼克道别而搜寻一个恰当而自然的借口。同时我不得不尽责地走在他那漂亮的女伴身旁，继续谈话。我得知今天早晨他们从布拉迪斯拉发来，这里与那里的天气一样晴朗。我得知他们是乘泽门尼克的小汽车来的，刚离开布拉迪斯拉发他们就不得已而换了火花塞。我还得知泽门尼克是布罗日小姐的老师。我从海伦娜那里知道他在大学教马列主义，可是我还是问他，他研究什么领域。他的回答是哲学（我发现这个专门术语很有意思。几年前他会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可近几年这个术语已不吃香了，尤其是青年中间，对泽门尼克来说，赶时髦一直都是他的主要标准，因此他用心良苦地用更普通的术语来表达他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如果不是我记错了，我说，很惊奇，你研究生物学。我这番话不明显地暗示这一事实：大学里许许多多非专业人员充当了马克思主义教员。他们与其说是作为学者还不如说是进入这一领域做宣传员的。这里，布罗日小姐插进来声称，虽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教员的脑子里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政治小册子，可是巴威尔却完全不同。巴威尔自己不可能更好地表达这意思，他温和地表示反对，从而既显示了他的谦虚，又鼓励了这位妙龄女郎对他的进一步称赞。于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了解到泽门尼克是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他受到他的学生的崇拜，其原因同他使行政部门感到不安的原因一样：即他总是说实在话，他勇敢，他支持青年人。由于泽门尼克不断表达出温和的抗议，近几年泽门尼克在大学里进行的斗争的细节我也了解了：由于他拒绝坚持课程的呆板过时，把正在发生的当代哲学的一切介绍给学生，他们声称他企图暗地里传输“敌对的意识形态”，甚至想把他的公职解除掉。他救了一个他们正准备开除的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孩子气地瞎闹，与一个警察发生争吵，校长（泽门尼克的敌人）希望把此事当作是一个政治上的不轨行为。此后女学生举行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选出她们最喜欢的教员，他当然轻而易举地夺得此殊荣。此时，泽门尼克已不再竭力阻拦这番滔滔不绝的赞扬，我对布罗日小姐说（带着讥讽的口气，哎，但又太隐约其辞，使她难以理解），我懂得她在说什么。因为据我所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大家就颇为爱戴和欢迎泽门尼克。布罗日小姐激动地点头：她一点也不奇怪。既然巴威尔是这样一位出色的讲演家，可以打得他的对手落花流水。“得啦，那又怎么样呢？”泽门尼克笑道，“就算我在辨认中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还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抨击我。”

我从最后这句话里骄傲的自鸣得意中确信，泽门尼克一点没变。然而，这句话的内涵却使我心都冰凉了：泽门尼克似乎已经不再持有以前的观点了，假若发生一场政治性的冲突，我将发现自己站在他一边，不管是否愿意。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然他的转向绝不是不可思议的；相反，这是很平常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整个国家实际也正在逐渐这样做。问题在于我并没想到泽门尼克会转向：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是僵硬不化，要是我给予他一点变化的权利，我就不是人。

有的人主张要爱整个人类，而有的人反对说，我们只可能爱单独的人，也就是说，爱这个人或那个人。我同意第二种观点，

并愿意补充一点，对此爱恨都适用。人这东西渴望平衡，他使他背上压的罪恶的重量与他仇恨的重量相平衡。但是试试只在抽象观念上集中你的仇恨——非正义、盲从、残酷——或者，如果你走得更远，发现你连人的本质也觉得值得仇恨，试试去仇恨人类！人的能力已无法承受那个秤盘上的仇恨，因此人的惟一能减轻他的愤怒的办法（尽管他意识到自己有限的力量），就是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他的愤怒。

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感到寒彻骨髓。突然我想到他可能马上就会把话题转到他的变化上（在我看来，他似乎胆怯地渴望夸耀他的变化），并为此请求我的原谅。这是多么令我可怖的事。我对他说什么呢？我怎么回答呢？我怎么解释他与我不能调和呢？我怎么解释这将意味着结束了我本来就不稳定的内心平衡呢？我怎么解释这将我内心秤盘的一端翘上空中呢？我怎么解释我用我的仇恨来平衡我年轻时承担的罪恶的重量呢？我怎么解释他被我看作是我所知道的一切罪恶的化身呢？我怎么解释我需要恨他呢？

马匹在狭窄的街道上挨挨挤挤地行进着。我看得见国王，但离得很远。他坐在马上，与别人相隔一定的距离，但他的两名小侍从守在他两旁。我弄糊涂了。的确，他和弗拉吉米尔的背一样有点弯。当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几乎对一切漠不关心时，他的背我很清楚地可以看到。但是，他真的是弗拉吉米尔吗？没有可能是别的人吗？

我向他慢慢地靠近。我只想认出他来。他的一举一动我不是很熟悉吗？我不是爱他吗？爱不是具有直觉吗？

现在我就在他旁边。我完全可以叫他。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但这没有用。国王不许说话。

接着，骑马队伍又走向下一家。现在我要把他认出来了！只要马迈一步就会迫使他动一动，这一动就会暴露他。当马向前走时，国王的背的确有点拱着，可是我并没有从他的动作中得到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暗示，表明究竟是谁藏在罩后面，在他脸上交叉着的鲜艳夺目的饰带仍然令人失望地不透明。

当骑马队伍又经过了几家房子（我们几个旁观者和我们还留在周围），我们开始转向别的话题：布罗日小姐已从泽门尼克谈到她自己，口若悬河地讲她如何喜欢沿途免费搭车的旅行，她谈及这件事时是那样热情四射（尽管并不是很自然的），我马上看出我免不了要聆听一番她这一代的宣言了。我很反感想到所谓一代人的思想（群体的自大）。布罗日小姐充分表达了她那惹人恼火的主张（这种主张我已无数次从她那代人口中听到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让那些请求免费搭车的人搭车（自由思想者、冒险家、人道主义者），另一种是不让那些请求免费搭车的人搭车（自我中心的社会主义布尔乔亚）。于是我戏称她是“公路的教条主义者”。她傲慢地回答，她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修正主义者，既不是宗派主义者，也不是机会主义者，这全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词，它们只属于我们，与他们完全毫无干系。

“你看见了？”泽门尼克说，“他们不一样，幸运的是，他们不一样。就连他们的词汇也不一样。他们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败毫无关心。你不会相信吧，在入学考试中，当我们向他们问起清洗时，我们在说些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斯大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字。在布拉格发生的政治审讯他们大多也不知道。”

“我认为这是件不幸的事；我认为这是可怕的。”我说。

“的确，这对于说明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多少帮助。但是想一想吧，他们的思想是多么解放。他们毫不关心我们的世界，拒绝它，并且拒绝它肯定的一切。”

“一种盲目屈服于另一种盲目。”

“我不这样看。我觉得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很深。他们喜爱他们的躯体，我们却忽视我们的躯体。他们喜欢旅游，我们却在原

地呆着不动。他们喜欢冒险，我们却在会议上耗费了所有的时间。他们喜欢爵士乐，我们却满足于拙劣地模仿民间音乐。他们对自己感兴趣。我们却想拯救世界，而由于我们的救世主观念却差点毁灭了它。也许倒是他们和他们的自我主义拯救世界。”

这可能吗？国王！这个被缤纷彩带遮住的笔挺的形体！我多少次看见他这样，把他想象成这样？我最亲密的幻想！既然已经实现这个幻想，所有的亲密也就消失了。它突然成了一个着色的幼虫，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如果不是在我的王国，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还谈什么亲密呢？

这是离我最近的人。我的儿子。我就站在他面前，可我甚至连他是不是我的儿子也不知道。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那我还知道什么呢？如果连这个都不能肯定，尘世间还有什么肯定是留给我呢？

当泽门尼克在称颂表扬年轻一代时，我却在注视布罗日小姐，妩媚而又令人快乐，我得出了很悲哀的结论，一想到她不属于我，心中既嫉妒又惋惜。她在泽门尼克身旁走着，不停地谈话，时时挽住他的胳膊，信任地望着他。这使我再次想到（正如随着流淌的时间我愈来愈经常想到的），自从露茜离开我后，我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值得我爱的尊敬的姑娘。我被生活尽情地嘲弄着。我的失败从它派遣的这个男人的情妇中得到提醒，而就在昨天我还认为我已在一场荒诞的性的战斗中击败了这个男人。

我愈喜欢布罗日小姐，就愈意识到她的观点与她同时代的人是多么相同啊，在他们看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全都属于一个混乱的整体，被同样的难以明晓的术语，同样的过分政治化的思想，同样的忧虑（他们认为这些忧虑是畏惧和胆怯），同样的来自一个黑暗而遥远年代的非凡经历所败坏。

此刻我才开始明白，我和泽门尼克之间的相似并不只是在于泽门尼克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使我和它们的观点更加一致。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相似要深得多，我们的命运被包容成一个整体。在布罗日小姐和她的同时代人眼里，即使我们在相互攻击时我们也是相似的。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勉强（我一定会感到勉强！）对布罗日小姐讲一下我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她会认为这很遥远，而且过于文学味（很多拙劣的小说就这个主题已作过多次描写），我们俩的结果都不妙。我的看法和他的看法，我的态度和他的态度——在她看来都一样违背常情。我看见我们的矛盾，至今它一直历历在目，现在却沉入了有治愈功能的时间之水中。众所周知，时间能够抹除各个时代之间的差异，对于两个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竭力抵制时间的和平馈赠。我不是在无穷无尽中生活，我被锁在我贫乏的三十七年里，并且不想与这根链条断结（像泽门尼克那样靠仓促接受年轻一代的思想来割断这根链条）。不，我不愿把我的命运抛弃，否认我的三十七年，虽然它们毫无意义，转瞬即逝，此刻正在被遗忘，已经被遗忘。

假如泽门尼克故作亲密地靠过来，打算谈谈过去的事，请求和解，我会拒绝的。是的，即使布罗日小姐从中调停，即使她所有的同时代人，以及时间本身代为说情，我同样会拒绝的。

筋疲力尽。突然我想就此事甩手不管了。走开去，不再担心它了。我厌倦了这个物质世界。我不理解它们。它们捉弄我。我有另一个世界。我感到在那个世界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道路，玫瑰花丛，逃兵，吟游诗人，母亲。

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我不得不控制自己。我必须当地了结我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分歧。我必须弄清揭开谎言和欺骗的真相。

可以向谁问呢？骑手吗？使我自己成为笑柄吗？我回想起早晨，给国王穿衣，随即我知道该去哪儿了。

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骑手们吟诵着又经过几家人家，我们尽责地慢慢跟在后面，华丽的彩带装饰在马的臀部，在



我们眼前跳动着蓝色、粉红色、绿色和紫色。突然，泽门尼克朝骑手们的方向指去，说：“瞧，海伦娜在那儿！”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但只见到了马匹躯体的色彩鲜艳，泽门尼克又指着说：“就在那儿！”于是我看见了她——她被一匹马半掩在后面——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泽门尼克那种方式把她指给我看（不是称“我的妻子，”而是称“海伦娜”），表明他知道我们认识。

海伦娜在人行道边正站着，她伸出的手上举着话筒，在一个收录机上接着话筒线，收录机在一个身穿工装裤、皮夹克，戴着耳机的小伙子肩上挂着。我们停在了离她不远的地方。泽门尼克突然而又不经意地说，海伦娜是个出色的女人；她不但表现出很奇特，而且很有头脑。她一点也不惊异于我们如此合得来。

我感到了我发烧的面颊。泽门尼克并不是说这番话来攻击我，他只是想表示殷勤。布罗日小姐一样，她意味深长的目光表示着明白，同感，甚至共谋。我毫不怀疑我所处的境地。

泽门尼克继续拿他的妻子来取笑，竭力想表明（用各种暗示和影射）他知道内情，可是绝不反对，因为他总是对于海伦娜的私生活表示出宽容大量。为了使这番话听上去更加随便，一边指着那个强壮的技术员一边说，那边那个小伙子（“他戴着那副耳机是不是显得像个巨大的甲虫？”）已经危险地爱上海伦娜有两年了，我最好对他提防着点。布罗日小姐笑着问，他两年前有多大。十七岁，泽门尼克说，可以恋爱了。然后他带着玩笑的口气补充说，海伦娜绝不是一个摇篮强盗，她有她的标准，可是是一个小伙子却喜欢这样——他愈受到打击，他的脾气就愈大，他肯定会来个迅速快捷的上勾拳。对此布罗日小姐回答说（用聊天的态度），对付他我似乎还可以。

“我可没这么肯定。”泽门尼克带着微笑说。

“别忘了我在矿井干过。还有一些肌肉留下了。”我只是想使谈话继续下去，我没想到开玩笑的范围已被我超出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在矿井干过？”布罗日小姐问。

“这些二十岁的小伙子。”泽门尼克一气说下去，“当他们在街上成群结伙地逛荡时，他们简直危险极了。如果你的模样他们不喜欢，你就得倒霉啦。”

“时间有多长？”布罗日小姐问。

“五年。”我说。

“什么时候？”

“九年以前。”

“噢，那可是古代史了。”她说，“你的肌肉，我敢说现在已经完全松软了。”她也想开点自己的小玩笑。正巧，我刚好也正在想我一点也不松软的肌肉，事实上我体格健壮，可以很容易地把我这位淡黄色头发的同伴揍成肉酱。而最重要也最沮丧的是，如果我决心要算清我的旧债，我除了依靠肌肉以外便不能依靠什么了。

我再次想像泽门尼克转向我时笑容满面，请求我让过去的事过去吧。我意识到他欺骗了我：泽门尼克请求宽恕，不但依靠他改变了观点，不但依靠时间，不但依靠布罗日小姐和她的同时代人，而且仗恃海伦娜（是的，此刻他们全支持他一边！）。因为原谅我的通奸不过是一个要我原谅他的砝码而已。

我想像我细细观看他的脸，一张过于自信可以勒索他的顾客的人脸，我真想对准他在他的鼻子上猛打一拳，这样我就能真正地看见：周围骑手们还在拥来拥去，大叫大喊；太阳金光灿烂；布罗日小姐仍在继续谈论着什么；我狂怒的眼睛只看见从他脸上流淌出鲜血。

是的，我能把这个场面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他请求我原谅他，我会真的做出什么来呢？

我惊恐地感觉到，我肯定也不会做什么。

这期间，我们已走向海伦娜和她的技术员，技术员正在移开

耳机。“你们已见过面了？”她问，她很吃惊地看着我和泽门尼克在一起。

“喔，我们已认识多年了。”泽门尼克说。

“你说什么？”现在她更吃惊了。

“在大学我们就认识了，”泽门尼克说，“我们是同学。”我心中暗想，我们已到达了那座桥、那座通向那块臭名昭著的（处死刑的）地方的最后一座桥，在那里他将要求我的原谅。“天哪，真巧！”海伦娜说。“经常发生一些偶然的事！”那个技术员说，以便提醒大家他的存在。

“噢，对了，我还没有介绍你们两位。”海伦娜对我说，“这是金德雷。”

我同金德雷（这个小伙子毫无吸引力）握了握手，泽门尼克对海伦娜说：“我原打算和布罗日小姐带你与我们一道回去，但是现在我看，你宁愿与卢德维克一道回去，所以……”

“你要和我们一道走？”穿工装裤的小伙子问，听上去像是在邀请。

“你这里有小汽车吗？”泽门尼克问我。

“我没有小汽车。”我回答。

“那么你可以与他们一起走。”他说。

“可是每小时我要开八十公里。”穿工装裤的小伙子说，“所以，如果那使你担心……”

“金德雷！”海伦娜严肃地说。

“你可以跟我们一道走。”泽门尼克说，“可是我想你的新朋友一定优于你的老朋友。”他如此随意地称我是他的朋友，以至于我肯定即将到来的不光彩的休战。更糟的是，他不再说话，似乎在犹豫是不是到一边去和我进行一场私下谈话（我垂下头，准备洗耳倾听），但是我错了。泽门尼克看了看他的手表，“我们的时间的确很紧。五点以前我们原打算赶回布拉格。我想我们只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告别了。Ciao，海伦娜。”他握握她的手。“Ciao。”他对我和强壮的技术员说，然后也握握我们的手。当布罗日小姐跟我们一一握了手后，他们就走了，手挽着手。

他们走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泽门尼克——挺着背，仰着淡黄色的头，身旁是褐发女郎。她——看上去背后也很美，轻快的步子，可爱极了。我几乎是痛苦地喜欢她，因为她那正在离去的美那样冷漠地对我，正如泽门尼克一样，正如我过去的一切一样，我是为了替我的过去报仇才来这里的，可我的过去却不知不觉地从我的身边溜走了，像陌生人一样对待我。

我因为这一切耻辱和愧怍使我感到气闷。我只想消失，独自走开，把这桩肮脏的事件抹去，抹去这个愚蠢的玩笑，抹去海伦娜和泽门尼克，抹去前天、昨天和今天，把这件事彻头彻尾地抹去，一点都不留下痕迹。“我想与海伦娜同志单独谈一谈，你不介意吧？”我问那个强壮的技术员。

我和海伦娜到了一边去，可她却抢先告诉我一些话，关于泽门尼克和他情人的事，为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而乱七八糟的道歉。但是我才不在乎哩。在我心里只企盼一件事：逃开，逃开她和这桩事，在我后面把这一切都丢下。我没有权利再这样把海伦娜欺骗下去。她和她对我的尊重是完全无辜的，而我却表现得很卑鄙：她仅仅被我当作一个物体，一块我企图（但失败了）朝另一个人投去的石头。想到我遭到很可笑的失败的复仇我就感到闷气，我下决心——尽管已迟了，但还没有迟到不可挽回——结束这件事。作出解释已毫无意义，不仅因为告诉她真话会伤害她，而且她也不能理解。我只能把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一再强调，再三重复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我再也不会和她见面，我不爱她，她应该明白。

比我想像的还要糟得多的结果出现了：她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我的话她不愿相信，也不放我走。我经受了一番小

小的折磨才挣脱开她，匆匆逃走了。

马匹和饰带到处都是，我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后来金德雷走上前，拉起我的手。紧紧握住它，问我出了什么事，哪里不舒服，我由他去握我的手，对他说，没什么，金德雷，真的没什么，我的声音听上去简直如同另一个人的声音，尖锐而不自然，然后我很快地开始谈到我们还需要录些什么。我们要录祈祷，我们要录两次采访，我还要录解说词，很奇怪我竟能不停地谈论我不可能关心的事。他则在我旁边沉默地站着，紧捏着我的手指。

在以前他从来没有触碰过我，他太羞怯，可是人人都知道他爱上了我，此刻他在我旁边站着紧捏着我的手指，而我却在不停地谈着我并不关心的计划，只有卢德维克装在心里。可是，说来也奇怪，我感到自己很想知道在金德雷眼里现在我像什么样子，遭受了这样的震惊之后，我可能显得很丑怪，也许不是这样，毕竟我没有哭，只是有点烦恼……

“听着，金德雷，我要去单独呆一会儿，我要去写解说词，然后我们就可以立刻把它录下来。”他不愿放我走，不断问我出了什么事，但是我摆脱开，朝区议会径直走去。在那里我们借了一个房间，我终于可以在一个空房间里单独呆一会儿了，我倒在椅子上，把头搁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我头痛得非常厉害。我打开手提包，瞧瞧有没有治头痛的东西，尽管我真的不知道我干嘛要费事。我知道我没有药，但我随即想起金德雷经常在身上带有一套备用药品，他的大衣就挂在衣钩上，在他的口袋里我乱翻一气，我确实找到了一小瓶止痛药，止头痛、牙疼、神经疼和神经炎，虽然它没有说可以治灵魂上的痛苦，但至少可以治我的头疼。

在隔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了水龙头，把一个装芥末的旧瓶子装满水，服了两片药。两片就够了，我的头疼可以消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尽管其它问题不能解决，除非我把整瓶药吞下去，大量的药就会有毒。金德雷的瓶子几乎是满的，也许足够了。

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但这个念头却在脑际不断浮现，迫使我思考我干嘛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要继续活下去。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事实，我根本没这样想，我几乎什么也没想，我只是试图想像自己已不再活着。突然我感到愉快极了，愉快得奇怪，我差点大笑起来，或许真的我笑了一下。

我在舌头上又放了一片药，我真的没有打算要把自己毒死，我只是把瓶子紧紧握住，喃喃自语：“我的死握在自己手中。”我不由地想多么简单的一切，就像一步步走向一个深渊，不是跳下去，只是往下看。我装了满满一杯水，服下这片药，回到我们的房间，窗户开着，汝等听着，汝等听着，从溪谷到山岭，从近处到远方的声音还飘荡在远处某个地方，不过这声音同小汽车、卡车和那些可怕的摩托车的喧嚣声掺和混在一起，它们淹没了所有美好的东西，所有我一直信任的东西，为之活着的东西。这些喧嚣声叫人难以忍受，这些微弱的声音叫人难以忍受，我关上窗户，那久久持续的疼痛又一次袭击我的心灵。

在那些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巴威尔从来没有像你卢德维克那样伤害过我。一瞬间，我原谅了巴威尔，我理解了他，他很快地燃烧他的情焰。我不断地需要新牧场，新听众，他也伤害过我，但此刻借这个痛苦，我不带怨气愤恨地看待他，像一位母亲那样，是的，他是个爱炫耀的人，一个小丑，我可以讥讽他这些年想甩掉我的企图。好吧，再见吧，还是最好再见吧，巴威尔。但是卢德维克，我却完全也不理解你，你来到我身旁戴着面具，先是使我复活，然后又把我扔回去。你，我是不能原谅的，我诅咒的人是你，我恳求你回来，回来吧，行行好。

天哪，或许这只是一场可怕的误会，也许当你们单独在一起时巴威尔对你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问过你，我恳求过你解

释你为什么不再爱我，不愿让你走，我把你拉回来四次，可是听你都不愿意，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就是你想说的，完了，结束了，永远结束了，不可挽回。那么，好吧，我终于答应了，我的声音变得尖锐而软弱，像是另一个人的讲话，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姑娘在讲话，我祝你旅途愉快，我用那个尖锐的声音说，可笑得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你旅途愉快，不断地从我的脑子里冒出这句话，我祝你旅途愉快……

或许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肯定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也许你认为我只是又一个已婚妇女在外面寻求艳遇，你怎么就不能明白：你是我的命运，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也许在这里你将发现我，被盖着一张白床单准备抬去埋葬，那时你会知道你杀害了一个你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或者，你来了，啊，上帝，我还活着，你仍然能够救我，你将在我身边跪下，我抚摸着你的手，你的头发，你，你的一切都将得到我的原谅……

我的确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悲哀的插曲我必须结束了，这个拙劣的玩笑，它不满足于单独存在，愈来愈多的愚蠢的玩笑可怕地繁衍出来了。我不仅想抹掉这一天，这实际上纯粹是由于起身迟了，没有赶上火车的偶然而导致的，而且还想抹掉导致这一天的一切，对海伦娜愚蠢的性征服，在我现在看来，也是由错误造成的。

我如此慌慌张张，就好像听见海伦娜的脚步声就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即使有可能，即使我可能抹去我的生活中这几天荒废的日子，那又有什么好处，既然错误造成了我的整个生活经历：那个偶然的事件，那个明信片上荒唐拙劣的玩笑。使我恐惧的是，我感觉到这些错误造成的事件与由理智和必然造成的事件完全一样真实。

我的整个生活经历要是能消除我将会是多么幸福！可是，当不幸经历的错误的发生不完全是我的错误时，我有什么力量做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点呢？实际上，是谁错误地把我的愚蠢玩笑当真？是谁错误地逮捕和处死亚历克谢父亲（尽管早已恢复了名誉，但毕竟还是死了）？这些太频繁的错误的，太普遍了，不可能把它们仅仅看做是例外，是“脱轨”了事物的秩序，它们就是事物的秩序。这些错误是谁犯下的？历史本身吗？神圣的、合理的历史吗？为什么要称它们是历史的错误？如果历史开玩笑怎么办？一刹那间我意识到，要取消我的玩笑我是多么无力：一个更大的（包罗一切的），绝对不能撤回的玩笑把我自己以及我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给卷进去了。

朝村子草地望去（现在那里一片寂静，骑马队伍正巡行在村子的另一头），我注意到一个大招牌支在酒店门旁边，上面用红字写着：今天下午四点，在露天饭馆将举行一个辛巴隆尔队音乐会。既然我乘坐的公共汽车差不多有两小时才会发车，既然该吃东西了，于是我便走了进去。

一步步走向深渊，俯在栏杆上朝下凝望，真诱人，我但愿给我做的事带来安慰与和谐，我但愿在下面，如果没有别的地方就在下面，在深渊的底部，我们能找到对方，守在一起，没有误会，没有诽谤，没有年老，没有悲哀，永远守在一起。我回到另一个房间，胃里只有四片药，这不算什么，离深渊还有很长的路程，甚至还没有走到栏杆边。我在手心上倒下了剩下的药片。这时我听见走廊上一道门开了，我吓了一跳，把药片塞进嘴里，尽力吞下它们，但药片一下子吞得太多，擦痛了我的喉咙，甚至我用水把它们强迫吞下去后我的喉咙还在作痛。

金德雷来了，他问我解说词写得怎样了，突然我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无所依靠了，不再是尖锐、生硬的嗓音了，我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噢，金德雷，你来我很高兴，你愿意给我帮个忙吗？他的脸上飞起红晕，说为我做什么事他都愿意，看见我脸色好了一点他很高兴。是的，现在我感觉很好，你能等一会儿



吗？我还是要写一张便条，于是我坐下来，找到一张纸，写道：最亲爱的卢德维克，我用整个身心爱过你，现在我已不再留恋什么肉体 and 灵魂了。永别了，我爱你。海伦娜。我写的东西我甚至都没再看一遍，金德雷就坐在我对面，注视着我的每个动作。但我在做什么他却不知道，我很快地把纸折起来，但没有找到一个信封，金德雷，你有没有信封？

丝毫没有迟疑，金德雷走到桌旁的柜子边，把它打开，开始在里面翻寻，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会呵斥他乱翻别人的东西，可此刻我需要一张信封，要快，他给了我一个印有区议会字样的信封，我把信塞进去，封好它，在正面写上卢德维克·扬。金德雷，你还记得刚才与我，与我丈夫和那位姑娘站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的，那个男人、黑皮肤的，我得留在这里，我要你去找到他，交给他这封信。

他又抓住我的手，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怎样解释我的激动，他不可能觉察发生的事，他只可能感觉我遇上了某种麻烦，他又一次紧紧握住我的手。突然，他弯下身，把我搂在怀里，把他的嘴唇紧紧贴在我的嘴唇上，我本打算阻止他，但他紧紧搂住我，接着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我最后一个吻的男人，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吻。突然我感到不管一切，我回应他的拥抱，紧紧搂住他，张开嘴唇，感觉在我舌头上的他的舌头，他的手在我的身上，一种绝对自由的眩晕感，我被一种什么也不再在乎的感觉攫住了，因为所有的人已抛弃了我，我的世界已经崩溃，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像那被我们赶出广播电台的姑娘一样自由，她和我的处境相同，我的世界已经粉碎，我永远不可能重新把它拼凑在一起。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要忠贞，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再需要我忠贞，我完全自由，正如那个电台的姑娘，那个每夜在不同床上睡觉的破鞋，假如我继续活下去，我会干同样的事，我感觉在我嘴里的金德雷的舌头，我是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的，我知道我可以同他做爱，我想同他做爱，不管在哪里都行，在桌子上或者在光光的地板上，就现在，马上，做最后一次爱，临死之前。这时，金德雷突然急促站起身，骄傲地微笑，说他要走了，马上就会回来。

服务员疾速穿过烟雾迷漫、挤满了人的小房间，用一只手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堆满了许多菜碟。我只顾得来瞥见上面有牛肉香肠肉排和土豆沙拉（显然这就是星期天惟一的菜），用另一只手为自己开路，穿过人群和五六张桌子，走到过道里。我在她身后紧随着，看见过道尽头有道门开着，走进去是一个花园，也有人在那里吃饭。就在后面，在一棵椴树下，我发现一张空桌，我走过去坐下。

在村庄的屋顶上仍飘着动人的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声音。可是这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当它飘到酒店花园时，听上去几乎就像是虚幻的，这个想像中的幻觉使我感到，一切在我周围的却都不属于现在，这全是过去的一部分，一个十五年或二十年前的过去，汝等听着，汝等听着，露茜，泽门尼克全属于这个过去的一部分。而海伦娜仅仅是一块石头，我想用它朝这个过去扔去。这三天不过是一场影子跳舞罢了。

什么？就只有这三天吗？似乎阴影笼罩着我的一生，目前也并不享有殊荣。我发现一个移动的过道（代表时间）和一个正朝着与移动的过道相反的方向狂奔的男人（代表我）。但过道移动得比我快，因而逐渐地载着我离开了我要奔向的目标。这个目标（怪异的目标，方向已错了！）是政治审讯的过去，举手表决的礼堂的过去，可怖的过去，惩戒营和露茜的过去，这个过去仍然使我中了魔，这个过去我仍然想竭力探索，寻求，阐明，这个过去仍然阻碍我生活得像一个正常人，阻碍我朝前看。

并且还有一个我试图用来连接使我这么入迷的过去的结合物，复仇的结合。不幸的是，复仇，如我这几天来所看到的，就

像我倒退地跑一样无用。是的，在礼堂里泽门尼克那天朗诵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时——那正是我应该走到他面前，朝他鼻子猛击一拳的时刻，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才是我复仇的时刻。搁置了复仇，它就变成了一个幻觉，一个个人的使命，一个神话逐日撤回它的人物表，这些人物在复仇的神话里依然如故。而在现实中（过道永远不停地向前移动），他们却彻底改变了。今天另一个泽门尼克面前站着另一个扬，已经无法恢复和重建他还欠我的一击了，已经永远永远失去了。

当我在盘子里切开那一大块牛肉香肠肉排时，汝等听着，汝等听着的曲调传入我的耳中，它在村子的屋顶上方微弱而悲切地飘荡。我想像着那个国王戴着面罩和他的扈从，心想，对于人们的姿态是多么地难以相互了解，这是多么悲哀啊。

多少世纪以来，年轻人都像今天这样一直从摩拉维亚村子骑马出发，去传达一些令人生奇的讯息，详细地解说这些讯息中难以理解的词。这种忠诚使人感动。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一群人说了一些重要的话，今天他们又复活到了他们后代身上，就像既聋又哑的讲演者用优雅和难懂的手势长篇大论地演说一样。他们对于讯息永远不会得到阐释，不仅因为没有任何答案，而且因为处在一个聚集了大量新旧讯息，它们的声音相互抵消的时代，人们缺乏耐心聆听。迄今为止，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的事物的涓涓细流，汇入了已被遗忘的事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将会产生新的时代，个人有限的书记将无法理解这些时代。因此将会湮没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是悲惨的：人将没有能力洞察自己，他的历史——深不可测，不可思议——将缩略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成百上千的聋哑骑手将出发去传达他们的信息给我们那些遥远的后代，而他们中将无人有时间聆听。

我在花园饭馆的一个角落里坐着，面对着一个空盘子，一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想到已经吃完了东西，沉思着我也（就在这一刻）被卷进了那个巨大的无法阻挡的遗忘中。服务员走过来，拿起我的盘子，将桌布上的面包屑和餐巾拂去。一阵沮丧兜上心头，与其说是因为这一天什么都没干，不如说是因为连它的徒劳无益都不会保留下来。它将随着这张桌子，我头上嗡嗡叫的苍蝇，散落在桌布上的椴树花的黄色花粉，以及我目前生活的这个社会特有的那种怠惰的服务一道被遗忘。社会本身也将被遗忘，那些缠着我，消耗我，那些我一直枉费心机企图牢记、纠正、矫正的一切错误和不公平都将被遗忘，因为不可能倒转发生的事。

是的，我突然看着这一切清清楚楚的：多数人情愿用加倍的虚假信念来欺骗自己。他们相信永远的记忆（记住人、事、行、为、民族），相信纠正（纠正行为、错误、罪行、不公平）。二者都不是真实的。事实搁在天平的另一头：将遗忘一切，没有什么会被纠正。忘却将接管一切纠正（复仇和宽恕）。没有人会洗雪冤屈，人们将遗忘一切冤屈。

我再次仔细地环顾一下周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将被遗忘：这棵椴树，这些坐在桌旁的人和这家饭馆。从街上看饭馆，它毫无吸引力，可是在花园里却迷人地长满攀缘而上的藤蔓。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个门上那个通往过道的门上，刚好记住了正在消失的服务员（负担过度的心脏现在几乎被遗弃了，再一次成了平静的隐藏处），当黑暗刚把他吞没，一个穿皮夹克、工装裤的小伙子就出现。他走进花园，四下张望。他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就朝我的方向直奔而来，愣了一愣我才意识到他便是海伦娜的健壮的技术员。

每当一个表露爱而又未被爱的女人威胁说要报复时，我总是觉得很费神，伤透脑筋。所以当那个小伙子把信封（“泽门尼克太太写的”）递给我时，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迟点看信。我要他坐下，他坐下了（支着一只肘，满足地眯眼望着那棵浸浴在阳光中

的椴树)。我将信封搁在桌上，然后说：“要喝一点么？”

他耸了耸肩膀表示不同意。我提议喝伏特加，可他说不，他还得开车，开车前喝酒是绝对不允许的。然而他不介意看着，如果我愿意喝的话。我根本不愿意喝，但既然现在信封就在我面前摆着，我又不愿打开它，似乎其他任何替代物都是受欢迎的。服务员碰巧经过，我给他要了一杯伏特加。

“告诉我，海伦娜想要怎么样？”我说。

“我怎么知道？”他回答，“请看信吧。”

“难道是紧急事？”我问。

“你认为她要我记住它，以防我遭到袭击吗？”他说。

我拾起信封（上面印有区议会公函字样）随后又把它放回到桌布上，由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说，只好说道：“很遗憾，你我两个不能喝一杯。”

“这是为了你本人的安全。”他说。他暗示得很清楚：他想通过我们的私下面谈，讲明这趟旅途的情况以及他与海伦娜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这个小伙子非常好。他的脸小而苍白，长满雀斑，有一个短短的翘鼻子，他全部的想法在他的脸上已映出来了。也许使这张脸如此透明的是它那不可救药的幼稚（我说不可救药是因为这张不同一般的小脸就连岁月也不能使它变得更加成熟：换句话说，就像一张老年人的娃娃脸）。对他来说他幼稚的模样肯定是一个可怕的祸根，他惟一的办法就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打扮伪装它（就像——噢，那无休止的影子跳舞！——那个娃娃指挥官）：靠他的服装（他的皮夹克宽肩合身，做工讲究）和他的举止（他很自信，有点粗鲁，只要有可能就尽量显得漠然和冷淡）。不幸的是，他不断使自己暴露。他稍一激动脸就会发红，声音就会变得嘶哑，一见面我就注意到了这点。总之，对于他的面部和身体表情他无法控制。很清楚他想向我表示，他对于我是否与他们一道回布拉格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当我向他保证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将留在后面时，他的两眼突然明显的发亮了。

当服务员放到桌上两杯伏特加时，小伙子抬起手说，不，那好吧，他将来一杯。“我不想让你独自喝，”他说，“祝你健康。”他举起杯子补充说。

“你也一样。”我说。我们碰了杯。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得知小伙子计划两小时后动身，因为海伦娜想听一遍他们录的材料，在必要的地方将解说词加上。这等于是说明天就可以播出。我问他与海伦娜一道工作是什么样子。他的脸红了，说海伦娜对她的业务很熟，可是她对工作人员却过分严厉。她总是想要加班加点，似乎没考虑到有些人急着想回家。我问是不是他也急着想回家。不，他说，他过得很好。接着，趁我提起海伦娜这个话题的机会，他似乎很随便地问：“你是在哪里认识她的？”我告诉他，他紧接着问：“她确实了不起，是不是？”

我一提到海伦娜，他便越发想表现出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再次把他这种表现当作是他想装装样子的欲望。既然他对海伦娜的极度爱慕无疑已是公开的事，那他就得尽力避免人们对他产生单相思的耻辱印象。所以，即使我完全没有认真地看待他的自信，可这还是减轻了面前这封信的重负，终于我把它拿起来，打开它：“肉体 and 灵魂……没有什么留恋的了。永别了……”

我抬起头来，看见在花园另一头的服务员，于是大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点点头，但是不愿把他的绕行线路改变，而是在过道里消失了。

“快。一点时间也别耽搁。”我告诉小伙子。我站起身，急急忙忙从花园穿过。小伙子在后面跟着。我们走完道，正要穿过餐厅，这时服务员追上了我们。

“肉排，汤，两杯伏特加。”我对服务员说着。

“怎么啦？”小伙子胆怯地问。

我把钱付给服务员，要小伙子赶快把我带到海伦娜那里去。我们疾步动身了。

“出什么事了？”他问。

“有多远？”我反问。

朝着我们前面的方向他指了指，我立刻跑起来。他也跟着跑起来，很快我们就到了区议会房子。这是一幢平房建筑，刷着白石灰，大门和两扇窗户对着大街。我们直接走进去，来到一间阴沉沉的办公室，在一扇窗户下，配置着两张背靠背的办公桌。在一张桌子上放着打开的收录机。两旁是一本白纸簿和一个手提包（是的，是海伦娜的），都有椅子在两张桌子旁边，一个金属帽架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挂着两件外衣，海伦娜的蓝雨衣和一件肮脏的男式军用雨衣。

“就是这里。”小伙子说。

“信就是在这里交给你的吗？”

“是的。”

至少在此刻，办公室里显得空得绝望。“海伦娜。”我喊叫。我的声音听上去如此焦急和忧惧。我感到颇为诧异。没有任何回答。“海伦娜。”我又喊道。

“你觉得她是……”

“看上去像是这样。”我说

“信上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说，“他们有否给你们其他房间？”

“没有。”他说。

“难道会在旅馆？”

“今天早晨我们就结了账。”

“那她应该在这里。”我说，于是他也开始用焦急、嘶哑的声音叫起来：“海伦娜！”

我去把隔壁房间的门给推开，另一个办公室：办公桌，字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篓，三把椅子，橱柜，帽架（与第一个办公室帽架一样的一个帽架：三架腿上竖着一根金属棒，顶端伸出去三根金属支架；因为上面没挂有衣服，它看上去像个人，像个孤儿；它的金属裸体和抬起的手臂的滑稽使我充满了焦虑）。只在桌子上方有一扇窗户，墙壁上空荡荡的，没有别的门通出去。显然在这幢房子里只有这两幢办公室的房间。

我们回到第一间房子，我拿起白纸簿，翻看它，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描述“国王们的骑马”的记录仓促潦草（根据我能辨认出的几个短语判断），没有进一步的临别赠言。我打开手提包：手帕、皮夹子、口红、带镜的小粉盒、两支零散香烟、打火机，没有瓶子装药片或药剂。我拼命思索海伦娜会干什么，此刻只能想到的就是毒药。但如果毒药是答案，那么就应该有瓶子。我走到帽架跟前，搜寻她的雨衣口袋：它们是空的。

“阁楼上呢？”小伙子急切不耐烦地说，显然他已得出结论，尽管我对房间的搜索才开始，但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我们奔到门厅，看见有两道门：一道门有一块毛玻璃，可以模糊看见后院；我们打开另一道门，发现一个不祥的楼梯，一层灰尘和煤灰铺在石梯上。我们奔上楼梯，马上就投入了黑暗：惟一的光线，阴郁、灰暗，从天窗射进来（天窗玻璃布满灰尘）。我们只能看清各种零星物品的轮廓（盒子，园艺工具，锄头，铁锹，耙子，大堆锉刀，一把拆散的旧椅子），每走一步我们都要被绊一下。

我想喊叫：“海伦娜！”可是非常害怕，害怕接下来又是沉默。小伙子也没有喊叫。我们找遍了这个地方，一声不吭地搜寻每一个角落，可是我能感受到我俩都很焦虑不安。事实上，这一切如此可怕正是由于我们的沉默。它表示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承认我们对回答已不再期望，我们只是在寻找一具尸体，吊着的或是俯卧的。

我们仍然没有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又回到办公室。我再次



把房间里的一切搜寻了一遍：办公桌，椅子，炫耀着海伦娜雨衣的那个帽架。然后我到另一个房间：办公桌，椅子，橱柜，另一个帽架，它的手臂绝望地伸出去。小伙子喊道（毫无缘由）“海伦娜”！而我（毫无缘由）打开橱柜，里面是一架架的卷宗，文具用品，粘胶纸，尺子。

“肯定还有别的地方！”我说“盥洗室！或地下室！”我们两次走到门厅。小伙子打开通向院子的门。院坝很小，有一个兔箱在一个角落里。院坝的另一边有一个果园，一些果树点缀着未修剪的草坪（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留心到这个果园是多么漂亮：斑驳的蓝天在绿色的树枝间，树桩屈曲不齐，在树桩周围闪烁着黄灿灿的向阳花）。接着在果园的尽头，在一棵苹果树诗一般的树荫下，我看见一间木板的乡下户外厕所。我朝它立即跑去。

在狭窄的门框上笔直地竖着用一根大钉子钉着的旋转木门闩。（把门闩转到水平位置上可以使门从外面关上）我从门框和门之间的缝隙里把手指伸了进去，轻轻地揪了一下，判断出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只能意味着：海伦娜就在里面。“海伦娜，海伦娜。”我小声地喊叫。任何反应都没有，只有苹果树枝触碰到小木屋的木板墙上发出的瑟瑟声。

反门上的厕所里静得使我向最坏的方面想。惟一的办法就是把门撞开，而只能是我来做这件事。我把手指伸进门框和门之间的缝隙，使劲一推。这门不是用钩扣住的，而是像乡间常见的那样，只是一根细绳拴住了它，所以立刻就打开了。我眼前出现的是，在恶臭的厕所里，木制的座位上，坐着海伦娜。她面色苍白，但还活着。她惊讶地抬眼望着我，本能地使劲拉裙子，但尽管她用了最大的力，也未能把裙子拉到大腿中部，她双手抓住裙边，紧紧夹拢着双腿。“我的天啊，出去！”她痛苦地叫着。

“怎么啦？”我冲她喊道，“你服了什么？”

“出去！别管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在我背后那小伙子出现了，海伦娜叫道，“走开，巴威尔！走开！”她抬起身，伸手去关门，可是在她和门之间我横在了那里，使得她踉跄地后退，一屁股又在木制座位的圆孔上坐下。

她立刻重新跳起身，向我绝望地猛扑过来（只有绝望才能使她产生这种力量，因为在她刚经历了那一切后，她只剩下了一点力气）。她用双手抓住我的短上衣的翻领，使尽全力猛推我。我们两个最后在门槛上扭斗“你这个畜生，你！你这个畜生！”她尖叫着（如果她那声音变弱的狂嘶可以称为尖叫的话），把我拼命地摇着。接着，突然间，她松开手，开始穿过草坪，朝院子的方向跑去。她打算逃走，可是没有成功。她慌慌张张又是仓促之下离开厕所，还没来得及把她的穿着整理好，她的裤衩（昨天我就知道了那条短裤，那条还可用作袜带子的松紧短裤）仍在她的膝盖上缠着，妨碍她前进（她的外衣也掉了下来，她的丝袜沿着小腿折起，可以从袜子下面看到袜子的黑色上边，以及系在袜子上的吊袜带）。她迈了几小步，或者说是跳了几下（她穿着高跟鞋），但是还不到十步就跌倒了（在洒满阳光的草上跌倒，一棵树的树枝下，一棵高大、绚丽的向日葵旁边）。我拉住她的手臂，想帮她站起来。她甩开我，我向她再次弯下身去时，她开始发狂地捶打，我挨了好几下才抓住她拉起来，像紧身衣一样用手箍住她。“畜生，畜生，畜生，畜生！”她狠毒地噓声咒骂，在我背上用空着的手连续捶打。当我尽量柔声地说“镇静点，海伦娜”时，她朝我的脸上啐口水。

我没有松手，说：“你不告诉我你服了什么，我不会放你走的。”

“滚开，滚开，滚开！”她发疯地重复道，突然她安静下来，一切反抗停止了，然后说：“让我走。”声音与刚才完全不同，虚弱而疲乏，我松开了手。使我非常害怕的是，我看见她的脸极度

痛苦地痉挛着，她的上下颚紧紧闭住，她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天空，她的身躯微微向前倾斜。

“怎么啦？”我问，她转过身一声不吭，朝厕所走去。她走路姿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被羁绊的腿缓慢、踉跄的步子；只有几码远的路，可她不止一次地被迫停下来，这期间，我意识到（从她身体抽搐的样子判断）她正在与她受了刺激的内脏进行一场战斗。她终于走到厕所，把门抓住（门仍然大开着），然后进去关上了门。

好一会儿，我就在我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那个地方呆呆地站着，突然从厕所传来一声痛苦的大声呻吟，我后退了一两步。这时我才意识到这里还有那位小伙子。“你留在原地。”我告诉他，“我去找医生。”

我跑进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电话机，它就在最近的那张办公桌上搁着。我找了半天电话簿，一本也看不到。我想拉开放电话机的那张桌子的中间抽屉，但抽屉已被上了锁，两边的抽屉也都上了锁，另一张桌子的抽屉也是锁上的。我走到隔壁房间，那里的办公桌只有一个抽屉，它并没有上锁，但里面除了几张照片和一把裁纸刀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并且开始感到困乏（现在我已知道海伦娜还活着，不会有致命的危险）。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发呆地盯着帽架（瘦骨嶙峋的金属帽架举着它的手，像一个士兵准备投降），然后我打开橱柜（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事可做）。在一摞宗卷上找到了青绿色封面的布卢诺及周围地区的电话簿。我拿到了电话机旁，找到医院的号码。我拨了号码，才听到最初的几声信号，这时小伙子冲到了房间。

“不用费事打电话了！这件事全过去了！”他对我叫道。

我没有明白过来。

他走上前，夺走了我手中的电话，把它放回去。“这件事全过去了，我告诉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要他解释他这话的意思。

“根本不是毒药！”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帽架前。他往那件男式军用雨衣的口袋里伸进了手，拿出一个小瓶子，打开它，倒过来；瓶子已经空了。

“你是说她服用的不过是这个？”我问。

“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

“我听她说的。”

“这是你的？”

他点点头。从他手中我拿过了瓶子。标签上写着“止痛药”。  
“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大剂量的止痛药可能有害吗？”我冲他叫道。

“里面的根本不是止痛药。”他说

“那么里面是什么？”

“轻泻剂。”他锐声说。

见他的鬼，在这个时候他竟敢和我开玩笑。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傲慢我再也无法忍受。我需要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由于我提高了嗓门，他也把嗓门提高：“瞧，我已告诉了你瓶里装的是轻泻药。难道人人都得要知道我的肠子乱糟糟的吗？”于是我明白了，我认为是一个愚蠢玩笑的，它却的确就是事实。

望着他，望着他的脸，通红的，他的狮子鼻（大得正好能容纳下众多的雀斑），我完全明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个阿司匹林瓶子是为了遮掩他那荒唐可笑的肠胃失调，正如工装裤和皮夹克是为了掩饰他那滑稽可笑的孩子气的脸一样。他感到羞愧，为了自己和自己身后拖着的永无止境的青春期。正是在这时我喜欢上了他。他的羞涩感（那种青春期的贵族气）救了海伦娜的命，免除了我的许多不眠之夜。我带着一种惶恐的感激之情盯着他那

空出的耳朵。是的，他救了海伦娜的命。但她为此付出的羞辱代价几乎难以忍受。这是很明显的，明显得就像这羞辱作为不适合任何目的、任何意义，看起来完全不公平的事实一样。可它也是一连串不可更改的环节中又一个不可更改的环节。我知道我有罪，我感到一种迫切（尽管模糊）的愿望，要跑到她身边去，从她的羞辱中拔出她来，对她表现我的谦恭和卑下，并承担这场无意义的残酷事件的一切指摘和责任。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小伙子吼叫道。我没有理睬他，走到他身边，进入门厅，转过身向后门方向走去。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他问我，从后面抓住我短上衣里的肩膀，想把我拉回去。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会。然后我抓住他的手腕，将他的手从我肩上挪开。他抢在我前面，站在门前，我朝他走去，打算把挡道的他推开，他一闪身对准我的胸膛打了一拳。

这一拳毫无力度，可是他跳开去，接着又跳回来，幼稚地模仿着拳击手的姿势。他的神情里恐慌和鲁莽的勇气相互掺杂。

“她一点也不需要你！”他冲我叫嚷。我一动不动。忽然我想到他也许是对的，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我没有能力改正。见我站在那里毫无防御，他朝前迈了一步，嚷道：“她受不了你的卑鄙无耻！她才不在乎你他妈的会怎么样哩！她对我说了！她才不在乎哩！”

神经紧张即可以使一个人哭，也可以使一个人笑。小伙子最后几句话很实在，这使我的嘴角开始抽动。这使他怒火喷涌。这次他从正面朝我扑来，我努力躲开他连续不断的进攻。接着他再一次跑开去，举起拳头，看起来像个拳击手一样，可这次拳头遮住了他的脸，只能看见他那对粉红色的大耳朵在拳头的后面。

“够了。”我说，“我马上就走。”

“胆小鬼！”他在我后面喊道，“懦夫！我知道一切都是你干的！我饶不了你，你这个杂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来到街上。街上冷冷清清，这样的情景通常出现在游行式节日之后的街上。一丝微风卷起灰尘，沿路平着把它卷走，没有一个人，就像我头脑里什么都没有想一样……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那个空瓶子还在我手里，我瞧着它，它已经完全用旧了：显然它长期被用来伪装那个小伙子的轻泻剂。

这瓶子使我想起另外两个装着亚历克谢的巴比妥酸盐的瓶子。它们使我意识到这小伙子实际上并没有救海伦娜的命：即使瓶子里是止痛药，它也只能使她肠胃不舒服罢了，尤其我和这个小伙子就近在咫尺，在距离死亡还有相当安全的范围处，海伦娜的绝望跟生命清了账。

她正站在厨房里的火炉旁，背对着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弗拉吉米尔呢？”她并不转身回答说：“你自己看见了他。干嘛还问？”“你在撒谎，”我说，“今天早晨，弗拉吉米尔搭小库茨基的摩托车走掉了。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知道这件事。我知道为什么早晨你这么重视那个蠢笨的女记者。我知道为什么给国王穿衣时不许我进去看。我知道国王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在骑马开始之前。你们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我的有理有据使她愣了片刻，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试图以攻为守。这是一场古怪的进攻。因为进攻的双方不是面对面站着的。她背对着我，她的鼻子前面是咕咕作响的汤。她的嗓门也并没有抬高。她的声音差不多是冷漠的。这好像是在表明，她告诉我的事是其他所有人多年来已知道的事，她之所以要对我解释，只因为我是如此地愚蠢，又怀着那么荒唐的想法。如果我需要的就是这个，那好。弗拉吉米尔从来就不想当国王，从一开始就不想当。对此乌娜斯塔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有一段时间，整个骑马活动可以由小伙子自己组织。而现在在这件事上组织却有干预，甚至包括党的区委会。人们再也不能独自动手。一切都是由上面操办。小伙子们本来挑选了他们自己的国王，可上面却把弗拉吉

米尔推荐给他们，以取悦于他的父亲，他们不得不赞同。然而弗拉吉米尔对借助父亲的力量而被挑选出来感到羞耻。没有人喜欢那些攀权附势的人。

“你是说弗拉吉米尔感到羞耻是因为我？”“他不想倚仗你的权势。”她重复道。“他之所以与库茨基家如此接近，原因就在于这个。”

“那些弱智？那些小资产阶级？”我问。“正是如此。”乌娜斯塔说，“由于他爷爷的原因米沃什不能上大学。只因为他爷爷曾拥有一个建筑公司。弗拉吉米尔却可以干任何他想干的事。只因为他的父亲是你。这对他是很难堪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生平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我被他们欺骗了。在我变得愈来愈激动的期间他们一直在冷漠地注视我。瞧着我把自己搞成一个郁郁寡欢的笨蛋，他们先是冷冷地欺骗我，然后又冷冷地观察我，“难道这样欺骗我对于你们真的是必要的吗？”

乌娜斯塔在面条里撒上盐，然后说，我总是把事情变得很复杂。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一个幻想家。他们不想剥夺我的理想，除了弗拉吉米尔。他不喜欢我的唱歌和高喊。这使他烦躁，烦躁得想哭。对于这一事实我必须接受。弗拉吉米尔具有现代观念。他像她的父亲。那是一个知道怎样才算进步的人。还是在战前，他在村子里就第一个有了拖拉机。后来他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自从田地归入合作社后，它们的产量就只有从前的一半了。

“我对你们的田地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弗拉吉米尔去哪了。他到布尔诺看摩托车比赛去了，你就承认吧。”

她背朝我站着，一边说话一边搅动面条。弗拉吉米尔长得就像他的外祖父。他的下巴和眼睛就像他的。不管怎样，弗拉吉米尔对“国王们的骑马”不感兴趣。是的，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他是看比赛去了。他此刻正在观看比赛。那又怎么样呢？他关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是摩托车而不是那些被饰带蒙住眼睛的老马。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弗拉吉米尔是现代人，当代人。

摩托车，六弦琴，摩托车，六弦琴。这个世界是愚蠢的，不可理喻的。“现代人和当代人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背对我站着，搅动着面条，回答说，我甚至不让她把我们的住房现代化。我甚至连买一个现代的落地灯都要大呼小叫！我也不喜欢现代的灯光设备。大家都认为落地灯很漂亮。如今这种灯正是人们想买的。

“够了。”我对她说，但无法让她停止说话。她已经变得非常兴奋。她的背对着我。她那瘦小的充满恶意的尖尖的背。正是这个给我印象最深。这个背。这个不长眼睛的背。它洋洋得意、自命不凡，像堵墙一样。我想叫她住口。把她扳过来面对我。可是她是如此地让我憎恶，以至于我根本不想碰到她。我决定用别的方式使她转过来。我打开橱柜，从里面取出一个盘子，把它摔在地上。她立刻停了下来，话只说了一半。但是她并没有转过身。又一个盘子，一个接一个的盘子。她仍然背对着我。朝前弯着身子。从她的背我看得出她害怕了。是的，她害怕了，可她却更加执拗。她不愿意让步。她不再搅动面条，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手里紧握着木勺，仿佛它可以救她的命似的。我恨她，而她也恨我。她没有动弹，我也一直盯着她。我只是不停地把橱柜架上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扔在地上。我恨她，我恨她的整个厨房。她的现代式的厨房，以及这些现代橱柜，现代盘子，现代杯子。

我没有感到心里不安。看着满地碎裂的瓷器，乱七八糟的碗，我平静，哀伤，疲惫不已。我摔在地上的是整个家。我曾爱过这个家，并把它看做一个避难所。在这个家里我曾忍受穷人的女儿温情的控制。我曾使这个家充满了民间故事、歌声和愉快。我们曾坐着吃饭的就是这些椅子。啊，好一位容易上当的养家者的被蒙骗，被欺瞒，每日里被这些平静的家具所目睹。我捡起一



张又一张的椅子，折断它们的腿。我把它们摔在罐子和破碎的瓷器旁的地板上。然后我把厨房桌子掀翻在上面。乌娜斯塔依然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火炉旁边。

我走出厨房，走进我的房间。天花板上有一个红色球形灯罩，屋里有一个现代式落地灯和一个难看的现代式床。簧风琴上的黑盒子里放着我的小提琴。我把它拿起来。四点钟我们要在露天饭店举行一场音乐会。现在才一点钟，我能到哪儿去呢？

我听见厨房里有哭泣声，乌娜斯塔正在哭。她的哭声凄凄惻惻，我心中隐隐感到一丝后悔。为什么十分钟前她不哭？也许那会使我再次相信这个老穷人的女儿的幻想。然而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离开了家。村子屋顶上空还飘荡着祈祷声。我们有一个贫穷而正直的国王。我可以到哪儿去呢？街道属于“国王们的骑马”，家属于乌娜斯塔，酒店属于酒鬼。我属于哪里呢？一个已过盛年而被抛弃的国王，一个贫穷而忠诚的国王，一个没有继承者的国王，最后一个国王。

庆幸的是，村子外面有一些田野。一条道路，到摩拉瓦河只需十分钟。我躺在河岸上。头下垫着小提琴盒子。我在那里躺了很久。一小时，也许是两小时。思考着我如何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日复一日，突然之间，到了。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无从知晓。我总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相信它们的相互协调。这是一个错觉。此刻其中的一个世界已经把我赶了出来。真实的世界，现在留给我的只有那虚幻的世界。然而我不可能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里生活。即使他们期望我在那里。即使那个逃兵在召唤我，一匹马和一个红面罩已为我备好。是的，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许我揭下我的面罩。并且坚持所有的一切只能由他来告诉我！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王的脸必须蒙上面罩！不是为了防止他被看见，而是为了防止他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像不到自己站起来走路。我想像不到自己走出一步。他们在等着我四点钟去，可是我没有力气站起身到那里去。我喜欢这里，靠着河边，这里河水从古老年代开始就静静地流淌。河水静静地流着，我愿静静地躺在这里，在这里躺很久，很久。

后来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卢德维克。我猜想又有一个打击来了。并不是我害怕，现在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震动了。

他在我身旁坐下，问我去不去参加下午的演出。“你不会说你准备去吧。”我说。“我要去。”他说。“你就为这个而来？”“不。”他说，“我来不是为了这个。但事物总是与我们预料的不同。”“是的。”我说，“是很不同。”“我在田野里散了一小时的步。我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你。”“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你。”“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并未直视我的眼睛。就像乌娜斯塔一样。他不能直视我的眼睛。但是他这样我并不在意。我觉得他这样反而使人感到安慰。我认为，这是一种冷漠。这种冷漠使我感到温暖和慰藉。“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我想知道今天下午的演奏你愿不愿意让我参加。”

还有几个小时下班才会发车，按照我内心的意志，我悄悄离开村子，来到田野，尽量想把头脑中今天所有的想法赶走。这件事不太容易：我能感觉到我的嘴唇上被那个小伙子的拳头揍过的地方正在肿起来，露茜的影子再次出来提醒我，我努力为自己报仇雪恨，结果却害了别人。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我脑子里完全逐出去：这件事我想了许多遍才完全理解。我极力让自己的头脑一片空白，只盛下骑手们的呼喊（现在几乎听不见了），让这些呼喊把我带出自己，带出我的生活经历，给我一点解脱。

我选择那些围绕村庄的小路，最后来到了摩拉瓦河岸，顺流而行。在河对岸近处有几只鹅，远处是一片林地，两处之间只有田野。然后我看见在前面的草丛里有一个人躺着。走近后，我认出他是谁了：他仰天躺着，望着天空，头底下枕着他的小提琴盒

子（四处都是田野，平坦而辽远，好像它们已存在了许多世纪，只有几个新修的铁塔和高压线破坏了这个局面）。我很容易从他面前过去，他被天空深深吸引住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但这次我不想避开他，我极力避开的是我自己，避开我自己和我那些顽固的想法。于是我走向他，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使我震惊的是他眼里的胆怯和恐惧，我注意到（许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就近看他）他那浓密的把他很高的个子又增高了一两寸的头发，现在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几根：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剩下几根可怜巴巴的头发，那些不见的头发使我想起我已多年没见他了。我突然感到后悔，这么长时间没有同他联系，一直在回避他（此时远处传来骑手们隐约的喊声），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歉疚的感情。他躺在我面前，用一只肘支着地，显得又大又笨，而他的小提琴盒子却显得又小又黑，像一个婴儿的棺材。我知道他的乐队（曾经也是我的乐队）将在下午演出，于是我问他我能否加入他们。

我未经思考就提出了这个要求（言语似乎先于思想）。但这个请求尽管很轻率，都符合我此时的心情。此刻，我对遗失在多年前的一个世界充满了悲哀的爱的感情，这是一个遥远而古老的世界，在那里骑手们绕着村庄前进，陪同着戴面罩的国王，在那里人们穿着白色的百褶裙在街上唱歌，这个世界使我和我的家，我的母亲（我被绑架的母亲），我的青春的意象交织在一起。整整一天，我内心一直默默滋长着爱情，现在它突然爆发出来，差一点化作眼泪。我爱那个失去的世界，恳求它给我提供避难所。

但是凭什么呢？就在前天我不是还不理睬雅罗斯拉夫，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体现了可恨的民间音乐吗？就在今天早晨我不是还心怀憎恶指责过民间节目吗？是什么突然之间将那些障碍推倒，那些十五年来阻止我体味我在辛巴隆乐队度过的年轻的记忆，常常使我不能快乐地回家的障碍呢？难道是因为几小时前泽门尼克嘲讽过“国王们的骑马”的原因吗？难道给我灌输对民歌的憎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是他而现在清除我的厌恶感的又是他吗？我真的只是罗盘的指针，而他却是天箭座星座吗？我真的是如此不光彩地依靠他吗？不，我之所以能恢复对民俗、民歌和辛巴隆乐队和这个世界的热爱，不仅是因为泽门尼克的嘲笑。我能重新爱它的主要原因是，今天早晨我意外地发现它坍塌了，不仅坍塌了，而且被遗弃了，被夸口和叫嚷抛弃了，被政治宣传和社会乌托邦抛弃了，被一群文化官员和我同时代人的虚情假意抛弃了，甚至被泽门尼克抛弃了。这个世界正因这种被遗弃的状态而纯净了。这个世界被清洗了，就像一个即将断气的躯体受到清洗一样。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最后的美照亮了这个世界。这个被遗弃的状态把它还给了我。

演出定在露天饭馆举行，不久前我曾在那里吃过午饭，读过海伦娜的便条。当我和雅罗斯拉夫到达那里时，有几个上了岁数的人已坐在桌旁（耐心地等待音乐会开始），还有几个人数差不多的醉汉在桌子中间摇摇摆摆地穿来穿去。在后面那棵有着华盖一样的树冠的椴树下摆了几张椅子，靠树桩放着一把裹着灰色帆布的低音提琴。一个身穿白色褶衬衣的男人正在默默地用木槌敲着辛巴隆琴弦。其余的乐手站在附近，雅罗斯拉夫向我一一介绍他们：第二小提琴手是本地医院的医生。低音提琴手是区议会管文化事务的视察员。单簧管手（他同意把他的乐器借给我，跟我轮流演奏）是小学教师。辛巴隆琴手是工厂的经济计划员。我好像唯一记得的人就是他。除了他和雅罗斯拉夫，乐队里全是新手。雅罗斯拉夫非常有礼地向听众介绍我，说我是乐队的一名老战士，创建乐队的成员之一，今天是荣誉单簧管手，接着我们在树下坐好，开始演奏。

虽然我的手已经多年没握过单簧管，但我们开始演奏的这首歌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一首，特别是当其他人对我赞赏不已，不相信我已多年没演奏过之后，我很快就克服了最初的怯场。这

时，那个服务员（正是几小时前我匆匆忙忙付钱给他的那一位）拖来一张小桌，把它放在树下，给我们摆下一坛酒和六个杯子，我们不时呷上一口。奏完几首歌后，我朝那位教师点点头，他接过单簧管，再次告诉我他认为我演奏得太棒了。我非常高兴。靠着树桩，观看乐队继续演奏，一种久已遗忘的友谊感穿透我全身，在这可怖的一天结束之际，它令人欣慰的出现让我感谢。突然，我面前浮现出露茜的样子，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先是出现在理发店，然后又出现在科斯特卡的故事里，她那真实和虚幻混杂的故事里：这是因为她想告诉我她的命运（一个被强奸者的命运）与我的命运非常相似。尽管我们没能互相了解，失去了对方，但我们的生活经历却是不可分的，纠缠在一起的，一致的，因为二者都有备受蹂躏的经历。正如露茜遭受了性的蹂躏，因而生活中最根本的价值被剥夺了一样，我也同样被剥夺了我最初想以此而生活的那些价值，那些纯净的价值，是的，纯净。性爱，尽管对露茜来说可能是备受蹂躏的，但仍然是纯洁无罪的，正如我们地区的民歌以及演奏它们的这个乐队是纯洁无罪的一样，这个地区本身，尽管我渐渐开始憎恨它，伏契克，尽管我忍受不了他的画像，“同志”这个词，虽然我总觉得它包含有某种威胁意义，还有“未来”这个词，以及许多其它词，都是纯洁无罪的。这个别的地方的过错，它如此之大，以致一大片广阔领域被它的阴影笼罩，它笼罩了纯净事物（以及纯净词汇）的世界，正在蹂躏它们。我们，露茜和我，生活在一个备受蹂躏的世界里。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去同情那些被蹂躏的东西，我们便转过身去不睬它们，在此过程中既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露茜，我的露茜，我爱得如此深而又如此笨拙的露茜，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就是为此而来的吗？来替这个被蹂躏的世界做辩护吗？

当这首歌曲结束时，那位教师把单簧管递给我，说他今天就演奏到这里，我吹奏得比他好，我应该尽可能多吹一会儿，因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再会回来。为了让雅罗斯拉夫注意我，我说我会很高兴尽快找一个机会回来看望他们，雅罗斯拉夫问我说的是不是真话。绝对是真话，我说，于是我们开始演奏下一首歌曲。雅罗斯拉夫早已丢开他的椅子，头往后仰，小提琴——违反所有规则——靠在他的胸脯上，一边演奏一边走来走去。我和第二小提琴手也不时站起来，尤其是当我们的即兴演奏需要更多空间发挥时。在这极度冒险的时刻，当我们的创造力、准确性，以及对乐队的感情经受考验时，雅罗斯拉夫成了我们大家的主心骨，这位有着巨人般的躯体引人着迷的乐手让我充满赞赏之情。雅罗斯拉夫也（实际上比别人更加）代表了我生活中遭到蹂躏的价值：他曾经从我这里被夺走，而我（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损失和羞辱）却放他走了。我最忠诚，最正直，最清白的朋友。

这期间，听众中慢慢起了一些变化：从一开始就带着热情倾听我们演奏的人只占了一半座位，另一半空座位大都被一群年轻人（也许是来自村里，更可能是来自城里）占据了。他们要了啤酒和白酒（同时大叫大嚷），很快，当酒精产生作用，他们就无法自制地急着被人看见、听见、认出。结果，完全改变了气氛，变得更加喧闹，更加紧张（小伙子们摇摇晃晃地在桌子中间穿过来穿过去，相互喊叫，对他们的女朋友喊叫）。我突然意识到我并没有在音乐上集中我的注意力，而是一直斜视着桌子，怀着公开的敌意观察那些年轻的面孔。瞧着这些长发的小家伙唾沫横飞，胡言乱语，大肆炫耀，我突然觉得我又恢复了对那个不成熟的最后堡垒的旧恨，我看见自己周围是一伙三流演员，戴着愚笨迟钝的男人气和傲慢的残忍的面具。尽管这些面具遮蔽了其他更具人性的脸孔，但我并没有从这个想法中得到多少安慰，因为真正的恐惧在于，这些戴面具的脸也是那么狂热地忠于面具的残酷和粗俗。

显然雅罗斯拉夫也和我情绪一样，因为他突然放下小提琴

琴，说他不想要再演奏给新来的听众了。他建议我们离开，找一条穿过田野的小径，就像我们很久以前常做的那样。这是一个晴朗的天，夕阳即将落下，但夜晚将很温暖，星星将会出来，我们可以奔向某一处野玫瑰丛，像我们以前常做的那样演奏给我们自己，演奏给我们自己欣赏。他对我们养成的只在预定场合演奏的习惯（愚蠢的习惯）已经受够了。

起初大家都表示赞同，几乎显得如释重负，他们也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加亲近的环境来阐释他们对民间韵律的激情。但这时那位低音提琴手（文化事务的视察员）指出，我们已答应要演奏到九点。区议会的同志们等待着我们，饭馆的经理也等待着我们。已经这样安排了事情；我们得履行我们的职责。否则，节日的整个安排都会搞糟了，我们可以选择别的时间去田野里演奏。

正在这时，一串连在棵棵树上的电线上的灯突然间一齐亮了。由于天还没有黑，甚至还没到黄昏，这些灯一点光也没有，只能像大滴冻结的，不愿被擦去，但也不会掉下的苍白的泪珠，挂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场所里，一种说不出的，似乎无人能抵抗的忧郁突然被它们带来。雅罗斯拉夫再次请求我们（几乎是央求我们）停止演奏，漫步到田野中，到野玫瑰丛那里，去为它们的快乐演奏，但突然他做了一个听天由命的手势，把小提琴重新靠在他的胸前，开始演奏起来。

这次，我们没让听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是更加聚精会神地演奏。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冷漠、愈粗狂，我们就愈感到周围像是一个荒岛，愈变得是在为自己演奏，到最后我们想法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创造出系列奇妙的音乐，就像沉浸在海底的一间与那群醉鬼隔开的玻璃屋里。

“即使高山是纸墨，即使星星是书记，即使整个世界都帮助他们思考，他们也不能起草我情人的真正遗嘱。”雅罗斯拉夫唱道，没有从胸脯上移开小提琴，我从这些歌曲里（在歌曲玻璃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感到愉快,在这里悲伤中没有调侃,欢笑中没有嘲讽,爱情中没有玩笑,仇恨中没有羞怯,在这里人们用他们的整个肉体 and 灵魂去爱(是的,露茜,用整个肉体 and 灵魂),在这里人们因欢乐而跳舞,因绝望而跳进多瑙河,在这里爱情依然是爱情,痛苦依然是痛苦,价值摆脱了践踏。在这些歌曲里,我感到自由自在,我感到我来源于它们,它们的世界在我身上印下了永久的痕迹,这是我的家,如果我曾经背叛过它,只是因为由此我使它更成为我自己的(因为还有什么声音比我们曾伤害过的家的声音更哀怨的呢?)。然而同时我也意识到,我的家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如果它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歌唱演奏的所有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回忆,一个纪念物,一个对某种消逝了的东西的形象的再现,我感到故乡的坚实的土地正在我脚下沉没下去,我手里拿着单簧管,也正在陷没,陷没在过去岁月和世纪的深渊,深不见底的深渊(在那里爱情就是爱情,痛苦就是痛苦),我对自己惊讶地说,我惟一真正的家就是这陷没,这完全的,急迫的陷没,我沉湎于它,体味着这种感觉的眩晕。

我看了看雅罗斯拉夫,想知道是否只有我一人处在极度亢奋中,我注意到(一盏挂在椴树上的灯笼照亮了他的脸)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我注意到他紧紧地咬住嘴唇,已不再歌唱,一种恐惧的眼神从他忧虑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开始拉错音符,他握小提琴的那只手在慢慢往下滑。突然,他停止演奏,一下子倒在椅子上。“怎么啦?”我在他身边跪下问道,汗水从他脸上淌下来,他把左手臂抬高到肩膀处,说:“痛得要死。”其他的人仍然沉浸在音乐的魅力中,在单簧管和首席小提琴退出的当口,辛巴隆琴手本能地独奏起来,只有第二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在伴奏。但是我马上走到第二小提琴手身边(我记得雅罗斯拉夫曾介绍说他是一个医生),叫他去看看雅罗斯拉夫。辛巴隆琴和低音提琴仍在继续演奏,第二小提琴手先是握住雅罗斯拉夫的左手腕,好像握了很



久，然后他翻开雅罗斯拉夫的眼睑，向他的眼睛里透视，最后他摸摸他布满汗珠的前额，问：“是不是心脏痛？”“手臂和心脏都痛。”雅罗斯拉夫说，他脸色发青。这时低音提琴手已经注意到我们，他把琴靠在树上，朝我们走来。现在演奏的只有辛巴隆琴手一个人了，他陶醉在自己的演奏中，根本没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我这就去给医院打电话。”第二小提琴手说。“是什么病？”我轻轻地问。“脉搏实际上已经摸不到了，而且他一直在出冷汗。如果以前有过这种症状，那么就是冠心病。”“啊，上帝！”我不禁叫出来。“别着急，他会好起来的。”他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向房子跑去，用力挤过人群，那些人已经醉得注意不到音乐已停止，他们一门心思在自己身上，在他们的啤酒，他们的胡说八道和他们的相互谩骂上，在花园的另一角，辱骂已发展成了一场斗殴。

辛巴隆琴手终于停止了演奏，我们全都围着雅罗斯拉夫站着，他抬眼看着我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刚才留了下来，他本来不想留下来，他本想到田野上去，尤其是我既然已经来了，在满天星光下演奏一定会非常美妙。“别激动。”我对他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安静。”然而我在心里却对自己说，虽然他可能像第二小提琴手断定的那样恢复起来。但他却将过着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不激情演奏，不能自己举办音乐会的生活，一种在死神监控下的生活，我不禁想到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他还活着时就已结束，而雅罗斯拉夫的命运已告结束了。我悲痛万分地抚摸着他的秃头和几根企图遮住头顶的悲哀的长发，大为震动地意识到，我这趟回家原本是为了向我的敌人泽门尼克寻仇，可结果却是我的朋友雅罗斯拉夫遭受了挫伤（是的，此刻我可以想象他被我抱在怀里，我抱着他，搂着他，尽管他又大又重，我抱着被自己隐瞒起来的罪过。我可以想见自己抱着他穿过漠然的人群，一边走一边哭。）

我们围着他站了大概十分钟，这时第二小提琴手回来了，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打了个手势让我们扶他起来，从胳膊下架住他，扶着他穿过那群醉酒疯闹的年轻人，来到街上，一辆白色救护车已亮着前灯，等在那里。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完稿